

【美】D·H·帕金斯 等著
顾志耘 编译

走向21世纪:

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其首要问题是:改革如何打破传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这里通过对中国少数的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前言 1

Translators' Preface 1

〔澳大利亚〕郭益耀

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 1

Y. Y. Kueh (Australia)

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1

〔澳大利亚〕奥德丽·唐尼索恩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 33

Audrey Donnithorne (Australia)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3

〔美国〕托马斯·P·莱昂斯

关于中国经济分割化的解释：体制分析 51

Thomas P. Lyons (USA)

Explaining Economic Fragmentation in China,
A Systems Approach 51

〔美国〕克里斯廷·P·W·黄

短缺经济学和中国工业改革中的问题 82

Christine P. W. Wong (USA)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nd Problems of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82

〔澳大利亚〕郭益耀

1979—1983年中国农业新政策的主要经济结果 109

Y. Y. Kueh (Australia)

China's New Agricultural-Policy Program,
Major Economic Consequences, 1973—1983 109

〔澳大利亚〕安德鲁·沃森 克里斯托弗·芬德莱 杜荫堂

谁在羊毛大战中取胜？中国农产品市场案例研究 121

Andrew Watso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Du Yintang (Australia)

Who Won the "Wool War" ? : A Case Study of
Rural Product Marketing in China 121

〔香港〕饶余庆

中国1978—1989年的金融改革：回顾和再评价 130

Y. C. Jao (Hong Kong)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1978—1989, Retrospect
and Reappraisal 130

〔新加坡〕黄朝翰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171

John Wong (Singapor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171

〔美国〕D·H·帕金斯

中国能成为亚洲下一个经济巨人吗？ 203

Dwight H. Perkins (USA)

China, 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203

〔美国〕阿伯特·基特尔

2000年的中国经济 261

Albert Keidel

China's Economy in the Year 2000 261

〔新加坡〕黄朝翰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底为多少? 279

John Wong (Singapore)

What is China's Per-Capita GNP? 279

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

澳大利亚 郭益耀

译者的按：经过4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应如何评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战略呢？特别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取得的；中国在工业化地区布局方面，如沿海—内地的工业差距方面，是有所缩小还是反而扩大了；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是否有益于传统的小工业，也就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是否具有“溢出”效应？这里译的郭益耀的论文，讨论了上述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郭益耀 (Y·Y·Kueh) 为澳大利亚麦科理大学经济与财政学院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讲座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本文译自英国《中国学季刊》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特辑。”^①

^①Y·Y·Kueh, 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40 Years", 1989, pp. 420-447.

任何试图评价中国过去40年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必然遇到三个关键性问题：第一，在何种程度上工业化的成功是以减慢农业增长为代价的，这是苏联式的强制工业化的结果；第二，意识到需要缩小不发达的内地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国领导人是否成功地纠正了工业生产中地区间的不平衡；第三，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否有益于传统的小工业。根据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第三个问题是重要的，也就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变化对传统产业部门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这些问题虽然较为一般，但意义重大。特别是过去40年，中国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衡之间的本质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也许讨论另一问题也相当重要：即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部门间、地区间和产业内部的技术差别以及不平等。

本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工业化的途径和类型的角度讨论中国工业的实绩、工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和技术变化。这里的分析要联系产业变动的政策背景。我们要用较多的注意力分析工业发展的地区问题，这就是繁荣的沿海地区和贫穷而又广大的西北、西南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这是历史上存在的，又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70年代后期以来对毛泽东工业化战略的修正，讨论这种修正的性质和范围，特别是对现存的部门差别、地区差别和技术差别的长期效应。这也包含着讨论新发展战略是如何影响着中国摆脱中央计划的苏联体制以及同西方的关系。在简短的结论中，我们要估价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经济分散化和进一步卷入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具有潜在的好处，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需要通过继续集中控制储蓄、投资和工业自给自足来加速重工业的增长。这方面的讨论有助于分析同

工农二元化、地区不平衡和技术不对称有关的中国未来的工业趋势。

中国的工业国地位

40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绝对额衡量，中国是世界第七；以工业产出衡量，仅次于美国、苏联、日本、西德和英国，为世界第六。中国也是某些关键的工业商品的主要国际生产者，如发电和原油生产为世界第六位；化纤生产为第五位；钢产量为第四位；化肥产量为第三位；煤和水泥为第二位，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①人均生产可与中国战前的最高水平相比，即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相比，中国也是相当不错的。

技术进步导致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国内产业部门结构的显著变动。表1（使用中国的国民收入定义）表明，工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1952年为23%，1987年为52%，几乎增加了30个百分点；相同时期，农业相应地从58%减少到34%，差不多减少了24个百分点。工业在国民收入份额中的急剧提高，是罕见的历史现象。例如，在工业化过程的最初40年或50年间，英国在1801—1841年期间工业份额只上升了11%，日本在1878/1882—1923/1924年间提高了22%。^②在战后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中，恐怕只有台湾在这方面能同中国大陆的可观记录相比。^③

^①排名是以1984年为根据的，资料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第206页。

^②参阅K·C·Yeh，“调整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中国学季刊》，第100期，1984年12月，第701—702页。

^③参阅Simon Kuznets（西蒙·库兹涅茨）：“增长和结构变动”，载Walter Galenson编，《台湾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台北，1979）第56—57页，第124页。

表1: 中国1952—1987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产出和劳动力中的相对份额

	1952 官方	1957		1978		1982		1987 官方
		官方	Yeh	官方	Yeh	官方	Yeh	
净物质产品份额								
农业	57.7	46.8	58.7	32.8	37.9	40.4	38.8	33.8
工业	23.1	33.9	16.8	53.6	41.7	50.6	43.9	52.3
服务业	19.2	19.9	24.5	13.7	20.4	8.9	17.3	13.8
劳动力份额								
农业	—	86.3	81.2	76.0	73.8	73.9	70.2	66.6
工业	—	8.1	7.6	18.9	15.5	20.3	16.3	24.9
服务业	—	5.6	11.1	5.1	10.7	5.9	13.5	8.5
劳动力人均相对产出 (%)								
农业	—	0.5	0.7	0.4	0.5	0.5	0.6	0.5
工业	—	4.1	2.2	2.8	2.7	2.6	2.7	2.1
服务业	—	3.6	2.2	2.7	1.9	1.5	1.3	1.6

注释和来源: 官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988》, 其中净物质产品(以当前价格计算)第 51 页; 1978、1982、1987 年的劳动力, 第 154 页。1957 年劳动力数字出自《统计年鉴 1983》, 第 122 页(工农业); 以及 K.C. Yeh, 《调整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 《中国学季刊》, 第 100 期(1984 年 12 月) 第 716 页(关于服务业, 即交通和贸易)。把 Yeh 文中指出的 1957 年建筑业就业人数(401 万)加上工业就业人数(1401 万人)(见《统计年鉴 1983》第 122 页)。注意除开建筑业就业人数外, 1978、1982 和 1987 年工业就业人数还包括了地质、勘探行业的就业人员。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仅仅包括交通、通讯、贸易和公共食堂。但并未包括从事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管理部门(这都包括在西方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中)。因此这里劳动力概念同中国的净物质产品包含的面是一致的。净物质产品包含的部门为农业、工业和那些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行业。Yeh 的数据包含了整个服务业。

更引人注目的在于技术引进方面。中国掌握了模仿西方的高技术。明显的例子是发展了洲际导弹、卫星技术,当然在其他一些工业技术领域方面,中国也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先行者。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仅是西德、法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的几分之一,它们也是中国的工业前辈,现在则认为用中国火箭发射它们的卫星是有益的。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技术二元主义。但在中国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还有工农业技术之间以及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差别,都是十分惊人的。^①

工农业之间的二元结构

经济不同部门中就业和产出份额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衡量部门间技术不平衡的总量指标。因此表1指出,1987年工业劳动力只占总劳力的25%,但占国民收入52%;相反,农业部门其相应的份额分别是67%和34%。换句话说,从总劳力中抽取1%的劳力投入工业可得到2.1%的国民收入,投入农业只得到0.5%的国民收入。

工农业间生产率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多年来为了取得最大的工业增长,始终把投资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同时这也反映了控制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到城市工业中的有效性。这种控制有效地限制了在新工业化国家里常常看到的所谓“平等化趋势”,即城市生产率

^① 技术二元主义 (technological dualism) 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特别是 R·S·Eckaus 在50年代提出的,用来说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作为殖民统治结果的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同广大不发达的乡村内地之间的对立现象。后来,据我所知, Alexander Eckstein 教授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用这个概念来描述50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发展战略。参阅他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增长和外债,对美国的政策含意》(纽约,麦格劳-希尔,1966),第32页。

和工人工资的迅速改善吸引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市，从而反过来降低城市生活水平，减轻农村可耕地方面的压力。

即便如此，表1也确实显示了1978年以后工农业间的生产率差距在缩小。我们很难估计农业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在多大程度上归之于邓小平的乡村改革计划。可以肯定的因素还有对城乡间人口迁移放松控制以及大批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的城市青年重新回城。相对于农村而言，降低了平均的城市工业生产率水平。这些迁移进城的劳动力不仅为城市服务业吸收，而且也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初级的小工业活动。

同时也要注意原先由乡村经营的乡村工业从农业改划为工业生产一类。^①表1中列出的部门相对生产率是根据新的分类(对1987年及前几年有效)，统计上的变动也使工业劳动力的相对产出减少，因为原先认为是农业的乡村工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其附加值较小的农产品加工业。同时也要记住，乡村工业劳动力只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但现在则在城市工业劳动力中占有可观的比例，虽然相对于总的乡村劳动力来说，城市劳动力数量仍然较少。

上述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近来乡村和城市生产率的比较趋势，尽管有上述“平等化”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显著的仍然是城市和乡村生产率和收入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地区间工业分布的不平衡性

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不平衡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要纠正工业集中

^①关于重划之前中国乡村工业中的各种问题，请参阅我的《中国的经济计划和地方动员》(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伦敦大学，1985年《学习和研究笔记》，第7期)。

在沿海地区的倾向,重视内地工业。^① 在文化革命中,考虑到战备的需要,采取地区工业自给自足的战略,便把这一问题引向极端。在为了备战需要而仓促建设的地方工业自足体系中,根本忽略了建立在区域和地方专业化合作基础上的经济理性。^②

强调地区内自给自足工业体系的最明显例证是文化革命时期实行的所谓“三线建设”,估计在1966—1970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有53%的投资投入了远离西北铁路线以西地区的工业和有关的项目。^③

上面回顾的是50年代以来工业地区分布变化的背景。尽管有“三线建设”这样的浪费^④,50年代以来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变化很大,沿海省份(官方口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的份额相对于内地下降了,从1952年的69%(1957年为67%)下降到1978年的61%(见表2)。确实,从

^①转引自 Charles R. Croll, K. C. Yeh, 《沿海和内地工业平衡发展问题》,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5),第81—93页。

^②关于这一课题有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估计的西方文献。较早的有 E. L. Wheelwright 和 Bruce McFarlane,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纽约和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Nicholas Lardy,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计划:中央—省际财政关系》,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第94—115页,该文的观点同 Audrey Donnithorne 的《中国的预算和计划:中央—地方经济关系》(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2)一文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两文都讨论中央控制和地区自给自足的程度。关于最近的讨论,参阅 Thomas P. Lyons 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一体化和计划》(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

^③参阅 Tien-tung, Tun-oy Woo,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15期(1986年1月),第72页。这里引证的数据该文没有注明来源。

^④许多工程建设缺乏足够的辅助设施。

1978年以来,工业产出的地区分布基本不变。正如菲尔德所说的那样:似乎是政策的重点在转移,“从发展内地(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到发展那些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完善的地区。”^① 这种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政策,起码能使内地工业的份额不再上升。我们无法肯定当前的分散化措施会导致工业分布回到1952年那时存在的类型。

表2: 中国工业产出在沿海和内地的分布(1952—1987) (%)

	1952 (1952 年价 格)	1957 (1957 年价 格)	1952 (1952 年价 格)	1978 (1970 年价 格)	1981 (1980 年价 格)	1983 (1952 年价 格)	1980 (1980 年价 格)	1987 (1987 年价 格)
沿海								
官方:	69.4	66.8	65.9	60.9	60.5	—	—	61.1
菲尔德:	67.2	—	64.9	—	—	61.4	59.5	—
内地								
官方:	30.6	33.2	34.1	39.1	39.5	—	—	38.9
菲尔德:	32.8	—	35.1	—	—	38.6	40.5	—

注释和来源,官方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第139、143页和《统计年鉴1988》,第326页。菲尔德(Field)的估算,见R·M·Field,《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动》,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走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出版署,1986),第526—527页。关于沿海、内地的官方划分,见《统计资料1949—1984》,第362页,11个省列为沿海地区。根据马洪的观点,还应加上安徽省,见《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31页。考虑到轻工业品价格增长快于重工业品(参阅Field文第507页)和某些沿海省份在毛泽东时期后轻工业品增长快于重工业品(见正文关于地区内部趋势的讨论),以现价计算的百分比份额会高估沿海的份额。如果把表中1981和1983年的数据加以比较,那么不变价格和现价之间的可能差异是微小的。也请注意由于缺乏省级的价格指数,菲尔德用1980年产品的全国价格指数来计算各个省的工业产出,“当然,实际的价格指数各省是有差别的。”(Field文第525页)

^①R·M·Field,《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动》,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走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第5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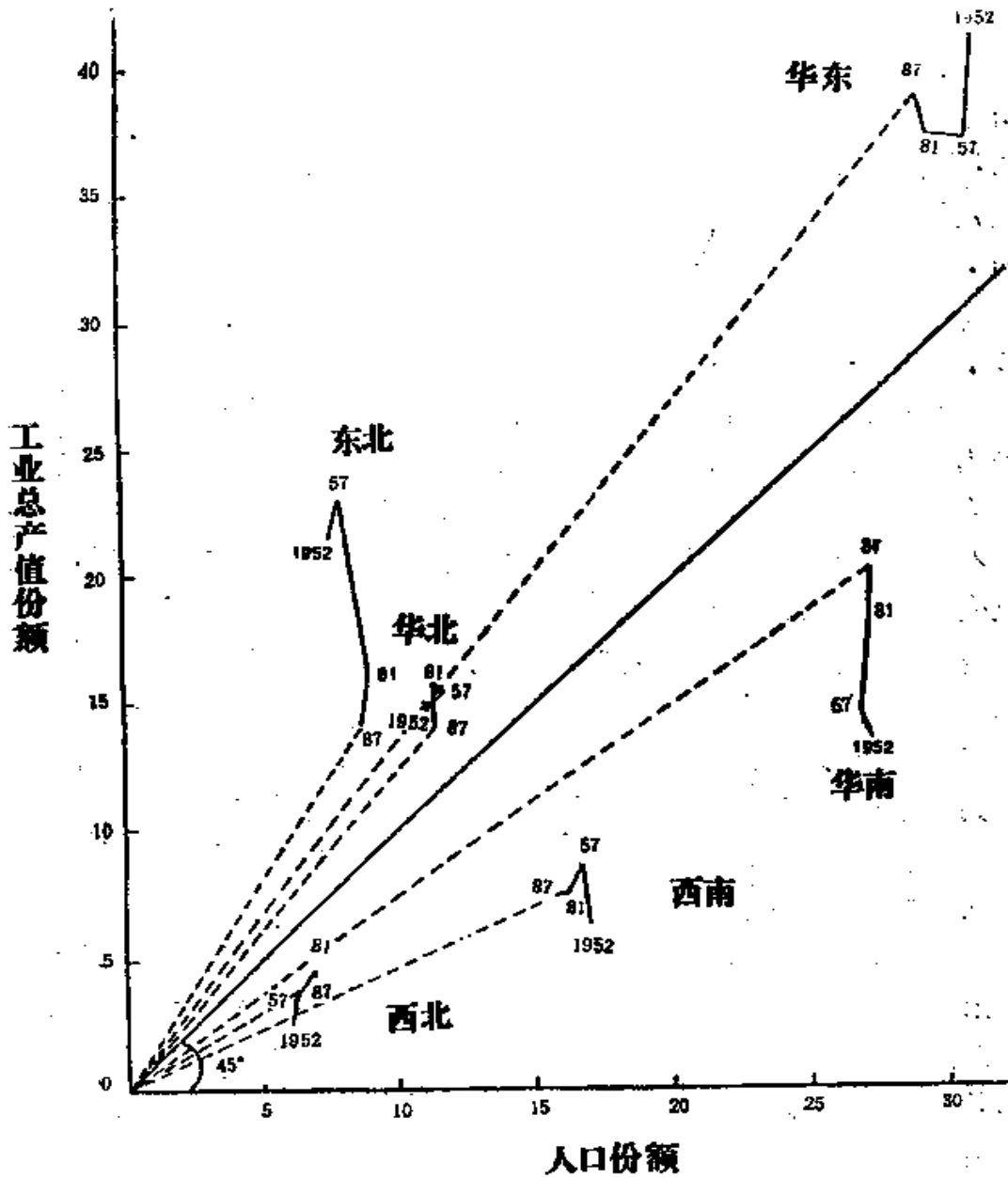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各地区人口和工业总产值份额的比较：
1952、1957、1981、1987 (%)

注释：1981年工业总产值以1980年价格计算，其余都以现价计算，用现价而不用不变价格计算可能隐含的问题，请参见表2的脚注。1952年的人口份额是以1953年各省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这是由于1953年进行第一次中国人口普查，比1952年所能提供的数据更为准确。

无论是何种情况，可采用该地区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生产的份额和该地区人口占总人口份额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工业地区分布的状况。如果地区间分布是十分平等的话（用人均工业产出来计量），那么相应的生产和人口份额的交点就会落在 45° 的射线上，如图1所示。^①

事实上，1952、1957、1981和1987年没有一年是落在 45° 射线上。图1揭示了下述几点：

第一，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人均工业产出份额高于平均数，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人均工业产出份额低于平均数，这个差距40年来始终存在着。这就说明，沿海和内地工业生产水平的差距，并不仅仅反映它们的人口绝对数之间的差距。例如华东地区人口比例最大，人均工业产出也较高，在1987年仅次于东北地区。

第二，从1952/1957和1982/1987这个长期的变动趋势看，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几乎没有机会在人均工业产出方面赶上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必须承认，华南正经历着加速发展，东北地区则在下降。东北地区人均工业产出在50年代至80年代间相对下降很快。即便如此，从全国平均的人均工业总产值水平来看，地区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最后，从1957年起一直到1987年，华东和华南地区的人均工业产出份额上升得很快。这个趋势同其他地区的变动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这两个地区占的人口比重最大（见图1），土地和其他资源也并不比其他地区好。华南和华东地区工业增长的源泉值得进一步探讨。

观察到的工业生产地区分布的变动，反映了中国政府长期以

^①这个方法就是在一直角坐标系内，分别以横坐标和纵坐标代表相应的地区工业产出份额和地区人口比例，并通过原点作一 45° 线，地区工业产出份额和地区人口比例完全相等的必定也只能在这条 45° 射线上，其余状况则偏离该射线。——译注

来努力避免工业过度集中在东北，而更多地发展华东和华南的政策目标。但是，在毛泽东以后，地区内部的工业增长差距在扩大。如图2所示，华东地区内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急剧下降，1981年为12%，1987年为8%。这一地区的其他省份份额则大大提高：同一时期江苏提高了3个百分点，浙江提高了2个百分点，山东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相似的地区内的变动发生在华南地区。广东的份额大大提高，其他省份在下降。如果以地区工业产值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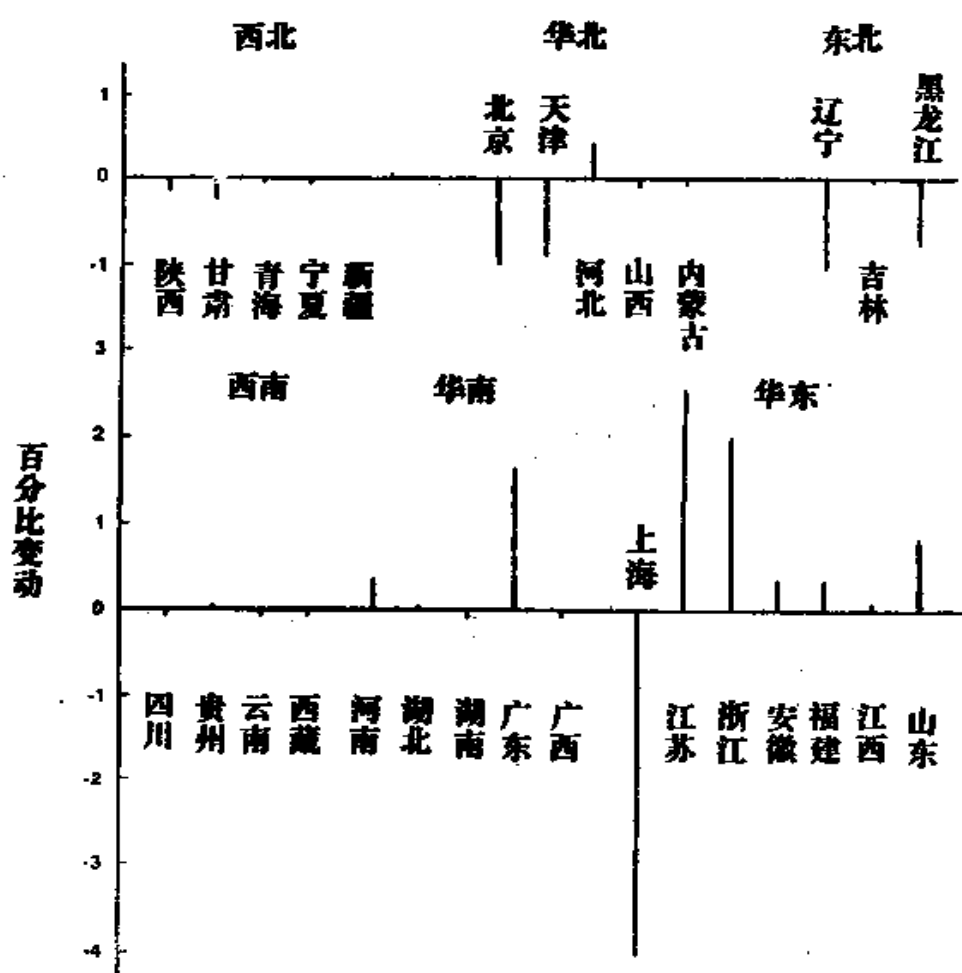


图2 地区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份额变动比较 (1981—1987)

来源：《统计年鉴1988》，第50、90页；《统计年鉴1981》，第210页。

基数,而不是以全国为基数,那么1981—1987年地区内部的工业分布转移更为明显。

其他地方省际工业总产值份额的变动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例如,十分有趣的是在华北,1981—1987年间北京和天津的份额大大下降,河北省的份额大大上升。在东北地区,鞍山钢铁公司所在的辽宁省占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下降,大庆油田所在的黑龙江省份额也在下降,当然下降幅度没有辽宁大。从中可以看出1981—1987年间华东和华南工业份额的大幅度增长,并不是由于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这些传统的沿海工业中心^①,而是由于其他省份的发展。

如果仅仅依靠那些不完整的省份统计资料来论证中国工业增长的新生极(Poles)是不慎重的,然而其他证据证明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位于这样的位置。例如,近年来,这些省都成功地促进了乡村工业增长。以广东为例,邻近香港是个重要因素,厂商利用这个优势,原材料在内地加工,然后组装成工业部件再出口。三省的工业都能利用城乡购买力急剧提高后活跃的消费品市场,并且利用邻近海外市场的地理优势,在对外贸易放松管制时扩大出口贸易。

也许这些沿海省份工业扩张的另一更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有能力开发、利用附近城市工业中心所提供的外部经济条件。如江苏省和上海市之间的工业联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相反,遥远的西南、西北地区,在这一方面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却都没有这种便利条件。现在人们正在怀疑最新建立的那些省级工业,其中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很小的企业,如果没有出口市场的大扩展的话,能够支持它们原先的发展速度。简短地说,它们未来的增长极

^①这里的论述不够严密、准确,因为辽宁属东北地区,并不是华东或华南,但原文如此。——译注

大地依赖于主导核心工业部门的状态。这也反过来影响政府关于投资和消费的政策以及经济增长的一般类型。

不管以后沿海地区的工业趋势如何,无论从总的工业产出,还是从人均工业产出份额来看,西北、西南地区将会落后很多年。失败的“三线建设”将不会重复,但人们很难相信,中国政府能不顾西部广大地区的现实情况而决定未来的产业政策。

工业技术的二元主义

40年来的强制工业化并没有纠正中国工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相反,它们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技术差异。传统丝绸工业和拾粪活动(这两者今天在中国仍然到处可见)间技术复杂程度的差异对比已经够鲜明的了,但当今中国存在的卫星发射技术和具有悠久传统的爆竹制造技术差别不是更大些吗?

工业技术间差距扩大的根源是很容易确定的。中国发动现代工业化时,它的资源要素主要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这同苏联1928年开始工业化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斯大林(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老师)当时认为苏联农业迫切需要“拖拉机化”,以此解放农业劳动力支持工业扩张。^①而且,当斯大林发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工业要比1953年的中国工业成熟得多。

然而,两个国家的工业扩张都需要现代技术。30年代斯大林转向西方以取得关键性项目,50年代中国则转向苏联以取得技术援助。60年代初以后,中国对工业化采取了相同的措施,转向日本和西欧的技术市场,70年代后期又进一步转向美国市场。

西方(包括苏联)技术是为了用机器代替稀缺的劳动力而发展起来的。考虑到中国40年来累积下来的人口压力,中国应用这些西方技术,必然会加速扩大工业技术的差距。再加上所有社会主

^①Dwight Perkins,《共产主义中国的市场控制和计划》(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第60页。

表3: 1987年中国工业企业

企业类型	企业数		工业总产值		职工数	
	单位数	比重(%)	亿元	(1980年) 份额(%)	千人	比重(%)
	(1)	(2)	(3)	(4)	(5)	(6)
大中型企业	8665	2.05	4288.01	49.66	22664.3	33.10
大型企业	2594	0.61	2618.42	30.33	13121.7	19.17
中型企业	6071	1.44	1669.59	19.33	9542.6	13.93
小型企业	414018	97.95	4346.73	50.34	45807.9	66.90
总数/平均	422683	100	8634.74	100	68472.2	100

注释和来源:《统计年鉴1988》,第391页。小型企业的数字是从大中型企业所占百分数中推算出来的。这一点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在同一年鉴的其他地方的大、中、小工业企业数分别为2908、6957和383708个(第312页),而不是本表的2594、6071和414018。但是根据更全面的数据推算出的百分比份额是一样的。同样的说明也适合于工业总产值份额(第319页)。这里没有用更综合的统计数据的原因在于没有对应的资本存量和实现税利。然而,必须注意这两组数据均没有包括所有的集体工业企业。如果我们假定所有的大中型企业均为国家所有制是符合实际的,那么这里显示的小企业数字仅仅包括名副其实的城市集体企业,数字为395973个,然而这只占

的产出、劳力和资本规模

固定资产原值		实现税利		平均规模差别			
亿元	份额(%)	亿元	份额	工业总值 亿元 (3)/(1)	劳力 人数 (5)/(1)	资本 亿元 (7)/(1)	财政收入 亿元 (9)/(10)
(7)	(8)	(9)	(10)	(11)	(12)	(13)	(14)
5172.07	65.29	1079.68	64.85	49.49	2612	59.69	19.73
3787.26	47.81	737.24	44.28	100.94	5058	146.00	28.42
1384.81	17.48	342.44	20.57	27.50	1572	22.80	5.64
2749.62	34.74	926.68	35.15	1.05	110	0.70	0.22
7921.69	100	2636.36	100	2.04	162	1.87	0.62

180万小企业的21%。现在官方认可的180万小企业，包括集体工业（包含大量的以前社队企业）以及新建的城乡联合公司。而且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城乡个体工业企业从无到有，现达到550万个。所有这些个体和集体小工业（并不包括显示在表中的集体工业）工业产值份额很小，即在118287.9万元（根据更综合的统计资料）中只占有19842万元，这些小企业平均每个只生产工业产值0.029百万元，而把城市集体工业计算在内的小企业平均产值为1.252百万元或1.050百万元（根据计算口径的宽狭而定）。这些资料补充说明了表3，来源请见《统计年鉴1988》，第301、310、312和313页。

义经济中追求“超大型”企业的倾向^①，当今中国技术差异之大，超过了芝加哥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描述古代文明中一极“大”一极“小”的传统程度。^②

表3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技术差距。第一，最突出的是1987年大中型(L/M)工业企业数只占2%，但吸收1/3的全国工业劳动力和占有2/3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0%，占税利收入的65%。这些数据表明，同小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具有很高的资本密集度(用资本——劳动比率来衡量)和很大的收入产出能力。我们也要注意小企业的平均工资要比大中型企业少一半左右。^③

第二，即使是中型企业平均规模也很大。它们的产出水平、就业量和拥有的资本存量分别是小企业的26倍、14倍和33倍。这表明中型企业的平均资本——劳动比例是小型企业的1倍至2.5倍。

第三，表3中大型企业的平均产出、就业量和资本存量掩盖了鞍钢和大庆油田这样一些中国工业企业巨人的状况。表4用平均规模、资本密集度等指标表明了这些超级工业企业和其他大企业之间的数量关系。

中国工业技术多样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存在着汪洋大海般的“微型”企业。这些微型企业大约有140万个，几乎是真正意义上企业数的3.5倍。在中国，大中型企业和少数小企业是国家所

^①中央计划者内在有一种建立超大型工厂以取得规模经济的动机，尽管这样可能会带来运输上的不经济。例如，参阅Robert W. Campbell：《苏联经济实力》（麻省坎布里奇，河边出版社，1960），第108页。

^②Robert Redfield，《农业社会和文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

^③《统计年鉴》，1988年，第391页。

**表4: 1986年中国冶金、机床、石油工业中最大
10家企业的产出、劳力和资本规模**

	工业总产值 百万元	职工数 人数	固定资产原值 百万元	元/人	上交税利 百万元
钢铁业十大企业					
平均	2098.88	83291	3848.06	46200	669.10
宝山钢铁厂	1149.14	31382	9090.97	289687	157.72
鞍山钢铁公司	5387.23	208588	8142.88	39038	2010.72
武汉钢铁公司	4016.88	135612	6371.14	46981	1400.40
首都钢铁公司	2764.13	94706	2842.29	30012	1367.47
机器制造业十大企业					
平均	672.88	31792	744.29	23411	120.09
第二汽车制造厂	2410.66	65810	2208.60	33560	617.86
第一汽车制造厂	1443.72	69572	1254.04	18025	146.29
石油/石化十大企业					
平均	(1962.85)	(44156)	(2305.45)	(52211)	(1145.79)
大庆油田	8661.62	111473	9006.45	80795	2650.94
大型企业全国平均 (1987)	100.94	5058	146.00	28887	28.42

注释和来源: 关于十大企业, 见《统计年鉴1988》第400--415页。关于全国平均见表3。三大工业部门中十大企业的确定是根据它们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十大企业的工业产值以1986年价格计算, 全国平均的则以1980年价格计算。在进行直接比较时, 要牢记上述不同。石油/石化部门第二行括号中的数据为该行业17家固定资产原值超过10亿元的企业。关于这一部门十大企业的数据主要反映的是大庆、中原、新疆等特大油田的情况。注意宝山钢铁厂拥有特别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较低的工业产值, 是由于整个投资项目并没有完全建成投产。

有的，这些“微型”企业是集体所有的。大多数属于乡村企业^①。甚至更为突出的是存在着550万个城乡个体工业“企业”，它们同集体和国营企业同时并存。

私人 and 乡村集体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值极少，平均只有传统意义上小企业的1/40(如表3所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不受严格税法和计划管理的自生自灭的企业，能够利用闲置资源，成为80年代工业增长的新源泉。同时这些小企业原始、简陋的特征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工业企业技术二元主义的差距。

毛泽东的传统对邓小平工业战略的影响

经过40年苏联式的工业化建设以后，工农业在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差别依然形成鲜明对比。地区间工业分布不平衡状况基本没变。在劳动力为主要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模仿西方技术的结果，甚至使工业内的技术差别更为突出。1978年后实行的任何新政策注定要受到毛泽东的工业传统的影响。因此，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新领导层在10年的短时间内没有能从根本上纠正原先的偏差就不足为怪了。

1978年后工业发展的新趋势中，有一个最能体现邓小平思路的是在传统的工业发展轨道以外鼓励小企业的加速发展。这在前面分析比较工农业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中，特别是地区内工业产出的变动中已经讨论过了。这些新生的小企业主要建立在乡村地区，它们的迅速发展和同样活跃的个体企业一起，使1987年国营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值占到38%。同年集体工业企业的产值，其中特别是建立时间较长的城市集体企业，只占到23%^②。

①见表3的说明。

②见表5。

表5总结了不同所有制的比较工业增长率以及它们占工业总产值相对份额的变动。这些数据明显地表明相对于传统的部门而言，新的集体工业在增长。这种增长不仅反映了受邓小平创造性政策的鼓励，也来源于农业中闲置资源的存在，这些资源不适于城市人口密集的都市中心利用。然而，乡村工业的加速扩展也反映了资源不利于城市工业的重新配置。例如，一些基本的农业原料，如棉花、烟叶等，原先是由规模大、效率高的城市工业利用的，现在经常为地方当局截留，提供给所属的原始落后的工厂加工^①。

但是，除开所隐含的资源成本外，如果把支持乡村工业化看成完全是邓小平的发明，那就错了。毛泽东显示过相似的偏好。毫无疑问，文化革命中用血汗成本建立起来的乡村工业体系，为毛泽东以后工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在邓小平的措施中有两个新的要素：第一，有效地抛弃毛泽东意识形态方面对发展的限制，现在资源制约是乡村工业扩展的唯一限制；第二，进一步转向消费品生产。这后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意识到要纠正“国民经济中基本比例失调”的问题，这种失调是由于以前长期把投资投向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生产而形成的。

这就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邓小平是否坚持毛泽东关于最大限度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第二，新政府从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显而易见的技术二元主义和地区间的不平衡？第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否真正摆脱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和控制体制，转向全面的经济市场化？下面关于农业和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在1978—1987以及更早一些年份增长趋势的比较，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些问题。

^①见Y·Y·Kueh, 《毛泽东以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和地方动员》，第34页。

表5: 1980—1987年中国工业产出中所有制结构比较

	1980		1984	
	亿元	份额 (%)	亿元	份额
1. 独立核算企业(1980、1984、1985为1980年价格, 1986—1987为当年价格)				
国家所有制	3928.4	78.6	5171.2	73.6
集体所有制	1034.4	20.7	1757.8	25.0
其中乡级企业	280.5	5.6	538.6	7.7
其他	29.6	0.6	100.9	1.4
总计	4992.4	100	7029.9	100
2. 乡及乡以上企业 (当年价格)				
国家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其他 (包括合资等)				
总计				
3. 包括乡级以下所有工业 (当年价格)				
国家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乡 级			575.25	
村 级			460.15	
城/乡联合企业				
城 市				
乡 村				
城/乡私人企业				
城 市				
乡 村				
其他				
总计			5155.0	

1985		1986		1987	
亿元	份额	亿元	份额	亿元	份额
5840.2	70.4	6759.12	71.6	7996.76	70.3
2300.8	27.7	2536.45	26.9	3143.5	27.6
742.0	8.9	959.87	10.2	1259.96	11.0
153.5	1.9	140.78	1.5	241.29	2.1
8294.5	100	9436.34	100	11381.56	100
		6971.12	71.1	8250.09	69.7
		2665.26	27.2	3299.93	27.9
		163.06	1.7	278.77	2.4
		9799.44	100	11828.79	100
6302.12	64.86	6971.12	62.27	8250.09	59.73
3117.19	32.08	3751.54	33.51	4781.74	34.62
760.55	7.83	981.08	8.76	1284.19	9.30
662.72	6.82	838.49	7.49	1165.35	8.44
151.75	1.56	247.79	2.21	316.46	2.29
—	—	20.56	0.18	30.31	0.23
151.75	1.56	227.23	2.03	286.15	2.07
179.75	1.85	308.54	2.76	502.39	3.64
33.39	0.34	29.13	0.26	50.27	0.36
146.36	1.51	279.41	2.50	452.12	3.27
117.41	1.21	163.06	1.46	278.77	2.02
9716.47	100	11194.26	100	13812.99	100

注释性说明：80年代初期以来由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几卷《统计年鉴》，关于工业总产值的统计起码有三种不同的口径，它们都有不同所有制的分类数据。除开对统计定义和范围作特殊的说明，人们不能通过这三种不同的口径，得到过去10年中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组成相对变动的清晰概念。

第一组数据，这里标明为独立核算企业。它们独立地负责盈利和损失。然而这组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标准是，这里的企业都归入“工业的”，即归属于不同的工业部门（如国营工业），或者产出数量足够大可归入这类（如原来的公社，现在称乡的工业，实际上更多地受县级政府管理，而不是由中央/省垂直领导）更先进的城市集体所有制，即所谓的“大集体”，也归入这一类。这一组工业总产值统计的企业单位数，在1988年少于50万个，在80年代初期为40万个。因此这组工业总产值的统计资料用表8的统计大体上是可比的。

表中第二组关于工业总产值的统计除包括第一组的内容外，还包含非工业部门如军事单位和从事食品加工的宾馆等生产的工业产出。因此这一组的工业生产总产值略高于第一组（如1987年高3.9%）。这也适用于该组的分项数据，包括剩余的“其他”类，就包含了中外联合企业。

综合性最强的是第三组数据。它在第二组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村办工业、新建的城乡集体联合企业和“微型”私人企业。这样就使1987年工业总产值同第二组相比增加了17%。从此这一口径的工业总产值似乎成了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口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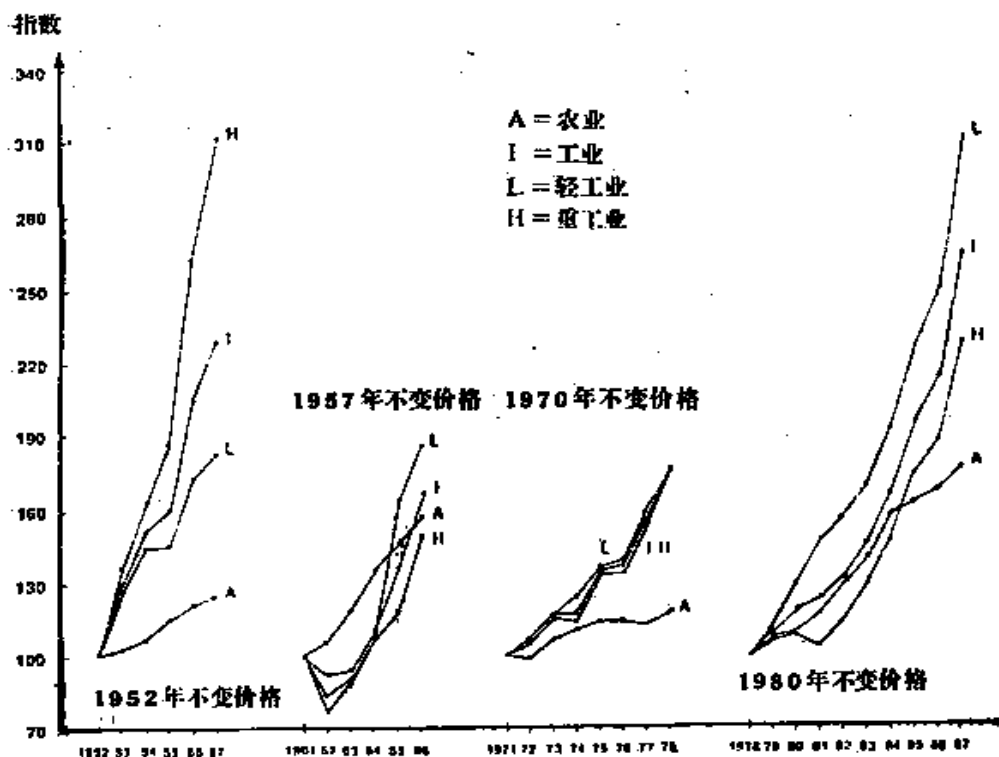
乡村组织的迅速变动似乎使国家统计局很难提供10年以来完整的工业生产总产值的时间序列统计。由于《统计年鉴》篇幅有限，因此国家统计局只好集中于最基本的变化方面。这使本表的数据有特定的性质。因此最完整的工业生产总产值的时间系列只能是以1980年价格计算的本表第一组的数据。这组数据1980—1986年每年都有（缺1987年）。奇怪的是，1986年的数据（本表没有显示出来）同有关可比数据并不一致。特别是关于1986年工业总产值中“其他”一项，该项为190.30亿元（见《统计年鉴1987》第259页），这比本表以现价计算的第一组数额140.78亿要大，也大于第二组相应数额163.06亿。要协调类似不一致的统计，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许最明显的不一致产生于后出版的《统计年鉴》通常对以前的统计数据修正。这样那样的模糊、混乱，使致力于对中国经济趋势数量分析的严肃学者十分失望。

关于非传统意义上工业（即集体/个体乡村工业）的相对地位，工业总产值统计也许总体上低估了它在新工业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人们要问过去10年中工业增长中有多少是由这些最原始企业的显著实绩构成的（关于乡村工业扩张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本文的总结性评论一节）。

来源：第一行：1980、1984、1985年数据出自《统计年鉴1986》，第276页；1986—1987年数据出自《统计年鉴1988》，第318页。

第二行：《统计年鉴1988》，第313页。

第三行：1985—1987年数据出自《统计年鉴1988》，第310—311页；1984年数据出自《统计年鉴1986》，第220页。1985年的相应数据也出自上述资料，但这同本表的数据略有不同。1980年数据见《统计年鉴1988》，第25页。



**图3 中国农业、工业以及轻、重工业的总产值趋势比较：
1952—1987**

注释和来源：《统计年鉴1983》第149页；《统计年鉴1987》第157、258页；《统计年鉴1988》第44、46页。农业总产值均不包括由村、组经营的乡村工业。这类乡村工业在《统计年鉴1988》出版前，都包括在农业总产出之中。

1978—1987年同1971—1977年相比,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轻工业相对于重工业而言得到了加速发展。以1978年为基数100,1985年重工业产出指数为175(巧合的是,在以前的7年中,即1971—1978年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两者经历着相同的增长率),而轻工业达到了227。这表示这一期间轻工业年增11%,重工业为7%。1987年的数据说明,以后几年并没有明显地缩小这一差距。

1978—1987年的轻重工业增长类型同1952—1957年的增长类型正好相反。1952—1957年重工业的迅速增长不仅损害了轻工业,而且也损害了农业。1978—1987年的农业增长率高于1952—1957年和1971—1978年,但不如1961—1966年,那时农业产出的大增长显示着正从6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中恢复过来。80年代农业的迅速增长表示了毛泽东以后的“非集体化”努力,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的发展也支持了最近的轻工业的扩张。

当然,从图3显示的比较趋势可以看出,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从总体上能赶上轻工业的增长。经过80年代初期短暂的调整后,重工业又取得了发展势头。到1984年,它又超过了农业增长。确实,工农业间的差距加大了,又类似于50年代初期的增长类型。

事实上,随着70年代后期作出有利于轻工业和农业的调整后,重工业在总产值中的份额1978年为57%,80年代初期至1987年,始终保持在52%左右。^①对重工业的资本建设支出1978年为49%,1980年降到40%,相应地对轻工业和农业支出增加,但对重工业支出的下降趋势并未继续,1987年又升到44%左右。

工业和投资增长的这种趋势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毛泽东和斯大林增长模式中处于关键地位的重工业,有可能再次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而扩张。如果内部资源制约着轻工业、农业保持现在这样的增长率,那么重工业的继续扩张是极有可能

^① 《统计年鉴1988》,第32页。

发生的。与此相关,农民和有关方面的决策者不断抱怨缺乏投资资源来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和资本来源,灌溉面积下降的状况已经有了广泛的报道。

如果重工业像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那样,再次成为中国的领头产业,那么工农业的二元化以及工业内部技术的二元主义,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继续下去。在重工业自我服务、进行再投资和吸收现代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过程中,将会抵消基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轻工业进一步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

是否会重新采取新政策把投资从沿海转向内地,以纠正地区间工业分布的不平衡?这点并不明显。中国政府面临着这样的权衡和抉择:一是促进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十分紧迫;另一方面是集中投资于已经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可得到潜在的规模经济。这种权衡和抉择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沿海工业逐渐渗透到内地,似乎更像一个概念化的设想,而不是实际付诸实施的方案。然而,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中国广大的内地继续制约着长期战略性投资安排。

1978年后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在国家工业产出中份额下降,也是毛泽东时代政策的产物。这个政策就是把这些先进工业地区简单再生产以上的剩余资金,都吸收转移到内地的扩大再生产(即新投资)上去。如果这是确实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工业产出中的沿海份额将继续下降,因而有利于内地。江苏、山东、广东沿海省份那些新建的乡村小企业不可小看的潜力就会萎缩。深入研究1978年以来投资的地区间配置类型,将有助于证明这里的假设。

经济和贸易改革的含义

对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进行详细的制度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要着重指出下面的一点:如果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

个战略,就会同摆脱斯大林的中央计划模式、提高国营企业生产效率的改革目标相矛盾。下面几点可以阐明目前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境地。^①

第一,继续重视重工业,就必然要控制消费和物质资料的分配,使储蓄和投资最大化,保证对优先发展产业的供应。这不仅影响对职工的刺激,而且产生长期的供应短缺。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中型企业就可以利用它们的优势,这就不可能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率。

第二,物资供应仍由中央分配,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必然由官方控制并固定,这就会使中国计划当局近几年以供求力量理顺价格结构的努力落空。

第三,如果中央计划仍取主导地位,那么就很难从现行的计划和价格的“双轨制”转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长期轨道上来(前一术语是指鼓励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产出指标的前提下,利用闲置生产能力自负盈亏地为市场而生产;后一术语描述了计划者要依靠间接的政策手段,如税收、银行贷款、利率和价格,而不是依靠规定物质投入和产出指标,来规范、管理国营企业的行为)。在“转轨”时期,已经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和资源损失,这种情况似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拥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会继续利用计划分配投入品的优势,例如使产出销量市场最大化,损害国民产出和收入。^②

^①对两难境地较详细分析,参阅我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措施、观念和制约因素》(即将出版)。

^②关于中国“双轨制”出现的背景,参阅我的《中国工业中的官僚主义化和经济改革》,载Wolfgang Klenner编,《东亚经济发展趋势》(柏林和爱丁堡, Springer Verlag, 1989),第381—392页;也可参阅C.H.Chai和Y.Y.Kueh,《中国双轨计划制度的困境》,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1979—1988)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该研讨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于1988年11月7日—13日在中国深圳召开。

在这一方面，现在就来估价1988年9月发起的“治理整顿”运动的可能结果还为时过早。这个运动旨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反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无论成因如何，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个短期现象。社会主义体制很容易通过控制工资上涨和国家征购农作物价格等手段予以消除。或者像以前10年经常做的那样，不管资源代价，停建国家的投资支出项目和缓建在建工程。即便如此，目前的反复明显地增强了对国营工业的行政实物控制，也不利于协调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理性市场行为和最大限度地扩张工业这个长期的计划目标之间的关系，而上述二者的关系是个基本的问题。

也许中国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方面是“产权”问题。在朝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至少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因此也包括大中型工业）的市场化过程中，这个棘手的问题最近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中间的原因是极易找到的：奥斯卡·兰格关于解决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结合的理论依然是没有被验证的假设；然而中国实际经历的艰苦试验似乎意味着可能有所突破。^①目前关键的并不是产权问题，而是何者优先发展，即重工业是否优先增长的问题。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统一分配的情况下，不管这种分配如何协调，为了完成国家的优先发展，即使有最完善的私有制产权民法，也不能保证私人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力，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战时经历。

^①Steven Cheung（张五常）似乎是第一个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提出这一重要问题的著名美籍中国学专家。自从他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82）一文后，他通过香港的新闻界坚持主张在中国国营企业要全面私有化。他的观点在很多中国学者中，特别是在那些最近几年有机会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年轻经济学家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我在深圳会议上（见上面的注释）大胆发表了不同意见。目前关键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什么“产权”问题，而在于苏联式强制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下面一节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在深圳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中国的农业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农业改革对产权作了许多妥协。虽然1985年用合同购买制度代替了强制性的征购定额制度,中国农民仍不断抱怨不公平的合同购买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仍然对农户用固定价格和销售定额的办法。明显地,仍然存在着斯大林式的吸取剩余农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支持工业增长的问题。

相同的问题也制约着中国外贸和投资部门的改革。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①, 出口部门(并不包括进口)的决策权在毛泽东以后大大地分散化了, 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商品是很不相同的, 过去的中央控制极大地挫伤了出口的积极性。但是出口创汇大部分仍是统一分配(当然按规定部分外汇可由出口者提留), 要用出口所得的外汇进口国家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所缺的基本生产资料。除了进口粮食外, 占中国进口一半或更多的是钢铁产品、机器设备或者类似的产品。^② 考虑到这些因素, 期望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放弃对外汇的控制是不现实的。

对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所遇到的某些主要困难, 也可用同样的原因来解释。为了保证中央计划体系免受外来干扰, 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合作投资十分困难。这就能解释在过去的10年里为什么外国投资者经常碰到短缺和成本的不确定性。^③ 为什么中国要求外国合资企业直接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平衡它们的外汇需要, 原因就在于使外汇收入最大化, 以此来特别支持重工业的发展。这样做只能使外国投资者失望, 他们的本意和强烈愿望是转

^① Y·Y·Kueh, Christopher Howe, 《中国的国际贸易: 政策和组织变动以及它们在经济调整中的地位》, 《中国学季刊》, 第100期(1984年12月), 第832页。

^② 《统计年鉴1988》, 第732页。

^③ 参阅我的《中国的经济分散化和外贸扩张》, 载 J·C·H·Chai, C·K·Leung 编, 《中国的经济改革》(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7), 第444—481页。

向中国国内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取得外国资本的核心,是想更新迅速贬值的沿海工业资本。因此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在香港和西方大做要求合作生产的广告。这样做有助于把国内的新增资金投入其他地方,特别是内地。同时对投资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予特别的优惠,以此纠正地区工业分布的不平衡。

总结性评论

中国在促进对外经济联系方面面临的某些主要问题仅仅是暂时的困难。中国的计划者具有对西方开放的真诚愿望,在取得外国资本、技术和保持苏联式工业自给自足体系的权衡中,经常调整同国外合作者的关系,甚至作出某些让步。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近几年建立了外汇“管理中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外国投资者以自由浮动汇率,把不可兑换的人民币,与他们同事积累的任何数量的多余外汇相交换。中国的国内市场对合资企业的产品似乎也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对那些特别需要的高技术产品。

在国内经济方面,由于特别需要改善国营企业的效率,中国计划者作了许多探索,包括对小工业企业的准私有化,试图解决棘手的产权问题。这些试验仅仅在前几年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然而只要继续实行苏联式的最大限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很难使最关键的经济部门(即国营大中型企业)受制于竞争市场的压力,以利于改善它们的经营活动。另一主要的限制是迫切需要把沿海地区(大多数大中型企业的所在地)创造的收入尽可能多地投入到内地,以利纠正地区工业的不平衡。

尽管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治疗整顿,现行的中国领导层仍然坚定地从事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转向基本上由市场和间接宏观调控手

段相结合的长远政策目标。例如，因赞成对工业大企业实行股份制而为西方所熟悉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已经期望国家—私人联合持股公司会有一天帮助开发中国广大的内地，正如19世纪后期规模巨大的美国公司开发西部一样。^①

但是，当前燃眉之急的是如何提高关键产业的效率。这就涉及到工农业之间的二元结构和产业内部技术多样化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资本边际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原有的产出状况（虽然存在严重的地区和技术不平衡），必须给中国经济投入更多的资本。^②这就意味着要继续相对降低中国农民和工业部门职工、尤其是那些不享受政府官员特权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消费水平。确实地，对许多城市居民而言，当他们的期望提高时，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了。

如果继续向前看，那么中心的问题则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是否会影响1980—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个目标。^③这个政策目标建立在下列假定的基础上：即投资要进一步向能源、交通和建筑业倾斜，使经济结构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这样就

①这一观点是厉教授本人于1988年1月在香港东南经济中心赞助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的。

②一些西方学者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尽管中国官方政策试图压低资本积累率，但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参阅 K.C.Yeh, 《调整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动》，第709页；D.H.Perkins, 《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学文献杂志》，Vol.XXVI(1988年6月)，第602页。也请参阅Shigeru Ishikawa, 《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种估价》，《中国学季刊》，94期（1984年6月），第257—259页。

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第92页。预测翻两番要求1980—2000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增长为5.5%，工业总产值年增长7.8%。

可打破瓶颈现象,工业就会更好地利用闲置资源,促进综合扩张。

在最近的治理整顿中,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即使对这些原定优先发展部门的投资也压缩了,这对下一年代工业增长的影响,现在是很难预料的。也许过去10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2%的实绩^①,意味着在1980—2000年间翻两番要求工业总产值年增7.8%,是极易实现的。我们要牢记最近几年已有两次重大的调整,一次是在1983年,另一次是在1985年,另外再加上1979年初始的那次调整。

但是,工业的年度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所需的增长率并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毕竟总产值依加工业的相对扩张而定。在这一方面,过去10年乡村工业产出的加速发展,部分是由于从事加工农业原料的工厂能迅速获利,然而增加的净值却不多。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更重要的结论:根据原定的在1980—2000年间工业年增7.8%,农业年增5.5%,那么中国领导人就不可能达到缩小工农业发展差距的政策目标。确实过去所有的指标表明,工农业年增长的差距正在扩大,这正像过去毛泽东在世时所发生的那样。^②注意到目前农业面临的投资危机,前景似乎更不容乐观。这个危机是在农民对使用土地的远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使短期行为最大化所引起的。^③

^①1978—1987年工业总产值年增12%,1980—1987年年增12.8%。见《统计年鉴1988》,第29页。

^②见《统计年鉴1988》,第39页。

^③参阅Andrew Watson,《中国农村的投资选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即将出版);也可参阅我的《中国的新农业政策:主要的经济结果1979—1983》,《比较经济学杂志》,第8卷,第4期(1984年12月),第365—366页。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制约农民对农业先行投资的因素。一个重要因素仍然是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由于缺乏政策工具促进内地利用自身的生产要素，保持和加速工业增长，因此即使把沿海地区的收入再分配给内地，内地仍将继续落后于沿海地区许多年。再加上在目前的开放政策下，吸收外国资本和技术肯定更有利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也能取得混合经济的优势，这些只能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加速引进西方技术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工业体系中技术水平的差距。

总之，我们最有把握说的是，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似乎能从整体上加强工业的能力。但在工农业二元结构、地区间的不平衡、工业内部的技术差距等重要问题上，将会使中国经济决策者继续担忧。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 某些经济趋势

澳大利亚 奥德利·唐尼索恩

译者按：文化革命，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整个经济分割成许许多多互相隔绝的单位。这很有点类似于“蜂窝状”的经济 (Cellular Economy)。在海外中国经济研究中，奥德利·唐尼索恩第一个用“蜂窝状”经济这个概念，概括当时中国经济呈现分割化趋势的特征。

本文发表后，立即在海外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近20年来西方有许多专著和文献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是“蜂窝状”结构，地方与地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进一步走向集中统一还是走向分散自治等问题，都要提到本文的观点。

另外，从本文的讨论亦可看出当时的海外中国经济研究的若干特点，作者主要引用当时中国报刊的新闻报道以及中国各省的电台新闻，作出有关判断。

本文^①译自英国伦敦的《中国学季刊》1972年12

^①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pp. 605-619. December, 1972.

月第52期。作者奥德丽·唐尼索恩 (Audrey Donnithorne) 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

文化革命严重地冲击着中国的组织结构。它的后果是削弱了行政管理和放松了控制，使中国走向“蜂窝状经济”的趋势不断强化。由于鼓励各个地方和企业形成自给自足的自治体系，这种力量已经很强大，现在又得到了新的加强。目前的中国似乎是由许许多多互不相关的单位所组成的。当然技术力量正在打破这些蜂窝状的结构，本文探讨强调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所带来的某些结果，并探讨这些分散单位之间经济联系的方式以及以后的变化。

当然，分割化不适于全部经济，这并不是整个画面。中央政府仍控制和协调着某些部门的经济生活，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一位捷克观察家在1970年的报道中说：“中国经济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军事目的的研究和生产方面的，更加集中化；第二部分是同职工基本生活需要有关的，十分分散，大部分遵循所谓的‘自力更生’的原则。”^①这样划分似乎过分简单化了些，但是它包含着极大的真实性。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中央部委的作用不断减弱，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57年。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合并减少了机构，也精简了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官方公布的正式资料，但据悉文化革命前由国务院领导的部、委员会和办公室，其中2/3通过合并或其他方式被撤消。周恩来宣称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1970年12月只有1万人，而在文化革命前有6万人。^②从报纸和电台得到的印象，中央政府部门的活动主要限于会议、展览、“写作组”、招待外国来宾和管理有

^①转引自1970年5月23日BBC“世界广播总述”第三部分，远东，编号，3389/B II/1。

^②和斯诺的谈话，《时代》，1971年2月，第23页。

关的研究设计机构。生产企业很少直接隶属于中央部门管辖，甚至偌大的鞍山钢铁公司现在也下放给省里管理。^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似乎也销声匿迹，文化革命以来很少听说负责什么事务。提到国家计委时主要是它的“写作组”，或同该委员会有关的其他经济运动如收购废钢铁等。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是垄断性银行，现在如何管理经济也无从知道。在70年代该银行由财政部领导，而财政部则比银行还要更多地受地方影响。如果银行的地方机构隶属地方财政部门，那么银行作为北京中央当局伸出的手臂职能就会削弱。

至少某些地方当局协调企业的力量要大于中央当局，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主要的三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直属中央政府管辖，而略小一点的隶属各省），情况更是这样。这是由于城市集中，半径有限，更易控制。省工业管理当局虽然活动要比中央部门更少局限性，但同省内城市工业以及大批乡村小工业的联系也很微弱。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县正在发展为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实体。用一位驻中国的南斯拉夫记者的话来说：“整个国家正在形成无数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生产中心。”^②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分割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精心设计的政策的结果。答案大致如下：对于组织的分散化这并不是北京当局的权力所能阻止的，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偏爱的苏联式官僚社会主义形成的现状。最近几年强调的所谓“毛主席的自力更生伟大方针”，更多的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论证和接受，当然这种承认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适用于大大小小的企业单位，也适用于地方行政单位直至生产队（生产队规模不等，一般对应着一个村

^①《北京周报》，1972年1月28日，第22页；《人民日报》，1972年1月15日第1版。

^②引自BBC，1970年10月9日，BBC，FE/3506/B/3。

庄或大村庄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自力更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集体概念。把自力更生概念应用到更低的层次,如家庭或个人,虽然从实践上有可能存在,但这是为官方竭力指责反对的。60年代初期中国广大地区乡村农户所拥有的高度经济独立现在也归之于在文化革命中免职的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的流毒影响。

自力更生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即利用当地资源,而不是依靠计划协调和政府的投资。下面的两个例子,是从近年中国官方新闻表扬的许多样板中选取的,可以很好地阐明上述含义。

第一个例子是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煤矿,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成。“原先有1000多工人,但是刘少奇的代理人命令关闭该矿。18名革命职工坚持用原始设备,土法上马进行开矿。从那以后,逐渐实现挖掘机械化,并建成了发电站,不仅为矿山发电,还能供应邻近公社。现在全矿设备价值超过8万元,年产原煤3500吨。这9年中煤矿从没有向国家伸手要援助。”^①

另一个例子是江苏省南通市一个棉纺厂的纤维车间,该车间建成于1970年。“挖掘棉纺厂自己的潜力,厂革命委员会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由于这个工程是国家计划外项目,他们就自筹资金。……工人们因陋就简,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方法。他们详细地研究了图纸,勇敢地作了改进。”结果,他们设计的设备成本只有外国同类设施的1/25,但效率提高了50%。“代替喷丝头需要两大块轧钢板,但厂里无法加工它,当地两个厂合作,一起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上面两个例子都阐明企业不要国家投资(在这里国家可以指政府行政的任何一级,从中央政府到县一级),用企业自己利润投资扩大生产,也阐明了企业要有在国家计划外取得原材料的能力,

^①新华通讯社,1970年1月30日,转引自BBC,FE/W557/A/10。——这里没有核对中文原文。——译注

包括钢材等。特别是在第一个例子中，上级命令他们停工。这两者都强调了毛泽东关于鼓足干劲和藐视专家，特别是外国专家的精神。

在农业方面，自力更生的大典型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这个极端贫穷的山村，面临着困难的境地。这种地方无论根据平等社会主义的观念还是根据西方式福利国家的修正了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应该由国家更富裕的部分补贴才能生存的，起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是这样。但大寨不是这样。他们坚决拒绝了国家的帮助，把山坡建成梯田，并用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努力，建成了水利灌溉工程，在大队内部确定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但不从国家其他任何地方取得任何资源。

大寨这个典型几年来在中国的报纸、广播和展览中得到了高度评价。在其他地方也树立了相类似的大队。在每一个典型中，基本的一条是不该错误地向国家要资助，这是可耻的。无论是农业集体还是工业企业，所以干部对向上要援助都持谨慎态度，既不能建议，也不能批准这种请求。

在报纸上表扬的样板生产大队当然是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然而，自力更生的结果是放松了组织纪律，这是事情的另一面。1970年下半年有人到华北的一个公社访问，询问当地干部每年粮食征购定额在什么时候确定。一位干部答道，国家有关部门通常要询问公社愿意把多少粮食出售给国家，现在公社比以前有多得多的独立性。当然，干部对来访者的回答不足为据，但是如果向有关当局询问这类事情，回答同以前大大不同，这表明公社和政府机构间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变。

用放松控制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中国粮食产出增长，但却不断地进口粮食。通过征购制度强迫农民上交国家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国家需要，现在行不通了或者政治上也不允许。国家上级行政机构也不能向基层单位调拨更多的粮食。

自给自足是中国目前的另一个经济口号，也是自力更生的必然结果。各个企业、地方行政组织或公社内部都要自给自足。甚至单个的县、市也要“自力更生建设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①。用山西省广播电台的话来说：“努力奋斗一至两年，在本省范围内实现轻工业品自给自足，是轻工业战线工人阶级、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的光荣战斗任务。”^②为了实行这一政策，经常引用的考核地方经济实绩的一个指标是商品自给自足的比例。例如，吉林省宣称在1970年年底本省生产的居民所需轻工消费品占47.9%（不多也不少），而1969年则为30%。在省会所在地的长春第一百货商店“现在只销售本省生产的轻工业品”^③。武汉市庆祝在1970年的上半年“工业生产设备自产率在整体上有了提高”。化肥生产设备“全部达到”自给自足。摩托车、自行车生产设备的自给自足率达到95%以上。^④但是南京市不满意于这样的事实，“同其他先进地方相比，我们轻工业品自给自足的比率并不高”，因此迅速召开会议，讨论这一形势，“轻工业品的自给自足率很快从70%上升到90%左右。”^⑤即使在较小的城市中，也要自给自足。例如，据报道，江西省会城市南昌（人口约50万）在1970年后期“轻工业主要产品80%能自给自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表明地方自给自足现在已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自给自足不仅适用于加工制造业，而且也适用于农产品。湖北

^①《北京周报》，1970年2月6日，第10—11页，《努力发展地方小工业》。也请参阅《中国建设》，1970年11月，第6页，《繁荣市场，稳定物价——1970年初以来进一步强调就地取材，就地销售》。

^②BBC，FE/3507/BII/16，山西省消息，1970年10月10日。

^③BBC，FE/W598/A/7，NCNA英语节目，1970年11月13日。

^④BBC，FE/W582/A/7，湖北省消息，1970年7月26日。

^⑤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方明，《正确引导群众》，《红旗》，1971年1月1日，第35页。

省是粮食和棉花的重要产区,据报道,1970年第一次试制糖获得了成功。“经过一至两年的发展”,报道认为“湖北省在制糖方面将能做到自给自足”^①。

单个企业也鼓励做到自给自足。例如江西省的萍乡煤矿“由于文化革命前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阻挠破坏,所需的生产设备、附属配件和材料……统统来自其他地方”。报道说在文化革命中,矿工们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作为突破口,他们“制造了全套的隧道掘进机和挖煤机”。这方面的成功,“激发了矿工们自力更生的积极性,他们开始制造更大规模的机械设备”。报道说,一年之内他们制造了90台车床和挖掘机,占全矿机床的77%。报道提到,该矿还开始自己制造汽车和吉普,很有可能这是指利用旧部件进行组装。他们并不就此满足,利用废旧材料进行一条龙组装,建成了4个小炼钢厂、一个小轧钢厂和一个13立方米容积的熔炉。这样,“煤矿所需钢铁大部分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萍乡矿务局(管理萍乡煤炭以及其他矿的机构)由此决定“打破行业界限,扩大生产范围”,即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根据需要建立了65个小厂,生产了许多原先由其他地方供应的产品,其数量除当地需要外还有剩余。”^②注意到结尾的重商主义口气——以提高自给自足程度而自豪,制造新的剩余品“出口”给其他地方。

强调企业的自给自足,在机械工业方面更为突出。报刊电台宣传不同工业部门的许多工厂,这些厂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设备,通常是自己发明设计而不是照搬照抄或得到其他地方的帮助。这样的过程虽然具有教育价值,但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明在中国更现代、更大的企业里已经拥有的设施。

这些例子阐明,在工业方面已分割成许多独立、封闭的单位。

^①BBC, FE/W603/A/23, 湖北省消息, 1970年12月25日。

^②NCNA英语节目, 南昌, 1970年10月2日。

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趋势。一位外国访问者注意到邻近的两个公社各自建造同样类型的化肥厂，询问他们为什么不合在一起建造一个更大的厂呢？回答是：“他们建的只是为他们的需要，我们归我们的。”

文化革命以前，地方和企业的自给自足趋势就很明显，特别是在毛泽东政策倾向极强的大跃进时期更是如此。但是在中国这种趋势遭到了批评。1962—1965年间，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内容是以地方行政区划（导致地方自给自足）还是以经济效率为根据划分“经济区域”，组织贸易流通。1963年《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了地方主义“坚持以行政区域划分来组织分配和运输，而不管运输线路是否合适”，社论又说，“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必须采用经济上合理的方式”，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① 几乎在同时，著名经济学家管大同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认为“跨越县、地区和省的界限，合理地组织供应”，将会降低成本，加快贸易流通速度。^②

现在我们知道，支持这一条思想路线的是刘少奇派，而反对的是毛泽东派。在这方面毛泽东派经常把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批判刘少奇派在中国南方的领导人陶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理由是陶要求某县不要从事林业，木材由外地供应，把土地用在更能赢利的方面。^③ 在批判刘少奇路线时，特别批判了他的地区分工思想。例如，由于刘少奇的影响，辽宁省不得不集中于重工业生产，轻工业产品则要依靠外省供给。^④ 批判的另一方面是刘少奇主张经济效率要优先于行政自治，因为他鼓动建立跨省的大托拉斯，

①《人民日报》，1963年3月23日，第1版。

②管大同，《我国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红旗》，第6期，1963年4月1日，第35页。

③BBC，FE/3289/B I I / 2，1970年1月21日。

④BBC，FE/3828/B II / 8，黑龙江省消息，1971年10月15日和NCNA英语节目，沈阳，1972年2月12日。

其经营活动覆盖整个国家或国内大部分地区，每一个托拉斯控制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对特定的地方当局而言，这样的托拉斯规模太大，无法自治，正如某些国家政府对跨国公司无能为力一样。

毛泽东关于鼓励行政组织内自给自足的思想同原先的共产主义观念相吻合。这个观念不同于现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流行的更复杂的观点。原先的共产主义观念认为，贸易仅仅是在地方计划制定后处理剩余产品或弥补计划缺口的一种手段。这一观念忽视了比较成本理论，相应地也忽视了分工优势和规模经济。

在众多报道地方自给自足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上海、天津声称近年外调给外地的产品创纪录。^①许多较小的地方也宣传它们的某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的需要，还有剩余“出口”到其他地区。这里呈现出一幅许多地方各自尽可能少地进口，而试图更多地出口的高度保护主义的场景。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澄清这个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声称许多地方增大了自给自足部分；另一方面两个大城市外调给其他地方的产品增加。这也许是小地方之间的贸易在减少，但并不影响对大城市工业中心所生产的更复杂、更不易替代的产品的需求。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地记住：在中国当颁布某一政策时，关于实行这一政策的报道就会铺天盖地，事实上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完全相吻合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政策。但是有关证据显示这一政策方向的趋势有所加强，当然这主要是某种潜在力量的结果，而主要的不是在于这一政策本身。

在一个行政单位内自给自足政策的好处，主要是行政管理方便和地方有积极性。由于这样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以后控制许多地方当局的军人更倾向于实行地方自给自足的政策。这样他们就易于掌握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场合，当供应的物资来自

^①《北京周报》，1970年2月20日，第30—31页；BBC，FE/W637/A/11，NCNA，1971年8月25日。

于其他单位,这些单位又拥有行政决策权,那么依赖于这些物品的供应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单位在短缺时会先满足它们自身的需要。

在最近几年里,建立无数个“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的战略优势进一步显露出来。地方工业的发展同对苏关系的危机紧密相联。

在一个充满着经济动机和企业家精神的行政单位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精神也许能增加地方的积极性。当缺乏这些品质时,从其他方面弥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有时用节约运输费来论证行政单位内实行自给自足政策是正当的,特别是那些大宗货物的运输,如煤炭。然而这只能用来证明需要短距离运输而不能证明在某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运输是合理的。因为在某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运输,从经济上看往往并不合理。

地方自给自足的不利方面是由于忽略了比较成本原理、忽略了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这种忽略从长期看会导致减少中国的潜在国民收入。当国民经济愈益复杂时,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愈益严重。经济分割化另一方面的结果是,从总体上看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更大部分由地方当局和企业所掌握,而一体化的经济则不是这样。如果分割化是由于运输困难而形成的,那它是合理的;如果分割化是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那它就只能造成浪费,特别是对一个资本—产出比例较低的不发达经济而言更是这样。

因此,从长期来看,地方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政策会有损于增长;从短期来看,它能刺激地方的积极性。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出这样的政策肯定会导政各地方增长率的差别以及加剧地区间甚至邻近的小单位之间的不平等。依靠当地原料或管理方面的资源,进行投资扩大产出必然形成“有什么吃什么”的体制。这种刺激会导致地区间收入的两极分化。下面一则报道中的例子阐明了这

一点。广东省同一地方的两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管理不善，社员除能分得粮食计划外，年终分配没有任何现金可得，另一个经营管理得法，每户每年为集体工作能分得现金 1000 元以上（约合 400 美元）。^①

小单位之间需要更多的协作，变得愈益紧迫。这样的协作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至少从理论上）通过计划交换。在缺乏大规模的计划^②或者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象单位之间是如何发生经济联系的。河北省一个县报道表明，由于缺乏协调机制所引起的麻烦。该县不生产锄头，农民们不得不步行 30 英里左右到另一个县去买，“因此严重地影响了生产”^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外县“进口”锄头，而是干脆自己生产。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先天不足的“非官方”贸易，这从地方和时期来说不同程度地带有非法的性质。这种贸易的规模和特性很难衡量。然而从香港方面得到的有关信息，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贸易是很可观的。

现在来对分割化经济中经济联系如何运作进行判断，似乎为时尚早。但是，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某种发展线索还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将对此作出若干分析。首先是企业在定价和签订合同方面所具有的广泛的决策权。第二是商业部门发挥着重要的联结作用。第三是较小的地方当局，主要如县、市所具有的协调和计划功能。

从企业订货可以看出企业之间直接交易的程度，表明经济中的许多方面缺乏计划机构对生产的控制和配置。例如，1968 年北京的一家手套厂向北京市电刷厂订购了 5000 副横应变机器刷子。“接受任务后，由于数量少价格低，电刷厂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①同作者的私人通讯。

②关于中国计划体制的软弱，参阅我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伦敦，1967）第 17 章以及我的专著《预算和计划》（堪培拉，1972）。

③《人民日报》，1972 年 1 月 15 日第 8 版。

按合同规定应在一个月内交货，但四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完成订货合同。手套厂不得不改向其他地方订货。”^①

在计划经济中许多积极性来源于计划者，在市场经济中来源于私人企业家，但在中国却来源于不同行政组织的商业部门，特别是省、地区和县级的商业部门。中国社会富有经商才能，而商业部门则是这种才能的储藏库。商业和生产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例如吉林省商业厅“帮助工业部门创建了70多家中小工厂，生产了30多种新产品”^②。广西柳州地区商业部门创建了20家小工厂。^③商业机构的职能从分配领域延伸到分配产品的生产领域这一趋势，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开始了。但是这一趋势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革命后小企业蓬勃发展时，更为显著。

在农业方面，商业部门也起着企业家的作用。如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湖南和福建引种了5000亩竹子。^④商业机构鼓励生产大队从事果园、蚕桑、林业和药材之类赚钱的多种经营活动，这样生产大队就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在农机销售后，商业职工还负责培训拖拉机手和组织维修活动。^⑤

商业部门的企业家职能先于文化革命。这是由于中国的计划一直是有缺陷的，远不如苏联的计划那么完整。中国的计划并不包括众多的小消费品。甚至某些主要产品也有未按计划供应的。商业部门对生产缺口有较清楚的了解，并能加以弥补。他们不但掌握商品的短缺情况，而且也能提供原材料的信息。因此它们是供求双方理想的协调机构。它们比处于工业、农业基层组织的大多数干部更能掌握较大范围内生产和市场的整个过程。这样商业机构就

①《人民日报》，1971年6月12日第4版。

②BBC，FE/W644/A/8，吉林省消息，1971年9月30日。

③BBC，FE/W603/A/16，广西地区消息，1970年12月25日。

④BBC，FE/W644/A/8，陕西省消息，1971年10月14日。

⑤BBC，FE/W647/A/3，山东省消息，1971年10月11日。

能为有关部门提供有益的建议,筹集资金投入资本设备,并从事有关的经营活 动。

商业机构资助这类活动,至少为它们提供初始资金。这些活动一般动用商业企业的部分流动资金。我们知道把流动资金用作长期投资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当然这样使用是不合法的、通常会受到批评。在实践中,由于银行对商业机构的流动资金贷款较为宽裕,因此,商业机构比工业企业更易延期支付贷款。^①

广泛宣传了一批县级进行计划协调的样板,它们遵循“自力更生建设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的方针。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的 地方单位中,企业之间有着紧密的协调关系,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普遍。《人民日报》上长篇报道的一个样板是河北省的遵化县。^② 该县在大跃进后 10 年里,粮食产出始终保持在每公顷 3 吨的水平上。由于缺乏灌溉机械、饲料粉碎机和拖拉机零部件,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很明显并不具备这些外部资源,至少价格太贵买不起,因此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县、公社、大队的三级服务网。不久该县面临原材料短缺的困难。他们发动群众,就地找矿。几个月内“群众发现了 22 种矿藏,包括煤、铁、铜、金、铬、锰、长石和石灰石”。由于本地供给煤矿和铁矿,该县农机所需钢铁达到“基本自给”。但是煤矿和钢铁厂存在亏损现象。县领导意识到这些企业资金不足,筹集资金的最好途径是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资本—产出比例低、收效快。

遵化县为取得利润而建立的消费轻工业包括食品罐头、肥皂毛毯、针织、五金、造纸、木器和玻璃制品。1970 年该县轻工业上交

^①1957 年 9 月底银行对工业和商业的贷款总额中 85% 为商业贷款。参阅《中国的经济体制》,第 422 页;关于挪用流动资金作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参阅该书第 421—430 页。

^②《人民日报》,1971 年 9 月 15 日第 1、4 版。

国家的利润(这里的国家包括从县到中央政府国家管理机构中的任何一级,从上下文看国家是指县)超过了100万元,其总产值有时超过1千万元。大部分利润弥补县里钢铁厂和其他重工业工厂的亏损。弥补亏损后结存37万元,用于“促进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和加快农业机械化”,它是“用轻工业推动重工业,用重工业促进农业”的样板^①。

遵化县当局能依靠轻工业取得利润,来源于对本县范围内贸易的控制。它拥有垄断地位,能够优先安排本地产品,排除外地产品的竞争,在这个保护性市场中,本地商品以盈利价格出售。这样本地生产的消费品在遵化县零售商店中销售比例1970年达到33%,是以前的2倍。^②

我们很少知道各级行政机构拥有怎样的定价权。从1957—1958年起,大多数轻工业产品的价格由地方控制。现在在乡村地区,很有可能县级机构行使这方面的权力,使价格确定在能赢利的水平上。各个县事实上控制着亏损的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只要这些产品供应给县级管理的企业。县还控制着当地各种投入,如劳动力和原材料,这些都是县内各类工业所需要的。

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县用轻工业的利润补偿重工业的亏损,也许是习惯和每一部门一般接受的价格水平。价格政策并不是用来高价销售同外地质量一样的本地产品,而是用同外地产品一样的价格水平出售本地的劣质产品。^③县里产品在外地销售所得价格经常低于在本地保护性市场上所得的价格。

^①《人民日报》1971年9月15日第4版。

^②同上。

^③强调地方自给自足似乎导致质量的普遍下降,这是由于缺乏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以前在任何地方销售的外地产品引入当地市场的主要原因是质量超过当地产品或在价格方面比当地产品更合理。

如果是短缺商品,地方当局一般不愿意供应外地,除开出于其他方面的强烈动机。如据报道,上海市市长要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提供一定数量的某些商品,江华回答说:“浙江不是上海的殖民地。”在1962年中国许多地方严重缺粮时,某些兄弟省要求浙江提供救济粮时,江华拒绝了这些要求,说“我还有猪要喂呢”^①。

促进轻工业,把轻工业的利润用于发展经济的其他部门,这并不是遵化县所特有的,而是中国许多地方普遍采取的政策。事实上这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指导政策之一(也许这个五年计划确实是指导政策汇编而不是一系列的数字指标)。一则新闻中报道,陕西省某市的官员说,这样的指导政策,使他们“逐渐明白了下述真理:‘农业、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才有市场和资金,才能发展得更快’”,因此市级领导决定新建一些纺织和其他轻工企业“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为重工业提供资金”^②。报道还指出了轻工业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在1970年陕西省财政收入的1/3来自轻工业。^③在工业更发达的省份,所占份额还要大些。

遵化县的矿业是亏损经营,轻工业利润大,而在其他地方小矿却能提供利润。在湖南、河南、江苏,都有小型矿取得利润后投资于农业和工业的样板。^④

地方具有的筹资能力,使地方不依赖于外部资本,增强了地方自治的倾向,至少它们能用自筹资金解决一般的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在某些场合投资于轻工业,然后用所得利润资助其他部门,这

①BBC, FE/2983/B/11, 浙江省消息, 1969年1月13日。

②BBC, FE/3945/BII/10, 陕西省消息, 1972年3月15日。

③BBC, FE/W659/23, NCNA, 1972年1月27日。

④《人民日报》, 1971年7月19日, 第4版;《红旗》, 1972年1月1日, 第64页; BBC, FE/W661/A/13, 湖南省消息, 1972年2月18日。

一事实本身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现在有时用利润标准决定是否投资。换句话说，初始投资之所以选择在轻工业而不是在其他部门，是由于轻工业赢利大。投资的首要目标既然是利润，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假定，在轻工业内部，优先投资的项目必然是预期赢利最高的。前几年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建议采用利润指标来决定投资，最著名的是中国科学院经济学所所长孙冶方，直到在1966年因为他的修正主义倾向而免职，他是坚持使用利润指标的先行人物。^①

但是，一方面公开拒绝用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概念作为投资方向的指导线，而在文化革命前的政策实践中还是广泛地应用这一概念的。如在铁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水力发电还是火力发电、现代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大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之间的投资配置安排方面，都应用投资收益最大化这一标准。现在经过文化革命，这样的政策虽然官方并没有正式接受，但事实上经常采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有关资料说明在评价某个投资项目的赢利水平时所采取的技术，投资项目之间是如何比较的。由于批判这一政策，其后果之一就是从此再也没有看到实行这一政策的最佳方法方面的公开讨论。在一些场合，则计算投资项目预期收入的贴现现金流量（但贴现率又如何确定呢？）。然而，也许更普遍的对赢利率的估计是根据某一突出方面决定的，确实，即使那些使用较复杂计算方法的国家，在投资决策时也要使用某些最终的因素。

^①《人民日报》，1966年8月12日，第5版；卫东方：《‘利润挂帅’论剖析》，《北京周报》，1966年10月21日第21—25页；《关于孙冶方的反动政治立场和经济观点》，《经济研究》，第12期，1963年12月第45、47、50页；杨建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第5期，1964年5月第15、17页；《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中国经济体制》，第162—163页、480—481页。

结 论

文化革命以来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强化了相当部分的中国经济发展成“蜂窝状”类型的趋势。那些大部分可自给自足的细胞，或者是地方政权单位或者是企业。自力更生意味着有效率的细胞不再援助无效率的细胞。当然这会影响平等。

由政治控制的经济同市场经济相比，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筑起了高高的非关税壁垒。当地方当局既控制加工制造业，又控制在这一地区内产品的分配权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地方当局必然优先考虑当地生产，实行行政保护。目前，中国的地方当局经常为当地生产者提供高度的行政保护。

中国形成的是关税同盟而不是共同市场。这就是说整个国家有着共同的拒绝外部世界的贸易壁垒，但国境内并没有自由贸易。非关税壁垒比以前的“里关”对自由贸易的限制更大。只要投资来源于地方当局的资金，地区间的区域划分就成了资本流动的壁垒。对劳动力流动来说，这也是壁垒的一部分。地方居住许可制度和地方配给票证制度限制了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以及从乡村到集镇的迁移。乡村当局一般无法拒绝接受从城市“下放”给他们的城市青年和其他人。当然据报道有时也能从有关部门得到某些款项来安置新来落户的。^①也有可能给乡村当局以其他有关的优惠，这样争取地方当局配合下放运动，例如接受新来的城市人“口”后可扣减上交征购粮食的指标，因为从城市那头来说已减少了“商

^①在1968—1969年中，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每接受一个下放的知青，就可从县革命委员会那里得到220元人民币。其中50元是作为开始6个月的食物补助，其余用于住房、农具等方面的开支（同作者的私人通讯）。

品粮”指标。

某些地方单位(如上海)的现代工业规模优势极大，它建立的大工厂，其优势要大大超过比较贫穷的地区。因此这些地方就处于这样的位置：给乡村内地提供加工制造品，换回食物和原材料。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使乡村地区十分值得专门从事农业，并从大工业中心购买其所需的大部分加工品。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技术现代化将会打破中国经济的“蜂窝状”特征。通过重建像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那样的经济计划体制，似乎不太可能打破“蜂窝状”特征，而只能通过大工业中心不断扩大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即通过大工业中心寻求广大的市场、并从内地取得原材料的过程，才能打破经济的“蜂窝状”性质。

关于中国经济分割化的解释：体制分析

美国 托马斯·P·莱昂斯

译者按：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分割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分割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海外学者中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着强烈的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计划体制造成的。中国经济划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个子块，在计划内子块中又划分为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两个部分。计划组织也分成中央部和省级计划机关两个体系。这样计划体制和计划组织的特点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分割化。

中国计划体制的特点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流通和分工合作关系被地区间的分界切断，造成了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以及严重的浪费现象。本文开始运用矩阵方法讨论基本原理，为了阅读的方便并考虑到一般读者的要求，译文中把矩阵附录删掉了。

本文原文发表于1986年的《比较经济学杂志》^①，

^①Thomas P. Lyons, Explaining Economic Fragmentation in China, A System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PP. 209—236 (1986)。

作者托马斯·P·莱昂斯(Thomas P. Lyons)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研究人员。

导 言

由于过去几年新发现的数字资料,有关中国最近的经济史方面一些未及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了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能。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时期(1958—1978)国内贸易类型的演变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奥德利·唐尼索恩长期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十分严重的走向分割化的趋势,并把这一趋势相当贴切地概括成“蜂窝状”经济,或者说“由许多互不相干的单位组成”^①。另一方面,尼古拉斯·拉迪则认为,“(1958年)分散化以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出强烈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征。”^②唐尼索恩和拉迪对立观点的争论,各自都有广泛的支持者。

近来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经济活动方面,唐尼索恩关于走向分割化的假设似乎更符合有关的证据。在农业方面,拉迪发现同产出相比较,地区专业化在削弱,地区之间的贸易在下降,在某些方面从绝对额来说也有下降现象,资源配置效率也在降低。^③在工业方面,莱昂斯发现许多重要的燃料、原料的运输量同生产不

^①参阅 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中国学季刊》,第52期,第607页,1972年12月;《中国的中央和省的经济关系》,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第34页,1981年。

^②Nicholas R. Lardy,《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计划:中央与省级财政关系》,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价》,第95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5年。

^③Nicholas R. Lardy,《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48—88页,1983年。

同步^①，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出和设备能力被广泛地分散在许多省份，这也表明总产出中进入地区间贸易的比重在下降。^②

可以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分割化的不正常类型，也许最终可以归结到毛泽东对地方自给自足的明显偏爱。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中央领导号召省和较小的地方单位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方面自给自足，要求各地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③但是要求只是指出要达到的结果，这种号召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各地区间互相作用类型的变化，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变动因丧失地区间贸易优势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经济分割化更切合实际的根源必须到中国经济体制中所实行的特定的政策、结构和运行中去寻找。例如拉迪认为“(在农业方面)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号召，而是由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所强化的”，比如税率政策和国家粮食市场政策。^④相比较而言，第二个层次的解释因素，即体制因素而不是政策，讨论得还很少。

本文认为经济分割化是1958年以来计划体制运行的结果特征。第二节简要讨论计划中的问题，对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并把重点放在该方案中同苏联式体制共同的那些方面。第三节至第五节具体分析中国的案例，阐明中国计划机构和计划过程的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以省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的经济分割。第六节是总结性评论。

本文的解释必然带有框架性和尝试性。有关毛泽东时代运行

① Thomas P. Lyons: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对分割化假设的检验》,《比较经济学杂志》,第9卷第2期第134—139页,1985年6月。

② Thomas P. Lyons: 《中国经济的一体化和发展,1957—1979》,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第75—107页、第165—174页,1983年。

③ 如参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北京周报》,第12卷43期,第7—13页,1969年10月。

④ Nicholas R. Lardy: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50页,1983年。

的中国计划体制的可靠资料仍很缺乏和零散。而且，有关经济体制运行的问题并不经常能用数量方法检验；在这方面的进展从来不可能诉诸直接的、结论性的证据，需要推理和概括。尽管如此，我们如果要理解中国最近的经济史和当前的经济改革，就要重视研究毛泽东时代计划中那些重要的和悬而未决的问题。^①

计划过程的划分

在指令性经济中，计划机关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成下列一点：即在一系列方案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案。为了某一时期的特定结果，在给定的经济初始状态下，计划者选择一个满足某种规定条件的方案。例如，党的领导在每一阶段对某一特定的产品规定产出指标，或者在某一阶段结束前要求完成某项特定的投资项目。^②对计划者考虑的任一方案，都对应着一个投入—产出矩阵。每一矩阵的任一元素都代表着某一时期从这一机构到另一机构一系列循环流。如在某个时期经济中包含着 m 个机构和 n 种商品，那么这一时期完整的矩阵形式包含有 m^2n 向量，覆盖了所有机构间的交换关系。在选定的方案中，某一机构所对应的行和列决定着对该机构的指令。^③

^①本文中把中国计划体制的特征潜在解释成过去的经济趋势。有关毛泽东以后的内在体制的含意分析，请参阅 Christine P.W.Wong, 《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泽东的传统和 80 年代的前景》，Y.Y.Kueh, 《中国的乡级经济改革》，《中国学季刊》，第96期，第665—688页，1983年12月。

^②当然，党的领导也许要求解决方案是具有效率的或使某个目标函数最大化。由党的领导给定的一系列条件、方案不一定有解，也不一定有唯一解。

^③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是很容易引入的因素，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加以处理。机构的数目随时期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如由于投资的结果），正在建设中的投资项目可以处理成对某个特定机构（如建筑公司）的物品销售。

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经济子块

即使撇开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综合计划所需的信息也明显地超出了任何可想象的计划体制的能力。为了使问题简化成可操作的规模，可以把经济划分成两个子块，只有其中的一块才实际编制计划。在每一阶段只有在计划子块中的机构才进入相应的投入—产出表，编制计划可把精力集中在简化了的机构间循环流矩阵。从计划者的角度看，进入那些属于计划外子块的机构循环流现在只是作为出口，而从计划外子块的机构流出的循环流只是作为进口。这样一来，计划者不必注意计划外生产者的技术以及计划外机构间的循环流动，只要计划子块所需的进口得到满足就行（在计划出口决定的条件下）。计划者通过频繁的、详细的和有约束力的指令同计划内的机构不断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计划外的机构没有必要得到有关它的经营活动的具体指令，对计划外机构的联系通常是没有针对性的或者仅仅是纯信息方面的。计划子块以外的协调活动，并不是通过详细的指令，而是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进行的。

为了计划目的而把国民经济分成两部分的划分方式，部分地取决于经济中不同机构的特征，取决于下达给计划者的条件，因此也就取决于党的领导的偏好。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特别急需或属优先安排的产品（或者生产这类产品所需的基本投入品），生产过程具有确定的投入—产出系数，使用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和技术，大多数投入品来自于计划企业或大多数产品要提供给计划企业，那么该企业就越有可能列入计划子块，成为其中的一个机构。例如，在工业方面，那些生产重军事硬件的企业，满足上述的大多数条件，就更有可能列入计划子块。那些生产轻工消费品，很少满足上述条件的则更有可能在计划外子块。

国民经济一分为二，不仅简化了计划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便

利了计划执行。计划者的观点认为,计划外的经济子块构成了物资和劳动力的蓄水池,当计划经济那一块出现不平衡、威胁到指标完成时,即可利用计划外子块弥补(当然这需要以并不急需的、计划外产品为代价)。另一方面,计划外子块也是剩余产品的吸纳者,随时准备吸纳多余的供给品。由于实际的计划是不完善的,由于一些未及预料的因素不断影响计划活动,预期的两个经济子块之间的进口—出口类型必须作出修正,例如要组织一些临时劳力进入计划内企业或者一些多余的设备要转移给计划外企业。在计划者本身对计划者实绩不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计划者是欢迎计划外的这类安排的,这样便于调整,计划者也不时地求助于计划外子块。

虽然现存计划外子块的某些方面便利了计划,但也带来了新的控制问题。计划外活动大部分不在计划者的视野之内,经常是为个体所得而进行的,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资源就会从计划活动中转移出去。另一方面,循环流进入计划内子块也必须征用和保护。政府会采取垄断运输或商业渠道的手段,以便保持计划对经济其余部分的干预。即使对计划外子块本身,政府也要通过控制有关的机制,如控制银行和市场,并通过这些机制保留制约计划外活动的的能力。

计划内子块的划分

正如已经讨论的那样,通过把整个经济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个子块的办法,计划问题就大大地简化了。计划问题的求解和求解方案的实施需要对计划内子块本身进一步加以划分。在计划过程中,所有计划内机构可合并到不同的混合单位里,每一单位又进入指定的计划小块,在所考虑的时期内一个完整的计划系列(各个机构的计划进入不同的计划小块),可以归结为 N 个投入—产业矩阵,每一矩阵含有 n 个向量,反映各个机构各自的循环流和所有机构同经济其他部分之间的循环流。对某个时期完整的

表系列而言,计划当局要加一附属的向量表描述机构间的循环流、从计划外经济子块的进口以及对计划外经济子块的出口。^①计划当局要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该方案每一时期包含 $N+1$ 个表),这个方案所计划的进口—出口类型是可接受的,并能满足下达给计划当局的条件。计划内子块的进口—出口类型能否被接受,是由计划外机构是否有能力和是否愿意用特定的出口满足进口的要求所决定的。

如果选中的令人满意的方案需要较少的单位之间的协调(即描述单位之间循环流的许多向量如果为零的话),那么计划当局的问题就简单化了。这样一来计划内经济子块如何划分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把单位以部门或以区域划分需要较简单的单位之间矩阵。例如重工业几乎不需要外部的投入品(主要需要的是运输和其他服务)。特别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各区域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区域之间的贸易只是限制在少数产品的很小的循环流。

计划内经济子块的划分,同时要求对计划外经济子块也要加以划分。由于地方计划部门对该地区的计划内和计划外经济子块之间的关系便于管理,对该地区的计划外机构活动更易了解,并能设计出相应的地区政策,因此如果计划内机构是根据地区分界加以划分的话,那就特别方便。

在计划内经济子块划分已定、计划当局满足一系列条件的前提下,一个满意的方案(如果这样的方案存在的话)或多或少是由某种概率找到的。因为它要容许 N 个计划小块产生满足各自机构的方案,并要检查这些方案系列有解。一个更可行的处理方法就是通过不断地反复来发现这样的方案。根据下达给计划当局的条

^① N 个表中,每一个都对应着计划内子块完整的 $m \times m$ 机构间矩阵中的一个方阵(由主对角线分开),机构按一定顺序排列。计划当局必须考虑并没有包括在方阵中的元素。

件,每一个计划小块得到关于主要产品的一系列指标(或计划小块要考虑的不同方案对所属机构的其他制约条件)。每一计划小块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制定出满意的方案,计划当局就审查计划小块的建议方案,如果有必要作出改变,就对个别指标进行调整后再行公布。这样,计划小块的方案就得修改,并重新上报和审查,这个过程不断反复直到发现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机构间的循环流同时达到均衡;可行的进口—出口类型;满足下达给计划当局的条件。这个解决方案就形成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

计划内经济子块的划分隐含了这样的意义,即国民经济计划是由 $N+1$ 块各个不同的计划组成的。其中 N 块属于计划小块。确实,计划小块可以进一步分解国民经济计划,把相应的责任分到更小的小块中(形成小小块或一组机构的计划),计划小块只管理小小块之间的计划。

计划精练过程

实践中计划当局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它不可能在每一个时期对每一个机构的活动作出详细的、足够多的指令。例如,在作了某种划分的体系中,由计划当局决定的小块之间的平衡量要大大少于小块之间所交易的商品种类,这是由于现在产品是以加总的形式或者以商品类的形式进行处理的。^①其结果是,计划当局认为满意的一系列计划方案、一个单位一个计划中实际上包含有若干产品的不协调现象。由于计划当局并不计划不同单位中具体机构的所有交易,这就发生了进一步的困难。 N 个增广矩阵,在一定时期含有 \bar{n} 个机构的计划内子块的单位间矩阵,上述两者的集合并不含有一个完整的 \bar{n}^2 个机构间向量。即使撇开产品间的加总问

^①换句话说,描述 N 小块之间计划流的矩阵包含 l 个向量 ($l < \bar{n}$)。在计划期, N 个小块计划中至少有一块反映 \bar{n} 种商品的流进和流出。

题不说，计划等级体系对计划问题充其量也只能提供部分的和近似的解决方案。^①

实际计划不可避免的粗糙性必然要求有一个精练过程，即把计划等级体系提出的近似解方案转化成更精确的计划，每一机构都有相应的计划，计划系列是统一的、令人满意的。精练过程由物资供应和分配系统进行。精练过程还包含有计划小块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在计划等级体系中的跨部门联系）。由于每一计划小块拥有其他任何小块都没有的信息，这种信息也没有在单位间计划中使用，因此这种相互联系是有用的。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中，两小块也许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如相应单位间均衡的指导线问题，各自经济单位内机构间特定商品的交换问题等等。这些安排可以归结到整个机构间矩阵中某个特定元素的项目变动；相关的元素并不处于特定计划小块的方阵之内。当然，如果计划小块再分解相应的责任，那么精练的过程就包含着小小块之间的联系以及计划等级体系中不同部门的小块和小小块之间的联系。粗糙的计划通过水平联系网络得到精练，由此补充了计划等级系统本身。这样，整个的组织——计划等级系统和附属于它的补充关系网络，产生了管理计划内子块活动类型的具体指令。

中国计划的划分

中国经济包括两个子块，在中国计划中有相当不同的处理。两个子块的划分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从近似的角度看，计划内子块大体对应着中国概念中的“国营部分”。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占中国物质净产值的50%不到，拥有的劳动力也不到

^①当然，甚至一个近似的解也不一定能找到。由于计划当局不能达到同时的均衡，最终的计划就会有缺口。

总数的1/5。^①在工业部门,国营部分占主导地位。以1980年为例,它包括83万2千家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22%;国营工业企业的劳动力为3200万人,占工业劳动力的59%,生产79%的工业总产值。^②国家还雇佣另外4800万人,大多数在服务部门。^③

计划外的经济子块大体上对应着“个体”和“集体”部分,个体部分包括所有家庭和由家庭和个人经营的小商业。在1979年大约1/6的农业总产值是由个体部分生产的。^④毛泽东时代自留地的重要性表明在以前年份里它生产的份额并不是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由于个体部分贡献份额在农业中比其他部门更大,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任何一年个体部分生产的物质净产值不会超过8%或9%。70年代后期,集体部分包括700多万企业,拥有的劳动力超过3.4亿。^⑤极大多数是乡村生产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4/5的

^①毛泽东时代大多数时期物质净产值中农业的份额超过40%。差不多整个农业都不属于国营部分。工业占物质净产值的份额1957年为28%,1978年升到41%;大约1/5左右不属于国营部分。其他部门中非国营企业也对物质净产出有贡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105、107页,1982年。也请参阅下文的评论。

^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106、108、208、212页,1982年。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108页,1982年。

^④刘中一、刘尧传,《农业结构》,载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1979年在集体农业中有5100万个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和大队经营的企业有148万,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是由乡村生产队和城市合作经营的。这里每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都算作为从事农业的企业。1978年中国只有2100个国营农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107、188、192、208页,1982年;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1980》,北京:农业出版社,第6、8页,1981年。

农业总产值。^① 集体部分也经营着中国工业的大多数企业。虽然在工业劳动力和产出中集体部分占的份额都不大，但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内其重要性是不同的，例如在第二轻工业部门中1978年78%的工业产出是由集体企业生产的。^②

计划内子块和计划外子块时有变动，并不完全对应于名义的所有制划分。^③ 一些国营小企业一直没有列入计划内，而一些集体企业则包括在计划内。^④ 虽然在一定时期两个子块的十分精确的分界是难以确定的，然而中国的报道确实明确地区分计划内和计划外两个子块，而且指明这不仅仅是为了统计的方便。最近的一则新闻说：“政府部门并不注意计划外的生产”；另一则提到的例子是一个社办厂由计划提供的材料只占1/3，明显地反映出集体企业是计划外剩余的吸纳者地位。^⑤

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的评论和官方的报道经常提及侵蚀计划经营活动所需资源的问题。1962年一篇社论指出：

“通过认真调查，确实发现那些把资金、材料和建筑劳力投到

①刘中一、刘尧传：《农业结构》，载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刘显东：《手工业结构》，载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进一步的讨论见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泽东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第12—15页，1985年。更抽象的讨论可按经营活动划入经济子块。这样的划分可能要超越某些企业，如一个企业中只有某项经营活动算作计划内的。除此以外，两个经济子块的分界可归结为一个很广的区域，例如有的企业同计划的关系是随时有所变动的。

④在1958年“6万多家”工业企业算入计划内，然而在1958年国营工业企业有11万9千家（Bruce L.Reynolds：《农业发展的两个模型：目前中国政策的来龙去脉》，《中国学季刊》，第76期，第860页，197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7页，1982年）。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1957年国营工业企业只有5万8千家，在1962年为5万3千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7页，1982年）。

⑤《人民日报》，1979年5月2日，第4版；1978年5月29日，第2版。

计划外工程的,极大多数是通过非法途径进行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些人声称依靠自有资源上项目,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利益,拖延了计划项目的完成,破坏了正常的生产。”^①

从计划者的观点看,农业集体也属于计划外机构,对这些集体的处理方法从根本上不同于计划内机构。“国家除开通过商品交换,各自用产品满足对方需要以外,没有其他手段同几百万集体企业建立经济联系。自然在交换中,各自都要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②从理论上说,计划者对集体农业的直接作用只是局限在規定基本产品的征购定额(即计划子块的进口需要,并用计划子块的出口予以补偿)。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干预是经常的;对集体企业的主观需求十分普遍,值得引起中央领导层的关注。^③自然,农村集体仍然属于计划者主要关注对象——计划内经济子块的外圈。

计划内经济子块的划分

为了给各个机构发出指令,中国拥有上到直接隶属于国务院领导的计划委员会,下到县和市的计划办公室的国家计划组织。虽然这个组织的结构经常调整,但它的关键特征在1958年至80年代初期则基本不变。^④

^①转引自Bruce L. Reynolds,《农业发展的两个模型:目前中国政策的来龙去脉》,《中国学季刊》,第76期,第866页,1978年12月。

^②薛暮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北京,外文出版社,第108页,1981年。

^③《北京周报》,第21卷,第10期,第9页,1978年3月。

^④关于计划组织的详细情况,见Cheng Chu-yuan,《中国的经济发展:增长和结构变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部观点出版社,第166—175页,1982年;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纽约, Praeger出版社,1967年;Nicholas H. Ludlow、James Stepanek,《河北:一个省的分析》,《中国商业评论》,第7卷,第5期,第43页,1980年10月;Barry M. Richman,《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社会》,纽约,Random出版社,1969年。

中国的计划内经济子块分成中央计划和非中央部分。中央计划部分的机构隶属于以部门为基础的中央部委，非中央部分的机构隶属于以地区为基础的省级计划当局。在国务院领导下的主要分部门(部或省计划当局)给更低的层次分配各种责任。这种更低的层次在部委下是中央的工业局，在省计划当局下是地方计划办公室和省工业局。局或地方办公室进一步给下面分配责任。结果是形成一个等级系统，这一系统的任何一级接受上一级的强制性条件，并从下一级建议的计划中选择计划方案，这样类似的计划系列就能完成上一级的条件；该级计划机构还必须满足自身的单位间均衡。计划官僚系统的底层主要考虑的是计划内和计划外经济子块之间的相互联系。

中国的“中央”计划包括委员会级的计划，覆盖直属委员会(即部和省)领导的主要计划部门单位之间的循环流，以及部或部所属部门计划者制定的关于计划内子块中央部分所有机构的综合计划。“省”计划包括省级当局的计划，覆盖直属省领导的部门(即省工业局或地方办公室)各单位之间的循环流，流进或流出省的循环流，以及由省级或附属部门计划者制订的详细综合计划。^①一个计划内的非中央企业，一般直接包括在省局或地方办公室领导下部门(即公司)的综合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非中央企业也许直接进入省计划当局的计划中。^②中央计划内企业一般包括在部的直属部门的综合计划中，“关键”企业也许进入部级计划，甚至进入委员会级计划。^③

^①省计划与中央计划在结构上相似，包括所有省级机构的详细计划和地区、部门所属单位之间的平衡。在省计划组织内，省计划当局的作用类似于中央层次上委员会的职能。地方计划和地方计划组织也与此类似。

^②Thomas H. Pyle, 《中国管理的改革》，《中国商业评论》，第8卷，第3期，第9页，1981年5月16日。

^③Bruce L. Reynolds, 《农业发展的两个模型：目前中国政策的来龙去脉》，《中国学季刊》，第76期，第860页，1978年12月。

各个主要计划部门经济单位相对独立的性质表明，委员会级所要实际掌握的平衡是很少的。大多数关于局、地方办公室和重要企业的平衡关系可由部或者省当局掌握；大多数关于公司和单个机构的平衡关系可由局和地方办公室掌握。事实上，委员会级平衡的不过几百种生产资料，而进入部或省以下部门平衡的要超过1万多种产品。^①

当然，单个机构能在计划内子块的中央计划或非中央计划系统内转移，或者在中央计划系统的不同部门间转移。中国国营工业企业隶属关系各个时期有较大的不同。在1957年国营企业数为5万8千，其中9300多属中央系统。到1958年中期，这些企业中有87%转给省级控制。1963年的再一次集中，使中央系统的企业数增到1万家。但是在1970年以后的分散化，又把大多数中央企业转移到省里控制。^②在70年代中期，中央企业数不到2000家，其中大约有1000家属重点大企业，它们的经营对国民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影响。^③在70年代中期，中国大约有5000家大中型工业企业，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评论，参阅刘国光、王瑞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页，1982年；Michel Oksenberg：《中国的经济官僚主义》，《中国商业评论》，第9卷，第8期，第25页，1982年6月；James Stepanek、Dori Jones：《同李开信会谈：转变中的中国计划体制》，《中国商业评论》，第7卷，第6期，第14、15页，1980年12月；Bruce L. Reynolds：《农业发展的两个模型：目前中国政策的来龙去脉》，《中国学季刊》，第76期，第858、861—862页，1978年12月。

^②刘国光、王瑞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7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7页，1982年。

^③刘国光、王瑞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页，1982年；Robert Ash：《季度记事和文献1982年10—12月》，《中国学季刊》，第93期，第187页，1983年8月。

至少有3000家企业不是由中央计划管理。^①1980年河北省内共有127家中央企业和4569家省企业,表明在70年代后期中国全部的中央企业数要少于2500家。^②

虽然由于部级控制的规模大的企业占主导地位,中央系统的产出份额也较大,但从总产出资料来看,其类型也很相似。1957年中央企业所生产的工业产出占总产值的50%左右,到60年代中期,相应的份额为30%左右。^③在分散化以前的1957年,据报道仅上海市的中央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出就占46%,在第二次分散化后的1970年,占7%。^④在70年代中期,中央企业占工业产出的份额可能少于40%。^⑤

在机械制造业,绝大部分国营企业不属于中央控制。例如在机床制造业有7家中央企业和265家县级以上的非中央企业。机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7页,1982年。

②Nicholas H. Ludlow, James Stepanek, “河北:一个省的分析”《中国商业评论》,第7卷,第5期,第42页,1980年12月。在70年代后期,某些名义上不属于省的企业则由部代表省进行管理,这表明了某种集中化趋势。参阅刘国光、王瑞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9页,1982年。

③这个份额是指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而不是仅指占国营工业的产值。见Bruce L. Reynolds, 《农业发展的两个模型:目前中国政策的来龙去脉》,《中国学季刊》,第76期,第860—861页,1978年12月;Christopher Howe, 《中国经济》,纽约:基础书籍,第56页,1978年。

④Charles Bettelheim, 《文化革命和中国的工业组织》,由Alfred Ehrenfeld翻译,纽约:每月评论,第46页,1974年。

⑤1980年1400家大企业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08、212页)。2000/1400×0.25=0.35,并不是所有中央企业都是大规模的;另一方面,在70年代后期工业企业数在增加。

业中央企业占国营总产值的10%。在煤炭业，1965年中央企业占总产值的71%，在1981年占54%^①。

表1显示了由委员会和部安排的总产出份额。在某些方面，这些份额超过了由中央企业所生产的相应份额，其原因在于一些非中央企业生产的产品也进入了中央平衡方案。有趣的是，1978年由中央安排的煤炭产出份额同1979—1981年间中央企业所生产的产出份额几乎一致。^②由中央安排的机床产出份额，也许大于同年中央企业生产的产出份额，但份额仍然较小。另一方面，大部分钢是由中央安排的，九大钢铁“基地”生产了大多数的钢，这些基地大多数或全部由中央控制。^③一般而论，中央安排的工业产出同中央控制的企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④

除工业部门以外，相当大部分的总产出是由非中央企业生产的，只进入非中央计划系统的平衡。例如在交通业，某些铁路和几乎所有的公路、内地水路（除长江以外）都由省级或当地控制。^⑤这

①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1984》，第Ⅱ—234、Ⅱ—244、Ⅱ—254页；中国煤炭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982》，第25、31页，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1983年。机床业数据只包括刨床方面的数据。本文下一节和煤炭产出中，中央企业的份额趋势表明在机械制造业中央的产出份额，1981年要低于以前一些年份，大多数产出是由非中央企业生产的。

②中国煤炭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982》，第25、31页，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1983年。

③孙敬之：《中国经济地理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0—151页，1983年。

④在机动车行业，由中央安排的产出份额要比中央企业生产的份额大得多。但是前一个份额包括最终完成的机动车，而后一个份额是指整个行业的总产值，也许中央企业最终装配方面起的作用比整个行业中起的作用更大。

⑤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纽约：Praeger，第251—272页，1967年。

表1: 由中央计划安排的产出份额 (1978年)

商 品 类	中央份额 (%)
木 材	81
成 品 钢	80
机 动 车	75
化学制品	75 ^a
有色金属 (铜、铝、铅、锌)	64 ^b
电 力	55 ^a
煤 炭	54
水 泥	36
车 床	35
轻工机械	c
纺 织 品	0 ^a

注释: 大多数有资料可查的商品组属于“一类”产品 (即由中央安排的生产资料); 其他许多商品主要或全部由省和较低层次的计划者安排。

a. 也许同1979年有关

b. 1980年

c. 按照中国轻工机械公司发言人的口径“主要由省政府控制”。发言人声明所属年份没有说明。

来源: 有色金属: 李开信: 《中国的物资管理》, 载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 第IV—124页, 北京: 经济管理杂志社, 1981年; 化学制品、电力和纺织品: Thomas H. Pyle, 《中国的管理改革》, 《中国商业评论》, 第8卷, 第3期, 第9页, 1981年6月; 轻工机械: 《中国贸易报告》, 1981年3月第9页; 其他: 余啸谷: 《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把物资流通搞活》, 《经济管理》, 1980年第2期, 第2—7页。

样算来,从总体看,在毛泽东时代中央企业大约占中国净物质产出的1/4左右。^①中央安排的扩展到总产出的很大部分,但明显地大大少于1/2。当然,实际的份额各年有较大的波动。

中央企业占总产出的较小份额这个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完全不由中央控制的。中央计划者可以向省级计划当局规定一定的条件;省计划当局也许感到有必要对下级部门规定一定的条件,以产生满意的省级计划。就这样,中央能通过计划等级系统从上到下进行控制,最终影响到非中央的计划内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出口—进口计划,又影响到计划外的机构。而且,下一层次采取的某些决策,包括那些大的投资项目,需要得到中央批准。中央能够直接干预那些名义上由下一层次管理的事务,或把那些经营活动不能令人满意的下级机构转为中央计划。中央也通过计划物资的安排(如表1)影响非中央计划内的活动。也许在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通过左右经济活动的意识形态来控制经济。

当然,中央实行控制的程度不能从现存的、那些正式控制手段中加以推断。例如由于中央意见不一致,就意味着不会发出清楚的指示和系统的计划指标。正如文化革命那样的混乱,导致中央下达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不断减少,较低层次就会有较大的权力。

计划的精练

计划制订过程形成的计划,从所包含的机构间向量数来看是不完整的,从每一向量所决定的协调数量来看又是粗糙的。在中国

^①本文的估计是基于下列观察:中央企业在工业部门是极其重要的,在工业中由中央企业生产的产出似乎没有超过40%。关于这方面进一步的评论,参阅Y·Y·Kueh:《中国的乡级经济改革》,《中国学季刊》,第96期,第665、669页,1983年12月;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泽东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第20—22页,1985年。

的计划精练化过程中,物资分配网络起着中心作用。这个网络把投入品分配给各个机构,决定具体的产出品种和销售方案。在实践中,某种商品的供求双方简化为“固定协作”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机构间在各个时期均保持一种配对关系。^①物资分配会议也方便了经济单位间的协调,简化了分配网络的任务。这样的会议:

“来自不同工厂和政府部门的代表集中在一起协商供应和销售合同。没有这样的会议,中国的年度计划只是理论化的、无法操作的,以致于计划不起作用。这些合同丰富了计划,使厂方了解了产品要求、发货日期和其他详细信息……”^②

对某些商品,商业部门也参与计划的精练化过程,把标准化的商品以批发形式提供给任何经过批准的购买者。

第二组精练化机制包括多种形式的称之为“双重领导”的跨部门管理关系。所谓双重领导就是一个部门(如一个部)管理计划等级系统中不同部门的一个分部门(如一个局)。例如:

“河北省工业交通办公室共有87个成员,负责执行由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制订的年度计划,监督各个企业分解成季度计划和月计划并合理地贯彻……河北省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管理13个地方工业局。无论是该办公室还是工业局都属于双重领导。如该办公室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省双重领导,而煤炭工业局则属煤炭工业部和省双重领导。”^③

在较低的层次上也有类似的安排。毫无疑问双重领导的实际

①《社会主义工业(I):所有制》,《北京周报》,19卷第16期第24页,1976年4月。

②Thomas H.Pyle,《中国的管理改革》,《中国商业评论》,第8卷第8期第13页,1981年5/6月。

③Nicholas H.Ludlow、James Stepanek,《河北:一个省的分析》,《中国商业评论》,第7卷第5期第42页,1980年12月。

性质各不相同,然而邓小平指出,在这中间是地方而不是部“负主要责任”^①。

这种机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计划垂直系统形成的近似解能成功地转化成一系列完整的、统一的指令。计划组织的块块化明显地使不同块之间经济单位的协作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

“行政结构,无论它是以部门为基础还是以地区为基础组织的,不可避免地要同供应结构、产出结构、市场结构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相矛盾。用行政划分代替自然的经济划分不仅会中断原材料和产品的流动,导致过度的库存,有时还会切断合理的经济协作,人为地造成经济分割和封闭,妨碍商品流通和物资分配,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②

改革必须打破不同地区和部门间的强大壁垒,按照不同专业部门协作和生产的需要,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壁垒的影响无论在外国观察家还是在中国官员的报告中都是明显的。一个观察家声称:“(部与部之间的)暗斗和不合作不是例外而是常规。”^③ 国家物资局局长李开兴认为:“原先由某个部生产的产品经常只在那个省或通过该部的供应渠道分配。”^④

①邓小平:《关于尽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载《中共年报1977》,第IV—70页,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7,1975年9月草稿。双重领导在第二节讨论中作为方便水平联系的手段,它是以垂直系统为基础的计划组织之上的第二种关系网络。

②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V—38页,北京: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原文发表于1978年10月。

③Kenji Hattori:《中国煤炭合作》,《中国通讯》,第36期第15页,1982年2月。

④James Stepanek, Dori Jones:《同李开兴会谈,转变中的中国计划体制》,《中国商业评论》,第7卷第6期第17页,1980年12月。

“例如辽宁省是钢铁的主要生产基地，但位于该省的重要工厂是由冶金部控制的。结果它们的产品要调出省外；辽宁省别无选择只好另建小厂以满足本省发展所需的钢铁……”^①

在企业层次广泛注意到的各种慢性病，如“盲目性”、囤积投入品、生产无用产品、非法物物交换以及不必要的重复建厂，可以看作是计划精练化过程没有完成在分割的机构间沟通组织联系的证据。因此，中国的体制没有能在属于不同计划机关的机构间传递统一的、详细的指令。^②

中国计划体制中的省和部

第二节阐明指令性经济一般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子块，计划内经济子块本身又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单位，这些单位隶属于计划组织中的不同部分。实践中由于两个经济子块之间或在不同部分的单位之间协调活动困难，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联系类型形成限制。经济活动被分割开来，这种分割仅仅是为计划目的而作的一种人为划分。第三节证明中国经济为了计划目的进行了划分，并且存在着同这种划分相联系的协调问题。

在已经描绘出来的一般性轮廓里，联系的障碍简单地来源于等级系统中分割计划机关的组织距离。隶属于不同计划机关的经济单位特性和计划机关本身也与此有关，某些特性还会加强组织结构方面的障碍。

隶属于省计划者的经济单位，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

^①《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综合平衡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第18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当然，这在其他苏联式经济中也一样。下面一节将阐明为什么这一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

地区性的单位，它同精心建立的行政地区相吻合。然而隶属于部的机构集合并没有地区性特征。确实，省级计划机关本身只是省的一个机构，而不是整个国家政府的机构。换句话说，省的计划者只是该省的工作人员，省级计划是在省级领导、具体地说是在党的省委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的^①。省级计划者必须配合省里所考虑的目标，这些目标也许同中央的不一定一致。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计划外经济子块是沿着地区分界划分的。省里计划者监督着省内两个经济子块的分界，尤其是控制着从集体部分的索取（包括农业的大部分）。在省际交流中，计划外机构生产的产品主要由省级计划机关同委员会协商后安排，这样就产生了同计划内机构间相互联系相类似的协调问题。而且各省试图单独制订政策（解释中央精神）来管理计划外机构的活动。

从中央的观点看，省级当局事实上同部有相当大的不同。从计划等级系统的最高层看，各省负责着广大地区除中央企业以外的所有机构，换句话说，负责着几百万生产者和消费者，它们从事十分广泛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各部负责着少量的机构，它们分散在中国各地，从事的活动相对来说要狭一些。

由各级政府行使的所有权严重地阻碍了省与省之间、省与部之间的合作。一般而言，由省的计划者控制的企业属于省级政府，而由部控制的企业则属于中央政府。^②所有权通常转化成对产品

^①它们（省和市的计划机关）是独立的。直接领导它们的是省和市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生产合作总局局长张彦宁（《中国计划的实行》1979年第48页）。关于党的省委的重要性，见 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纽约，Praeger，第55—56页，256、309页，1967年。

^②所有国营企业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本文是根据白拓方的观点解释的。见白拓方：《论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模式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第39—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和利润的某种索取权,总是增强讨价还价的地位。省与省之间或省与部之间的计划流动包含着所有权的转移。因此从交易方的观点看,计划流动必须以对等的条件进行。但是由于行政管制着价格,计划流动经常使一个省(或中央)不合理地得益,而损害其他所有权的合法权益。当一个省出口相对于成品而言价格较低的原材料时,上述的问题就产生了。出口省情愿自己加工这些原材料以获取部分利润。更可能的是,现实的不平等会再度加剧传统的竞争。例如据报道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1962年阻止某些产品运往上海,他的立场是“浙江不是上海的殖民地”^①。这样的态度依然存在。

“(1976年以来)由于上海帮的倒台,上海人为他们的傲慢态度吃了一些苦,他们较高的生活水平是由‘四人帮’支持的。据报道至少有六个省的计划委员会拒绝在以后给上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主要是工业材料,但也包括食物)。”^②

从省计划者的观点出发,中央的部也是一个对手,部的计划可能会影响省的利益,特别是由部控制的中央企业在该省范围之内时更是这样。

中国经济划分的方法对出于计划目的而划分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换类型,产生了两个隐含的影响。第一,由各部控制的企业主要是由大规模的重点企业和其他生产急需产品的企业组成。在它们的单位间计划中,计划委员会首先安排各部的需要,并从其他部或省的企业调拨物资,试图保证中央企业的基本需要。这样表面看来不平衡是由于省的过错而不是中央的过错造成的。事实上这样的不平衡经常的、主要的是由于计划能力有限造成的。50年代末期由于统计制度瓦解,计划过程失去了同现实的所有联系。^③在

^①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中国学季刊》,第52期,第616—617页,1972年12月。

^②《中国贸易报告》,1977年6月,第7页。

^③Dwight H. Perkins,《工业计划和管理》,载Alexander Eckstein Walter Galenson, Ta-Chung Liu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趋势》,第627—628页,芝加哥, Aldine 1968年。

文化革命(1966—1969)中,中央计划组织本身也遭到破坏,例如那时国家统计局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只有14个工作人员。计划委员会本身也很少听到履行了什么职能。①1976年大多数中央机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和瘫痪状态”,“分裂成敌对的派别”。②第二,省计划内单位的区域特性隐含着省计划机关本身的地区分布性。另一方面,部的首脑机关都集中在北京。考虑到中国体制中疏通和讨价还价的重要性,邻近国家计划委员会,使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单位间的竞争中具有较大的优势。③再说,部长们是国务院的成员,处于保护该部利益的理想位置。

虽然两种主要的计划系统在组织结构方面是平等的,事实上却是相当不同的。正如上节阐明的,部之间的协调通常很难保证,省与省之间或省与部之间甚至比部与部之间计划和协调更难处理,也没有那么紧迫。之所以更难处理,是由于不同省份的非中央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者和不同(经常相反)的利益;由于地区性单位对外部供给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也由于省计划者从地理位置上说远离和外在于北京的中央计划者圈子。之所以没有那么紧迫,是由于从领导层的眼光看,中国大多数重要企业是由部控制的;由于各个省计划当局拥有较大范围的计划外机构,如果发生差错可

①Michel Oksenberg,《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81年夏季》,《中国学季刊》,第90期,第185页,1982年6月;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中国学季刊》,第52期第606页,1972年12月。

②Michel Oksenberg,《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81年夏季》,《中国学季刊》,第90期,第168页,1982年6月。

③关于这些机关间平时的联系,见Michel Oksenberg,《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81年夏季》,《中国学季刊》,第90期第181页,1982年6月。关于部间疏通,见Martin Weil,《建设项目下马》,《中国商业评论》,第8卷第1期第9—13页,1980年12月。

动员这些机构储备的资源；也由于一旦单位间计划和协调中断，每个省的计划和计划外机构合在一起可做到自给自足。

因此，各省时常忽略中央的协调努力，就毫不足奇了。邓小平指出：

“目前(指1975年)一些地区和单位忽略整体利益和中央的决定，任意制定政策，违反国家计划，随意改变非中央企业的生产计划，切断已经建立的协作关系，不能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定额，任意增加建设项目的数目和范围，非法占用原材料和资金。”^①

最近的外国报道注意到中央控制省级当局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归结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努力利用它们新取得的权力，进行自我发展”^②。在毛泽东时代由邓小平和其他人所作的权威论断表明，地方政府有时拥有较大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央决心计划和协调它们的新成果。

如果省向往独立和取得较大的计划自主权，那么就会在报道和省级行为分析中显而易见强有力地追求独立的省级平衡。最近的中国分析清楚地指出，各省追求独立的平衡，而且搞得相当成功。有位评论家批评普遍的而且是错误的关于地区平衡就意味着地区自给自足的观念。指出实际上地区计划平衡意味着该地区计划同地区间计划规定的进口—出口类型完全一致，因此地区平衡是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一个方面，而全国的平衡不是各个自给自足的地区独立平衡的简单加总。该评论者指出，事实上“每一个地区(即省)已经习惯了同其他经济部分联系，盲目地追求建立独

^①邓小平：《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载《中共年报1977》，第V—17页。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7；1975年9月草稿。这里指出的情况毫无疑问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末期更为严重。

^②Sueo Kojima，《中国坚韧的调整》，JETRO，《中国通讯》，第30期第8页，1981年2月。

立的体系”^①。

这里的解释可由有关一些省设立贸易障碍的报道加以佐证。

“最近几年,某些地方借口发展地方工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它们限制本省或该地区生产的原料出口,同先进企业争原料;它们限制企业活动,要求企业在本省范围内销售;阻止本省本地区从外地进口更便宜的产品;它们采取措施切断省际合作和商业联系。”^②

计划外机构因为行政管理的目的以地区划分,这样的贸易壁垒影响着计划外子块的活动类型。“各个部门有许多限制,不允许社队企业的产品出口到省外,不允许远距离购买和销售,这样就切断了互相有益的交换渠道。”^③对个体贸易也有类似的限制。

本节的评论虽然不是结论性的,却指出了中国计划体制内在的分散性倾向最突出的是环绕省界进行的。确实,证据表明,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回避省际间计划和协调中的问题,就允许或者有时干脆鼓励省级计划相当大的独立性,接受走向各省分散主义的既

①《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综合平衡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第178—18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论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模式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第43页,1981年。这种保护主义已经广泛盛行,以致于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见《国务院作出规定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封锁》,《人民日报》,1982年4月21日,第1—2版。关于以前的省际间贸易壁垒,见Audrey Donnithorne,《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中国学季刊》,第52期第609页,1972年12月;Christine P.W.Wong:《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村工业化:文化革命时代的教训》,载《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第一部分,第407—408页,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2年。

③《人民日报》1979年5月2日第4版。

成趋势。如果没有有力的中央控制，省级计划不会按照全国的意图制订，视野也不会比单个纯粹地方水平的计划机关更广。

计划组织和经济分割化

第四节指出中国的计划组织——部和省，虽然形式相同，其在计划过程中的职能却有很大的不同。计划委员会和部为中央企业制定和实行计划，这些企业的产出大约占中国国民产出的1/4。然而，省级计划由中央十分松散地组合在一起，以至于如果把非中央的机构考虑进去，人们怀疑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全国性计划。在缺乏其他协调手段(如市场)的情况下，独立的省级计划意味着各省能自我发展、自给自足，形成进口替代，抑制跨省际的联系。由于中国大部分经济活动是由非中央机构进行的，因此计划体制这一缺陷如果较严重的话，必然影响到总的活动类型。

在中央控制较少的那些活动领域里，分割化的问题突出。^①首先，正如在第一节中指出的，拉迪最近关于农业产出和贸易类型的研究揭示了在粮食和其他产品方面走向各省自给自足的趋势。以往的粮食出口者现在似乎转向种植当地消费的其他作物。1957至1979年间，国内粮食在省际间的流动下降。^②大部分农业是在计

^①正如第一节指出的“经济分割化”的特征改变了地区间商品活动的类型，意味着在省级或地方层次上走向更大的自给自足的趋势。关于进一步的评论，见 Thomas P. Lyons: 《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和发展，1957—1979》，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第9—23页，1983年。

^②莱昂斯关于粮食问题有关证据的解释是不准确的。见 Thomas P. Lyons: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分割化假设的检验》，《比较经济学杂志》，第9卷第2期第142页，1985年6月。事实上在该文中讨论的运输数据隐含的增长率高于粮食从剩余省份调往缺粮省份实际的增长率，这是由于运输量包括铁道和粮食从其他运输工具运至铁道的运输量，而且也由于运输量包含着省内的运输在内，在省内的运输要比省际间粮食流转增长得更快。

划之外的。“农业的问题留给省以下的地方当局。”^①其次，中国和西方观察家报道各种工业消费品，如香烟和“日常用品”的地方自给自足或者地区间只有少量的流动。^②再其次在“第二轻工业”部门中，非中央企业生产的产品占这类产品的大多数（上文第三节）。最后，机械制造部门的某些产品，尤其是机床方面，省级的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③在机床方面，非中央企业和非中央计划者生产和安排了总产品的相当部分（上文第三节）。当然，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或在同一部门内的不同机构间，经济分割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某些轻工业部门，正常的发展途径也许是生产能力和产出进一步在各地区分散，其产品主要是当地使用。但在农业方面，各省气候和土壤类型差别很大，如果强调分割化，必然造成成本很大的扭曲。

为计划目的所作的划分，也影响着中央控制的那部分经济机构间联系的类型。这些机构并不是以地区划分的，而是出于计划目的以部门分类的。因此省的边界同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大关系。

从总体资料来看，在中央控制较紧的工业部门中，分割化的现象并不突出。运输数据表明部门间对内贸易量的增长率和中央分配的产品份额间有正相关关系。^④特别是木材工业，也许还有钢铁

①Audrey Donnithorne, 《中国的粮食：产出、征购、转移和贸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第19页，1970年。

②Howell Jackson, 《中国的香烟价格》，《中国商业评论》，第6卷第3期第25—29页，1979年6月；Audrey Donnithorne,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中国学季刊》，第52期第609页，1972年12月。

③Dwight H. Perkins,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村小工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285页，1977年。

④Thomas P. Lyons, 《中国的蜂窝状经济：分割化假设的检验》，《比较经济学杂志》，第9卷第2期第141—142页，1985年6月。

工业是那些受分割化影响最少的领域。在这两个工业中,1978年由中央分配的占总产出的4/5,成品钢的绝大多数是由中央企业生产的(上文第三节)。

关于钢铁行业的例子是十分有趣的。辽宁和其他省的报告揭示了中央大型企业同非中央经济的隔绝现象,甚至同企业所在省的经济也是这样。^①这种隔绝导致各省自建了一批相当分散、规模极小的企业,为本省提供钢铁。结果出现了双重结构:到70年代末,钢铁工业包括大规模的中央企业部分,它们同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一体,还有外围的省内小型企业部分,为当地市场服务。即使这些十分小的企业个数已达几百个,由于中央企业继续占产出的绝大份额,集中率和运输量数据仍没有显示明显的分割化类型。尽管如此,钢铁工业较大的规模经济特性,隐含着存在大批小企业必然有着很大的成本。钢铁工业的发展类型和导致的成本,也许可以代表重工业中那些中央企业生产较大部分比重或大部分产品由中央安排的那些工业部门。机动车工业提供了第二个例证。^②

本节所举的关于主要环绕省界的分割化例证,支持了分割化大部分应归之于中国计划体制结构的假设。本文第三节的讨论认为,这种假设也能扩展到省内单位。每一个省级计划组织部门划

^①关于钢铁行业,见在上文第三节引用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综合平衡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第18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丁华:《投资效果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研究》,第3期第25—26页,1981年;新华社国内消息(1980年7月12日):“小钢铁厂”,载美国国外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每日报道,1980年7月18日,第L15页。关于省级产出资料,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香港:经济信息和机构,第241页,1982年。

^②Thomas P. Lyons:《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和发展,1957—1979》,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第75—88页,1983年。

分成省的各个局(局制定和实行以行业划分的机构的计划)和地方计划办公室(该办公室制订和实行以区域划分的机构的计划)。中央部和省计划机关的区别,现在又重现在省局和地方计划机关之间,相似的分割倾向也在省内存在着。每个省计划当局类似于中央的计划委员会,只对由它控制的下属单位实行统一的计划。由于存在着29个不同的省计划当局,毫无疑问,这些当局在各省实行的控制是大不相同的。在某些省,可能是独立的地方计划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省,可能是省内统一的计划占主导地位。如果有可能考察县级资料,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至少在某些省份,地方发展类型呈现着扭曲现象。这种现象类似于我们已经在省级研究中所发现的倾向。

总结性评论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不管是故意地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权力已大大下放,但并不伴随合适的激励机制和信息结构,不同计划机关采取的决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在一个市场作用有限的体制中,上级计划者应该代替“看不见的手”,制约下级集中于较狭的目标,有限的信息使活动类型较为宽泛。在中国下级计划者可以容许在较大范围内活动,缺乏足够的控制。中国计划没有有效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付分块带来的分散化趋势,或者说没有指导这种由错误的分块带来的趋势转向破坏性最小的方向。特别是许多主要计划部门与确立已久的地区交叉重合的方面,同现存的分割化类型密切相关。权力集中于各省首府,削弱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这一过程因为中央经常出现混乱以及周期性有意的分散化产生的棘轮效应而大大加速。

在计划经济国家中,中国的独特之处不是在于以地区界限来划分计划体制,而是在于这样的体制保持得太长以致于从根本上

改变了发展的类型。苏联在1957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改革时期，尝试过高度地区化的计划组织。有趣的是，赫鲁晓夫预见到同这一体制相关联的问题。

“在一个省或共和国内建立一个封闭经济的愿望，也许会导致绝对分权的趋势……地方主义倾向表现在尽管开发本地储藏不如其他地方有利，却要努力发展当地的原材料基地，还表现在其他地区专业工厂生产的设备和配件更有优势时，本地还要自己生产这种东西……某些地区的工人试图在国家分配的资源以外更多地把资源用于满足当地需要，这样必然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①

事实上苏联很快放弃了改革。它的失败“归之于苏联国民经济中不断高涨的地方主义，把地区需要凌驾于国民经济之上，也归之于协调地区计划机关所遇到的困难”^②。

^①Harry Schwartz:《斯大林以来的苏联经济》，纽约：李普因库特，第92页，1965年。

^②Paul R. Gregory、Robert C. Stuart:《苏联经济结构和状况》，第二版，第120页，纽约：哈珀和罗，1961年。

短缺经济学和中国工业改革中的问题

美国 克里斯廷·P·W·黄

译者按：本文运用科尔纳短缺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毛泽东以后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中的问题。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国营工业企业改革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营企业的经济行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依然存在，这样“数量”动机和“扩张”动机也就继续起着作用。

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尽管经济改革前后实行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经济依然有着基本的连续性：短缺和预算约束软化，当然程度有所不同。中国企业改革遇到的问题说明，短缺是中国能否成功地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所在。从短期看，短缺的程度决定了价格改革能推进得多快，以及缩小行政控制经济步伐的快慢；从长期看，这决定了政府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的发展模式，使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由于短缺决定了预算约束的性质，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对成本压力的反应，也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进一步的改革是企业的预算约束必须硬化。仅仅对经济主体发出正确的信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使这些经济主体对这些信号作

出反应和调整。

本文译自《比较经济学杂志》，1986年第10卷第4期。^①作者克里斯廷·P·W·黄(Christine P·W·Wong)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引 言

1978年12月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当时的“调整 and 改革”方案试图纠正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提高经济效率。到1985年，逐渐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包括农业方面的非集体化。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中央计划和实物分配的范围和程度，企业和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决策权，经济机构在更强的激励机制下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超过了以往改革中国经济的努力。如果1984年10月宣布的改革措施真正得到全部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管理的分散化甚至超过匈牙利改革所达到的程度。

改革时期获得了许多成功，最显著的是在乡村方面。除了非集体化以外，乡村改革还采取了提高价格、调整征购定额、对贸易和其他非农活动放松限制等一系列政策，1979—1983年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以7.9%的速度增长。粮食和关键性经济作物生产的全面增长，大大促进了轻工业，改善了经济结构。农业和轻工业在总物质产出中的份额在1978年分别占27.8%和31.1%，在1983年分别提高到33.9%和32.1%。^②棉花产量增加使政府在1984

^①Christine P·W·Wong,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nd Problems of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10, PP. 363—387, 1986.

^②《统计年鉴1984》，第27页。

年结束了棉产品配给制度。生活标准不断提高，乡村和城市地区的收入增长较快，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供应也有大幅度改善。^①

在城市方面，在自由化政策下集体企业的经营有了改善，但国营工业进展不大。根据国家计委主任吕东的文章，1985年初期对5800家骨干企业调查后发现，经过6年改革，只有15%的企业“开始利用它们新取得的权利改善生产和管理……65%的骨干企业仍在实行改革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其余20%的企业存在经济困难”^②。尽管普遍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消除企业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仍然是城市改革的中心任务。^③

本文讨论中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问题。中国的国营工业拥有87000多家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3/4。首先要讨论的是到1985年为止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机构的行为。这是由于改革时期仍然对企业抱“仁爱”态度，这样旨在迫使企业随竞争压力而调整的手段大部分失败。本文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改革远远没有达到“打破企业吃大锅饭”这个既定目标。运用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缺乏金融纪律或者说预算约束的软化，是目前企业进步缓慢、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根源。^④最后，毛泽东时代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管理活动的传统也是消除国营企业“父爱主义”的重要障碍。以1983—1984年推出一系列新政策为界，改革时期可以粗略分为

①关于到1984年为止经济实绩方面的简单回顾，见Christine P. W. Wong:《经济实绩》，载S. Goldstein编《中国简况1984》，第109—119页，克罗拉多州博尔德：西部观点出版社，1985年。

②《北京周报》，1985，9：10。

③《人民日报》，1984年6月2日。

④这个分析框架是由科尔奈建立的。见Janos Kornai:《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体制》，《计量经济学》47卷，第4期，第801—819页，1979年7月；《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80年。

两个阶段。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简要讨论可为研究改革提供背景材料。

在文化革命时期（1966—1976）毛派轻视金融制约和极端倾向增长的政策大大加强了“数量”动机和“扩张”冲动。解散计划机构、批判“官僚”和“经济主义”也削弱了集中计划，因此，也不存在对过量需求的行政控制。^①而且，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使许多资源转移到了地方政府手中，这样实施中央控制愈加困难。^②在文化革命结束时，中国暴露出了典型的短缺经济的所有症状：投资率超过了国民收入的30%；^③持续不断的生产资料、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短缺，产品质量下降；低效率；尽管反复宣传“把农业放在首位”，但由重工业主导的发展类型，很少有资源投入农业等等。^④

除了众所周知的配置和生产的低效率以外，文化革命时期普

^①文化革命时期计划工作极其混乱。由于政治斗争，国家计委并没有制定1967、1968年的年度计划。1970年6月，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局、工业运输办公室、劳动局、物资分配局、地质局和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内的控制机构合并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610名工作人员，只有合并前原有机构人员的11.6%（见邓力群，《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Naughton和Wong都讨论过这个观点。见Barry Naughton，《不合适的开端和第二次风潮：中国工业体系的金融改革》，载E·J·Perry、C·Wong编《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第223—252页，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Christine P·W·Wong，《物资分配和非集中性：地方对工业改革的影响》，载E·J·Perry、C·Wong编《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第253—278页。

^③世界银行估计按中国定义计算占国民收入34.6%的积累率，换算成通常的占总物质产出的投资率为31%。见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78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3。

^④关于文化革命结束时面临的经济问题，详见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遍的短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还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改革时期，许多证据表明在工厂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中广泛存在着短缺的预期心理，这种关于短缺的预期在项目估价中超过了对价格、成本等因素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决策。由于事先预防的行为约束，这种关于短缺的预期造成了市场信号调节失灵和进一步的短缺，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大大增加了改变这种行为模式的困难。

调整和改革：第一阶段（1979—1983）

文化革命时期长期的经济恶化，使人们普遍不满意于经济管理体系，由此导致了改革。人们普遍把过去的低效率、生产不能适应需求和严重的基础设施瓶颈等问题归之于僵死的、无效率的命令经济。人们也指责过高的增长率和投资率、过分地重视重工业和对生产者缺乏刺激。针对这些批评，改革第一阶段采取的措施包含有两个相关的内容。首先采取调整措施，降低增长率，纠正严重的部门比例失调。同时，通过减少行政控制的范围、决策权力下放、改善刺激等改革措施，逐步解决僵硬的体制问题。

对国营企业改善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利润留用制度，包括根据企业利润决定奖金和职工的福利支出等内容。自从1978—1979年实行以后，利润留用制度经历了多种形式以适应情况的变化。1978年10月在四川6个企业中开始谨慎地试行利润留成办法。在四川的试点中，企业在全面完成规定的年度8项经济和技术计划指标（如实物产出、产出品种、质量、投入消耗、劳动生产率、生产成本、利润和流动资金）以及完成对其他企业的供货合同的条件下，企业可将计划利润以上的部分留用15—25%，用于工人的奖金、集体福利和企业发展基金。企业用自有资金建成的小投资项目，头两年所得的利润100%由企业留用。1979年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这些试点企业所得的总利润92%上交国家，6.5%作为企业发

展基金,1.5%作为职工奖金。新增利润中企业留用28%,7%作为工人奖金。^①

在四川试点的基础上,1979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利润留成制。到1980年6月,6600家盈利状况好的大企业实行了这个制度。在初始阶段,允许企业留用固定比例的利润作为职工福利、奖金以及生产发展基金。利润留成比例以企业1978年留用的总基金作为基础,一定三年不变,只在外部情况变动时作些调整。1980年1月修改了留用比例,实行了新方案。新方案包括两个比例,一个比例适用于利润达到上年水平,另一比例适用于新增利润,新增利润留成比例更高。新增利润的留用比例根据企业盈利状况分成三种,盈利率最高的留成比例为10%,盈利率较低的为20%,大多数企业是盈利水平中等的,为20%。对1979年的亏损企业实行了另一种方案,不论企业以后亏损额多少,国家的亏损补贴始终不变。

1981年4月随着推行“经济责任制”,大大加快了实行利润留成的步伐,新的利润承包形式很快代替了以前各种形式的留成制度。在利润承包制中,企业和上级主管部门商定每年需上交的利润定额,定额以上的部分企业留用40—100%不等。到1981年年底80%的国营企业都实行了利润承包。到了这一阶段,利润留成制不断演变,其特征是进一步简化了考核企业实绩的指标,如从在四川试点要求企业全面完成计划指标到唯一地考核利润指标。朝着迅速提高企业留成比例趋势发展,1978年为21亿元,1982年提高到170亿元,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工业产出增长率或利润总额增长率。^②

^①这些估算数是由Byrd作出的(未发表)。

^②这些估计见Barry Naughton,《不合适的开端和第二次风潮:中国工业体系的金融改革》,载E·J·Perry、C·Wong编,《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第223—252页,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尽管上述的激励机制，很少有证据显示国营工业效率提高。除上面提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外，总量资本效率指数也显示改善不甚明显甚至根本没有改善。1978—1982年期间，虽然百元流动资产的工业产值上升38%，但是百元固定资产的工业总产值则下降了8%。^①然而，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相比资本密集度低、生产周期也短，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事实上能改善这两者的指标。确实，考虑到轻工业产品的增长，罗伯特·密契尔·菲尔德估计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工业产值从1978年到1982年的5年间一共下降了14.5%。^②

产生这些老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一些企业经理认为短缺仍然干扰着生产。北京机械公司经理指出，在1984年供应的原材料、燃料和其他投入品只能满足公司所属11家企业生产所需的60—70%。在文化革命时期，有所谓“三八式”的说法。^③一些企业的状况仍然是这样，“分配少于必需的，订购少于分配的，发货少于订购的。”^④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在分析改革时期的短缺现象时认为，问题在于难于压缩投资。在1979年政府不能减少预算内的投资支出，是由于许多项目已经在建。1980年企业留利基金和地方财政收入所上的投资项目大增长，足以抵消计划内投资的下降。1981年对投资更严厉的控制措施和大砍预算内投资终于使总投资

①见《统计年鉴1984》，第263页。为防止误解，应该注意到按照中国的习惯，固定资产是以原值计算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实际效率的改善。但同时这也可以被重置成本提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抵消。

②Robert Michael Field: 《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的变动》，《中国学季刊》，第100期，第742—761页，1984年12月。

③据报道，所谓“三八式”是指分配的原材料只有所需数量的8/10；能订购到的只有分配额的8/10；能落实发货的只有订购额的8/10。

④《经济管理》，1984，12：6。

表1: 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单位: 10亿元)

	总额 ^a	预算内 ^b	预算外 ^c
1978	66.87	48.35 (72.3)	18.52 (27.7)
1979	69.94	55.07 (78.7)	14.87 (21.3)
1980	74.59	45.97 (61.6)	28.62 (38.4)
1981	66.75	36.33 (54.4)	30.42 (45.6)
1982	84.53	34.37 (40.7)	50.16 (59.3)
1983	95.20	42.22 (44.3)	52.98 (55.7)
1984	118.52		

a: 《统计年鉴》, 1984, 第301页; 《统计摘要》, 1985, 第4页。

b: 这列数据是由预算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技术更新和新产品开发”基金的一半计算出来的(《统计年鉴》1984, 第420页)。

c: 企业留用基金、地方政府收入和银行贷款总和, 用差额法计算。

注释: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占总投资的百分数。

表2: 以现价计算的工业增长率 (%)

	全部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1953-1979平均	11.1	13.4	9.1
1979	8.8	7.7	9.6
1980	8.7	1.4	18.4
1981	4.1	-4.7	14.1
1982	7.7	9.8	5.7
(计划)	(4.0)	(5.7)	(7.0)
1983	10.6	14.4	6.8
(计划)	(4.0)	(3.9)	(4.1)
1984	14.0	14.2	13.9
(计划)	(5.0)		

来源: 《统计年鉴》1981, 第VI-4页; 1983, 第215、217页; 《统计摘要》, 1984, 第5页; 1985, 第5页; 计划增长率: 《人民日报》, 1984年6月3日第2版。

下降(见表1),这样才缓解了短缺现象。1982年由于政府又放松了投资控制,下半年又出现了某些生产资料的短缺。“而且,由于重工业增长再一次大大超过了轻工业增长,消费品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在1983年我们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压缩计划外投资以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继续让轻工业优先发展。当前这些问题还不能说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①表2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率表明,由过高的投资水平引起的“吸力”效应使重工业又取得了增长势头。明显地调整政策只有短期效应。经过1979和1980年短暂的扩张后,轻工业增长开始下降。只有在1983年中期行政的再一次干预,支持轻工业,才扭回了这个趋势。^②同时投资需求刺激了重工业增长,1982年以后都超过了计划水平。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阐明这些问题都是扩张动机和数量动机的病症,根源在于持续的预算软约束。尽管“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是改革的目标,然而利润留成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行为。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利润上交指标甚至税收额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以致于企业无须经受竞争的压力。

打不破的“大锅饭”：持续的预算软约束

改革后中国企业的预算约束依然软化,体现在许多方面。第

^①薛暮桥,《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经济管理》,第1期,第11页,1984。

^②1983年第一季度轻工业增长缓慢,与去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2.5%。这给国务院敲了警钟,重申对轻工业的“六优先”原则,直接支持轻工业发展(《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2页)。在解释轻、重工业比较增长趋势时必须牢记下面一点,中国的统计方法把由重工业企业生产的消费品计入重工业产出。例如,许多机械企业生产的冰箱、洗衣机包括在重工业产出之中,这就使重工业增长率偏高了。

一个方面即最重要的方面是尽管政府多次声明要关闭那些低效率的企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效率更高的企业,然而很少有企业因为经济原因而关闭,例外的是1978—1979年广泛宣传的关闭了几百家浪费极大的“五小工业”企业,这些县级或县级以上的“五小工业”企业总共有1万多家。^①在集体所有制方面,关闭或合并了一些亏损企业,但这些仍然是小企业,而且乡村集体企业是在预算约束较硬的情况下经营的。^②80年代流行着这样的观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总不会让国营大企业破产。”^③

对资金状况不好的企业的宽容,并不仅仅表现在让这些企业生存下去。在整个利润留成制度中,上交利润始终是富有弹性的。这在利润承包制中达到顶点,所谓的“承包合同”是同企业每年逐一协商的。由于留用利润额急剧上升,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也在软化。如四川试点企业的留利水平一开始还比较合适,但到1983年实行利润承包制时,留利水平则上升到新增利润的85%。^④在对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企业实行优厚奖励的同时,却很少对未完成利润任务的企业进行惩罚。例如在山东烟台地区,1981年有46家盈利企业没有完成利润指标,还有一些亏损企业大大超过了承包合同规定的亏损额,但只对其中的两个企业进行惩罚,减少了它们的

^①详细情况请参阅 Christine P. W. Wong,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村工业化: 文革时代的教训》, 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394—418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政府出版署, 1982。

^②1979—1982年4年期间, 40万家企业中只有20万家企业倒闭, 同时新增的6万家企业中多数是集体所有制。见《中国工业部门结构》, 第259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③见 William Byrd, Gene Tidrick, 《重庆钟表公司的调整和改革》,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 第652期, 第62页, 1984。

^④见《财政》, 1984, 7: 4, 8: 2—6。

企业基金。^① 对这类企业的仁慈宽容，使人们抱怨利润承包制“只负盈不负亏”，大大削弱了企业改革中“胡萝卜加大棒”的刺激效应。

预算约束软化还表现在价格和税收上的讨价还价。价格和税收是决定企业利润率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国营渠道以外的局部市场改革，形成了改革时期的多重价格结构。在这种价格结构中，不同层次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② 企业有多少产品按何种价格水平的销售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讨价还价、有弹性的。对地方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如地方官员可以通过操纵价格结构暗中补贴给亏损企业。例如，有个县的政府官员为了改善当地化肥厂的资金状况，允许该厂绕过其他机构直接把产品销售给用户，取得20—30%的批零差价。在水泥行业，如果允许企业以市场价格销售，就意味着企业可得到比国家计划价格高2倍多的收入。山西省的一位作者在文中抱怨地方政府拥有任意决定企业以何种价格水平销售产品的权力，如地方官员歧视社队煤矿，就要它们以每吨7—8元的低价销售给当地用户，却容许国营煤矿以每吨高达27元的价格销往外省。^③

税收制度也是相应软化的。官员们经常用减税、免税手段来帮助那些财务上有困难的企业。一项研究报告认为，甚至对那些赢利高的大企业也给予各种免税照顾。^④ 当价格和税收两方面照

^①见《财政》，8：26—27，1982。

^②关于国家和地方价格、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详细的讨论请参阅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80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③见《从社队煤矿生产成本的变动看调整价格和税收的必要性》，《经济问题》5：42，1982。

^④见William Byrd Gene Tidrick，《重庆钟表公司的调整 and 改革》，《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第652期，第61页，1984。

愿仍嫌不够时,还可求助于最后一手,即用国家贷款支持那些资金特别困难的企业。^①

改革措施为什么仍然没有达到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原定目标呢?我们可以讨论三个相关的因素:(1)改革方案设计得较差;(2)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不同的大企业和行业的表现;(3)由短缺预期和官僚不愿放弃控制引起的“行为迟钝”。这些因素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经过下述的讨论,我们将会理解这些因素具有相互强化的性质。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改革方案设计中的问题最严重的是资金过度分散,这就大大加强了扩张动机。1979年以来,利润留成制度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灶吃饭的财政改革,使企业、地方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手中积累了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金(见表3),这些资金到1984年已达1000多亿元。国家预算外存在如此巨额的资金,十分明显给政府压缩投资带来极大的困难。在投资者的风险可由预算软约束消除的情况下,压缩投资就难上加难。

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同样重要的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规定。这些资金的使用办法通常导致持续的“扩张”动机。首先,初期的改革措施为了控制奖金增长,规定企业留用利润中30—40%用于扩大再生产,30%用于集体福利(大部分用于建造职工住房或其他集体设施,增加了对建筑材料方面的需求)。企业留用资金的边际投资率按规定高达0.6—0.7,而国家预算内收入的平均投资率只有0.3—0.4。^②同时规定,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所得的头两年利润100%的留给企业支配,也有相当大的量进入投资。利润

^①当重庆钟表公司面临市场困难时,给该企业的85万元贷款就成了不必偿还的财政资助。

^②这个数据是用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企业革新”和“新产品开发”基金加总同预算内总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出来的(见《统计年鉴》,1983,第449页)。

表 3: 预算外资金(10亿元)

	(1) 国家预算内 收入 ^a	(2) 预算外 资金 ^b	(3) (2) + (1) (%)
1978	112.1	36.1	32.2
1979	110.3	39.0	35.4
1980	108.5	45.0	41.5
1981	109.0	51.0 ^c	46.8
1982	112.4	86.6	77.0
1983	124.9	89.3	71.5
1984	146.5	100.4 ^d	68.3+

a, 《统计年鉴》, 1984, 第417页; 《统计摘要》, 1985, 第4页。

b, 从《统计年鉴》, 1984, 第IV—43页; 1983, 第III—90页推算。

c, 北京采访, 1982年8月。

d, 《财贸经济》, 1985, 第3期, 第1页。

用于再投资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边际投资率。

第二, 各级政府根据所有制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收入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 使地方政府竭力利用取得的资金进行投资, 以扩大它们的收入基础。在改革第一阶段的整个时期, 不断商定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 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也在某种程度上是软化的。^① 再加上持续不断的财政赤字, 迫使国家起用新的手段得到收入, 如连续对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 1983年对预算外资金征收交通能源基金。^② 这些措施显然强化了地方的扩张动机; 由于未使用的资金

①在1980年确定了财政收入分成比例, 1982年又有了变动。

②1983年对预算外资金新的税收达102.6亿元(《统计年鉴1984》, 第IV—43页); 每年发行的国库券为40亿元。另外向地方政府借债, 1981年达74亿元(采访, 1982年8月)。

可由国家以各种名目征用,地方资金的边际成本就接近于零。

第三,银行贷款的约束软化,使通过贷款提高企业使用成本、减少投资需求的目标落空。至少到1984年为止,规定企业首先用贷款项目所得的赢利归还贷款,即贷款项目新增利润的税前提还贷。如果这还不够归还全部贷款,那么可用下列几项:(1)贷款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额;(2)项目所生产的产品税收(“工商税”);(3)企业其他产品的流转税。^①由于利润和折旧额部分要归国家所有,因此用这些项目归还贷款,实际上是把部分负担转到国家财政身上。而且,还款期限规定在3年以内,期限较短,即使是盈利率极高的项目,也很难在此期限内用新增利润和折旧额全部还清贷款,因此实际上大部分要用税收归还,企业的实际负担很小。

可从两个方面解释改革方案质量较差。一是改革者缺乏经验;二是很难控制改革过程。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可以清楚地阐明从利润留成到利润承包的演化过程。开始时财政部考虑到财政收入的稳定,限制实行利润分成试点的企业数,以及试图把留成率压在较低水平上。但一旦开始改革,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这一试点就取得了某种势头。在1981年中央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试图控制留成比例,最后因极度紧缩而宣告失败。预算内投资减少,导致企业生产计划急剧下降。^②同时物资分配分散化,使许多产品价格浮动,使许多企业突然赢利或亏损。面对如此不稳定的环境,只好放弃以上年利润为基数的改革方案,而代之以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实行更有弹性的政策。由于激励机制依各个企业情况而定,这就扩大了讨价还价的范围。因此利润承

^①关于归还贷款项目,详情请见William Byrd、Gene Tidrick,《重庆钟表公司的调整和改革》,《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第652期,1984。

^②如以第一机械工业部为例,生产计划只有生产能力的1/4。

包方案从根本上偏离了“打破企业吃大锅饭”这个目标。

同改革方案设计较差和改革者没有能力控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导致预算约束软化的第二方面的因素是:难于对所有国营企业用统一的衡量标准,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情况相差很大。(1)由于毛泽东技术二元主义的战略(所谓的“两条腿”走路)在许多工业部门企业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技术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水泥、化肥、纸张、钢铁、制糖工业,企业应用资本密集度各不相同、投入品质量不一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结果其生产成本差别之大竟达2—3倍。^①(2)毛泽东的工业生产分散化政策导致60年代、70年代对内地省份的大量投资。由于缺乏经验或基础设施不足等多种原因,内地工厂的生产落后于沿海地区工厂的生产,因此现在在生产率和成本方面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距。^②(3)同样是毛泽东时期发展政策的结果,国营企业分成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和地方企业在生产上虽然有很大重合的部分,但中央计划对它们的处理是不同的。中央企业拥有以计划价格取得投入品的特权,而地方企业所需投入的相当部分要以市场价格购买。^③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同一生产线的企业成本差别很大,需要区别对待。为了适应这些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必须要由国家基层机关确定企业上缴利

^①参阅 Christine P.W.Wong,《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乡村工业化:文化革命时代的教训》,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第394—418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2。

^②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新疆、宁夏、西藏、青海这8个内地省份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40%。青海每百元固定资产所得到的税、利只有全国平均的1/6。《经济研究》,1984年第10期,第70页。

^③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细请见 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80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润的指标，通常需要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由于基层行政官员缺乏经验，在利润谈判中企业会占很大优势，这也导致了企业留利水平过高和过分仁慈地对待企业。

在改革时期造成预算软约束的第三个和最重要的因素可以称之为决策者的“行为迟钝”。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已经熟悉了文化革命时期的短缺和卖方市场，一般不可能预期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他们的预期十分简单，认为增加的所有产品都能以现价销售。^①当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面对市场信号时，他们当即的反应是不考虑竞争效应和价格变动，迅速上马一批以往是短缺和赢利高的投资项目。

重庆钟表公司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实例。改革之初，该公司面临的是一个过度需求和赢利率很高的环境，因此扩大自主权后他们首先的反应就是迅速提高产量，很少注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开发新产品。1980—1982年，该公司为扩大生产，投资总额达3850万元，这个投资额是以前8年投资总额的2倍还多。重庆钟表公司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投资决策，是因为过分乐观地看待长期市场需求行情，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同行业其他生产厂家，特别是上海、天津那些更大、更有声誉的厂家的竞争。1981年钟市场已呈饱和状态，1982年开始重庆钟表公司销售手表也面临愈来愈激烈的竞争。结果，在1980、1981两年钟的生产增长79%，手表增长了60%，但在1982年钟的生产下降了55%，手表生产也只增长了10%。^②出于同样的原因，1981—1982年在纺织、卷烟、酿酒和电扇、缝纫机、自行车这类耐用消费品行业也都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度的问题。

^①例如，广东农村一个县正在筹建一个纤维厂，其设计能力为本省现有生产能力的1/4左右。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本省其他的几个县也进行类似的投资，那么市场情况将会如何。

^②见William Byrd、Gene Tidrick，《重庆钟表公司的调整和改革》，《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第652期，第42页，1984。

我们不必把这些乐观的投资决策全部归之于缺乏经验，或者归之于由僵死的、不合理的价格导致的高利润吸引了进入、限制了需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这种决策下放的非对称性。地方官员一方面竭力投资于获利高的产业，以扩大他们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又不愿关闭那些不能赢利的企业。也许最极端的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化肥厂的例子。该化肥厂因为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因此作为惩罚，国家就不分配所需的煤炭。为使企业继续经营，县经委补贴该厂从市场渠道购买煤炭。到1982年，煤炭的市场价格提高到计划价格的两倍，该县每年的煤炭补贴就超过100万元，再加上弥补该厂的日常经营开支。当问到为什么要继续经营这些明显亏损的企业时，该县官员回答这是保证供应农业生产所需化肥的唯一办法。^①

之所以不“惩罚”这些企业，还在于有些因素并不是地方官员所能控制的。在另一个县，官员们继续把资金投向一个长期不盈利的水泥厂，帮助该厂扩大生产和提高等级。而在该县煤矿附近正在新建一个更大、更有效率的水泥厂。官员们说现存的那个水泥厂主要的是厂址问题，远离原材料产地，又没有便宜的运输方式，必须支付高昂的运输费用。虽然通过技术革新也不可能达到盈亏点，官员们还是认为该厂经理和职工们十分努力地提高效率，因此应该予以支持。再说县里也迫切需要水泥。

显然，持续的短缺和短缺预期削弱了改革时期的成本意识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当然，也有对市场导致不稳定的忧虑、官员不肯放权而产生的阻力、企业间收入“公平”再分配的强烈愿望等等因素。所有这一切都阻碍着使企业更负责任的努力，这样，企业面临

^①当然也许由于使用化肥而新增的农业产出足以抵销化肥生产的高成本，因而对该县有利。但这里的决策过程显然没有包括这方面的计算。

的环境仍然没有竞争压力。^①前面讨论的有关改革方案设计中的问题，部分的是由于试图保持控制和力图公平地对待企业。这种父爱主义的态度在地方一级更为普遍，因为政府官员通常和企业有密切的人事联系。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行为迟钝”的问题。

总之，改革时期启动短缺机制的首要力量是无力控制的扩张动机，而扩张动机又可以追溯到预算约束软化。在改革过程中，短缺预期有自我实现的特征。这样就延缓了市场调整的过程，持续的数量和扩张动机又反过来产生了短缺。短缺使管理企业更为困难，又加强了官员不愿惩罚企业的倾向。因此，虽有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仍然陷入短缺的恶性循环；只要存在短缺，就不可能实行金融纪律；只要企业经营缺乏硬的预算约束，自主权机制就会使经济走向短缺和瓶颈。

第二阶段：1984——

中国开始5年的国营工业改革可以说是失败的：资源转移到了基层单位手中，但没有相应增加它们的责任，结果放松了国家控制，资源使用也没有大的改善。1983—1984年间，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纠正以前出现的问题。第一步是重新筹集以前分散的资金，压缩预算外投资。1983年1月1日起对预算外资金征税10%，到年中税率提高到15%。又对计划外建设项目新开征了税收，以及采取更严厉的行政措施限制预算外投资。所有这些措施减少了30%的分散资金，使国家增加预算分配，发展

^①这些特点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中是共同的。例如参阅 Janos Kornai, 《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80；Laura Jyson,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流动性危机：银行破产的抉择》，《苏联研究》，29：2，1977年4月。

能源、交通部门。^①

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实行“利改税”，这是利润留成制度的最后形式。根据“利改税”方案，所有国营大中型企业都要逐渐从上缴利润制度改为缴纳税收，企业也有更大的自主权处理剩余收入。这一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分两步实行，第一步利改税从1983年7月开始，第二步利改税计划从1985年1月1日起开始。第一步利改税基本上没有改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财政关系，大中型企业除了要缴纳55%的利润所得税以外，还要根据合同上缴利润，这样企业税后利润仍然保持在1982年时的水平。

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国家和企业的财政关系进一步发生了变动。它提前到1984年10月开始，那时大力宣传要进一步开展城市改革。第二步改革包括“价格结构的逐步合理化”。第二步改革完成后，上缴利润将被一系列的税收完全代替。这些税收将消除影响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使企业的收益仅仅取决于它们的经营。除对利润征收所得税外，对占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还要付费。目前的工商流转税将分成四个部分：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这样就可消除不同产品赢利水平的差别。对矿业和采掘业企业，将用资源税消除租金差别。最后把上述税种无法包括的、而又不应得的利润用调节税来解决。有趣的是，虽然利改税方案是在县级试点中产生的，它的最后实施却把大多数县级企业排除在外。^② 方案还宣布对于固定资产在150万元以下、年利润20万元以下的小型国营企业将承包或出租给集体或个人，期限3年以上，承包者的责任是要支付利润所得税和资产费用。^③ 这个方案涉及

^①关于第二阶段财政方面的改革，详见 Barry Naughton, 《工业的财政和计划改革》，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80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②利改税试点于1979年在湖北省花县开始。

^③见《财政》1983年，第2期，第23—24页；“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4年6月2日。

到 81000 家国营企业中的一半左右,现在把它们称为“小企业”。^①

利改税方案的合理之处在于规范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财政关系,减少了利润上缴制度的主观随意性。作为价格改革完成前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方案也使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杠杆,弥补价格不合理所带来的缺陷。而且还期望利改税能够缓解地区主义和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问题,这是通过把地方政府收入同企业有特定的所有制和赢利相分离而实现的。^②利改税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要阻止国家收入迅速下降的趋势,新的税收制度规定企业收入的较大部分交给国家预算。^③

旨在解决较早时期改革中的两个主要障碍,即企业的责任和地方控制问题,利改税的改革方向是对的。然而,在税制改革、小企业承包和价格改革这三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中,也很容易发现存在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一系列税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影响企业赢利的外部因素,使利润率反映企业的努力程度,并根据企业的努力奖勤罚懒。应用不同的税收杠杆,分离出价格、技术、资本密集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使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企业能比较好坏优

^①这些企业1983年的情况如下:平均产值为 310 万元,固定资产 200 万元,上缴税利 43 万元(《统计年鉴 1984》以及《北京周报》,1985,9:10)。

^②根据当时的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企业的利润收入要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见 Christine P. W. 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的传统和 80 年代的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80 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③据报道,1983 年实行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有 28110 家工业企业实行了利改税,这些企业占赢利国营工业总利润的 83%,新增利润分割如下:61% 以税利形式上缴国家,18% 作为企业发展基金,13.3% 作为职工奖金,6.7% 为集体福利基金。而实行利润承包制的企业,其上缴国家的部分,只有 14.5%(《财政》,1984,7:4;8:2—9)。

劣,使企业和国家间的收入分配具有客观的标准。然而在实践中,这些不同的税种如何确定合适的税率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税收具有的再分配企业和地区间收入的功能,同现在的价格改革一样遇到了阻力。而且即使成功地实行了税制改革,调节税具有较大的缺陷。在设计方案中,不同的产品实行不同税率的产品税,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统一的,调节税却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决定的,试图消除虽然生产同一产品但企业面临的其他条件却不同的问题。这样对具体企业实行不同的调节税这一做法,就带来了早期利润分成制一样的讨价还价的问题,虽然其讨价还价的范围和幅度已大大缩小。

把小企业承包给个人或集体经营的决定,似乎是减少国家与企业间金融关系中讨价还价的效应合乎逻辑的延伸。由于小企业不实行利改税,大大缩小了技术和成本方面的差别,减少了必须调整的规模。承包制通过简单地规定承包责任,似乎是硬化地方企业预算约束的捷径。然而,这里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约束软化的空间。事实上,从功能上说,这同以前实行的利润包干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当然在实践上如何贯彻承包制可以预料会有较大差别。因为这时地方官员的宽容大度并不是有益于“全体人民”,而只是有益于个别人或一小群人。真正的考验是在企业无法实现足够的利润兑现承包责任。由于发包方是地方官员,这些官员考虑到如失业、区域发展、税收收入等社会问题,一旦企业承包失败就会加以通融,预算约束再度软化。^①

^①到目前为止,关于承包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只有零星的材料。到1984年底,1万1千多家工业企业和5800家服务性企业被租赁,租赁期为5年。如凌方友(音译)在1984年6月的沈阳油泵厂承包中中标。基于1984年上半年实现利润为8万元,承包合同规定承包者在第一年要上缴6万元,第二年为8万元,第三年为12万元。根据合同,在完成承包利润和税收的情况下,剩余利润的30%归凌所有,70%作为工人奖金分配(BBC电台,W1326/A.12)。

承包制最严重的威胁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反对。如果实行承包制,地方政府的经济作用就大大削弱,从积极干预生产和投资的机构到仅仅是征税者。考虑到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阻碍作用,毫无疑问削弱地方政府的影响是这一改革方案最重要的目标,但是采取这样直截了当的措施,预先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价格改革是1984年10月宣布的总体改革方案中第三个重要部分,甚至在正式宣布改革方案之前,中国政府从1983年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调整价格的措施,特别是一开始就调整棉布、化纤等轻工业品的相对价格。^①由于竞争加剧和价格下降,减少了轻工业的超额利润。来自上海的一个报道认为,第二轻工业系统的价高利大情况实际上已经消失。^②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由价格信号扭曲所引起的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等问题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已大部分得到纠正。但在生产资料部门,在1985年时还没有实行价格改革,其主要原因是在短缺加剧的情况下,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随着部分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渠道,价格水平事实上已在上涨。

价格自发浮动不能代替价格改革。为了消除现行的多元价格结构所产生的三个极端有害的效应,必须进行价格改革。在改革时期,试图保持对关键部门的控制,政府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反常的形势,以容许地方小企业以市场价格销售,大企业则必须执行计划价格。由于生产资料和投资品普遍短缺,这样的政策实践实际上起着鼓励小企业在那些本要大量投资才能取得规模经济的行业急剧发展,从长期看这对效率影响极大。^③

①《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49—IV—51页。

②《财政经济》,1984年,第10期,第54页。

③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建筑材料工业,小企业以高于国家价格一倍到两倍的价格销售水泥和平板玻璃。见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80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多元价格存在的第二方面效应是导致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产品价格的随意性,由此增加了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难度。最后,多元价格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把资源从国家渠道转移到市场渠道就可能得到可观的经济报偿,这一点引诱着企业经理、职工以及政府官员。

在现行的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价格改革不可能消除短缺。在研究匈牙利的改革时,科尔奈认为只要企业的存在和增长不取决于资金状况,企业对投入品价格变动的反应就会是微弱的。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例证表明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前面举过的化肥厂就是一例,经理们和地方官员们并不在乎国家减少煤炭的供应计划,而只是简单地以更高的市场价格购买煤炭。最近几年工资和奖金支出超过了计划水平,主要是由于企业经理们并不在乎成本提高,难怪政府官员们指责工厂经理们同工人串通一气。^①最后,有关资料显示1980年和1981年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在3个月之内价格水平高低幅度之大令人吃惊。^②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解释,如严重缺乏关于产品和价格方面的信息,也许还包括质量差别和产品规格、性能方面的差别。同样合理的解释是购买者并不十分在乎价格高低,或者他们只要有货就赶紧以现价购买。关于企业需求的价格弹性还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但下面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企业成本提高后转嫁给购买者或政府预算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企业寻找便宜替代品的努力程度。

经过6年不寻常的经历,中国政府于1984年晚些时候提出了

^①薛暮桥,《改革 经济管理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第7页。

^②这一资料来源于上海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该公司是新建立的计划外“剩余”物资的交易市场。见《上海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情况汇报》,载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编,《上海工业企业经验》,1981年,第1期,第56页。市场交易价格的平均幅度为15—49%,但在3个月内时常超过215%。

一揽子改革计划，试图纠正以前改革方案中的设计问题，重使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平衡。尽管有某些缺陷，这个一揽子方案较改革第一阶段的措施有了较大的进步。可惜的是，它出台得太迟了。某些关键性措施的实施在1985年陷于停顿，本想把某些分散资金筹集起来的努力被银行信用的大量扩张所抵销。整个1985年，只是在利改税方案的基础上，加上了产品税和调节税。普遍的反对推迟了固定资产税和流动资产税的出台。事实上在1984—1985年间，在资本价格合理化方面有所倒退。至少在某些已经实行资本付费改革措施的地方，还没有等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就宣告取消。^①

甚至更严重的是1984年有关的措施出台后爆发了新一轮的投资增长热。该年投资增长了25%，紧接着的1985年头7个月资本建设支出又增长了45%，^②其中预算外投资比1984年增长90%。^③由投资增长和消费收入失控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迫使人们多次呼吁经济降温，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价格改革似乎只局限在放松控制若干食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方面，这也导致了一些城市的抢购。把小企业承包给私人 and 集体经营也由于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停顿。^④

结 论

尽管毛泽东时期和毛泽东以后的时期推行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经济仍然有着基本的连续性：即存在着持续的短缺，当然程度有

^①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1984年12月赴华旅行研究搜集到的信息，出自 Barry Naughton。

^②这里1984、1985年数据涵盖的面略有不同。1984年是指固定资产总投资，1985年仅指资本建设投资。

^③《北京周报》，1985年，第37期，第7页。

^④这是从1985年中国新闻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进展报告所推论的。

所差别。这个连续性是由于迄今为止的改革并没有消除引起短缺的根源；企业缺乏责任心。本文倾向于支持科尔奈的观察：“……解释长期短缺、吸纳以及资源约束系统的功能，不可能在于金融方面或者在于价格信息的特殊性质，而只能在于决策者的制度关系方面。”^①通过证明在中国也存在着相同的产生短缺的机制，而在这个经济中从来没有有效地实行过集中计划，本文有助于阐明科尔奈模型的广泛适用性。

短缺是中国能否成功地实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关键所在。从短期来看，短缺的程度将决定能否进行价格改革和这种改革能有多快，以及减少行政控制经济的步伐。从长期来看，这决定了政府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以及改善经济结构，使之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由于短缺和预算约束的性质决定着企业对成本压力的反应，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否最终转向内涵型发展、工业增长能否建立在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大规模投资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以后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首要的教训是，局部改革存在着特别严重的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仍继续坚定地采取措施，减少集中计划的范围。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如果改革者意识到，试图像他们宣布的那样，政府的作用只局限在管理几个关键部门，同时只是依赖于价格和税收这些间接手段，控制整个发展的步伐和方向，那么就必须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对经济机构发出正确的信号是不够的，还必须迫使这些经济机构对经济信号作出调整。

考虑到企业预算约束性质的重要性以及硬化约束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中国工业经济的改革依然面临许多障碍。匈牙利的经验

^①Janos Kornai, 《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80，第559页。

表明，经济刺激和官僚政治的刺激相结合的分散体制比一个集中的计划体制运行要好得多。因此中国没有能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结构也不完全靠市场信号。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对中国在提高效率方面持悲观态度的理由。中国经济改革者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经济刺激和行政控制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匈牙利官员和企业间非正式的协商体系在中国并不一定能行得通，这是由于中国有8万7千个国营工业企业和庞大而又分散的官僚阶层。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分权的办法来解决管理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又不很发达的经济中的困难。计划也部分下放给更低的层次，并把党的控制作为关键措施来保证地方决策同中央政策的一致性。但是，只要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自主权扩大，国家控制就相应放松。因此这个体制并不像理想的那样是由间接集中计划，但又由北京方面紧紧控制，而是逐渐退化成众多分散、各自独立地控制着资源和企业的体制。^①

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切断企业和行政组织之间的联系，拆除资源流动的壁垒。然而过去7年的分权改革，却加强了企业和地方当局的关系，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效应。毛泽东时的领导者发现，通过把中央指令传达到广大的中级官僚层的办法管理一个计划经济，是极其困难的。现在改革者也发现，要动员中级官僚层去实行改革措施是何等困难。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把经济刺激和行政激励结合起来的机制，其前景是渺茫的。只要实行改革依赖于地方官员的忠诚一致，那么当改革的目标明显地不利于企业和地方的利益时，改革就必然会变形甚至会彻底失败。目前继续

^①见 Christine P.W.Wong:《中国工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毛的传统和80年代的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80年代的中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

改革面临两大障碍：地方政府的反对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地方政府把分权式的改革看成是他们进一步控制资源配置的机会，他们的热烈支持是改革有势头的关键因素。但是在第二阶段，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地方严重影响企业这个延续了20年的趋势。由于这些改革对权力联盟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此时地方政府不愿意继续前进了。

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十分强大的。由于官方指数只涵盖一小部分产品的价格因此这种压力在改革时期无法度量。在生产资料部门，这种压力由于短缺的需求拉动效应和卖方市场的成本推动效应而加剧。工资和奖金迅速提高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又进一步增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和短缺历来是积蓄反对改革力量的焦点，因为它们增大了控制和重建分配的压力。

因此目前的工业改革正处在进退两难的阶段：它很难前进，又后退不得。要前进，就需要对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和懒惰工人采取坚决措施，但这无疑会加剧社会和地区紧张关系。要后退，则意味着接受微观经济无效率的指令性经济，这种微观经济低效现象现在由于放松集中控制而更加严重。随着改革的前进，难度还会增大，这是毫不足奇的。改革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性质上说是机械性的，即设计和实行中的问题。随着改革发展，机械性的问题让位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即如何协调涉及到的不同集团的利益矛盾。最后当资源配置进一步交给市场力量处理时，改革就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这样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焦点。以后的二三年是毛泽东以后改革的决定性阶段。由于地方政府现在倾向于另一方，保持改革势头的前景不容乐观。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也许会改变潮流。

1979—1983年中国农业新政策的 主要经济结果

澳大利亚 郭益耀

译者按：中国的改革是首先从农业开始的。本文主要讨论1979—1983年中国农业新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结果。

作者认为，中国的农业新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各种形式的价格体系，实行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多种经营，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了对农民的生产刺激，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本文分别讨论了农业新政策在经济哲学方面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讨论改革对总储蓄、投资偏好的变化、农业生产的稳定问题、农产品征购和供应以及对效率、刺激的影响。

作者认为，农业改革强调了投资的短期利益，使农村很难应付自然灾害和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等等。而且认为，只要缺乏有效的政策机制来吸收由于农业改革而导致的剩余产品，中国的新农业政策必然会由于农民消费的总体失控，并对中国将来的工业化道路产生有害影响而终结。

本文译自1984年12月出版的《比较经济学杂志》

第8卷第4期。^①由于原文较长,且其中有关资料和改革过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因此作了一些编译处理。作者简介见本书《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一文。

导 论

自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惊人方面是1979年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平均在25%左右。更轰动的也许是1981年下半年以来乡村地区加速的非集体化过程。1984年初,实际上在所有地区实行了“包干到户”。简要地说,这就意味着把集体拥有的耕地分配给单个农户耕种(即到户),并用综合合同的方式要求农户把农产品的固定份额上交给国家(即包干)。这种新安排实际上是把传统的集体农业制度转变成佃农—地主(这里是农民—国家)的关系。但是农产品中除了国家强制性征购定额以外的部分则以双方都同意的价格即市场价格卖给国家。

这些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变化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经济哲学提出了若干有趣的基本问题。例如,农业和工业之间贸易条件的改变会不会导致投资和收入在工农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并导致放弃苏联式的重重工业的增长发展战略?乡村方面的重新个体化会不会使中国变成西方式的发展中国家,使农民在生产决策、市场和消费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自由?非集体化是否会阻止乡村大规模先行设施的进行?这些设施原先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劳动刺激所产生的短期生产率的提高能否补偿集体的规模经营方面的损失?能否保持农业生产的长期、全面增长?这样是否会削弱农业

^① Yak—Yeow Kueh, “China’s New Agricultural-Policy Program, Major Economic Consequences, 1979—1983”,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8, 353—375(1984)。

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能否继续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部分市场化措施会不会减少国家的农产品和征购，由此引起食品供应、原材料供应方面的波动，影响工业的发展？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和讨论农业新政策的主要经济结果来阐明上述关键问题。已有的中国统计资料的范围和性质不允许我们进行更系统的、经济计量式的研究。但是全文试图尽可能地利用数量指数来阐明观点。然而，一开始简要地讨论政策变动的过程、内容是必要的。按照我的观点，这样的政策变动可以解释成一个战略性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整体。

新农业政策方案

政策变动的主要方面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史无前例地纠正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有利于农业部门。从1979年夏收起，国家大幅度地提高18种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国家对征购的粮食价格提高20%，征购额固定在长期不变的基础上。在征购额以上的那部分农产品价格提价50%，其数额是预先规定好的，这种准征购交易不时有所调整。对于也列入统一收购的棉花，分别提价15%和30%。食油和猪的征购价格向上调整约25%。^①提价最多的是新方案中自愿销售部分的“议价”和“市价”，增加了对农民的刺激。

而且销往乡村地区的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一般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降低。国家对许多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收。同样的精神也适用于乡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企业的所得税。再加上在1979年重建了国家农业银行，为农业生产和投资提供信贷资金。

改革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基本上

^①《农业年鉴1980》，第375—376页。

是以任务合同制代替原先毛泽东派实行的以时间为基础的平均主义集体报酬分配制。在包干到户制度下,集体组织,特别是生产队,仍然控制着大型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及育种等任务。主要生产资料存在“双轨所有制”的原因在于产出合同不仅仅包括预先规定好的由政府征购的那部分,还包括计划留给集体进行生产投资以及必要的粮食储备、集体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从1981年秋天开始的“非集体化过程”,似乎是为了使新政策第一方面的内容——价格刺激更有效而必须的。如果原先那种平均主义的集体分配形式不变的话,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的效应就会一风吹。相反,包干到户制度使收入分配更紧密地联系农民的相对边际贡献,超过合同征购数以上的那部分边际产出同农民个体家庭的努力有关。

改革方案的第三个方面是促进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这是为了(1)吸收包干到户后富余的劳动力;(2)生产更多的非农消费品,减轻当地对城市轻工业需求的压力,鼓励家庭副业生产和乡村贸易

改革的第四个方面是农业生产计划和控制的“非集中化”,如减少计划产品的品种等。

改革的第五个方面,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方面是农业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从1980年起,国家预算对农业投资的拨款急剧下降,这部分地可以由国家银行增加贷款来弥补。但是资料显示,除1980年银行贷款有较大增加外,1981、1982年银行集体组织以及它们附属企业的净增贷款有相当幅度的下降。即使部分预算投资拨款改由银行贷款进行,这种转移本身就说明投资决策在分散化。这是因为财政拨款在其项目的评估、批准权限上都是由垂直型的行政机构控制的。银行贷款在决策方面,主要依赖于求贷者的信誉,项目评估和选择上是由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投资申请者的责任能力作出的,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机构作出的。事实上在80年代的前几年,农村个人在信用社的存款大大增加,无论从增长率

还是从绝对额来看,都超过集体存款,这是投资决策分散化和农民收入以及储蓄能力提高后的明显结果。

对总储蓄的影响

根据我的不完全的估计,由于提价和减免税收,1979—1982年农业部分增加的总收入为760亿元,相当于1982年财政支出的66%左右,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这可以在1979年以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不断增加表现出来。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的增加,足以抵消国家财政投资拨款和国家银行贷款的减少。储蓄对收入的比例从1979年起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先只有15%左右,1979—1982年提高到23%左右。

那么,在现在的“非集体化”浪潮中,原先由农业集体组织维持的较高储蓄水平能继续保持下去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是由于第一,在包干到户制度下,合同承包的产量定额是由生产队(组)领导控制的。具体地说,集体组织是根据国家的征购要求、集体用于农具和水利设施所需的留成数额确定的。当然,由于乡村多种经营所取得的收入较高,这就迫使生产队(组)压低产量定额和相应的集体积累,使农民在定额完成后所得的边际收益仍有相当吸引力。但是,这种边际调整不太可能影响集体储蓄的能力。

第二,公社(乡)和生产大队(村)非农企业依然是整个乡村积累和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考虑到这些企业的利润通过乡村之手再投资于非农产业和农业资本设备,或通过扶贫形式进行的投资,那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有一些倾向使转移到生产队(组)的净利润增多了。这些转移增多是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后,农户同生产队(组)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同公社(乡)、生产大队(村)的联系松弛了,这一变化只是影响着公社(乡)内部的投资优先序列,并不影响公社

(乡)、大队(村)企业的整个储蓄能力。

我们还要注意到在1982年12月新宪法公布后,社队企业脱离公社的政治监督,公社不再是农村的政治组织,它们的行政权力转移到传统的乡政府。农村企业成了名义上独立的经济实体。这些变化旨在增加对企业的刺激效应和效率,但不会降低乡村企业作为农村资金积累来源的重要性。

第三,农户有更多的购买基本投入品,如化肥等资料的意愿,以取得农产品提价的利益。在实行包干到户后,农户的储蓄动机加强了。这反映在广泛实行包干到户的1982年,边际储蓄倾向提高,达到37%。这说明原先担心的包干到户使“农机无路”的现象并没有普遍发生,1983年农民购买和租用农机具的积极性很高。

值得怀疑的是,由农产品收购高价和包干到户带来的较高收益机会给农民的刺激,能否长期保持下去?

投资偏好的变动

同总量储蓄规模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如何投资。首先,农村改革的政策并不倾向于大的乡村先行资本建设。集中化的国家投资一般用于跨乡、县、地区乃至省的大的水利工程,现在也缩减了。此外,包干到户和责任制也不便于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动员,这可以用来解释乡村企业用于基本的农业资本建设减少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乡村用于大规模水利和排水设备资金的减少。

众所周知,过去中国经常实行劳动积累制度,即对集体或农民个人无须付任何报酬的直接劳动投资。从1980年起实行新的政策,为了不再损害农民的利益,强调进行严格的成本—收益计算,强调集体和农民的自愿性。基于这样的原则,劳动积累的资金成本使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不再可能,特别是在实行包干到户和乡村多种经营政策后,这些活动的机会成本更大。

与此相关的现象是棉纺、编织、制糖、卷烟、酿酒这些新的“五小”工业的兴起，它们逐渐替代了原有的水泥、化肥、农机、冶炼、能源包括小煤矿这样的“五小”工业，原有的“五小”工业是由公社（乡）领导建立、利用生产大队（村）或生产队（组）的储蓄，为建立地方小规模工业体系而提供必需的生产资料。原有的“五小”工业突然失去重要性（当然化肥厂除外），是由下列两个原因引起的：（1）对水泥、钢筋这些水利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需求下降；（2）地方当局花大气力把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用于新的“五小”工业，以满足收入增加后对轻型消费品的需求。再加上原材料价格和加工品价格之间的价格差距导致新的“五小”工业有利可图。

大规模基础设施方面的减少，可由中小型农田设施投资方面的增加予以弥补，而这些更适合小规模加工。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资金从社队（乡村）企业转到了生产队（作业组）。生产队（组）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区域中，比社队（乡村）更便利地把农具设施送到农户手中，同时包干到户制度使农户对小农具的需求大增。

正如化肥加速使用一样，新投资侧重于很快地取得收益。由于增强了激励机制，包干到户的初始效应是应该肯定的。1981年到1982年间粮食产量增加8.7%。当然很难估计由于农业内部投资的转向丧失了长期的生产率，在何种程度上能由产出的短期增长予以弥补。

农业生产不稳定问题

新农业政策对当前产出的影响可能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多种经营和农业计划控制的“非集中化”，是否会使农产品构成对价格和利润更加敏感？到目前为止的答案是肯定的，如粮食面积持续下降，棉花、烟叶和其他赢利性经济作物在近年内的播种面积大大扩大，这部分是为了满足新“五小”工业所需的原料。这种转向经

济作物是粮食面积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在1981年中期,这种趋势引起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以致于中央当局不得不发布行政命令,关闭和停办小工厂,特别是棉纺和卷烟的小工厂。以前在许多地方已经取消的粮食作物计划面积指标,现在又恢复或加强了,为的是稳定由价格引起的生产波动。由于中央固定征购粮食的价格并不反映其稀缺性,因此很难确定政府用行政手段阻止农业生产由粮食向经济作物的转移是否正当有效。

第二,更基本的问题还在于:a、乡村的基本设施;b、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激励机制。虽然气候多变,但前30年中国的粮食产出是愈来愈稳定的。在实行新农业政策后,中国农业产出的稳定趋势能继续保持和加强吗?减少在水利设施方面的基础投资是否会在长期影响中国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虽然中国的可耕地一半左右具有水利灌溉,但只有1/4左右可划为高产稳产田。为了满足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中国必须把较不肥沃和产量不稳定的耕地也投入农业生产。因此由气候等因素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是较大的。如果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0—1981年度粮食产量变动,其中35%要归之于气候影响。当然必须承认,这比1952—1966年期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对那一时期的回归分析, R^2 的值为0.59%。^①

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必须注意到中国农民具有很强的“生存激励”(subsistence urge),它是到目前为止的强大的“丰收稳定器”(harvest stabilizer)。这在“非集体化”以前那种职业和地点迁移由集体机构严格控制的情况下,是十分易于理解的。农民如果没有预料到多变的气候,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灾难性的。原先把大量人工用于战胜自然灾害,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这种劳动动

^①见 Y·Y·Kueh,《中国1952—1981粮食产出不稳定的气候指数分析》,《中国学季刊》,第97期,第63—83页,1984年3月。

员失去了效力,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多种经营提供了多方面赚钱的机会,这就使采取原先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在农民看来,经济上也很少吸引力。因此,在党的干部中普遍有一种担心,农业上的经济改革更易受自然灾害的威胁。

农产品征购和供应

包干到户倾向于压低国家强制征购定额的水平,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减少国家的征购。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农民对超定额以上那部分销售的高价格作出了十分热烈的响应。再加上议价和市价销售量也大大增加,结果国家收购的粮食占总产量百分比近年显著地扭转了过去30年那种下降的趋势。

一般而言,国家征购总额比例的上升,不但意味着更有弹性的粮食生产,而且还意味着更可靠的地方供应,甚至在1980、1981年气候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而作出结论,在大范围气候变坏的干扰下,包干到户制度也会作出相同的反应,撇开这一问题,人们也许可以假定,中国地区之间粮食的调移比以前要相对容易些,这对缺粮地区有利。类似地,工业扩大也较少受到农业原料和职工所需粮食的限制。农民对价格刺激的热切反应,意味着国家对农业征购的支出增加。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农民和地方政权普遍地有一种压低征购定额水平以取得四种价格制度经济利益的愿望。这些扭曲必然会引起以后的比例危机。中央政府一再呼吁并发布行政法规,提高或重订征购定额。这是又一个计划者寻找分散化的最优水平时利益冲突的例证。

国家必须为农业改革付出额外的资金负担,这是由于国家征购的农产品销售价格只能边际地向上调一点,而大部分以更高价格收购来的农产品其支出却要由财政预算冲减粮食贸易部门的利润来解决,而且随着部分农副产品的提价,为了保持现存的工资—

成本和工业价格结构,国家财政给城市职工的生活费用补贴增加,这就使本来就高度扭曲的价格体系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结果是,近年来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大大增加。

结 论

从效率方面看,农业方面的改革结果如何?我们要区别由承包农户使用和控制的小型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和由集体掌握的比较大的生产资料效率。毫无疑问,前一类生产资料的投入包括化肥等,使用得很有效率。对于大的生产资料,例如农业机械和排灌设备,由于集体耕地分割会影响这类资料使用的规模经济,虽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是很难确定的。

另一方面的低效率是由分配耕地的标准产生的,耕地分配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只考虑到家庭人口的规模,并不考虑劳动力的多少。这一平均主义的作法是想阻止潜在的农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但是这样分配显然使农业土地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作为补救措施,又规定在某些特定限定条件下,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可允许雇佣劳力。

更有意思的是,相应的经济理性后来同新的称之为“专业户”的产生有着联系。这是农村中家庭之间互助互利、实行专业化分工的一种形式,现在允许农民把粮食田转移到装备更好、更适于种粮的农户中,以利于另一些农户专业于其他的或非农的经济活动。现在很难估价这些改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重新安排劳力和其他资源配置。

在效率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承包农户占有土地的时间开始一般只有1—3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农民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以改善土地肥力。因此从1982年2月起,土地承包的时间一般延长到15年。这自然有助于加强专业户制度。

尽管有上述非效率的方面，近年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大大超过了工业(详见表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一部分应归之于由大队和生产队经营的农村工业。

表1: 1978—1982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和劳动投入指数

	农 业			工 业		
	总产值 (1)	劳动投入 (2)	(1)/(2)×100 (3)	总产值 (4)	劳动收入 (5)	(4)/(5)×100 (6)
197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9	108.6	100.8	107.7	108.5	104.9	103.4
1980	112.8	103.4	109.1	117.9	109.9	107.3
1981	120.2	106.2	113.2	122.8	115.2	106.6
1982	133.4	109.7	121.6	132.2	118.8	111.3

来源:《统计摘要1983》,第1列见第22页;第2、5列见第18页;第4列见第7页。

十分清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解放农业劳动力。在整个乡村的意义上,有助于产业发展。我们也要注意,这一变化同近年政策上在乡村内部转移富余劳动力到非农活动方面的努力有关。

中国实行的农业改革政策同 Chiang—Fei 的“通过节欲取得最高速度”的模型十分相似。^①

这个模型假定最优的、而不是最低的消费标准将会使资本积累最大化。具体地说,当中央当局制订仅够生存的消费水平时将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实行适度节欲的最优收入政策,将刺激劳

^①见 Alpha C. Chiang、John C. Fei,《通过节欲取得最高速度发展》,载 Irma Adelman、E. Thorbecke 编,《经济发展的理论和设计》,第67—92页,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6年。

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使总产出的增长超过消费支出的增长,有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从而整个收入也得到提高。

从这几年中国农民热切地想取得价格提高后的收益来看,对农民的刺激效应是具体真实的。

关于农业产出增加后其中大部分能否吸入国家资金积累的渠道,以利于工业的长期增长,这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确定这几年国家征购的粮食增加幅度超过了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幅度,其他经济作物也是这样。但是,在农业和工业二元化的斯大林模式中,更基本的问题是增加的征购粮食部分能否有效地转化为重工业投资品,比如通过出口,换回外国机器设备等。

值得怀疑的是 Chiang—Fei 理论模型中关于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假定,在中国经济情况下是否存在。从 1978 年起,中国不仅仅是粮食出口在减少,同一时期粮食进口在急剧增加。这是由于毛泽东以后大幅度改善乡村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准所引起的。注意到农民个人和地方政权不断努力操纵、影响征购定额以取得定额以上销售价格的好处,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不仅意味着国家资金的损失,而且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向轻工业以满足乡村消费需求的提高。

的确,近年农户和集体的储蓄和投资仍然较高,但在乡村范围内投资从重工业向轻小工业的转移,以及从长期的基础设施向短期收入最大化的项目转移,明显地表现出消费增加的普遍趋势。

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有两条可能的办法来改变目前的状况,使国家的资本积累增加。(1)可以提高销售给乡村消费者、生产者的工业品价格,使价格剪刀差复归。(2)直接提高农业税收。这两个办法都会影响对农民的物质刺激。

只要缺乏有效的政策机制来吸收由于农业改革而导致的剩余产品,中国的新农业政策必然会由于农民消费的总体失控,并对中国将来的工业化道路产生有害影响而终结。

谁在羊毛大战中取胜？中国农产品 市场案例研究

澳大利亚 安德鲁·沃森
克里斯托弗·芬德莱 杜荫堂

译者按：如果说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曾因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被国外经济学界所注目，那么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则主要因为其暴露的问题、尖锐的利益冲突，特别是接连爆发持续几年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烟叶大战”、“羊毛大战”等引起海外学者的重视。

本文作者安德鲁·沃森 (Andrew Watson)、克里斯托弗·芬德莱 (Christopher Findlay) 分别为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经济系的研究人员，杜荫堂 (Du Yintang 音译) 为中国赴澳的访问学者。英文原文发表于《中国学季刊》1989 年第 6 期上。^① 由于原文较长，译者进行了删节和编译处理。

^① Andrew Watson, Christopher Findlay, Du Yintang, "Who Won the Wool War? A Case Study of Rural Product Marketing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213-241), June 1989.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缺乏系统的方案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中国人并没有设计出在一段时期分阶段实施的有步骤的改革计划。他们采用若干战略目标,从1978年起发动了渐进的实用的变革。试图实现这些目标。采用的战略主要是四个方面:从以一定的统计指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到重视满足人民的消费;从以新投资为基础的外延发展转到重视效率的内涵发展;给生产者以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普遍采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经济管理手段;实行更开放的经济模式。以后几年的改革是与这些目标相吻合的,但是没有仔细地计划所要具体实现的步骤。整个过程的特征是不同部门的改革不同步,时有停顿甚至倒退,改革不同步也产生了若干问题。例如,企业经理们发现,在投入供应放松控制以前,就取消了生产和销售的计划控制。^①由于价格双轨体制,以及中央政府在供应关键性原材料能源方面继续发挥着作用,因此改革进程不平衡对经理行为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

即使中国在改革发起前有一个仔细的计划,整个过程也不见得就更容易些,这里存在着三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每一步改革的时机问题,改革各个方面的联系问题和对过程的外部反应问题。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处理上述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是不能预料的,这些问题不仅仅同经济短缺和非均衡有关,还同改革引起的利益得失而产生的政治反应以及同必要的组织机构变动有关。不可避免地,就会有政治上的争论和改革计划方面的调整。至于外界对中国经济变化的反应,确实会对改革起着反馈的作用,这更不是中国的改革者所能控制的。如果外界不能有助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或者中国进入市场引起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而这种变动并不利于中

^①张少杰:《双轨制下企业的经济行为》,打印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1986年3月。

国的话,那么改革者的前进就会遇到困难。^①分析时机、联系和外部反应以及这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到目前为止的改革道路,也可预测下一步改革可能的走向。

这些问题在农村部分改革中是明显的,羊毛生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羊毛产业规模小,且相对简单,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来研究。改革过程深深地影响着它,牧羊业和羊毛生产的若干特征提供了一幅改革如何运作的基本图画。集中于羊毛案例的另一好处是羊毛生产高度集中在牧区省份,羊毛加工集中在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中间包含了改革过程中从事羊毛生产的少数民族地区和从事羊毛加工的沿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羊毛是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它并不直接进入国内消费,这样就可以分析正在经历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案例也提供了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农业和工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业化所需原材料供应能力的决定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羊毛生产国,也是一个主要的消费者。而且,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78年生羊毛总产出接近1.38亿公斤(见表1)。到1982年产出达到高峰,接近2.02亿公斤,仅仅4年之内就增产45%左右。尽管在1985年产出又下降到1.78亿公斤左右,从相对份额看,中国仍然是大的羊毛生产者,是仅次于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第四大羊毛产出国。经历了1982年至1985年的3年减产后,生产又开始恢复,到1987年又达到了2.08亿公斤新高峰。在1978年和1987年间,羊毛生产经历了高速增长、突然下降

^①见C·Findlay,《中国开放政策和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未来改革的含义》,为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学会200周年提交的论文,堪培拉,1988年2月。

表1:中国的生羊毛生产和消费 (1978—1985)

年份	生羊毛 生产 (百万公斤) ^a	购买 总量 (百万公斤) ^b	生羊毛 进口 (百万公斤) ^c	生羊毛 拥有量 (百万公斤) ^d	国内购买占 拥有量的%
1978	137.8	138.2	10.3	148.5	93
1979	153.2	149.1	16.9	166.0	90
1980	176.0	161.0	37.4	198.4	81
1981	189.0	170.1	59.1	229.2	74
1982	202.0	179.9	87.0	266.9	67
1983	194.0	177.7	88.4	266.1	67
1984	183.0	154.8	55.8	210.6	74
1985	178.0	219.0	113.4	332.4	66
1986	185.0	218.0	152.2	370.2	59
1987	208.0	—	152.2	—	—

来源:

a. 1978—1979: 《中国农业年鉴1980》(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1), 第118页。

1980—1985: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第94页。

1987: 《光明日报》, 1988年2月25日, 第3页。

b. 1978—1983: 《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第121页。

1984—1986: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7》, 第122页。

c. 1978—1980: (外贸部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第413页。

1981—1983: (海关数据) 《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 第480—481页。

1984: (海关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 第572页。

1985—1986: (海关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 第600页。

1987: 《中国海关统计》, 第1期, (1988), 第32页。

d. 进口加上购买量。

和迅速恢复的过程。但是如果用实际产出来衡量，1987年的羊毛生产只是略大于1982年的产出。

在产出波动的背景下，对生羊毛的需求急剧上升。通过进口增加可反映出国内生产赶不上需求增长速度。1978年生羊毛拥有量（国内购买加上进口，见表1）为1.49亿公斤，到1985年拥有量增长了一倍多，为3.32亿公斤。这样国内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扩大，导致生羊毛进口的迅速增长，在同一时期进口从占消费量的7%上升到34%。1978年只进口了1万吨生羊毛，只占世界进口量的很小一个比例。到1983年，尽管国内产出增长，进口量增加到88400吨以上，占世界进口量的10%，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进口国。3年以后，在1986年以及1987年，中国的进口量上升到15万吨以上，由此中国成了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①事实上，国内产出下降加剧了供给短缺，生产回升也落后于现存的需求。这样的供求缺口导致中国国内羊毛价格迅速上涨，即爆发所谓的“羊毛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牧民同政府征购系统为合同而争吵，地方政府试图控制已经非中央化了的羊毛市场体系，商业机构和加工者在充满着投机和利润的市场上竞争产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本文的分析是作者关于中国生猪市场变化的姐妹篇。由于猪肉消费在中国家庭食物预算中的重要性，生猪是个重大问题。在穿的预算中，毛线衣消费虽然仍占很小的比例，但增长很快，在1978至1985年间，人均消费量增长了250%，城市消费者

^①由于海关和外贸部的数字不同，进口的数字根据资料来源的不同存在着差别。如根据《我国羊毛供求方面的主要问题与近期对策》一文（《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7期，第30—34页），1986年进口量为18万吨。1988年10月的《中国纺织报》发表的题为《我国毛纺行业面临严重困难》一文认为，1987年进口量为16万—17万吨。表1中该年份的数据为官方的海关数字。

购买量是乡村消费者的3倍以上。^① 羊毛的重要性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在世界羊毛市场上的规模。正如上面提到的,进口增长使中国现在成为国际羊毛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变动不仅仅影响着羊毛贸易的方向,而且也使羊毛的国际价格大幅度上升。这就导致了中国纺织工业产品的纤维结构发生变动,导致增加使用和进口更多的化学纤维,由此也改变了整个产业的利润水平。反过来又影响了羊毛产品的国内价格政策。这种相互影响是中国的改变引起了国际的反应,又影响到中国下一步改革进程的一个实例。

上述的所有发展,同改革时机、联系和外部反应诸问题都是相关的。因此本文有两个同羊毛业的事件有关的关键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分析羊毛大战的起源。显然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是有关的,这在下面两节中予以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阐明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性质。本文的第二个目标是阐明羊毛大战对中国经济作为整体发生作用的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进而讨论以上提及的中国经济、政治变动中的更一般性的问题。

在本文中对羊毛的需求源于纺织行业的羊毛制品部门(我们集中了羊毛纤维而不考虑丝绸或毛皮类)。中国国内对衣着以及出口的最终需求源、纺织业对这种需求的反应、在本行业内部的分部门间安排资金,包括在羊毛行业内粗纺和精纺系统间的分配,都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② 我们讨论的范围是毛纺行业的总的加

^①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第669、676、687页。

^②见Ray Byron,《中国的收入和人口对家庭需求的影响》,油印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对中国家庭预算中衣着的份额进行了分析,见Kym Anderson,Youngil Park,《中国与世界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国际重新组合》,油印稿,阿德雷得大学,对穿着、纺织品消费中不同种纤维的份额进行了分析。

工能力,衡量加工能力的一个指标是纱锭的数量。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纺织工业部控制着企业的纱锭数量,在国家计划内,纱锭数每年增长14%。1978年以后增长率提高,年增17%以上。但是与此同时,对预算和资本投资的分散控制使得省、县政府有机会新建国家计划外的羊毛纺织厂(对这种投资的刺激将在下文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结果是官方计划数字不再能反映纺织行业实际生产的能力。据估计到1985年计划外开工的高达60万纱锭数,相当于计划内生产能力的43%。^①如果这是确实的话,1985年的生产能力接近200万纱锭数,不可避免的,1980年以来毛纺能力增长200%的快速提高,形成了对羊毛的大量需求。^②

增加的羊毛加工能力导致对羊毛的需求激增,但羊毛原料供应跟不上。羊毛原料供应减少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一组因素是在现行的价格水平下,影响以后的供应,这里包括生产的技术因素、羊群的管理因素以及生产者面临其他替代活动的价格和收益因素,这些因素是互相影响的。第二组因素同市场体系和对生产者提供的信号有关。这两组因素都受1978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影响,这就影响了羊毛生产的管理和生羊毛的定价及市场。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导致中国境内的原羊毛价格迅速上涨。1985年起取消统一的派购体系,原先由中央集中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现在由合同和市场来控制,于是羊毛有了一系列的价格,包括基本价、议价、清洁羊毛价、加价平均价、比例剩余价和自由价。在改革中,牧民同政府征购系统在合同上讨价还价。财政包干制度,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经济利益,当地行政部门竭力使自身得益最大化。他们投资

^①见《我国羊毛供求状况及其对策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1987年第3期,第11—14页。

^②纱锭能力和羊毛需求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是由若干技术因素决定的,包括纱锭的类型(精纺或粗纺)和实际利用率。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为羊毛需求的增长提供一个大概的尺度。

工厂,加工本地原材料以取得增加价值额,同时限制原料进入其他地区,试图控制已经“分散化”了的羊毛市场。商人和羊毛加工业者在市场上竞争着投机和盈利机会。因此,1985年起爆发的羊毛大战,包含着不同形式企业的竞争(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不同层次的政府和不同种类的商业单位的利益;而且影响着羊毛生产者,他们面临着新的农产品相对价格和新的市场体系。当中央对市场的集中控制放松以后,这些矛盾就彻底爆发了,这就导致了价格失控,导致了“羊毛大战”。

从“羊毛大战”可以看出改革的政策失误。改革的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不同方面改革的联系上。(1)羊群管理的责任制从集体转到家庭手中后,从每个家庭的牧羊管理来说,其效应是积极的,但由于对牧羊业的服务、对牧地的分散使用,增大了某些成本,因此对整个牧羊管理来说,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2)当牧羊管理转到家庭手中时,相对价格也变动了,由于羊肉市场的改革快于羊毛市场的改革,羊肉的相对价格高于羊毛的相对价格,牧羊者从相对利润角度作出的决策,不利于羊毛生产。同时羊毛加工者预计羊毛价格以后会上升,加上一段时间原羊毛价格较低,地方政府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有了投资自主权,这样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纱锭数大增。但是羊毛市场改革步子慢,使羊毛购买者和羊毛加工者的利益没有及时地传导给羊毛生产者。同时中间商由于有着自己的偏好费用估计等,并不愿在羊毛生产者和加工者之间起这种作用,而且在80年代初期地方小工厂纱锭能力扩张,这些厂使用羊毛低效、高耗加剧了这个矛盾。更直接的影响是,羊毛产地的加工业膨胀,影响了沿海地区国营工厂的采购,它们只好更多地使用进口羊毛。国内改革的结果同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位置、中国进口量的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需求导致了世界市场上羊毛价格的上涨。因此国内的羊毛大战带进了国际市场,这些价格变动对改革战略和企业生产选择有反馈作用。(3)虽然羊毛价格和羊

毛市场的改革较慢,由于需求大增的经济压力,羊毛生产者千方百计绕过国家计划收购体系,因此削弱了计划体系。国家的最终反应是在1985年放开价格,这样就把原先压抑的力量全部放开。1985—1988年经历的羊毛大战和对地方的再控制突出地说明,在具有各不相同变化率的不同经济部门中,在同时运作的不同所有制和管理手段的经济体系中,改革是何等地困难。这中间除开包含的经济问题外,也反映出十分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

解决羊毛大战需要仔细谨慎地管理价格体系和市场网络。对羊毛需求的压力意味着羊毛生产者所得价格仍将提高。在羊毛短缺仍然持续的情况下,贸易者取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时,不同质的羊毛差价要增大,更多地刺激生产者满足工业的需要。此外要在羊毛产地和最终使用者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要建立这样的机制,以保证羊种繁殖、兽医和对生产者的其他服务,要更有效地管理牧地。为此,要给生产者以适度的刺激和正确的信号。还要协调好羊毛加工业不同类型的利益,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这些不仅同乡村改革有关,而且同整个改革进程,同政治抉择有关。

中国1978—1989年的金融改革： 回顾和再评价

香港 饶余庆

译者按：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中国1979—1989年10年的金融改革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再评价。

中国金融改革有三个主要的目标，一是纠正以前30年过度的“金融抑制”；二是结束同世界金融体系隔绝的状态，重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宏观经济控制机制，主要以经济杠杆为主，替代行政控制经济的传统做法，保证国民经济增长沿着没有通货膨胀的轨道前进。

本文认为10年金融改革在前两个目标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如由原先单一的独家经营的银行体系改革成在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银行体系，建立和开放了多种金融市场，多次调整银行利率。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团体，同许多国家的银行建立了工作联系等等。但在第三个目标方面，10年金融改革进展甚少。其明显的例证是持续的财政赤字、货币超量发行和信贷失控，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根源是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国家所有制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导致的

“预算约束软化”，因此没有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本文作者饶余庆(Y·C·Jao)为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译自1990年冬季号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杂志》。^①

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想对中国1978—1989年的金融改革进行一番回顾总结和评价。虽然对1978年以后的改革已有许多研究，但在金融改革方面讨论颇少，需要进行新的评价。

改革的背景

毋庸置疑，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是“金融抑制”的极端例证。它在中国的特征是金融机构的完全国有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手段均被限制；普遍存在的非均衡利率和汇率；同世界金融界隔绝和闭关锁国；隐蔽性的通货膨胀。^②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是唯一的银行，垄断了所有银行业务，没有任何竞争。在1949年前存在的所有政府的、私人的银行或金融中介或被没收充公，或给以名义性补

^①Y·C·Jao,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1978—1989: Retrospect and Reapprais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4, 1990, pp.279—309.

^②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独创性评论，见R·I·Mckinnon,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73年；E·S·Shaw,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最近关于经济发展中金融改变意义的评论，见M·Fry, 《货币、利息、银行和经济发展》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8年。

偿实行国有化,合并入中国人民银行。^①交通银行和它的后继者人民建设银行,分别在1952年和1958年成为财政部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农业银行只在1955年和1963—1965年两个时期存在过短暂的几年。相类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财政部的一个单位,在1959年停止了国内业务。50年代初期,关闭了金融市场,禁止可转让金融票据的流通。那时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和农民信用合作社。甚至中国人民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把它描述成财政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现金出纳部门也许更准确些。由于没有独立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从总体上偏离均衡值就不足为怪了。再加上在毛泽东时期,同世界金融体系发生联系是不允许的,几乎很少有什么来往。通货膨胀主要通过长期短缺、排长队、广泛的定额配给和货币余额的迅速积累表现出来,而不是表现为价格的全面上涨。^②

中国的金融改革

到1978年,甚至党的领导层都明白,那种几乎全部依赖于中央官僚控制的命令经济模式导致了生产率的停滞、普遍的低效率

^①在这方面香港有些例外,中国银行机构也控制和管理着12家以前由政府 and 私人拥有的银行、4家合作银行,允许这些附属机构保持原有的名字是为了适应香港的特殊情况。

^②关于1978年前金融体制的描述,见A·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第14—15章,伦敦;乔治艾伦和艾温,1967年;K·H·Hsiao,《共产主义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3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7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关于隐蔽性通货膨胀的研究,见Y·C·Jao,《关于隐蔽性通货膨胀的若干研究:共产主义中国1950—1957年期间货币和价格的一种解释》,《联合学院杂志》,第99—114页,1967/68年。

和浪费,以及已经经历了30年私有化的民众的道德水准下降。用一位著名专家的话来说:“存在着大量的配置低效率和X低效率。”^①再加上中国领导者最终意识到,那些沿着市场化发展战略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著名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在50年代初期的起步状态并不比中国好多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末发动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本文把讨论的问题限制在金融改革方面。金融改革的总目标是要纠正前面提及的过度的“金融抑制”,再造能够以有效成本的手段动员储蓄、分配资金的金融体制,为没有通货膨胀的持续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下面分析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在下列三个主要领域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金融机构和市场、税收体制以及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

金融机构和市场

正如已经涉及的独家经营的银行体系,关闭金融市场,同外部的银行和金融世界相隔绝,是1978年前“金融抑制”的显著特征。因此初期的改革措施包括:复活、重建或创造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行结构的合理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相分离;以及同世界金融体系的再结合。

1979年2月重建了农业银行,以利于为乡村和农业部分筹集资金。随后在同年3月中国银行恢复了独立的银行地位,它是负责国际贸易、外汇和海外汇款的专业银行,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附属部分。10月底新建了一个新的机构,即中国国际信托和投资公

^①引自D·Perkins,《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文献杂志》,第601—645页,1988年6月号;C·Bettelheim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研究杂志》,第24卷,第4期,第15—49页,1987年7月),和D·Perkins的文章都对经济改革作了出色的论述,但对金融改革只作了一般性介绍。

司(CITIC),为合资企业筹资,促进它的发展,也有利于在中国的
外国投资以及中国在海外投资。在1981年12月,又建立了一个新机
构,即中国投资银行,它是为了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引进资金,
为批准上马的现代化工程筹集资金。①1987年4月恢复了交通银
行,它的总部从北京迁到上海。这个重建的银行是以联合筹股为
基础的,中央政府股份占50%。它是一家“综合性”银行,授权从
事国内和国外的银行业务。它也是一家“地区”银行,主要为华东
沿海各省的经济发展筹措资金,它的另一目标是恢复上海以前的
金融中心的地位。②

1985—1988年期间建立的其他地方银行或专业银行,包括广
东发展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福建工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业银行、中国商业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和
烟台住房储蓄银行。③上述前四家银行的目的是为广东、福建两省

①关于1979—1985年期间的银行改革,见C.H.Chai,《中国的货币和
银行改革》,《香港经济论文》,第14期,第37—52页,1981;A.W.Sa-
mansky,《中国的银行体系:它的现代史和发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1981年12月,研究论文8108;W.A.Byrd,《中国的金融体系:银行职能
的变动》,第2章,科罗拉多博尔德:西部观点出版社,1983年;李茂生,
《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7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D.Wilson,
《学习新方法的中国银行》,《银行家》,1986年8月,第14—25页;G.
White, P.Bowles,《中国的银行改革:目的、方法和问题》,《国立
西部银行每季评论》,第28—37页,1988年11月。

②甚至在1952—1988年间总部销声匿迹时,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依然从事
经营活动,它成了香港的中国银行的一个部分。在交通银行恢复后,它的总
部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很清楚。参见R.Delfs,《长征
回头》,《远东经济评论》,1986年12月,第82—85页;E.Cheng,《尝
试恢复》,《远东经济评论》,1988年8月4日,第49页。

③见《1987年金融改革新进展》,《中国经济年鉴1988》,第Ⅲ部分第
15—17页;《经济导报》,1990年5月7日。

和厦门、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筹资。厦门国际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业银行是该公司的银行部门，而中国商业银行是一家国营航空公司——中国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银行部门，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专门从事住房抵押业务。从广义上说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协会或英国的建筑协会。

在国内银行业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仅仅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同时命令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执行非中央银行职能和业务，并把这些其他专业银行所不具备的职能和业务转移给1984年1月设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出于同样的政策目标，某些银行的管理机关，如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等等，则由财政部管辖改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

同银行改革相平行的还有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恢复和建立。国内保险业务在中断21年以后于1980年得以恢复，但是直到1983年9月人民保险公司才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当然它仍然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①也开始出现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根据最近的报道，到1987年底，整个中国已有6000家投资信托公司、10家金融公司和1615家城市信用合作社。^②

随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恢复，合乎逻辑地重新开放了金融市场，可转让金融票据也合法化了。198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则上批准了银行同业市场，旨在结束原先那种从上至下垂直安排信贷的办法。荒唐的是在1986年初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引起的信

^①参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20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1959—1980年期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要通过它们的附属机构中国保险有限公司和在香港的太平保险有限公司，继续从事国际保险业务。

^②参见《1987年金融改革的新进展》，《中国统计年鉴1988》，第三部分第15—17页。

用危机,刺激了银行同业市场的发展。那些缺少现金的银行被迫从其他银行拆借。但是这种现象很快遍及主要城市,最近的新闻报道指出,在1989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11个城市(上海、沈阳、济南、天津、合肥、温州、宝鸡、武汉、呼和浩特、郑州、杭州)银行同业交易总数为35.29亿人民币,加权平均年利率从10.44%至14.0%不等。相类似地,信用紧缩也刺激发售公司股份和银行债券。在1984—1985年,企业和专业银行缺少资金就直接向自己的职工和公众发售债券来筹集资金。一般来说,发售给个人的公司股票为50元和100元,发售给机构投资者的为10万元。到期日较短,从一年至五年不等。收益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固定利息率,另一部分是同净利润相联系的股息。这样说来,中国的公司股票是债券和股本的混合物,类似于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无投票权、可偿还、参与优先股”(non-voting, redeemable, participating preferred stock)。这种股票和债券的二级市场也在1986年重新开放,虽然这种市场只是沈阳、上海和广州的试点形式。^①同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发售了银行债券,债券利率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1.8个百分点。^②

早在1981年就发售政府债券,主要是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和为

①《金融时报》,北京,1989年4月6日。另请参见R·Delfs,《长征回头》,《远东经济评论》,1986年12月11日,第82—85页。

②更详细的讨论,参见Y·K·HO,《中国金融革新》,为国际商业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美国亚特兰大,1986年11月;Y·K·HO,Joseph Wan,《中国的股票市场》,香港浸礼会学院商业研究中心,研究报告,1988年12月;J·Xu,《股份制: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路》,《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1卷,第509—514页,1987年;G·Grub,B·L·Sudweeks,《证券市场 and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通讯》,第74期,1988年5—6月,第11—16页。根据Xu的说法,到1985年底,用股票和债券方式筹资达100亿人民币。

基础设施建设筹资，这比发售银行债券等要早得多。虽然政府在1950年为同样目的发行过债券，但这些债券在1974年已经还清。1959年至1981年间，一直没有发行新的政府债券。从1982年起，由于持续的财政赤字，发行的政府债券也随之增加，债券利率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到1987年年底，据报道国内政府公债累计已达363亿元人民币。^①最近的新闻报道透露在全国7个城市（沈阳、上海、哈尔滨、武汉、重庆、广州和深圳）存在政府公债券的二级市场。^②1980年起源于上海的汇票贴现、承兑和再贴现已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12月正式批准。^③最近实行的结算程序改革将有望促进可转让金融票据的发展，原先的苏联式结算方式，银行实际上执行着从产品买方或欠款方收款的额外任务。这一体制不利的结果是故意拖延付款、欠款累积、流动资金占用增大以及银行的额外管理成本。^④从1989年4月1日起，取消了所谓的“委托收款”及其类似形式。所有的非现金结算必须应用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和其他金融票据形式进行结算。^⑤

与中国改革进程同等重要的是重新进入世界金融体系。虽然中国在1971年重新加入联合国，但直到1980年4—5月才重新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明显地是由于在台湾和其他问题上（比如提供金融和其他经济资料）经历了漫长的谈判过程。在1984年12月中国和国际结算银行正式建立了业务联系。1985年后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见《中国统计年鉴1988》，第680页。

②《金融时报》，1989年4月6日。

③见刘鸿儒等，《中国资产市场的扩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第47—52页；另请参见G·White、P·Bowles，《走向资本市场？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IDS中国研究报告，第6号，第70页，1987年。

④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8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金融时报》北京，1989年4月1日。

期签订协议后,中国于1986年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①。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和愿意履行国际责任结束了中国金融30年与世隔绝的状态。

作为“开放”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也有了改变。例如在改革以前,中国在进口资本设备设施时,只接受短期和中期贷款,拒绝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银行的长期贷款。确实,60年代中期在以极其高昂的代价还清苏联的债务后中国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感到十分骄傲。但是,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接受外国商业银行、政府机构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联合贷款和出口信贷。中国银行和其他机构也向国外发售债券和有关证券。最新资料表明,到1988年底中国所欠外债总数达420亿美元。^②

在改革以前,中国有计划地采取排挤外国银行的政策,认为它们不是别的,只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改革前夕,只有4家外国银行和香港银行在中国有分行,上海有4个分行,厦门有1个分行。这些银行是:香港和上海银行公司(香港)、标准特许银行(英国);东亚银行(香港)、海外中国银行公司(新加坡)。从此以后,中国十分谨慎地放宽了对外国银行的政策。广义地说,外国银行建立代理处得到批准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他们要建立从事全部业务活动的分行就难得多。即使批准建立分行,对外国银行也有许多限制,例如它们只能从事非居民的外汇存款;只有当它们作为工商银行代理机构时,才能从事人民币的存款活动。^③其他阻止外国银行

^①见A·W·Samansky,《中国的银行体系:它的现代史和发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81年12月,研究报告8108号,第65—67页;《中国金融年鉴1986》。

^②世界银行,1989—1990世界债务表。

^③见P·D·Reynolds,《中国的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第8章,纽约:布拉杰,1982年;D·Wilson,《在华外国银行家的等待游戏》,《银行家》,1986年8月,第26—27页。

和有关金融机构增长的因素是互惠条件 征税处理和物质设施方面的限制(如办公室间和电讯通讯设施的缺乏等)。到1988年3月,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有170个代理处,其中在北京有90个,以及30家分行,其中上海有4家,其余设在经济特区,尤其是在深圳和厦门。^①

中国同世界金融体系再度一体化的另一表现是中国银行对外网络迅速扩展。在1949和1971年间,中国银行经营活动极为低落。如在悉尼、东京、大阪、纽约、曼谷、西贡和科隆的分行忠诚于台湾,而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雅加达、仰光、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的分行由于政治原因或经济困难而关闭。^②由于70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外交关系的极大改善和后来发动经济改革运动 中国银行的国外网络迅速得到恢复和扩大。到1988年底,中国银行在12个国家设立了426个分行或办事处。它还同155个国家或地区的1447家银行建立了相应的联系。^③资产总额达到810亿美元,在世界最大的500家商业银行中排在第46位。^④

在香港和澳门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也引人注目,这是由于它们整个地处在国际竞争的风浪中,它们对中国大陆的同业具有潜在的“示范效应”。这些机构是家喻户晓的“姐妹银行”,同中国联合

①①·Barnham:《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改革》,《中国新闻分析》,1988年3月15日,第1—9页。Wilson的《在华外国银行家的等待游戏》错误地把中国在香港的姐妹银行包括在外国银行里。

②见A·W·Samansky:《中国的银行体系,它的现代史和发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81年12月,研究报告8108,第44页。美国承认北京以后,1979年台湾的中国银行改名为中国国际商行银行。

③《中国银行年度报告》,北京,1989年4月。

④《最大的500家》,《银行家》,1988年7月,第56页。

一体的有 8 家，同香港联合一体的有 4 家。^① 在澳门的一家银行于 1987 年 1 月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所有这些银行现在都由中国银行香港和澳门分别管理。在 1989 年 4 月宣布的“姐妹银行”中有 6 家为中国银行的子银行，而中国银行拥有广东省银行的 41.25%。^② 1978 年前，中国银行和它的“姐妹银行”主要从事同中国有关的商业融资活动，如贸易、投资和汇兑等等。1978 年以后，它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开始大量吸收香港和其他外汇存款，扩展同中国无关的业务活动。它们还建立全部拥有或部分拥有的储蓄公司，形成了两个合资商业银行。^③ 中国还越来越多地参与保持香港金融界稳定的事务。在 1965 年银行业危机中，中国基本上采取了“撒手”政策，而在 1983—1986 年的银行危机和 1987 年的证券市场危机中，中国和香港当局紧密合作恢复信心。因此在 1985—1986 年，中国拥有的两个实体，中国国际信托和投资公司与中国商业储备有限公司能够控制康华银行和联合银行这两家银行的利率。1987 年 11 月当香港期货市场濒临倒闭时，中国银行和香港政府以及两家发行纸币的银行联合干预挽救了市场。到 1988 年年底中国银行集团在香港银行体系中占总存款的 21%，当然其在资产总额

① 1949 年以前，交通银行和广东省银行是民国时代的政府银行，因此无偿地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他 6 家中国联合银行是私人银行，在 1950—1952 年首先转变成公私合营的银行，给予名义上的补偿，然后在 1958 年完全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彻底丧失了原先的地位，它们在香港的分行允许保留原名。

② 见 Eva To: 《中国银行控制 6 家银行》，《南华早报商业公告》，香港，1989 年 4 月 15 日。

③ 更详细的分析，见 Y.C.Jao, 《为中国现代化筹资中香港的作用》，载 A.J.Youngson 编：《中国和香港：经济联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 章，1983 年，Y.K.HO: 《中国拥有的银行》，载 Y.C.Jao、Y.K.HO 编：《香港的主要银行集团：它们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 3 章，1987 年。

中所占份额要少得多,为8.1%。^①根据香港银行业委员会的报告,到1989年年底在港的中国银行存款达1960亿港元,比1988年底高10%,但是占香港银行业存款总额的份额从21%降到19.4%,资产份额也由8.1%降到7.7%。^②

中国改革后到1990年1月1日为止的金融结构如图1所示。我们假定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现在管理、控制着所有其他银行(用中文的概念叫做专业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以及负责管理国家外汇储备。“专业银行”根据它们从事经营的地理范围可分为国家银行、区域性银行和地方银行。一个例外是1987年成立的中国商业银行,它是中国商业储备有限公司管理下的航空公司的银行,中国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受交通部领导。同时存在着各个部和国家公司自建银行的趋势。中国国际信托和投资公司与中国商业储备有限公司极其幸运地被批准设立为机构内部银行(in house)。就在批准它们不久,随着1988年经济环境恶化,北京下令暂停建立新银行。还有从1984年1月起财政部名义上把以前由它支配的某些权力转移给中国人民银行,当然仍然保留那些同发行财政公债和其他政府证券的有关经营权力。

税收制度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给国营和集体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使它们成为无需国家不断补贴的自负盈亏的实体。在毛泽东时期,一个企业在缴纳了各种流转税和一小部分(一般为10%)上缴给国家财政(地方财政或中央财政,根据企业性质而定)

^①银行业委员会,1988年年度报告,香港,表2.5,第70页。

^②银行业委员会,1989年年度报告,香港,表2.5A、2.5B,第74—75页。

后，要上缴全部利润。①70年代后期政府承认这样的制度只能对生产率和效率产生极强的促退效应。结果是所谓的“利改税”的税制改革。换句话说，企业以统一税率上交国家利润税后，现在原则上能留用剩余的利润。

这个改革措施于1980年首先开始在某些省和城市试点。起初企业在交纳统一的利润税后，仍然需要同国家以多种方式共享剩余利润。后来从1984年10月起对利润征税的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对大中型企业，统一税率为55%，小企业实行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55%。②虽然企业留用利润比以前高，但并没有显著增长。首先，在1984年企业必须对超过上年水平的超额利润缴纳30%的调节税。如果超过限额发放奖金或在计划外进行投资，还要对剩余利润部分征税。③其次，一个企业仍然必须缴纳其他税收，当然计算企业所得税时的利润是以扣除上述税收以后的净利润为依据的。一般说来，即使在改革以后，企业全部留用利润不可能超过税前利润的25%。

①见A·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第17章，伦敦：乔治艾伦和艾温，1967年；Richard K·Diao,《共产主义中国的税收制度》，第7章，香港：联合研究所，1969年。

②更详细的描述，见Wang Chuanlun,《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若干评论》，《中国学季刊》，第97期，1984年；A·Donnithorne,《毛以来的银行和财政变动》，提交中国体制改革讨论会的论文，1986年3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H·C·Y·HO,《中国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和从上交利润到上交税收的变动》，载C·H·Chai、C·K·Leung编，《中国经济改革》，第562—583页，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M·Nambu,《中国国家金融和税收制度的最近趋势》，《中国通讯》，第72期，1988年1—2月，第2—9页。

③在1986—1987年，调节税税率降低，意在逐步取消。见《1987年金融改革新进展》，《中国经济年鉴1988》，第三部分，第15—17页。

在实行以税代利改革方案的同时，原先的工商税为若干新税种所代替，如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资源税，各个企业根据适合的税种缴纳税收。

最近几年还开征了一些其他新税，包括补充教育税（从1986年7月起），可耕地使用税（1987年4月起）、个体企业所得税（1985年1月起），该税种分成从7%—60%的10级累进税，以及1986年9月起实行的新的个人所得税，代替了原先1980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400元人民币，累进税率为20—60%。^①

在1984年与实行“以税代利”方案相协调，为了控制超量发放奖金，对激励支付单独征税。在1987年，奖金数额在4—5个月工资额以内的奖金税较低，为30—20%，5—6个月部分的奖金税税率为100%到50%，在6—7个月部分的，奖金税税率为300%到100%。奖金额超过7个月以上的部分，税率固定在200%。^②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制定了关于外资和合资企业的税法。1980年9月开始实行的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税率为30%，再在税额的基础上附加10%的地方税，总的税率为33%。外国合作者如把利润汇到国外再征10%的税。对开发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合资企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对外资企业，1982年1月起实行了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一税法规定净收入要以累进税率纳税，税率为20—40%，再加上10%的地方税，由海外华人建立的商号可得到特殊优惠。另外对在经济特区经营的外国企业和合资企

^①1980年个人所得税只适用于月收入超过800元人民币的个人。由于中国绝大多数领取工资薪金的个人月收入低于800元，这个税法明显是针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②见《中国的公共财政》，《中国经济年鉴1988》，第IV部分，第36—37页。

业也实行优惠税率,税率为10%到15%。^①

随着“以税代利”改革措施的实行和增加新税种,税收总额从1984年的947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2041亿元,增加了一倍多。但是,从此以后税收收入停滞不前。在1985—1988年间,税收总额增加到2376亿元,只增长了16.4%,而相同期间的国民收入增加到11533亿元,增长了64%,这意味着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②

税收增长的停滞是由若干因素综合而致,例如税收的普遍撒漏,税收管理的低效率,甚至包括对税务人员的抵制或者暴力抗税等等。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在1987年当局引起了足够的警觉,实行了所谓的“承包管理制”。在这一制度下,一个国营企业交给国家财政的所得税额不得少于一个固定数额,这时适用的税率是通过协商确定的,一般比较低。^③当然这个制度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导致讨价还价和搞小动作,有损于税法的强制性和财政责任。它是科尔奈著名的“预算软约束”理论的例证。^④

中央政府和地方(省和市)政府之间的税收分成也包含有讨价还价和谈判的同样过程的特征。除了较贫穷的省和地区由中央政

①A·Donnithorne,《毛以来的银行和财政变动》,为中国体制改革讨论会提交的论文,1986年3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②1985—1987年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8》,1988年数据见姚依林副总理在1989年3月21日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同一会议上的财政报告以及财政部长王丙乾所作的预算发言。

③见R·Delfs,《财政封建主义》,《远东经济评论》,1989年4月6日,第77—78页。

④见J·Kornai,《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80年,《预算软约束和硬约束》,“Acta Oeconomica”,第25卷第231—246页,1980年。按照科尔奈的理论,有关税收方面“预算软约束”本身表现出下列特征:a.厂商能影响税法的形成;b.企业能以个案处理的形式得到免税或推迟纳税的优惠;c.征税不严肃。

业也实行优惠税率,税率为10%到15%。^①

随着“以税代利”改革措施的实行和增加新税种,税收总额从1984年的947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2041亿元,增加了一倍多。但是,从此以后税收收入停滞不前。在1985—1988年间,税收总额增加到2376亿元,只增长了16.4%,而相同期间的国民收入增加到11533亿元,增长了64%,这意味着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②

税收增长的停滞是由若干因素综合而致,例如税收的普遍撒漏,税收管理的低效率,甚至包括对税务人员的抵制或者暴力抗税等等。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在1987年当局引起了足够的警觉,实行了所谓的“承包管理制”。在这一制度下,一个国营企业交给国家财政的所得税额不得少于一个固定数额,这时适用的税率是通过协商确定的,一般比较低。^③当然这个制度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导致讨价还价和搞小动作,有损于税法的强制性和财政责任。它是科尔奈著名的“预算软约束”理论的例证。^④

中央政府和地方(省和市)政府之间的税收分成也包含有讨价还价和谈判的同样过程的特征。除了较贫穷的省和地区由中央政

①A·Donnithorne,《毛以来的银行和财政变动》,为中国体制改革讨论会提交的论文,1986年3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②1985—1987年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88》,1988年数据见姚依林副总理在1989年3月21日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同一会议上的财政报告以及财政部长王丙乾所作的预算发言。

③见R·Delfs,《财政封建主义》,《远东经济评论》,1989年4月6日,第77—78页。

④见J·Kornai,《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80年,《预算软约束和硬约束》,“Acta Oeconomica”,第25卷第231—246页,1980年。按照科尔奈的理论,有关税收方面“预算软约束”本身表现出下列特征:a.厂商能影响税法的形成;b.企业能以个案处理的形式得到免税或推迟纳税的优惠;c.征税不严肃。

表1: 中国 1978—1989 年的政府收入和支出 (10亿元人民币)

年份	收入	支出	报告的余额	调整后的余额
1978	112.11	111.00	1.01	1.01
1979	110.33	127.39	-17.06	-20.59
1980	108.52	121.27	-12.75	-21.35
1981	108.96	111.50	-2.55	-17.17
1982	112.40	115.33	-2.93	-15.32
1983	124.90	129.25	-4.35	-16.07
1984	150.19	154.64	-4.45	-15.67
1985	186.64	184.48	-2.16	-9.66
1986	226.03	233.08	-7.06	-28.45
1987	236.89	244.85	-7.95	-34.92
1988	258.78	266.83	-8.05	-34.15
1989	291.92	301.46	-9.56	-36.99
1990(估计)	323.65	322.55	-8.89	-42.34

资料来源: 1978—1988 年财政年度见《中国统计年鉴 1988》; 王丙乾在 1990 年 3 月 2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预算报告; R·Delfs, 《财政封建主义》, 《远东经济评论》, 1989 年 4 月 6 日。

26.8%。^①

这种亏损企业补助是“预算软约束”的另一方面的、然而更为严重的表现。

但是预算中列出的收入并不是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 并没有进入国家预算的所谓“预算外资金”由 1978 年 347 亿元增长到 1988

^①王丙乾: “在 1989 年 3 月 21 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关于 1989 年国家预算和 1990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补充报告”。在预算中对亏损企业的补助作为扣减收入处理。因此这项补助加上支出额, 得出所占比重为 26.8%。

年的 2270 亿元。这些资金是由国营企业、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地方当局控制的。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这些资金是如何使用的，但人们相信这些资金是近几年造成经济过热、过度的资本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①

货币制度和政策

前两部分阐述了为纠正过度扭曲的“金融抑制”所做的努力。但是金融深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它的成功更依赖于一个切实可行的货币稳定方案，使经济改革沿着没有通货膨胀的道路前进。

首先我们应该强调人民币是一种根本没有支持的货币。没有法律条款规定纸币发行同贵金属、同政府证券或者同外汇之间的关系。甚至从纯形式的意义上说，人民币也没有规定含金量。人民币也不能自由兑换成任何外国货币，它只能通过中国银行的机构汇入中国，并不在任何国家的外汇市场上交换或报价。总之，人民币是根据政府法令作为法币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没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性制约。但是人民币的这一基本特征并不在改革的议程上。虽然在中国有关金融改革的文献很多，但据我所知中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有主张要改变人民币的不兑现纸币的特征。由于缺乏制度性制约，形成对货币和信贷的宏观控制机制就是极端重要的。

因此货币领域的改革包含：(a) 把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分离出去，建立了中央银行；(b) 用间接手段(用中国人的术语是“经济杠杆”)而不是以前直接的行政手段来控制货币和信贷，保持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c) 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转变成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实体，即“银行企业化”；(d) 使人民币汇率更

^①见 R·Delfs, 《财政封建主义》，《远东经济评论》，1989 年 4 月 6 日，第 77—78 页。

能反映市场变化。

在讨论这些改革措施前,有必要概括地讨论一下1979年前货币政策是如何实行的。遵循苏联模式,同实物的投入—产出计划相对应的有一个金融计划。金融计划由政府预算、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组成。制定和实行后面两个计划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范围。

信贷计划是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具体化。资金来源由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金(即经营利润、预算拨款和流通中货币)、存款和结算过程中的现金组成。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贷款可根据经济部门和贷款的作用进行分类(即分成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每一类贷款再根据贷款用途细分)。原则上说,能得到信贷的只能是由生产计划规定的各个经济部门和企业的筹资活动,并受银行的存款余额限制,当满足规定的条件时,银行应立即给予贷款。实际上,这些指导思想更有利于不守信用者,不利于守信用者。信贷的另一个原则,也是来自于苏联,认为建立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基础上的货币是中性的,既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不会引起通货紧缩。正如每个学货币经济学的学生所知道的,这只是长期以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真实票据教条”的一种表现。

现金计划表现了现金在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部门的计划流入和计划流出。因此现金流入包括零售收入、公共服务费收入、归还贷款、税收收入、储蓄和定期存款、外汇收入等等;现金流出主要包括工资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转移支付、政府征购农产品、政府购买非农产品、政府支出、提取储蓄和定期存款、外汇支出等等。流进和流出之间的差额表示着中国人民银行纸币发行的计划增加或减少。

结算体系贯彻现金计划。在中国的结算体系中禁止使用支票。结算体系分成两种,即“银行转帐结算”和“现金结算”,前者适用于城市企业和政府机构总体,它们之间的结算只能通过银行转帐,从事结算活动的银行体系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另一方面“现金

结算”适用于乡村公社和家庭以及个人。在后一个整体内部以及两个整体之间的结算都要用现金进行。这样的结算体系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只有现金才构成“货币供应”，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货币当局如此重视“货币回笼”，这是由于银行存款可以比较容易地由行政手段加以控制。^①

货币当局也利用简单货币数量论的公式 $MV = PQ$ ，决定流通中货币的净变化。根据极端的假定， PQ 的数额为零售商品总额， V 是根据商品零售总额同基期年份流通中货币平均量的比例计算出来的。这样把估算的计划货币量 M 同上年已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相比，两者间的差额决定了当年流通中现金量的计划增加或减少。^② 注意到不像货币主义者对交换方程的解释，他们把 M 看成

^①关于改革前货币政策更详细的讨论，见 K·H·Hsiao，《共产主义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 4—9 章，1971 年；A·Donnithorne，《中国的经济体制》，第 15 章，伦敦：乔治艾伦和文温，1967 年；关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两个时期，见 C·H·Chai，《中国的货币和银行改革》，《香港经济报告》，第 14 期，第 37—52 页，1981 年；W·A·Byrd，《中国的金融体制：银行作用的变化》，科罗拉多博尔德：西部观点出版社，1983 年；Cheng Hang-sheng，《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1981 年秋季，第 19—36 页；L·De-Wulf, D·Goldsbrough，《中国货币政策作用的演变》，《国际货币基金成员报告》，第 33 卷第 2 期，1986 年 6 月，第 209—242 页；A·Donnithorne，《毛以来的银行和财政变动》，为中国体制改革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1986 年 3 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G·Peebles，《中国的货币管理 1953—1982》，载 C·H·Chai、C·K·Leung 编，《中国的经济改革》，第 503—550 页，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 年。

^②赵海宽，《综合信贷计划》，第 103 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 年；C·H·Chai，“中国的货币和银行改革”，《香港经济报告》，1981 年第 14 期，第 37—52 页；Cheng Hang-sheng，《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1981 年秋季，第 19—36 页。

是外生变量，但是中国人认为 M 是一个由 PQ 和 V 决定的外生变量。甚至存在着这样一种较粗糙的判别标准，认为现金对零售总额的最优比率应在 1:7.5 至 1:9.0 的范围内。^①

从理论上说，只要安排好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就能完全控制货币和信贷。由于下列原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第一，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是独家垄断银行，但它并不是经营活动不受政府干扰、拥有全部金融手段独立的中央银行。它的职责是根据金融计划和实物计划的重点需要完成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就更像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的现金出纳部门。第二，追随苏联模式，国家预算为国营和集体企业进行固定资产和定额流动资产拨款。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只是限制在提供补充的、即用于库存和半成品的所谓超定额流动资金。第三，虽然中国计划者相信企业信贷（即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理论，但是财政性贷款（即信贷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则是通货膨胀性的。当财政赤字需要信贷弥补时，中国人民银行别无选择，只好贷款。^② 而且由于国家是由政府控制的，基本上没有金融纪律和责任心，事实上只要企业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必须给予贷款。第四，在信贷市场上，利率从来没有发挥配置作用。1952 年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以后，1953—1978 年期间利率结构很少变动。借贷利率总的来说不仅仅是低的问题，而且还出现“倒挂”现象，即贷款利

^①见 G·Peebles, 《中国的货币管理 1953—1982》, 载 C·H·Chai、C·K·Leung 编: 《中国的经济改革》, 第 512 页, 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7 年。

^②根据 L·De Wulf, D·Goldsbrough, 《中国货币政策作用的演变》, 《国际货币基金成员报告》, 第 33 卷第 2 期, 1986 年 6 月, 第 209—242 页, 中国在 1950—1978 年间的 29 年中有 10 年用银行信贷弥补财政赤字。

率竟然低于存款利率，影响银行体系的经营能力。^① 再加上财政对固定资产的无偿拨款，毫无疑问带来了过度投资和存货积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低效率。第五，前面提到的现金的内生性也可用下列方程形式表现现金计划：

$$C_u = W + A + T - C - (D_h + B_h)$$

这里 C_u 是流通现金的变动量， A 为国家购买农产品的价值额， W 为工资总额， T 是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净额， C 为家庭消费， D_h 是家庭银行存款， B_h 为家庭持有的政府证券。显然 W 、 A 、 T 是政府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决策变量， C 、 D_h 是家庭的决策变量， B_h 也许可以作为政府和家庭共同决策的变量，这些都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直接控制范围以外。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是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那么它就能利用利率水平来影响 C 和 D_h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在 1984 年前，它连名义上的中央银行都不是。在无论何种场合，利率固定在市场水平以下，当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配给手段）而不是通过利率水平来影响消费。

正是在这样的货币管理背景下，70 年代后期以来的改革可从下列方面予以简要讨论。第一，逐渐实行了把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改革。这一措施首先于 1979 年在小企业试行，并于 1981 年推广到全国的大多数资金状况较好的企业。实行“拨改贷”，原先不付利息也无需偿还的拨款现在则变成了支付利息又要偿还的银行贷款。这一方案开始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实行，后来扩展到技术革新和改造活动。同时，以前银行只对那些实行“经济核算”企业的超定额流动资金部分进行贷款的限制也放松了。这一变动的规模可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在 1981 年政府拨款和银行

^①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 6 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利率表也可参见 W·A·Byrd，《中国的金融体制，银行作用的变化》，科罗拉多博尔德：西部观点，第 151—152 页，1983 年。

款贷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 28.1% 和 12.7%，到 1987 年相应的比例则分别为 13.1% 和 23.0%。^① 起初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只能通过人民建设银行。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把非中央银行职能分离出来以后，决定人民建设银行集中于对大中型投资项目的筹资，小规模的投资项目由工商银行负责。

第二，银行在借贷决策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企业原则上不再自动取得贷款，必须通过信誉方面的检查。贷款项目的可行性和赢利能力必须得到银行的认可。

第三，中国人民银行在 1984 年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逐渐形成了市场取向的货币控制手段。在中央银行三个主要的传统手段方面，即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准备金条件。其中第一个手段可以存而不论，这是由于中国目前缺乏广泛的、富有生气和弹性的政府证券市场，公开市场业务并不可行，因此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在其他两个手段方面。首先在 1984 年建立了准备金条件，根据不同种类的存款，准备金率规定在 20%—40% 的幅度内；但在 1985 年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统一规定为 10%。1987 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准备金率提高到 12%。准备金条件的另一形式是 1987 年对乡村信用合作社实行的固定金额为 50 亿人民币的“特种存款”。这种存款支付利率，在 1987 年年利率固定在 7.92%。必须注意所需的准备金也有利息，其利率水平低于“特种存款”和其他普通存款。1986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借款给其他专业银行实行贴现率。目前，这样的借款采取年度、临时、日常和“贴现窗口”预付款等形式。大多数预付款用于季节性的或临时性的目的，比如用于农业征购和出口，它们也是无担保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目的是把所有这些借款最终全部变成“贴现窗口工具”。^②

^①《中国统计年鉴 1988》，第 493 页。资金的其他部分来自自筹资金（即预算外资金）和外国投资。

^②《中国金融 1988》，第 137—139 页；《中国银行的特殊补充》，《明报》，香港 1988 年 7 月 18 日。

第四,利率水平更经常地向上调整,虽然这种调整还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的。表2和表3分别标明了1978—1988年间利率水平的调整和1985—1988年间的中央银行利息率。它们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十分复杂的利率表的简化形式。例如,表2中的借款利率在一定幅度内变动,这是因为银行根据不同的借款者和用途实行差别利率。国营和集体企业同个体企业相比,借款利率较低;某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如农业、能源、交通和国防工业可得到优惠利率。一个新生事物是在1988年9月开始实行对3年及3年以上储蓄存款与零售物价指数挂钩的利率补贴。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①表3显示了各银行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普通存款的利率、乡村信用合作社的特种存款利率以及给银行预付款和再贴现的利息费用。1989年2月又宣布大大提高利率水平,存款利率平均提高3个百分点,借款利率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②

利率改革的其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利率“倒挂”,即某些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利率低于储蓄存款的利率是一个老问题。据说这一问题经过1985年8月的利率调整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③其次,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有权对它们的利率在一定幅度上进行调整。因此非银行中介机构如投资信托公司、

^①可用下例阐述:假定一个存款者在1988年10月10日存了期限为3年的存款100元,年利率为9.72%。在这8年中,如果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52.4%,这样需付给存款者152.4元的人民币,正好避免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即保持实际利率为零。但是,它的名义本金加利息(不可计复利)只有129.16元。在这种情况下,存款者可得到23.24元的人民币补贴。

^②《南方日报》,1989年1月22日。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没有公布最近一次详细的利率表。

^③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170—17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表2: 中国1979—1988利率的调整 (每年百分数)

	1979年4月	1980年4月	1982年4月	1985年4月	1985年8月	1988年9月
存款利率						
活期储蓄	2.16	2.88	2.88	2.88	2.88	2.88
定期储蓄						
6个月	3.60	4.32	4.32	5.40	6.12	6.48
1年	3.96	5.40	5.76	6.84	7.20	8.64
2年	—	—	—	—	—	9.18
3年	4.50	6.12	6.84	7.92	8.28	9.72
5年	5.04	6.84	7.92	8.28	9.36	10.80
8年	—	—	9.00	9.00	10.44	12.42
其他定期存款						
1年	3.60	4.32	4.68	5.40	6.12	7.20
3年	3.96	5.40	6.12	6.84	7.20	8.64
5年	4.50	6.12	7.20	7.56	7.92	9.72
借款利率						
流动资金	4.32—5.04	4.32—5.04	4.32—7.20	4.32—11.52	4.32—11.52	9.0
固定资金	—	3.00—5.04	3.00—6.48	5.01—6.48	7.92—10.80	9.0—16.02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处 (1988)

表3：中国1985—1988中央银行利率（每年百分数）

	1985年1月	1986年8月	1987年9月	1987年12月	1988年9月
银行存款					
准备金存款	4.32	4.32	4.32	5.04	5.04
普通存款	4.32	5.76	5.76	5.76	6.48
乡村信用合作社特种存款	—	—	7.92	7.92	9.00
对银行预付					
年度预付	4.68	4.68	7.20	7.20	8.28
季度预付	5.04	6.84	7.20	6.84	7.56
日预付	5.04	6.48	7.20	6.48	6.84
再贴现	—	比以上 低0.3点	比以上低 5—10%	比以上低 5—10%	浮动 同以上对 应部分上 浮5—10% 或下浮 5—10%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处（1988）

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乡村信用合作社才能够把它们的存、贷款利率相对于专业银行公布的利率向上或向下浮动20%。专业银行本身对流动资金的贷款利率能相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利率浮动20%。^①

第五，汇率也调整得更频繁了。1979年前人民币对外确定的币值总是高估了。根据一项官方报告，1964年出口1个美元产品的平均成本为6.5元人民币，但是当时的汇率则是1美元=2.4618

^①《中国金融年鉴1988》，第118—120页。

元人民币。^① 在1973年1月至1979年4月间,由于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2.2174元人民币提高到1美元=1.555元人民币。这种不切实际的汇率不仅影响了出口,而且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和对外贸企业的补贴。因此,1979年以来,人民币不断贬值,以纠正以前的扭曲现象。到1989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到1美元=4.7339元人民币。1981年中国试行“汇率双轨制”,在这一体制中“内部结算汇率”固定在1美元=2.8元人民币,用以进出口方面的外汇结算,而同年官方的平均汇率为1美元=1.7045元人民币。这一体制证明是不成功的,并于1985年1月1日起取消。相应的于1985年11月,在深圳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以便企业(个人不包括在内)能相互买卖外汇。后来像上海、广州、厦门、珠海这些主要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中心。由于交易仍由货币当局以“指导汇率”的方式管制着,因此这样的中心并不就是外汇市场。^② 考虑到汇率较有弹性,可把这样的中心看成是处于官方汇率控制和企业间黑市交易市场之间的过渡形式。在同一年中国的外汇存款帐户更自由了,容许存款者取出部分外汇现金。1987年年底外汇存款帐户户头增加到100万以上。^③

金融领域这些改革措施的效应是什么? 如果像经济学家所一致同意的那样,把稳定价格看作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货币改革的纪录明显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更是如此。正如官方的零售物价总指数表明的,通货膨胀率由一位数急剧上升到1988年的18.5%。然而正如人所共知的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由于“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官方的价格指数低估

^① 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组:《金融改革和宏观管理》,第23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② 在1989年3月厦门的指导性汇率是1美元=6.8元人民币,而官方汇率为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见《亚洲展望》,1989年5月,第24—26页。

^③ 《中国金融年鉴1988》,第185页。

了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

N·R·陈和 C·M·侯在 1986 年采用了把公开的通货膨胀加上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方法,来计算 1979—1983 年期间中国总的通货膨胀率。^①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方法也是利用了熟知的数量方程 $MV = PT$, M 为流通中的货币量, P 为价格总水平, T 为零售产品量,因此 PT 是零售总额。假定流通速度 V 近似于一个常数,这就很容易地看出通货膨胀率 \dot{P}/P 为货币增长率 \dot{M}/M 和零售增长率 \dot{T}/T 之间的差额。

表 4 列出了中国 1979—1988 年期间的通货膨胀指数。其中 1979—1983 年期间的数据来源于陈、侯的文章, 1984—1988 年期间的数据是用表 4 注释中的方法取得的。这种方法之所以可行是由于现金依然是主要的支付手段, 以及存在着使货币周转速度稳定的抵消因素。从表中可见,把抑制性通货膨胀考虑进来后,总的通货膨胀率比零售物价总指数要高得多。在表中零售物价总指数相当于公开的通货膨胀。1985 年是个唯一的例外,那年抑制性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 -2.2% 。^②除这一点以外,10 年改革中就有 4 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就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官方统计资料显示 1989 年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到 17.8% 。^③

加速的通货膨胀成因是什么? 一种观念是把通货膨胀归咎于价格改革。例如 1978 年至 1985 年间,国家对农产品的征购价格

①见 N·R·Chen、C·M·Hou, 《大陆中国的通货膨胀: 测算和分析》, 《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 34 卷, 1986 年 7 月, 第 811—835 页。

②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货币量的急剧紧缩以及 1985 年比较成功的价格改革。

③国家统计局, 《198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民日报》, 1990 年 2 月 21 日。

4: 中国1979—1988通货膨胀指数 (每年变动%)

年份	流通中 货币量	当期价格 零售量	不变价格 零售量	零售物价 总指数	总通货 膨胀率	公开通货 膨胀率	抑制性通 货膨胀率
	(1)	(2)	(3)	(4)	(5)	(6)	(7)
1979	19.1	16.2	13.7	2.0	4.7	2.0	2.7
1980	22.2	19.3	12.6	6.0	8.5	6.0	2.5
1981	21.0	10.4	7.8	2.4	12.2	2.4	9.8
1982	13.6	9.4	7.3	1.9	5.9	1.9	4.0
1983	19.7	10.9	9.2	1.5	9.6	1.5	8.1
1984	49.5	18.5	15.3	2.8	29.7	2.8	26.9
1985	24.7	27.5	17.2	8.8	6.4	8.8	-2.4
1986	23.3	15.0	8.5	6.0	13.6	6.0	7.6
1987	19.4	17.6	9.6	7.3	8.9	7.3	1.6
1988	46.7	27.8	7.9	18.5	36.0	18.5	17.5

来源: 1979—1983, 陈和侯 1986 年的文章; 1984—1988, 《中国统计年鉴 1988》、国家统计局, 《1988 年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金融 1988》。每列数字均是年变化百分数。第 (3) 列是利用第 (4) 列的资料从第 (2) 列中推算出来的。第 (6) 列假定同第 (4) 列相等。第 (5) 列是把第 (3) 列和第 (1) 列的数据折算成关联指数后, 用第 (3) 列除以第 (1) 列得到的。第 (7) 列是第 (5) 列与第 (6) 列之间的差额。

提高了 66.8%, 或者每年提高 7.6%。^① 1979 年至 1986 年间, 三种主要生产资料煤、铁、钢的计划价格分别提高了 30%、30% 和 20%。即便如此, 这种观点经不起仔细推敲。第一, 如果价格改革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 那么就不应该存在任何抑制性的通货膨胀。表 4 中显示的并不是这种情形。第二, 如果价格改革是彻底的、成功的话, 那么价格结构中的扭曲现象就不复存在。经过初始

^① 见张卓元等: 《中国价格结构研究》, 第 15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的通货膨胀后,通货膨胀率应该逐渐下降。事实上价格改革既不彻底也不成功。简要地说,在中国有三种价格。^①第一种是计划价格,它由政府决定。虽然计划价现在不像1978年前那样普遍,但它依然很重要。第二种是浮动价格,它能在预先规定好的某种幅度内变动。第三种是集市价格,大部分不由国家征购的农副产品实行集市价格,主要由供应和需求力量决定。这三类价格比例变动见表5。

表5: 三种价格的产品百分数

	1978		1987 (第一季度)	
	计划价	浮动价 和自由价	计划价	浮动价 和自由价
农业,	92	8	35	65
工业,				
消费品	97	3	42	58
生产资料	接近100	接近0	40	60

来源:《解放日报》,1987年6月3日。

但是在1988年9月,由于人们预期价格进一步上涨出现了抢提银行存款和抢购风潮,政府突然命令停止实行价格改革。

许多经济学家把恶化的通货膨胀归咎于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和国内信贷的失控,这也是很自然的。正如表6所显示的,货币总

^①另有一种价格称之为“议价”。那些并不重要的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议价介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见陈、侯1986年的文章,第816页。关于工业价格的讨论,另请见W·A·Byrd,《中国工业中计划、市场双轨价格制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1卷,第295—308页,1987年;C·H·Chai、C·K·Leung编,《中国的经济改革》,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张卓元等,《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量和国内信贷的年度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中实际产出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不能否认在货币和信贷供应的超量增长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但是人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经过近来的改革,中国的宏观控制机制会失效呢?①

基本的答案只能在货币政策运行的制度框架中寻找。第一,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起名义上成了中央银行,但从不受政治干预和压力独立地决定货币基础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个独立的实体。当然中国人民银行也许不再仅仅是财政部或国家计划委

①关于中国的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有许多的实证文献。邹至庄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货币和价格水平决定》一文,(载《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1卷,第319—333页)中运用简单货币数量理论公式解释价格变动,认为模型用中国1951至1981年的数据要比用美国1922—1953年的数据质量要更好些。但是该模型内含假定货币供应是外生变量。G·皮珀尔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货币管理1953—1982》中认为,中国计划者用提高价格水平的办法抵消过度的货币余额,目的是使公众的货币积累保持所期望的比例。但是,为什么是意愿的货币积累率而不是价格稳定成为决策者的目标函数,关于这一点该文没有解释。弗尔坦士丁和法哈丁在1987年的《集中计划 经济中的财政政策、货币目标和价格水平:在中国案例中的运用》一文中(载《货币信贷和银行杂志》第9卷,第2期,1987年5月第137—156页),构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和实际余额需求方程,认为在1954—1983年间实际通货膨胀率是官方公布通货膨胀率的2.5倍。中国经济学家也开始估计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函数。见《预测货币需求的几个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8月20日,第11—19页;黄旭:《我国货币供求与价格水平决定》,《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第35—45页;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组:《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关于最近的研究,参阅Tsang Shu-Ki,《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经济的货币控制问题:中国的案例》,香港浸礼会学院商学院研究报告CS89001,1989年和《货币数量论同中国有关吗?》香港浸礼会学院商学院研究报告,CS89002,1989年。

表6: 货币总量和国内信贷年增长率 (每年百分数)

年份	M ₀	M ₁	M ₂	DC
1979	19.1	29.8	19.2	14.9
1980	22.2	35.9	25.5	22.4
1981	21.0	23.4	22.1	13.8
1982	13.6	21.2	16.0	14.3
1983	19.7	27.6	18.7	13.7
1984	49.5	36.8	34.2	36.0
1985	24.7	34.2	20.7	22.3
1986	23.3	32.4	26.3	29.6
1987	19.4	31.0	22.8	21.1
1988	46.7	31.1	26.9	17.1
平均	25.9	30.3	23.2	20.5

注释: M₀ = 流通中的现金

M₁ = M₀ + 家庭储蓄存款

M₂ = M₁ + 其他存款

DC = 国内信贷 (对中央政府和企业的索款权)

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1988》, 《中国金融》1989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关于1988年货币发行的报告, 1989年3月23日。

员会的会计或现金出纳者,但它基本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财政。因此,根据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最新的研究,财政赤字经常性地大量地是通过由中国人民银行预付形成的。而且财政部也从未承认这些预付债务以后是要偿还的。^①正如表1所示,自1979年以后,中国每年都有财政赤字。结果中国人民银行对财政部的累计支付从1979年的90亿元人民币急剧膨胀到1988年的576.5亿元人民币。^②当

^①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143—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见表4的来源。

然,弥补财政赤字的另一种办法就是简单地多发行货币,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财政发行”。货币性贷款是弥补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的大多数形式,这同时也说明在中国货币供应并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的。^① 国务院最终意识到这样弥补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于1988年明确禁止用创造货币的手段弥补财政赤字。^②

国家预算具有“约束软化”的特征。国家必须负责所有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包括银行),而不管它们的效率和状况如何。由于价格并不是市场清场价格,因此正如上节指出的那样,政府预算必须承担大量的价格补贴。

其他专业银行的处境并不比中国人民银行更好。虽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这些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而实际上这一点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因此,根据官方报道,要求银行上交财政部的利润比例不断提高,1980年前上交比例为20%,就在利改税改革前夕的1984年上交比例为80%。我们对改革以后银行的情况并不清楚。而且,正如已在前面指出的那样,财政部从不偿还来自银行系统的预付款项,这样一来并不像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对政权款项的索取权这一资财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最终的结果是银行体系基础薄弱,这当然影响着他们的独立性。再说50年代以来银行系统必须周期性注销那些积压下来、收不回来的贷款。^③ 最后一点但并不是微不足道的,银行经常受到部和地方

^①货币供应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是理论上、实证分析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关于最近的研究,见饶余庆:《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外生性问题:对货币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争论的评论》,《东正教经济评论》,第11卷第2期,第203—204页,1989年。

^②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发言人透露的,引自《中国银行的特殊补充》,《明报》,香港,1988年7月18日。

^③见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第9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X·Zhou、L·Zhu:《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地位和改革前景》,《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1卷第399—409页,1987年。

当局的政治干预和压力,结果是银行事实上要“奉命贷款”给那些拥有强大政治权力的客户。^①

企业本身是“预算约束软化”的另一个方面。由于企业是国家拥有的,并不存在破产法,不管经营状况如何,它们总能由国家包下来存在下去,特别是那些具有强有力政治保护的企业更是如此。确实“利改税”方案提高了留用利润的比例,但留用的利润并没有高到足以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实体。相似地用银行贷款代替财政拨款也没有能硬化预算约束,因为企业清楚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它们事实上能够拒还银行贷款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企业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具有的财务纪律和责任心意识,是毫不奇怪的。它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以此争取更多的国家分配和补助。^②这个体制也出现了贷款和税收的“替换关系”,即所谓的“税前还贷”,这就意味着企业可以同有关行政当局讨价还价,要它们归还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是相应减少应该缴纳的税款。^③但在同时,不合理的、非市场清场的价格体系造成许多企业不断亏损,使它们无力对市场供求作出反应。

虽然在过去10年里利率水平作出较频繁的调整,但仍然大大滞后于通货膨胀,结果是负的实际利率仍然相当普遍。1988年9月起对3年以及3年以上的储蓄存款实行的利息补贴方案,并没有对这类存款的增长起到应有的刺激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方案不像完全的指数化方案,仅仅保证存款者的实际利率不为负数,但不能保证存款者取得正的实际利率。换言之,这一方案充其量只能使存款者得到的实际利率为零。但是,由于该方案依据的是官

^①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组,《金融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82页,1988年。

^②见前注第183页。

^③见前注第185—186页。

方公布的价格指数,广泛认为这一指数有低估价格指数的偏向,这样该方案能否保持零的实际利率也值得怀疑。确实在1989年的上半年,政策决定者和经济学家经历了所谓的“资金体外循环”的现象。^①这就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货币存入银行体系,愿意在手头持有大量现金从事交易活动。

货币政策没有能制止通货膨胀可用图2来说明。我们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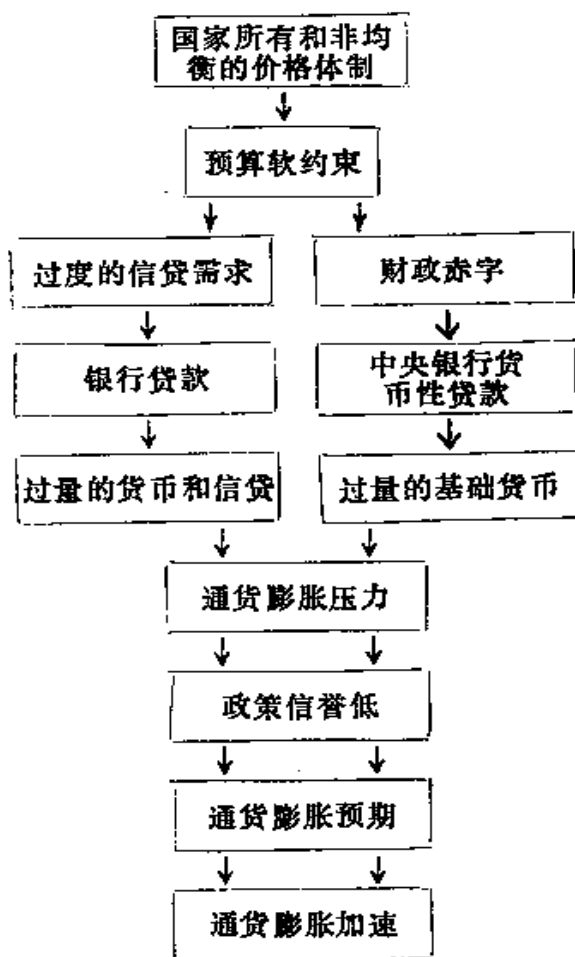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通货膨胀过程

^①见《金融时报》，1989年2月25日开始的关于“资金体外循环”的座谈会。

“预算约束软化”是集中计划经济所特有的，它是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普遍计划的、因而呈现非均衡状态的价格体制不可避免的结果。“约束软化”反过来导致长期的财政赤字和过度的信贷需求，这两者又要银行体系被动地加以弥补。这样过度的货币和信贷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货币当局无力控制的。政策信誉低反过来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加速的通货膨胀。

意识到国家所有制也许是中国灾难的根本原因，使得中国经济学家近几年提倡改革所有制。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从扩大“责任制”、到国营企业“股份化”（即把它们变成合股公司）到极端的私有化。^①也广泛存在这样的共识，认为不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就不可能实行所有制改革。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和股票交易法构成这一法律框架的若干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并不彻底的汇率体制改革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较频繁地调整利率和建立外汇调剂中心没有消灭黑市市场。从表7可见，从1989年12月最近一次贬值以后6个月，调剂中心和黑市市场上对美元和港元的汇率要比官方汇率分别高23%和27%。

表7：经济特区的人民币汇率（1990年6月4—30日）

官方汇率	调剂中心汇率	黑市市场汇率
1美元 = 4.71元人民币	1美元 = 5.78~5.82 元人民币	100港元 = 75.6~77 元人民币
100港元 = 60.33元人民币		

来源：《香港经济时报》。

^①见厉以宁：《经济改革探索》，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于光远：《对企业所有制发展前途的思考》，《经济研究》，第17—30页，1988年6月20日。S·N·S·Cheung：《私有化与特殊利益：中国经济改革经历》，《香港经济报告》，第19期第1—8页，1989年；《所有制——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金融研究》，第23—24页，1989年1月。

1988年9月，由于担心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加剧，中国政府进行治理整顿，压缩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实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治理整顿的一部分，推迟了价格改革和其他金融改革。那时认为推迟改革措施，仅仅是暂时的：一旦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就将继续全力进行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

最近几个月，政府当局宣布作为治理整顿的结果，从1989年第三季度起，通货膨胀率大大降低。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1989年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了17.8%，略低于1988年上升18.5%的水平。1990年头五个月，用35个城市生活费用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1%，而上年同期则为26%。^①

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是否表明治理整顿是有效的？是否也意味着中国最终找到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合适的宏观经济控制机制？再者，通货膨胀率下降是否否定了本文关于中国普遍存在着“预算约束软化”的现象？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意识到在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以官方价格指数衡量的“公开性通货膨胀”，即使接受这个表面性的衡量意义也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包含总的通货膨胀的其他部分即“抑制性的通货膨胀”部分。但是，在写作本文时，还没有表4所需的1989—1990年的最新数据，因此我们无法肯定总的通货膨胀率是否真正地大幅度地下降了。

第二，通货膨胀的明显缓解大部分是通过强制性地控制工资和价格取得的。正如前面所述，这一政策意味着实际上放弃价格改革和其他的相关改革。它在一个时期能抑制通货膨胀，但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扭曲这个通货膨胀的根本性原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①这些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转引自中国新闻社，1990年6月20日。

章,这样评论政府的政策,①

“治理整顿本身,单靠强化行政性措施是不行的。比如用政府补贴的办法限制物价,可以收到物价稳定一时的效果,但是这会加大财政赤字,不利于总量平衡;又会加深价格的扭曲,不利于结构调整。这种单纯行政办法显然难以持久,其结果也有悖于治理整顿的初衷。……治理整顿进行到目前,已取得的成就主要还是浅层次的,如群众对于物价暴涨预期的缓和,等等,而深层次的问题,诸如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效益下降等等,尚未根本扭转。”

相似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在宣布政府计划在1990年发行403亿元人民币的债券时指出“要努力减少行政性分配,改进发行债券的方式”。②

第三,甚至通货膨胀的表面缓解也是以巨大的代价取得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急剧下降至1989年的3.9%。在正常情况下,抑制经济过热需要放慢增长速度。但在中国的情况下,它伴随着许多副作用。虽然从1990年3月起工业生产有回升的迹象,头5个月的工业产出同一年前相比增长了1.4%,实际上1990年初期的工业生产同去年比是下降了。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失业率大增。中国只提供了有关城市失业率的统计资料,1989年提高到2.7% (或者300万失业人口),而在1984—1988年间,失业率不到2%。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援引劳动部部长阮崇武的话,“如果没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共同的自觉努力”,失业率会超过4%。③

最后,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对失业率提高和市场零售疲软、工业生产下降引起了警觉,开始放松信贷控制。从1990年3月开始,

①刘国光,《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关系的若干思考》,《人民日报》,1990年2月2日。

②中国新闻社报道,转引自《香港经济时报》,1990年6月8日。

③《中国日报》,1990年5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下降了1.26个百分点,增加了计划内信贷分配和流动资金预付款,重新调整了短期信贷计划,并恢复为大规模投资项目包括高科技工程筹资。^①在目前的情况下,也许适度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但这也需要谨慎地同紧缩性财政政策相结合,避免通货膨胀失控。但是持续不断的巨额财政赤字使人担忧放松银根会再次触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刚才引用的刘国光的同一篇文章中,刘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之处:

“4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轨,老是大起大落,近几年又犯了这个毛病,以至需要花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治理。为什么老犯这个毛病,甚至在进行了几年改革之后,仍然摆脱不了,其原因何在?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条病因:一是政策失误,二是机制缺陷。”

结 论

从1978—1979年开始的金融改革有三大目标:纠正以前30年的过度的“金融抑制”,结束中国金融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转变宏观控制机制,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保证经济沿着没有通货膨胀的轨道增长。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1989年前在第一、第二个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1979年以前长期禁止的许多机构、市场和手段得以恢复和建立。以前单一的银行体系现在变成由正式的中央银行指导下的更合理、更多样化的银行结构体系。中国试图重新进入世界金融体系也逐渐成功地得到实现。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公开的国际团体内恢复了成员国位置,

^①见《人民银行采取10大稳定措施增加生产和销售》,《金融时报》,1990年6月9日。

同所有重要国家的金融机构重建了工作联系。中国在香港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迅速扩展更是惊人。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两大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其较大部分应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在1978年中国的金融抑制和自我封闭是极其严重的。

但是即使在1989年前，中国在第三大目标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80年代后期，无论是财政赤字还是货币供应都失去控制，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这方面的问题不能单纯归之于政策失误。相反，它同集中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关，即同国家所有制和失衡的价格体系有关。换句话说，没有在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方面的相应成功，金融改革自身不可能取得进展。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新加坡 黄朝翰

译者按：在1976年以前，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内向型的。1977年中国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人们把中国当成一个广大而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市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前沿。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开放，实行了许多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不大。

黄朝翰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不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而应该从特定的地区来分析。从亚太地区来分析，亚太邻国和地区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开放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质上看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是互补性的。从总体上看，拥有众多人口和多种资源的中国卷入亚太经济区，可以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增长潜力，极有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和资源流动的总体格局。

作者黄朝翰 (John Wong)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该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大学博士。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论述中国经济和亚太经济区的关系和发展前景，在海内外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对我国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调整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实际意义。本文译自英文版《世界经济》1988年第3期^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的中国领导层立即把经济转向苏联体系,同苏联的贸易占50年代中期中国贸易总额的8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很少有余地同西方经济或亚太地区的邻国经济发生联系。

50年代后期,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争论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脱离苏联集团,但整个中国对外部的影响,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国家而言,仍然是很小的。只有实行开放和无意识形态色彩的贸易体系的香港和新加坡,才不顾冷战的影响,不断设法保持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其他亚太地区同中国只有极有限的商业联系,或者干脆禁止同中国的任何经济交往。

部分地由于中国的规模,部分地也由于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当时的中国经济从根本性质上说,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大国经济更倾向于自我发展,较少地卷入世界经济。而且集中计划体制具有自给自足、闭关锁国(或者如毛泽东称之为“自力更生”)的特征,进一步使中国同世界经济隔绝。结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大国。她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始终低于1%,是亚太地区中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

随着7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缓和,中国经济开始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1977年中国首次宣布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人们把中国当成一个广大而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市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增长

^①John Wong,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The World Economy*, Vol.11 No.3 pp.327-354, September 1988.

的新前沿。

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开放,政府实行了许多有深远意义的经济和制度改革。1977年以后中国的外部经济联系大大扩展,例如,中国的外贸10年间增加了3倍,产品和劳务出口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加到10%。但是,苏醒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实际影响仍然不大。中国的外贸周转额仍然不如南朝鲜,仅比香港略大一些。对世界许多贸易集团来说,所谓“中国市场”依然是微不足道的。

从根本上说,用这种方法看待中国经济是很不现实的。开放的、外向型的中国对外部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不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去衡量,而应该从特定的地区来分析。显然,直到进入21世纪前,中国经济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重大的影响。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我们必须记住,日本明治维新后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才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巨人。

同时,亚太地区邻国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开放经济的影响。这些影响本质上看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是互补性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将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即使没有中国,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活跃的一部分。拥有众多人口和广泛的自然资源基础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卷入亚太经济区,可以从总体上提高该地区的增长潜力。这些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因素,极有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和资源流动的总格局。正是在亚太地区,我们才能看清楚最近中国经济政策变动的直接影响和具有的充分意义。

一个逐渐一体化的活跃经济区

按照一般的概念,亚太地区由四大块组成:日本、中国、东亚新

兴工业化国家^①或地区即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四大块都在太平洋的西边。虽然这四大块各自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它们在生产方面却都有相互影响的能力。

我们首先从分析日本开始。日本明显地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超级大国。事实上,如果以重新估价的日元作计算基础,它目前的人均收入已高于美国。已经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唯有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1985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是11300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的30倍还多,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数的3倍,10倍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平均数)。日本是亚太地区天然的不可争辩的经济领导者。

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奇迹般的经济恢复和扩展是世人皆知的。可以这样说,日本过去非凡的经济成功是国内经济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高生产率)同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就这样,日本能够长时期保持以其他先进国家平均数的2倍的增长率发展着。而原先那些曾经有过高经济增长率实绩的国家如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早已衰退了。这说明日本经济必然是在某些支持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结构中发展的,而这些力量将继续支持它的经济高增长,使得日本经济对其他亚太地区的经济产生“动态”的影响。

过去的20年,日本通过增加贸易和对外投资,始终不断地扩大它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后日本经济卷入该地区将会更加广泛、更为明显。由于日本能为亚太地区不断提供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因而活跃的日本经济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因

^①新兴工业化国家,英文原文为“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意指已在工业化进程中但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译注

素。确实地,最近的国际宏观经济的变动、日元的升值以及日本贸易盈余的扩大,加速了这些趋势。

正如日本在亚太地区引人注目是由于它的经济上的杰出成就,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同其他国家相比,其鲜明的差别是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国公开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行中央计划。这就把中国同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区别开来。然而,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差别要小得多,这是因为除日本以外,它们都是追求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近几年,中国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期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更为迅速的进展。因此,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这就有助于中国经济和这一地区的发展进一步结合起来。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构成了亚太地区的第三块。它们是亚太地区最活跃的部分,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它们几乎一直保持接近两位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见表 1)。一般说来,它们的土地和资源极为贫乏。作为城市国家或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除开它们的地理位置以外,谈不上拥有什么自然资源。对南朝鲜和台湾而言,它们说得上的资源基础也许要算它们发达的农业部分了,这在工业起飞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像日本那样,经济发展并没有因为自然资源缺乏而受到阻碍。相反,它们通过培养高技术、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纪律,强化了它们的人力资源,成功地克服了自然资源的制约因素。人们认为,这些东亚国家的孔夫子主流文化传统,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很有点类似于耶稣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

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过去 20 年持续的经济增长,现在明显地在发展中国家处在高于中等收入的水平。新加坡和香港人均收入大约 7500 美元,高于欧洲共同体的西班牙、爱尔兰和

表1: 亚太地区的经济潜力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1985 (百万)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1985 (美元)	国内生产 总值1985 (百万 美元)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制造业人 均附加值 1985 (美元)	贸易总额 1986 (10亿 美元)	年增长率 1980—85 (%)				
			1985	1980—1985	1985	1986			1987	出口	进口		
中国	9561	1040	310	265530	6.4	9.8	12.3	9.3	9.4	140	73.5	8.8	17.6
日本	372	120	11800	1327900	6.3	3.8	4.5	2.5	3.9	3440	338.4	7.3	2.4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南朝鲜	93	41	2150	86180	9.5	7.9	5.2	12.5	12.8	70	75.3	13.0	9.8
台湾	36	19	2868	59200	9.6	6.5	4.6	9.6	10.8	1230	64.2	19.4	17.7
香港	1	5.4	6230	30730	8.5	5.9	0.9	8.5	14.0	1290	70.8	9.4	7.7
新加坡 ^①	1	2.6	7420	17470	10.2	6.5	-1.8	1.9	8.4	1540	48.1	5.9	4.2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印度尼西亚	1919	162	530	36470	7.9	3.5	1.0	1.3	3.8	80	25.5	1	4.9
马来西亚	330	16	2000	31270	7.3	5.5	-1.0	0.5	3.1	450	24.7	10.7	6.4
菲律宾	300	55	580	32590	5.9	-0.5	-4.0	0.2	4.8	160	10.2	-2.1	-5.9
泰国	514	52	800	8240	7.4	5.1	4.2	3.8	6.1	170	18.0	8.4	2.8
文莱	6	0.2	21000	na	na	na	na	na	2.0	na	na	na	na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7》(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准备1987);《亚洲年鉴1987》(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87);《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6》,台北,《贸易统计指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1987年编。

^①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

意大利三个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即将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而且,由于这四个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依赖于出口扩张,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1964年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和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6%,但到1983年增加到5.30%。事实上,它们出口的加工制造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60%左右。换个不同的说法,这四小经济1983年出口的加工制造品是美国出口的加工制造品的52%,或10倍于印度同类产品的出口额。^①

该地区的第四大块由东南亚国家联盟组成。新加坡事实上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尽管从地理上或历史上看,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经济上和社会方面看,它更接近于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人均收入高,经济和社会结构相似,等等。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长期以来以年增长率6%左右的速度发展着,这从世界发展的标准来看是不低的。同新兴工业化的国家相反,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有着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如橡胶、锡、棕榈油、椰子产品、蔗糖、大米、石油和天然气等。这些初级产品的不断出口,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来源。^②由于世界产品市场长期不景气,最近几年它们的经济增长骤减。毫无疑问一旦国际产品市场恢复景气,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将会重新取得增长的势头。

当这四大块结合在一起,亚太地区显然就形成了一个在人口、自然资源和市场潜力诸方面都不可战胜的经济共同体。它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要素,即资本、劳动、技术和原材料,正如图4所

^①更具体的请参阅黄朝翰:《走向2000年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和调整》,为1986年11月12—15日在北京召开的“走向2000年的亚太经济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即将由吉隆坡亚太经济发展中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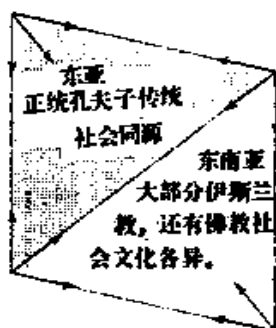
^②关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经济结构的详细讨论,参阅黄朝翰:《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的前景》(伦敦,麦克米兰,1979)。

中国

- 一个拥有潜力的大国 面积950万平方公里, 或是该地区其余部分的2.5倍)
- 10亿人口(该地区其余部分的2倍)
- 人均收入310美元(可能低估)
- 1980-1985年年均增长率9.8%
- 贸易总额700亿美元
- 原书如此——译者注

日本

- 唯一不是西方的发达国家
- 1.2亿人口
- 人均收入11300美元(由于日元升值现在高于这个数字)
- 1980-1985年年均增长率3.6%
- 贸易总额308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8%)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 由四个规模小、缺乏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单位组成
- 6800万人口
- 人均收入4700美元
- 以加工出口为基础的特别活跃的经济
- 1965-1980年年均增长率9.5%, 1980-1985年为8.7%
- 贸易总额2200亿美元
- 加工业日益资本密集化

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自然资源丰富
- 2.85亿人口
- 人均收入大约1000美元(不包括新加坡和文莱)
- 可观的年均增长率, 1962-1980年为7.2%, 1980-1985年减慢为3.4%(由于世界产品市场萧条)
- 新加坡是东盟成员, 但这里把它算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

图4 亚太地区四大块

(除注明外, 其余为1895年数据)

表示的那样。从结构层上说,包括中国、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在内的东亚,具有社会传统相同的优势。但是,东南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能以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抵消社会和文化相异这个内在的不利条件。

更有意义的是,亚太地区由于它内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差异,已经以高水平的地区内贸易形式,发展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联系。以1984年这四大块出口给本地区占各自出口总额的比重为例,中国出口给亚太地区的占56%,日本为20%,新兴工业化国家为30%,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占48%。与此同时,中国从本地区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日本为23%,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0%,东南亚国家联盟为44%。^①随着近来的日元不断升值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极有可能亚太地区内的外贸联系的整体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这就表明亚太地区不同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很高程度的经济互补性。有着自然资源基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肯定能弥补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这两者也能补充高度发达的日本经济。中国的巨大潜力,将会给其他三大块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分析的角度看,亚太地区内同国际比较优势相联系的活跃因素,将使该地区四大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这是由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正巧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工业国,战后经济恢复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品。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日本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给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自己从事更复杂的资本密集型的活动。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则刚刚开始自己的工业

^①数字是用《外贸统计指南》(国际货币基金,华盛顿)、1985年年鉴以及《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6年》(台北)提供的资料计算的。

化建设。从整个亚太地区的工业化过程看，日本大大领先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后者领先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到了70年代后期，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类、塑料制品和某些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出口方面超过了日本，成了重要的出口者。由于后来者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利用丰富的低廉劳动费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重新部署经济结构，把重点转向增值额更大、资本更密集的产品上去，以应付更加剧烈的国际竞争。现在，它们继续处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个过程有不同的名称，新加坡称之为“二次产业革命”，南朝鲜称之为“产业复杂化”，台湾称之为“产业升级”，香港则称为“产业多样化”。

这种比较优势转移的类型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劳动横向分工的经典形式。它促进了不同国家集团的工业化过程，允许各自专门从事比较优势大的生产活动，也进一步导致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如香港纺织业的升级会导致进口更多的日本中间投入品，如乙烯乙二醇、己丙酰胺和丙烯腈以及自动织机。与此类似，南朝鲜、台湾的重工业发展将导致更多地进口日本新的机器设备。同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调整，要求从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如橡胶和木材，以及允许后者扩大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样，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为以后进一步发展地区内的贸易联系打下基础。^①

使亚太地区经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另一个动力是不断增加的资本在该地区内的流动。众所周知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是开放经济，这不但是指外贸，而且也指外资。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运

^①参阅Toshio Watanabe,《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分析》，《发展中经济》，东京，1980年12月；另请参阅Takuo Tanaka,《亚洲国家间的国际专业化类型和日本产业的未来》，《发展中经济》，1980年12月。

用各种形式吸引外资,它们认为这不但可以增加资本来源,而且也是引进技术和发展出口市场的渠道。

起初是美国资本控制着亚太地区,从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资本很快赶了上来。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①显然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最近几年,地区内出现了新的、其意义不可低估的发展,即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更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联盟投资。中国的开放引入了另一新因素,如“经济特区”从日本和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吸引了较多的外资。我们在图5中总结了亚太地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亚太地区不仅仅在高经济增长方面积蓄了势头,而且也形成了各自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为以后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动力。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多变性,从长期看,将会推动整个地区的增长和发展;而从短期看,中国卷入亚太地区一体化,将对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造成某些消极影响。

中国向经济高增长的转变

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其他经济能否起积极作用,互助互利,提高各自的经济增长,要根据两个关键性的条件才能确定。首先,中国经济是否有能力保持高增长?显然,如果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她就不可能对亚太地区的其他经济起积极作用。第二,北京的中国现行领导能否坚定地实行开放政策?这也很清楚,如果不是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同该地区形成一体化。但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相互强化的。中国经济按照当前类型进一步发展,就会形成更大的压力,要求更加开放,旨在使中国经济达到

^①参阅《亚太TNC评论》曼谷,1986年6月(该评论由亚太经济社会跨国公司联合体[ESCAP]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出版)。

中国

地区内贸易：
进口占45%
出口占56%
资本和设备
净进口者

地区内贸易平均数：

进口占42%
出口占39%

日本

地区内贸易：
进口占23%
出口占20%
资本和设备
净出口者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地区内贸易：
进口占45%
出口占30%

东南亚国家联盟

地区内贸易：
进口占44%
出口占48%

贸易顺差
投资流
(资本和技术)



图5 亚太地区经济影响类型

(贸易额为1984年数据)

国际资本主义的实力。同时外向型战略将使中国经济的更大部分受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缓解价格扭曲的程度,为高速增长提高总体效率。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不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中间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误解,即认为在毛泽东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很少经历甚至不存在经济增长。在1984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这在亚太地区显然是最低的了。确实,这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几分之一。亚洲旅游者经常观察到中国物质生活条件的贫穷和经济其他方面的落后,特别是同他们自己的相对照。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实际状况的印象,虽然这些印象并不都是正确的。

真实情况是除开几年的停滞,中国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中国是除日本外,在亚太地区最早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早在1953年中国就开始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年均增长率达到7%。在50年代末期,当其他亚太国家仍然从事传统经济活动时,中国就开始制造如汽车、电动机和内燃机等重工业产品。但是,她并没有始终坚持促进增长的发展战略。在1959年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试图把经济增长和某些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事实上,毛泽东的发展战略变成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非经济的目标。在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毛的发展战略走到了极端,几乎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经济学。这一时期,自然是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毛泽东的以意识形态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几年无结果的试验之后,中国领导层最终意识到,只有老的增长战略才能给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提供最好的希望。基本发展战略的急剧转变同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由此引起的亚太地区冷战缓和的形势相吻合。但这一切发生在中国解决领导层继承这一关键问题之前。

在1975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号召回到务实的、促进增长的发展战略，并在本世纪末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①。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四个现代化”计划的由来。1978年周恩来的后继者华国锋提出了过渡时期的十年计划，这个计划的指标是雄心勃勃的。

邓小平等很快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而震惊。1981年1月1日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正式代替了十年计划，五年计划强调“调整、巩固、提高”^②。这就开辟了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道路。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乡村地区引入“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市场激励。乡村改革立即取得了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丰收。在1984年后期，北京政府决定进行更复杂的城市改革，解决中央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同时把沿海许多城市辟为经济特区，使它们更多地参与外贸和吸引外资。就这样，开放政策就成了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实绩如何？根据权威的西方人士估计，在1953—1976年中中国年均增长率为4.4%（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③。用第三世界的平均标准来衡量，这样一种长期增长记录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如果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是相形见绌的。在表1中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在1965—1980年间实际增长率年均增长6.4%，1980—1985年间为9.8%，这是80年代前半期亚太地区所取得的最高增长速度。这也说明，从增长实绩

①引自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23页。

②《北京周报》，1983年5月23日。

③参阅Dwight H. Perkins，《中国能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6），也可参阅《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选择》（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86）。

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得相当顺利。同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一样，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较高的国内投资水平。正如表 2 所说明的，亚太经济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比例用于国内投资，与此相应，国内的储蓄率水平也高。在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中，经济结构是开放性的，国内投资超过了国内储蓄，其资金缺口是由向外借债或引进外资的形式填补的。在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只有通过紧缩消费，才能维持高水平的国内投资。确实，苏联式的中央计划（即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体制的典型特征是集中资源投资于工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重工业部分，牺牲轻工业或消费资料工业。中国曾虔诚地遵循这一发展类型，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毛泽东声称重视的是非经济目标，实际上他的发展战略是内在严重倾斜的增长。

如果毛泽东时的旧体制在经济增长方面还算过得去，为什么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层要变革这个体制呢？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第一，1976 年前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较为可观，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现存的增长潜力。具有如此之高的投资率的中国经济，如果善于管理的话，至少要达到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在原有的僵死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的效率极其低下。根据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 D·H·帕金斯的估计，中国经济在 1953—1976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4.4%，其中劳动力为增长所作的贡献为 1.8%，资本为 2.0%，生产率增长只占 0.6%。这同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历正好相反，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一般伴随着高的生产率增长。

第二，中国原先的发展战略，虽然保持了社会公平，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中包含的福利水平较低，这是由于这个战略反映的是计划者的偏好，比如更多地生产钢铁和机器等资本品，并不反映消费者的需求，更多地生产诸如电视机等产品。在其他亚太国家里，经

表2: 亚太经济投资和储蓄

	国内生产总值分配 (%)										国内总投资	
	国内总投资					国内总储蓄					年增长率 (%)	
	1960	1965	1982	1985	1980	1965	1982	1985	1963—1973	1973—1984		
中国	24	25	28	38	24	25	30	34	12.9	8.0		
日本	33	32	30	28	33	33	31	32	14.1	3.0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南朝鲜	11	30	26	30	1	30	24	31	19.7	8.8		
台湾	20	23	36	21	13	20	33	34	16.5	6.0		
香港	18	36	29	21	6	29	25	27	3.7	9.7		
新加坡	11	22	46	43	-3	10	41	42	22.7	9.5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印度尼西亚	8	7	23	30	8	6	19	32	17.5	11.3		
马来西亚	14	18	34	28	27	23	25	33	9.1	11.4		
菲律宾	16	21	29	16	16	21	21	13	4.4	4.3		
泰国	16	20	21	23	14	19	21	21	7.6	5.3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报告1984》(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为世界银行准备, 1984); 《世界发展报告1987》(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为世界银行准备, 1987); 以及《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6》, 台北。

经济增长一般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增长和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刺激效应机制，反过来刺激劳动者提高生产率。在中国，毛泽东用精神刺激代替物质刺激，这从长期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

简单地说，毛泽东以后政策从以中央计划为基础转到更分散的决策和扩大利用市场激励，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社会方面看都是理性的选择。这将使中国经济在更高程度上利用增长潜力。确实，最近经济自由化的效果已经显示出来，1977—1984年间年均增长率提高到8.3%，而其中生产率增长构成了总增长的主要源泉：劳动力贡献占1.1%，资本为2.2%，生产率为5.0%。1984年后，经济改革集中在城市部分，由于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增长率也进一步提高。1985年中国增长达到最高点，为12.3%，这在亚太地区也是最高的。1986年和1987年，增长率分别为9.3%和9.4%（参阅表1）。中国现在因此展示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减少了宏观经济方面的管理不善。

在70年代后期，当中国回到支持增长的发展战略时，北京政府宣布了中国的长期增长目标：在1980年至2000年间的20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就要求每年增长率达到7.2%。在1980—1985年的五年计划里，实际每年增长为11.3%。这样在剩下的15年里，每年所需的生长仅为5.8%。正如前面所提到的，198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9.3%，超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规定的年均增长6.7%的指标。要达到翻两番的目标，1991—2000年间，年均增长率仅仅只要5.4%。中国经济在目前的市场和集中指导混合体制下，显然有能力实现这样的指标。如果经济改革能进一步深入展开，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力也会继续扩展。

这就要提出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中国会不会继续坚持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同其他亚太经济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1986年以后的事实十分明确地表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开放政

策都要以支持性的政治环境为转移,严格地说,中国并没有完全完成领导层的交替过程,仍存在不可预料的变化因素。但是,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亚太国家。

中国的改革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不可能倒退回去。自然,改革的步伐有时可能放慢些,但当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后,改革又会积蓄势头。这是由于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积极效应,大大超过了负的溢出效应。改革逐渐扩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支持新的体制。换句话说,经济改革能加速经济增长,成功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把中国说成是经济强国,恐怕是有所夸大了,但是,中国经济肯定有着高增长的潜力。通过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这个增长潜力就会释放出来。一个更外向、更稳定的中国经济将愈益同其他亚太经济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由于中国的规模巨大,因此她紧密地同亚太地区结合起来,肯定会对该地区的所有其他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地有益于所有国家,并将促进整个地区的进一步增长。自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是没有摩擦的。从短期来看,中国的进入也许会对某些亚太经济产生负的溢出效应,这就要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方向如何而定。不断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必然会给某些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给其他国家以竞争的压力。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同亚太地区的进一步一体化,其深远的影响要超出经济领域(正如图6所概念化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将会扩展她对亚太地区的地域政治的影响。经过变革的中国对其他亚太国家而言,将成为稳定的力量。中国也将成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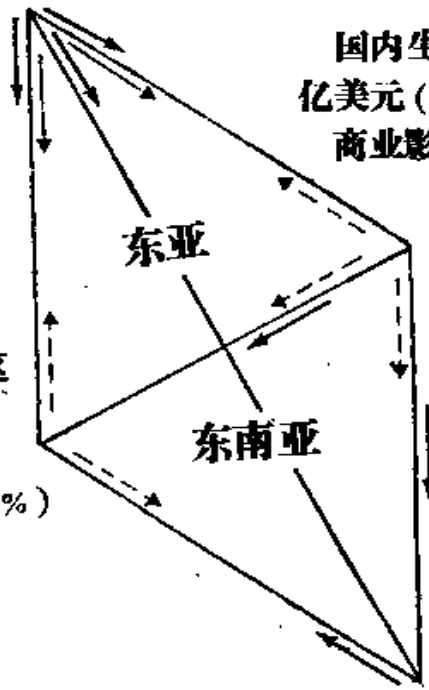
国内生产总值为2700
亿美元(美国的7%)
地理-政治影响源

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为13300
亿美元(美国的34%)
商业影响源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为
1950亿美元(美国的5%)
加工制造品出口源



东南亚国家联盟

国内生产总值为
1900亿美元(美国的5%)
原材料出口源

影响方向:

地理-政治 ——>
传统/文化 ——>
商业 - - - ->

图6 亚太地区一体化问题
(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985年数据)

为平衡日本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商业影响的力量。这种平衡也将给该地区的其他部分发展各自的特长。新兴工业化国家将作为加工制造品的净出口者,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则作为原材料的净出口者。

分析中国在亚太地区内的经济影响,可从比较中国和亚太经济区内其他一些经济的出口结构开始。正如表 3 所示,中国总体的出口结构处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一方面,中国出口初级产品,但出口比重不像东南亚国家联盟那样大;另一方面,中国也出口加工品,但不如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说来,中国同新兴工业化国家更具有互补性,同东南亚国家联盟更具有竞争性。

由于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和日本的市场,因此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国家市场的占有份额变动能较好地说明它们之间相互的竞争性。正如表 4 表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已相当可观,但是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 1977 年的 0.1% 上升到 1985 年的 1.2%,是令人惊叹的。相应的年份,中国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从 2.3% 上升到 5.0%,也是令人瞩目的。而在欧洲共同体的市场上,中国的份额为 1.0%,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中份额最高的。基于某种静态的分析方法,亚太发展中国家确实担心中国经济强有力地进入世界市场,会对它们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但是现实的评价应该基于动态的分析方法,那么中国经济较大程度地参与世界市场,对亚太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很难评价的。这必须具体分析亚太国家各自的经济结构和同中国的历史关系,才能予以确定。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日本作为全方位工业化的国家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如

表3: 制造加工品出口结构(份额百分比)

	燃料、矿产		其他初级产品		机械和运输设备		其他制造加工品		纺织和服装	
	1985	1986	1985	1986	1985	1986	1985	1986	1985	1986
日本	1	2	7	1	31	62	60	36	17	3
中国	25	na	na	21	na	6	na	48	na	24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南朝鲜	4	15	25	5	3	36	56	55	27	23
台湾	1.8	0.4	57.9	7.5	4.3	27.9	37.4	62.8	26.2	19.7
香港	2	2	11	6	6	24	81	68	43	32
新加坡	29	21	44	12	10	32	24	26	6	4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印度尼西亚	75	43	53	14	3	1	1	10	...	2
马来西亚	34	35	59	39	2	19	4	8	...	3
菲律宾	13	11	84	36	...	5	6	46	1	7
泰国	5	11	84	60	...	7	4	28	...	13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7》(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为世界银行准备, 1987), 以及《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6》, 台北。

表4. 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从亚太国家进口份额

	美 国			日 本			欧洲共同体		
	1977	1979	1981 1985	1977	1979	1981 1985	1977	1979	1981 1985
进口来自:									
中 国	0.1	0.3	0.8 1.2	2.3	2.7	3.7 5.0	0.3	0.3	0.4 1.0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南朝鲜	2.0	2.0	2.0 1.6	3.0	3.0	2.4 3.2	0.4	0.4	0.4 0.4
台 湾	na	2.3	2.7 4.5	na	1.7	1.4 2.3	na	0.3	0.3 0.4
香 港	2.0	2.0	2.1 2.5	0.5	0.6	0.5 0.6	0.6	0.7	0.3 0.5
新加坡	0.6	0.7	0.8 1.0	1.0	1.3	1.4 1.2	0.2	0.2	0.4 0.5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印度尼西亚	2.4	1.8	2.3 1.4	7.1	7.9	9.3 7.8	0.1	0.3	0.2 0.3
马来西亚	0.9	1.0	0.8 0.4	2.2	2.9	2.0 3.3	0.4	0.4	0.2 0.3
菲律宾	0.8	0.8	0.8 0.4	1.3	1.4	1.2 1.0	0.2	0.2	0.1 0.1
泰 国	0.2	0.3	0.4 0.2	1.1	1.1	0.7 0.8	0.2	0.2	0.2 0.2

资料来源:《贸易统计指南》, 国际货币基金, 华盛顿, 1980年、1982年、1985年年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6》, 台北。

日本有能力提供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本、金融和技术。日本能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其繁荣对中国有外溢作用。二是日本明显地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巨人,中国仅仅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国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联系,将会服从日本全球性的经济战略,也经常从属于更大的地区性问题。因此,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对中国的投资就不会脱离日本全球性的投资战略单独予以考虑。这也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的结构并不是对等互相依赖的,相反日本是主导的一方。中国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因此在同日本打交道时不得不处于“价格接受者”的地位,这同其他亚太发展中国家一样。

日本同中国之间由于文化传统上相近、历史上有着联系、地理上邻近这些因素,对中国的贸易比其他发达国家要更占优势。日本也能够在非意识形态或主要是纯粹的商业动机的基础上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在1972年正式建交以前,日本早就成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首次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后,日本商人是第一批来到中国开发新市场的。这些年来,日本不断用机器、资本设备和耐用消费品换回中国的原材料、煤炭和石油。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没有特别成功地占领日本市场。

但是,一些关于中日关系的长期问题也抵消了日本对中国的内在优势。这两个国家历史上和地理上十分靠近,因此原先的对抗现在也时常表面化。例如教科书事件,使中国又悲痛地回忆起日本战时的残暴。还有地区内竞争和疑虑等,阻碍了两国关系。例如,北京政府经常提防日本对台湾潜在的野心。

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许多摩擦。许多日本企业家恼怒中国在1979年取消了25亿美元的合同,他们认为这是单方面宣布取消。另一方面中国则埋怨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在增大。尽管日本对华贸易的主导作用和巨额的贸易顺差,北京政府还是公开抱怨日本在中国投资不足。日本在中国的投资目前只占外国在中国总投资的2%。确实,到1987年3月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只有51300万美元,

这同日本对外投资高达 1060 亿美元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①。

但是所有这些政治和经济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对近年的中日贸易造成大的影响。1978 年贸易额达 48 亿美元,1985 年增至 164 亿美元。几年前,中日签订了双方互助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日本要增加对中国的软贷款。

日本目前同中国发生的经济联系确实仍处于较低水平,明显地同日本经济的能力、同日中经济互利所要求的不相称。在日本对亚太地区经济影响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将会进一步转向中国,这就为中国和亚太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具有意义的力量。

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从经济上看,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中国经济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吸引到一起。后者严重缺乏自然资源但已高度工业化,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是天然的经济伙伴。随着国际比较优势的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向着高增值和技术密集型发展,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弱了同中国出口制造业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关系。表 3 清楚地显示了这个类型。南朝鲜和台湾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产业基地,如果政治环境进一步改善,那么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正是它们寻求扩大出口的理想场所。中国在将来也可通过它们更多地取得中间技术。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的港口城市,能为中国引进资金和其他设施服务,这也有益于双方。

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东亚的主导力量,能对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施加影响。中国是这一地区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而政治稳定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①大藏省,东京,1986—1987 财政年度。

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中国对香港和台湾有着直接的强有力的政治影响，通过北朝鲜对南朝鲜也有间接的影响。因此这就有力地促使双方增强它们之间现有的经济联系，发展成一种“特别关系”。

南朝鲜和中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从1976年中期起，南朝鲜和中国(主要通过香港)发展间接贸易。近年来双边贸易额急剧增加，如1984年贸易额为8亿美元，1985年为18亿，1987年为20亿。南朝鲜提供钢材、船舶、电子消费品和石油化工产品，换回中国的原材料和农产品^①。大约有40—50家建在香港的南朝鲜商号为这一目的服务。

南朝鲜卢泰愚上台和最近的政治自由化，进一步缓解了中国和南朝鲜之间的关系。卢总统公开宣称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中国官方表示愿意和南朝鲜进行直接贸易^②。随着日元升值，南朝鲜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市场上比日本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③

直到最近台湾基于它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同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商业联系。但是，1979年以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通过香港，有时通过新加坡和东京)不断发展。据估计，1987年的贸易额超过15亿美元。此外，广东、福建

^①参阅《经济学家》，伦敦，1986年3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87年3月14日以及《海峡时代》，新加坡，1988年8月12日。

^②参阅《中国愿同南朝鲜直接贸易》，《海峡时代》，1988年8月12日，1988年7月南朝鲜外交部部长助理访问北京，这是自1949年以后访问中国的南朝鲜最高官员，部长助理说中国可能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在汉城建立贸易办公处（《海峡时代》，1988年8月8日）。

^③据报道，南朝鲜正在开发西海岸(穿过黄海离山东半岛只有400公里)作为和中国直接贸易的潜在贸易口岸。参阅《南朝鲜正准备同中国进行贸易》，《海峡时代》，1988年4月5日。

沿海渔民同台湾之间的物物交换也增加很快。大陆用药材、食品和工业原料(例如棉花), 换回台湾的轻工业消费品, 如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和手表。近来由于中国政府抑制耐用消费品的进口, 台湾的出口转向化工、纺织品和机械产品。贸易平衡的结果一直对台湾更为有利。

最近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以前和中国贸易从法律上说可以处以死刑。80年代初期以来, 台湾当局对和中国的贸易采取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只要这种贸易是通过第三方进行的。1987年台湾政府迫于公众压力, 允许台湾居民访问大陆。1988年1月蒋经国总统逝世后, 官方对大陆的商业联系采取了进一步自由化的态度。只要是通过第三国进行的, 允许大陆产品进入台湾, 允许台湾商人在中国投资^①。大多数观察家认为, 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建立完全正常的商业联系已经为期不远了。台湾可以从资本和技术方面为大陆的现代化作出较大的贡献^②。由于美国不断增强的贸易保护主义, 台湾制造商也敏锐地把大陆作为潜在的出口市场。

香港同中国大陆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中国于1997年将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从一开始香港就成了中国南方的一个口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香港作为中国口岸的作用开始

^①《台湾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海峡时代》, 1988年3月12日, 也可参阅《台北商人担心南朝鲜竞争》, 《商业时代》新加坡, 1988年8月14日。自从1987年11月开放对中国的旅游, 到1989年9月止, 已有15万台湾人访问大陆。从台湾直接开往上海的第一艘客轮于1988年9月12日靠岸, (《海峡时代》, 1988年9月12日)。

^②最近, 台湾政府的智囊团组织台北中华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建议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基金”, 促进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海峡时代》, 1988年3月16日, 台湾积存了高达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现在是一个资本出口国, 有能力为北京政府提供资本、设备和资金。

下降,但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它又随之活跃起来^①。几年来,香港是中国取得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占中国出口总收入的25%—30%。^②最近中国又通过在香港直接投资,进一步提高了它的经济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特区投资绝大部分来源于香港。事实上,香港已经和中国经济直接融合在一起了。^③1997年回归后,香港无疑将在中国经济中继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香港最好的专业技术人员不断离港,说明这个回归过程有可能是十分困难的。

新加坡的作用有点类似于香港,它是中国在东亚的口岸贸易基地,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新加坡并没有同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双方把关系限制在互设贸易代表的范围内。由于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新加坡能对最近活跃的中国经济快速作出反应。1984年以来,新加坡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一些由政府控制的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1985年新加坡的经济衰退,也推动私人经济部分把中国作为新的机会。1979年后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有100多个,投资额为4亿5千万美元。^④新加坡利用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中国同源的优势,正在积极成为香港以后的又一个中国门户,这也是1987年5月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访华的首要动机。

^①关于香港近来的口岸作用,参阅Yun—Wing Sung:《口岸贸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香港、新加坡以及它们在中国贸易中的作用》,1987年1月25日—29日在新西兰惠灵顿召开的第16届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论文。

^②参阅A.J.Youngson编:《中国和香港:经济联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

^③据设在香港的银行报道,在1986年港外对当地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大陆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大公报》,香港,1987年10月22日。

^④《亚洲华尔街杂志》,1985年9月7日,以及参阅《海峡时代》,1987年8月25日。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以南地区国家,在历史、地理和移民方面都有着广泛的、根深蒂固的关系。1949年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经历了20年的冷战状态。从70年代初起,东南亚国家开始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最早的是马来西亚,然后是非律宾,最后是泰国。^①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在1967年关系恶化后,并没有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从1985年7月起,政府准许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②在所有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中,泰国目前同中国关系最好。作为面临越南扩张主义前线的国家,泰国同中国有着同样的战略忧虑。除了给泰国提供武器以外,中国公开表示,如果泰国受到越南攻击,就将援助泰国。^③从总体上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是由务实的经济因素制约的,并更加重视直接贸易。^④

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具有互补

^①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关系的历史背景的详细讨论,参阅黄朝翰,《中国改变同东南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伦敦,麦克米兰,1984)。

^②1967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断绝外交关系后,1986年6月中国第一次派出大型贸易代表团赴雅加达参加贸易年会。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孙坚会见了许多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双方表示要增加直接贸易。参阅《星期日时报》,新加坡,1987年6月21日。

^③《中国发誓保卫泰国》,《海峡时代》,1987年1月19日。

^④例如,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为进口中国产品的许可问题而制定的条例发生争论。这个条例和近年签订的两国贸易协定一起,将会扩大两国间的直接贸易。《关于中国进口的争论》,《海峡时代》,1988年1月13日,1985年以来,印度尼西亚恢复同中国的直接贸易,取得了积极效果。1987年头10个月,印度尼西亚同中国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计2.5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计0.99亿美元。《雅加达的中国贸易出现顺差》,《海峡时代》,1988年4月11日。

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出口初级产品，因此它们同任何国家的经济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初级产品贸易的制约。这也说明了，在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贸易中初级产品数额是何等重要。例如，几年中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只是橡胶，菲律宾、泰国，重要的出口是蔗糖。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初级产品的重要出口者，如石油出口给菲律宾和泰国，大米出口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①一般而言，由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相对优势，中国虽然也出口初级产品，但并不构成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威胁。而且，未来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必将需要更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初级产品。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最近几年中国从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口的种类更多了，不仅包括各种初级产品，而且也包括各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加工制造品。

然而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担心来自中国的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由于双方都在推行工业化政策，因此在出口加工制造品时，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时，潜在地存在着竞争关系。它是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关系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首先，东南亚国家联盟担心中国的加工制造品可能以低廉的价格涌入东南亚市场，这对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东南亚国家产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当然这种忧虑目前并不现实，因为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国家各自的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一般较为稳定，份额也小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最近几年只有新加坡急剧地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由于原油提炼加工的需要。

其次，中国是东南亚国家出口到第三国市场的潜在竞争对手，

^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贸易结构详细分类表明，贸易偏重于初级产品。具体数据可从各国的资料中得到：如可参阅印度尼西亚的“进口和出口”，菲律宾的“菲律宾的外贸统计”，新加坡的“新加坡贸易统计”，泰国的“泰国贸易统计”。

表5: 亚太经济1981年带头劳动密集型加工品出口

	纺纱和纤维 ^a			服装 ^b			鞋类 ^c		
	数 额 (百万 美元)	国 家 份 额 (%)	世 界 份 额 (%)	数 额 (百万 美元)	国 家 份 额 (%)	世 界 份 额 (%)	数 额 (百万 美元)	国 家 份 额 (%)	世 界 份 额 (%)
中 国	3079	14.3	7.2	2093	9.7	5.8	259	1.2	2.2
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南朝鲜	2139	10.1	5.0	3732	17.6	10.4	1024	4.8	9.0
香 港	872	6.1	2.0	4819	33.8	13.4	148	1.0	1.3
新加坡	309	1.5	0.7	469	2.2	1.3	41	0.2	0.4
东南亚国家联盟									
印度尼西亚	24	0.1	0.1	95	0.4	0.3
马来西亚	125	1.1	0.3	160	1.4	0.5	32	0.3	0.3
菲律宾	25	0.4	0.1	347	6.1	1.0	73	1.3	0.6
泰 国	321	4.7	0.7	344	5.0	1.0	44	0.6	0.4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1984年补充,《经济统计手册》,中国。

a: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651、652、653和656。

b: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841。

c: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851。

这可能是比前面一点更为严重的方面。作为较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双方都想出口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品。因此双方都在扩展较慢、甚至萎缩的工业化国家市场上展开竞争。至少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在这些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就会减少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这些市场上的出口额，特别是在纺织、服装和鞋类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表5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这方面的疑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纺织、服装等带头性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品方面占有的世界份额，这些都使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者对前景感到灰心^①。

这是对国际竞争的静态分析。从动态的观点看，世界市场并不是零一总形态，中国出口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市场的减少。从长期看，在竞争的推动下，东南亚国家企业会像新兴工业化国家那样，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再说，东南亚国家联盟面临的出口竞争，即使不是中国，也可能是印度。

一个平衡的画面也必须考虑到某些长期的积极效应。一个有着10亿消费者市场的繁荣的中国，并不仅仅由工业国家或者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去开发。中国的经济增长为所有国家提供了机会，没有理由相信某些东南亚国家不能以资源为基础的加工品出口，在中国这个潜在的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从长期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活跃关系，具有充分的经济理性。

总结性评论

10年来由于成功地保持了高经济增长和开放政策，中国愈益和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结合在一起。我们不难想象当所有亚太国

^①参阅Rodney Tyers、Prue Philips和Christopher Findlay，《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实绩和前景》，《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手册》，新加坡，1987年8月。

家,包括中国在内,互相之间发展成一种“经济共生”(economic symbiosis)现象,以此进一步提高整个地区的增长潜力。从现在起12年内,亚太经济能否进入所谓的“太平洋世纪”,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有效地结合进亚太地区。

但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看,中国这个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并不稳定。她还没有完全完成领导层过渡。即使我们假定这个过渡是和平的,对新的北京领导层是否有能力把这个规模巨大的泱泱大国结合成一个经济统一体还是值得怀疑的。确实,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中央行政系统能实际地、有效地控制像中国这样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人们能够预见,在中国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事实上会逐渐形成同历史上分割相类似的某种联邦式的体系,如分成华南、华东、中国东部和中国内地几大块。在过去,只要中央政权无法使国家结合在一起时,地方主义就会在中国抬头。

中国一直苦恼着经济上地区间的严重失衡,中国领导层过去为减少不同地区收入差别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例如大都市上海的人均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左右,是天津和北京的3倍,是东北的2倍左右。由于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经济增长肯定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同共产主义革命前的历史类型十分相似。因此,由华南、上海、天津和东北组成的“外部”中国,由于对外经济联系的刺激,将像过去那样发展得十分迅速;而较落后的中国“内地”,则发展缓慢。

必须指出,所有的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界点都处在“外部”中国。正是这一部分中国经济不断地同亚太地区的其他几大块保持联系。台湾、香港,也许还有新加坡,以后将在经济上同华南以及沿海地区更紧地结合起来,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形成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ndominium)。“外部”中国同新兴工业化国家结合起来,将潜在地成为亚太地区又一个活跃的经济实体。

中国能成为亚洲下一个经济巨人吗？

美国 D·H·帕金斯

译者按：占世界 1/4 人口的中国，如果在本世纪末从封闭、贫穷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社会，并同国际经济体系紧密相连，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D·H·帕金斯在两篇饶有兴趣而又十分及时的论文中涉及了上述问题，讨论了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变革。

帕金斯指出，中国目前正沿着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已经成功走过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发展的道路前进。他的第一篇论文重点讨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以及它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在上述国家或地区，构成经济增长型经济政策基础的是政治支持和人力资源的环境。帕金斯断言，同样支持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将使中国利用自身丰富的人力资源，加速经济增长。

90年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过渡到新一代领导人手里将会怎样？作者在第二篇论文中讨论了顺利过渡道路上的一些障碍，但他指出改革的势头是很难逆转的。中国将经历经济和社会的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很多乡村人口将进入城市，经历现代城市中消费者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这里发表的两篇论文是帕金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院所作的讲演基础上写成的，并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D·H·帕金斯于1974年访问我国，以后又多次来访，出版了多部研究中国经济的论著。帕金斯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①

东亚的发展经历

东亚的富强、兴起是改变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本世纪初，日本开始兴起，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导致对外冒险，遭到严重挫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城市濒临毁灭。然而在1950年至1980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4倍，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巨人。继日本年增长率为9%和10%以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南朝鲜、台湾和两个城市地区香港、新加坡也在迅速发展。在5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开始这段时期内，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倍，南朝鲜增长近8倍。这四个高速发展地区的人口总数大约是日本的一半。在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也在加速发展，虽然它们的发展速度没有东亚四地区那样迅速。

近2亿人口告别以极端贫穷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如果10亿多人口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或以后的短时间内变成工业国，这个意义就更为重大。18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北美，用了150年的时间，使这些地区7亿左右的人口（不包括苏联）提高了生

^①Dwight H. Perkins, *China, 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活水平。这些地区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7% ,如果把苏联也包括进去,那就占世界总人口的 23% 。

如果中国转变成工业化社会的努力取得成功,那么生活在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就比 50 年代增加了 11 亿。这样,只经过 40 年或者 50 年的努力,这个世界就有了转变:即从大多数人(占总人口 3/4)生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转变到 1/2 左右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相对繁荣的工业都市化的社会中。如果考虑到东亚国家或地区,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消除收入分配的过分不平等现象,那么经济增长就有益于、并将继续有益于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有利于少数人。

如果说经济发展主要使东亚人民得益的话,那么受此影响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迅速增长伴随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更快速度发展着东亚地区的出口。西方产业遇到东亚产品的激烈竞争,需要及时调整。并不是所有厂商都能及时调整的,结果美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厂商倒闭和失业现象。经常听到人们随意地谈到由于这些国际竞争,美国正在非产业化。当然,现实还没有发展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日本出口额占世界总额在 1963 年为 3.5%, 1973 年为 6.5%, 1983 年为 7.3%。东亚四地区加上中国一起,出口额占世界总额的份额增长同日本差不多,1963 年为 2.6%, 1973 年为 3.8%, 1983 年为 5.8%。由此可见,20 年来东亚对外贸易份额增长十分迅速。但直到 80 年代初期,东亚以外的国家出口额仍占有世界总额的 86%。真正的问题在于,东亚出口集中在某些有形产品上(纺织、钢材、电视机和汽车),具有政治影响,并对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产生作用。

从积极的方面看,东亚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取得成功,使得许多国家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道路。与开放政策相反,在 50 年代、甚至一直到 60 年代,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不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模式是苏联自给自足的集中计划经济。印度和中国受苏联经济的成功影响极大。虽然

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来源于它们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但结果是相似的。当时认为,只有尽可能少地参与美国、欧洲的经济联系,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南朝鲜和台湾同苏联一样,都不能作为别国效法的模式,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同其他国家完全相同的条件。但它却用相反的例证打破了一种传统教条,即认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外贸的作用,只能导致贫穷和依附于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所引起的变化更令人深思的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开放经济的成功,促使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走向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由于不能或者不愿对由此产生的出口扩张作出调整,正在由自由经济政策倒退到保护主义政策方面。

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也对这个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在 50、60 年代,安全问题支配着亚洲前程的讨论。美国处在亚洲的第三次战争之中,苏联影响在扩大,这个地区内部的不稳定使内战一触即发,中国和苏联的对抗在 60 年代后期已经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80 年代的不安定主要表现在菲律宾。菲律宾政府 20 年来的错误领导终于自食恶果。对印度支那而言,老的越南领导人并没有从军事社会中转向,仍然用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地区大的强力冲突在缓和,因为许多国家正集中于自身的事务,特别是经济发展。这一地区许多地方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定要归之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已变成稳定的力量,除开它同越南的冲突以及与前一冲突性质不同的对台湾的关系方面。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愈益强大,就使得同苏联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富强的民族,有效地缓和了朝鲜半岛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

人们不会怀疑首先由日本开始,然后是东亚四小国家和地区,现在又扩展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重要的是,这

个发展趋势能否继续下去，中国是否真的沿着东亚发展的道路前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以后几十年会继续如此吗？将来中国领导人会改变这种趋势吗？如果将来领导人仍将如此的话，那么他们能否会取得东亚先驱者那样的经济成功，或者有那么一天“东亚模式”过时了？

东亚的发展类型

在讨论中国是否沿着其他东亚发展者的道路前进，能否取得成功这些问题以前，人们必须对日本、东亚四小地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和如何取得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讨论未来中国可能的发展模式以及同它的邻居所走道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中心特征是什么呢？仅仅指出以上五个国家或地区受孔夫子价值观念影响，使用汉字，用筷子吃饭，并不能深切地理解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例如，孔夫子的价值观念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很可能是表面化的。如果要证明这种联系不是表面化的，人们必须证明孔夫子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量有着积极的作用。讨论不应从价值观念和其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发，而应该分析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并由此分析到较间接一点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产生的，一是生产的投入因素的增加，其中主要的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另一方面是这些投入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东亚一段时间里，资本增长的速度确实高于国民产出的增长率。例如南朝鲜和台湾在高速增长初始阶段，总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20%，几年以后提高到24%—28%，然后达到高峰，最终稳定在30%以上。但在另一方面，东亚的劳动力增长率并不惊人。二次大战后，除日本外，亚洲由于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人口增长率提高。随着这些出生人口

的成长和进入劳动力队伍，这一地区的劳动力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

如果我们把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率放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去分析，我们可以说这些投入的增长构成了东亚地区50年代至70年代持续的9%—10%增长率的一半，而另一半增长要归之于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将在附录中提供这一结论的方法^①。

要探讨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必须解释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指出日本个人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特别高，指出南朝鲜和日本得到大量外援(事实上是外国人在为他们而储蓄)，只能解释全部增长的很小一部分。因为产出的增长大大地高于储蓄转化成资本、雇佣新劳动力这些投入所能得到的增长。例如，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其劳动投入和资本形成增长率高于东亚，但这一时期非洲的国民产出年增长率平均只有3%。这一时期非洲的生产率没有增长，相反在许多地区还有所下降。

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的中国增长率高于大部分非洲国家，但是中国GNP的增长几乎可以全部归之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高增长率。中国资本形成率类似于南朝鲜和台湾，在50年代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下，在70年代初期升到30%以上。但是中国1955—1957—1975—1977的20年间国民产出年增长率却只有5.1%。如果用70年代后期更切合实际的价格来测算，那就低于5%^②。相反，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资本形成有所降低，劳动力增长率仍为2%，然而国民产出年增长率在1977—1985年的9年间平均为8%以上。这个变化主要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以前的18年达

^①附录中关于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本书从略。——译注

^②中国在50年代的相对价格，有利于工业而不利农业，在国民产出中，快速发展的工业就具有更大的权数。70年代后期，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有大幅度提高，这就使中国的相对价格结构接近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到这个增长速度,加上后面的9年共27年,那么到1976年中国的GNP将增长8倍。与此相对照,1976年前的25年中,GNP只增长了3倍。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生产率是否像她的邻国一样,进入了持续增长的阶段,或者这种增长仅仅是中国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以后未必能持续下去呢?

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在解释东亚的生产率增长时,经济学家的主要困难在于并不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引起了生产率的增长或下降。生产率的某些增长是因为引进了包含有先进技术因素的新设备。生产率增长的另一原因是改进了管理水平,能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一个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率也可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职业中,特别是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到较高生产率的城市产业和劳务岗位上去。但是,为什么东亚国家能够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呢?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都必然带有猜测的性质。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东亚国家19—20世纪的经历,将对此提供有益的线索。

按照过去的标准,东亚国家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丰富的人力资源并不是指人口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在地球上随机分布的,而是指社会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提高了人口素质,这同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东亚国家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重视正规教育。东亚国家继承了孔夫子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在中国,以及某种程度在南朝鲜,由于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在这些地区,以前在商业或金融系统中从事比较复杂管理的人员必须具备读写能力。后一因素对日本具有较高的识字率有着影响,因为日本政府官员主要是世袭的。

无论何种原因,在日本男子中一半具有读写能力,在中国约有

1/3左右。^①受教育者城市高于乡村,无论在哪里,妇女都很少受教育。朝鲜人能够使用拼音读写的人较多,但能够使用汉字者可能要少于日本。^②

根据 80 年代的标准,这些有文化的数字是并不引人注目的。但是,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就会明白它的意义。如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在 19 世纪还没有书面语。直到 1960 年,这些地区有文化的平均只占成人人口的 16%,在七个半干旱的穷国,其比例只有 3%,学龄儿童只有 3% 的比例上小学。^③

甚至在今天,由于对有文化的估计数不够准确,东亚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系统比较是不可能的。然而一个结论是显然的:教育体系不可能一夜完成。因石油致富的苏丹王国也许可以从其他阿拉伯语国家引进所有的教师,但大多数国家必须培养自己的教师,这需要时间。人们可以用仅比学生多受一点点正规教育的教师充斥学校,但教学质量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而且,家庭的教育十分重要,特别是同现代经济有关的技能训练,就更是如此。如果双亲都是文盲的话,这种教育就极其有限。

本世纪初期,东亚国家就形成和发展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教育体系。当然,日本在这一方面走在前头。即使是中国,在 30 年代初期,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就有 4 万人之多。^④与此相反,直到 1960 年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所有国家的小学生人数只有 7 万人,

①对现代前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和识字率的进一步讨论,参阅 R·Dore 的《日本的教育》(伦敦,1965)和 E·S·Rawski 的《清代中国的教育和普遍的识字率》(安亚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9)。

②这个判断是基于 30 年代日本人在朝鲜所做的家庭调查。

③这些数据出自世界银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加速发展》,(世界银行,1981),第 181 页。

④参阅 Leo Orlean:《共产主义中国的技术劳动力和教育》,(华盛顿:国家科学基金会,1961),第 68 页。

在 1930 年至多只有几千人。这些学生分布在整个 2 亿人口的地区中,要去服务于迅速扩大的教育体系和形成即将独立的 40 个国家的官僚阶层,而且这还不包括民间对受教育者的需要。简言之,1960 年的非洲同 19 世纪的东亚处于差不多的水平。

但是正规教育仅仅是人力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现代经济有关的教育,还有经验。管理大组织的经验,显然是有用的。市场运行的知识、信用管理的经验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这方面,东亚也远胜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20 世纪初期前很久,东亚就存在着拥有百万或更多人口的大城市。要维持这类规模的城市运行,就要有复杂的商业供应网络,提供食品、燃料,以及其他必需品和奢侈品。这就需要成千上万人参与这些网络,于是这些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参与和管理。即使普通的农民也进入了这个网络,并在日常生活中受市场价格、信用、正式契约和合同的影响。当欧洲人和美国人来到东亚时,他们并没有替代这种体系。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成功地在东亚市场竞争,也很少有人尝试。欧洲人曾利用船和先进的外贸知识在对外贸易中竞争,但这种优势也只是暂时的。早在二次大战前,先是日本人,然后是中国人在外贸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只有在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中国商人的支配地位到 60、70 年代才得到确立。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沦为由外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因此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具有管理政府的经验。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几百万朝鲜人在日本商号中工作,并不一定都处于较低层次上,他们生活在都市环境中,取得了经验。香港和新加坡主要是都市,那里的居民从城市生活中得到了许多经验。虽然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都市生活同乡村生活相比,能给人们许多相对优势,但表明这种优势的证据是很多的。

我们并不需要到远处的非洲去找那些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国

家，如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就能表明这里的主要之点。在那里，当时所有的政府职位和大商业组织如所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多数职位，除开那些非熟练技术的职位，均被荷兰人占据。小商业组织则被中国移民所占据，这些中国移民本是为其他目的而迁移的，由于在中国的经验和其他组织方面的技能，远胜过当地居民，很快进入商业活动。由于印度尼西亚人主要是农民，荷兰人认为无须使他们受教育。荷兰人的理论是教育会带来现代观念，因此会损害印度尼西亚文化，得不偿失。印度尼西亚实际受到的教育，主要同朝鲜读物有关。非洲的情形甚至更为明显，那里欧洲人起了相类似的作用。在南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居住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当然东亚在教育 and 经验方面的长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东亚为一端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另一端的中间状态。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政府自我管理经验的生长，这两极之间的鸿沟在缩小，但并不是到处都是如此，它也不会消失。东亚人力资源方面在进一步加强教育的基础上，将会取得更多的优势。

政治学和不安定

如果是整个东亚拥有人力资源的优势，为什么只有日本在本世纪初起就开始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他国家直到 50、60 年代才起步呢？有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现象。许多理论注意到这样的差别：日本更多地具有封建的社会结构，中国则是一个保守的官僚政权。当然许多解释有其道理和价值，却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为什么日本首先起步，其他国家则落后了 50 年之久？

如果投资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在没有安全感和十分不确定的环境中决策的话，那么要取得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常说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但是政治稳定的含义

并不是十分精确的。意大利首相每隔一二年就换一次，经济环境却没有不什么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中国毛泽东的统治从没中断，但是从1958—1976年间，投资决策环境却充满了不确定。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家的政治环境是否能从长远的角度来支持投资者。

从这样的标准出发，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做得很不错。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黑船”结束了日本的锁国状态。14年后德川幕府倒台。从1868—1930年，日本只经历了“萨摩暴乱”一次政治危机，并很快镇压下去。下一次对政府（建立于明治时期）的严重威胁就是军人政权对外冒险和国内暗杀，并以1945年日本战败而告终。在军人控制政权前，日本已经历了50年左右的稳定统治。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极为重视建设强大的经济，并且也有资源可以利用。一半左右的资本形成是由政府国库支出的，用于建立基本的经济设施。日本政府官员把支持私人经济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因此，日本早期的大企业家，同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决非偶然，政府用合同和其他形式支持他们。

二次大战后日本30年的快速增长也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政府基础上的。这30年间，日本由一个政党统治，这个党又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同美国的联盟给日本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使日本不必把大量资源投入军事方面的开支。

中国的经历与此相反，在19世纪中，在一半年代处于冲突状态。中国比日本更早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但清王朝还是延续了70年。在这70年中，清朝经历了同太平天国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和几次小冲突。太平天国从1851至1864年，延续了14年，死亡几百万人口，几乎毁灭了华中、华南的相当大地区。在这期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中失败，丧失了对许多沿海城市的控制。

太平天国结束后,中国虽有 30 年左右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政府处于分裂状态,一部分总督要求开始现代化进程,北京的朝廷不愿进行根本变革。而且,即使清朝愿意支持经济发展,它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中国政府的收入在 19 世纪从未超过 GNP 的 2%,这部分收入大部分用以政府的日常开支和军事支出。与此相反,日本政府收入占 GNP 的比例,要高于中国几倍。^①

回过头来看,1865—1894 这 30 年是中国在 1949 年前经济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1895 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失去了对台湾的控制。1898 年改革失败,保守派的反对以及义和团暴乱导致了西方的再次侵略和 1901 年的失败。1911 年清朝倒台,1918 年袁世凯试图建立新王朝失败。1918—1928 这 10 年间,中国是地方军阀统治。1928 年国民党取得了半统一的政权,然而共产党分裂出来,并开始暴动,终于在 1949 年取得胜利。1931 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数省,1937 年侵略中国本土,直至 1945 年战争结束。然而和平并没有到来,1945—1949 中国又爆发了全面内战。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在 1949 年前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会感到奇怪。投资者只能在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或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找到某种有限的安全感。那里确实有过工业发展,但这太有限了,不可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在 1949 年后,中国得到了统一和安定,政府下决心致力于经济发展,并且能够取得资源用于这个目标。甚至在 1949 年后,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完全致力于现代的经济增长,这同 1976 年前生产率提高缓慢,具有密切的关系。

^①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政府收入可能要超过国民收入的 20%,虽然在明治初期比例有所下降 (E.S.Crawcour,《德川幕府传统》,载 W.W.Lockwood 编:《日本的政府和企业》(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第 31 页)。中国数据根据 Y.C.Wang:《中国王朝的土地税收 1750—1911》(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本文讨论的四个国家或地区,在本世纪的前半段时期,直到1941年,都具有政治稳定性。事实上这一时期,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NP都有很大地提高,由于缺乏资料和研究,我们不能具体说明提高的程度有多大。但是,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殖民地的特色。极端的例子是朝鲜。朝鲜30年中人均GNP大幅度提高,同时伴随的现象是大多数朝鲜人生活水平反而下降^①。日本商业和日本、朝鲜的地主得到了大部分益处。台湾人均GNP较高,30年代就接近400美元(用1981年价格计算),台湾人也得到了大部分益处^②,但台湾经济大部分仍然处于农业状态。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建立在商业基础上,只具有极其有限的工业,大商号大多数是由英国人掌握。这四个地区在战前的殖民时期取得了一些经济进展,但并不具备现代经济增长的成份。这四个地区的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是作为工人、农民,有时是作为人均GNP提高的收益者的身份参加的,而不是作为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的。

1945年日本战败后,香港很快趋于稳定,并且继续得到增长,然而并不仅仅是英国商号领先。逃避共产主义的上海商人在新领土上开设工厂,开始了中国人主导的工业化过程,使得这片殖民地人均GNP在80年代初期超过了5000美元。

另一极端是南朝鲜。日本投降后,有5年的政治不安定期,紧接着的3年战争使国家的物质设施变为废墟。战争后,有7年政治稳定时期,直到学生示威导致李承晚倒台。但是李承晚总统追求政治目标,并不热心经济建设,即使有大量美援,也无济于事,经济增长没有进展。经过政变,朴正熙取得政权,由此开始了17

^①参阅 Sang-Chul Suh, 《朝鲜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动1910—1940》(剑桥,哈佛东亚研究协会,1978)。

^②这个数据基于这样的假定,即50年代初期人均收入能涵盖30年代的水平。

年政府持续支持经济增长的时期。

除开在政治稳定方面并不完全以外，新加坡的经历很有点类似于香港。1959年新加坡独立，60年代初期曾作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从此以后政治稳定是由土生土长的当地力量，而不是殖民者管理。其结果是同香港差不多，在80年代初期人均GNP超过了5000美元。台湾并没有面临50年代朝鲜经历过的政治动乱，但国民党政府必须解决200万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并要防备共产主义力量可能的进攻。尽管有这些困难，1952—1960年GNP年平均增长7%。

以上对东亚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政府在这一较长时期的稳定以及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密切相关。经济停滞或下降时期同战争、内战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就是它们的直接后果。二次大战前的殖民政府符合这一模式，然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得益者和领导者是外国人，而不是本地人。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需要经济发展的国家，必须引入经济增长所需的稳定的政治集团。在东亚，虽然缺乏独立的主权政府领导下的政治稳定。一旦拥有这样的政府，这一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就会发挥作用，经济就能高速增长。

东亚经济制度

以上观点似乎同把东亚经济增长归之于经济制度和这些地区实行的政策这个观点有某种矛盾。经济学家们，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走得更远，甚至把60、70年代东亚的高速发展归之于采取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香港似乎符合那种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的观点。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开放的，然而政府在工资水平和发展经济的某些部门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但是用自由放任观点来解释南朝鲜、台湾和日本时，就会碰到

真正的困难。如南朝鲜造船业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70年代初期,朴总统召见一家联合企业的头头,要求他在朝鲜筹建一个大型的造船企业^①。在尝试筹建这样的大企业一段时期后,该企业的头头认为完成这个任务困难太大,朝鲜缺乏建造这一大企业的有关经验,最好的办法是等待,直到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才动手。据报道,朴总统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个企业只愿做那些容易完成的任务,那么以后就没有必要得到政府的有关帮助。由于该企业的许多经营业务是同政府合作完成的,这一关于中止支持的要挟,使得企业改变决策,准备造船。仅一年多时间,南朝鲜的第一艘超级油船下水,但是这时超级油船的市场正处于饱和状态。朴正熙政府伸手相援,给南朝鲜自制的油船以进口石油的优惠条件。几年后,南朝鲜成为世界上先进的造船国之一^②。

但是,人们描述政府—商业合作的制度,并不是自由放任。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政府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不仅仅是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而且表现在用奖惩手段对私人经济加以指导。除开鼓励出口外,朝鲜政府还用高关税和其他限制进口措施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只要研究日本和台湾的经济制度,人们就会发现同朝鲜明显类似的情形。三菱的奠基人岩崎在19世纪曾得到政府的帮助,政府购买他的毛织品制作服装,使用他的船只作为军事运输工具。在最近的年代里,日本的工业和国际贸易省(MITI),集中力量做了许多政府怎样才能指导产业的研究。

政府的这种计划并不总是正确和成功的。MITI试图巩固日本汽车工业的意图不是被有关的企业忽视了,就是被绕过了。

①此处朝鲜应为南朝鲜,下文的论述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请读者注意。
——译注

②对南朝鲜政府—商业相互关系性质的讨论,请参阅 L.P.Jones、I.Sakong 的《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商业和企业:南朝鲜的案例》(剑桥,哈佛东亚研究协会,1980)。

其结果在遍布美国各地的停车场和展览橱窗里看得很清楚。70年代朝鲜政府侧重重工业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的一个原因，虽然许多重工业后来成为主要的出口者。当然，即使有这些错误，经济制度在基本方面明显地没有削弱生产力的增长。相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相似的进口替代政策和政府方向导致了企业的低效率，以致于不能同外部世界竞争。

从结果来看，为什么东亚和拉丁美洲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答案恐怕在于拉丁美洲进口替代企业的所有者和经理能够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以保持高水平的保护，这样就无须提高效率。东亚企业家由于较为复杂的原因，没有形成必要的政治联盟，只能得到临时性的保护，使他们有机会积累经验，然后逐渐减少乃至取消保护。

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东亚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是否使得任何经济体制运行得更有效力呢？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案例是中央计划的、充分社会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北朝鲜和毛泽东的中国。在这个制度下，北朝鲜和中国确实都取得了较长时期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但两者都没有取得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由于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是由投入的增长带来的，因此实际增长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远远低于东亚高速发展者。

任何试图预测中国能否有日本、南朝鲜这样高的经济实绩，部分地取决于对中国能否足够地修正经济制度来达到生产率高增长作出的判断。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中国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并不要求照搬日本的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创造的计划制度起码要不阻塞为生产率高速度提高所必须的“创新”。中国能否建立这样的制度，将是第二篇论文的主题。

经济政策

大多数试图解释东亚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家，不是完全忽略上述问题，就是一带而过，不作深论。经济学家通常把经济和政治制

度和人力资源基础,当成给定的参数,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变量。他们着眼于政府推行的具体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和东亚四小的外向型政策是它们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不能用十分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外向型可能同生产率高速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成功并不主要地同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关,它只是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大甚至更有意义的是对生产率的影响方面,因为这种生产率需要在外国市场竞争。同样重要的是出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先进的技术,以及克服关键性中间投入品短缺的困难,因为出口使得外汇储备更充裕。

如果撇开东亚经济战略中外向型的一面,人们就很难发现还有什么经济政策对它们的成功具有重大的作用。有关的著作曾经认为,朝鲜的利率改革,增加了储蓄,消除了金融抑制,增加了朝鲜资本市场的效率。^①然而近来的一些著作对这些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因为高利率是这种改革的中心特征,但是朝鲜政府并没有长时期地维持高利率。

另一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外国的直接投资同东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远不像有些文献认为的那样,多国化会导致依附,因而妨碍经济发展。其实,多国化在东亚发展中起了引导作用。某些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找到案例,虽然在这个经济中大多数能动因素是当地的中国人和同香港、新加坡厂商有联系的东南亚华人。但是用这个观点看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并不一定合适。特别是日本,一直反对外国直接投资,直到面临着对日本出口报复的威胁时,才被迫开放了资本市场。60年代外国在南朝鲜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美元,在70年代年均只有1

^①例如参阅R·I·Mckinnon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华盛顿:布鲁金斯,1973)。

亿美元左右。台湾略高，60年代年平均为4000万美元，70年代为1亿8千万美元。这些数据是根据得到批准的数字，而不是实际实现的。即使根据批准的数字，南朝鲜和台湾在这20年中，外资份额只占了资本总形成的不足5%^①，台湾和朝鲜企业中绝大多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当地人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当南朝鲜和台湾建立精妙的壁垒，阻止外来的所有权和控制时，它们却欢迎其他形式的外资流入。朝鲜从商业银行和国际先进机构大量举债，债务超过400亿美元，是发展中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之一。然而，朝鲜拥有强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并没有产生债务清偿方面的困难。相反，近年来台湾从商业银行和国际先进机构中借债很少，在80年代拥有巨额的外汇盈余，是一个净债权人。

在50年代、60年代，朝鲜和台湾都得到了大量的美国援助，某些分析认为它们的经济成功同这些巨额援助关系极大。确实在5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平均每年超过1千万美元，接近这一年代台湾总资本形成的量。但在1965年台湾的GNP增长率开始加速时，美国就停止了经济援助。这个援助对安置大陆来到海岛的200万人口、引入各种改革和在收入提高时建立政治控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生产率的高增长，是在没有大量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

对朝鲜的援助比台湾的要大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朝鲜战争结束至1960年，朝鲜得到的美援每年平均为2亿7千万美元，以后的10年中，每年减少至1亿4千万美元。虽然直到70年代中期，经济援助才正式停止，然而得到可观的经济援助的最后一年是1971年。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援助同朝鲜的高增长率有关？显然，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朝鲜从战争的大规模破坏中迅速得到恢复，是

^①台湾投资和外援的数据来自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台湾经济年鉴，1985》，朝鲜的相应数据来自经济计划局：《朝鲜经济的主要统计1982（1982）》。

难以想象的。即使在60年代,朝鲜一开始几乎根本没有什么出口收入,如果没有援助,那就只能大幅度减少进口。援助使某些改革更易推行,但援助对政策的影响充其量只能是混合的。例如,曾有这样的怀疑:如果没有美国援助资金的流入,李承晚政府能继续它的灾难性的反经济增长的政策(如禁止同日本贸易,有害的高估汇率)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军事政变后,肯尼迪威胁要减少美援,由此反而刺激了某些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这个威胁导致了朝鲜关于民主政治的简短经历,然而一般说来可能的结论倒是要找到其他途径代替美国的援助,以减少美国对朝鲜国内事务的影响^①。朝鲜当局面临的可行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后几年发现的鼓励加工品的出口。

在这里当我们简短讨论东亚增长源泉时,在政策改革方面值得一提的最后一个领域是土地改革。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都经历了把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耕种者手里的过程。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土地名义的转移伴随着相当大的没收的成份,对地主不进行补偿。这样就有可观的财产再分配给以前的佃农。同时在日本和朝鲜的城市,战争毁掉了大多数人的财产;日本殖民者的撤出为朝鲜和台湾的财富再分配提供了又一来源。这些变动的结果是在这三个国家或地区战后开始时的收入异常平均化。

经济学家对收入不均影响增长方面知之甚少。许多增长模型的共同假定是,收入不平均对促进储蓄是必要的。这个假设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正确的。如果在大多数场合这一假设是对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收入如此平均的基础上,东亚取得了如此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

也许不平均的减少并非直接影响经济行为,而是间接地影响

^①这里的论断是基于推测。这个观点还须得到那些在当时直接参与关键性决策者的认可。

政治行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在50年代,东亚同大多数发展中社会相比,为经济成功地提供了更平等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人可凭借政策,有可能在经济上迅速得到发展。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得以实现或者抓住了机会。然而,许多人做到了,其他的人则从他们的创造性活动中得益。由于增长而带来的得益面是很广的,反过来导致了政治稳定,从而使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可以肯定地说,除开经济成功和由此取得的稳定以外,朝鲜的军人政府和台湾的大陆人主导的政府没有什么内在受人欢迎的地方。对日本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日本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低增长,或者只有大联合企业的经理阶层受益的话,日本自由民主党就不可能长期统治下去。

拉丁美洲很明显地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在巴西和墨西哥,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60%以上的国民收入,其人均收入是最低的40%人口人均收入的12倍。在日本、朝鲜和台湾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40%(朝鲜为45%)的国民收入,其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40%那部分人的4倍。^①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由于西班牙后裔和祖籍为当地大陆人之间的种族分歧,很难存在机会均等的观念。

如果把拉丁美洲的城市名流政治同东亚乡村人口发挥较大作用(城市国家除外)的政治加以比较的话,那就使本文离题太远。但是,这样的比较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减少不平均和广泛享有经济机会,导致较为稳定的政治;反之就会导致不稳定和另一部分人对增长政策的敌意。

这里关于日本、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有关讨论,对理解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情况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东亚国

^①这些数据引自 H·Cheney、M·S·Ahluwalia、C·L·G·Bell、J·H·Duloy和R·Jolly,《伴随增长的再分配》(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8—9页。

家或地区的高速增长可以用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和持续、稳定、促进增长的政府来解释。形式较宽泛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似乎可以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相适应。然而在全部分或大多数迅速发展者那里某些因素则是共同的：都实行强调加工品出口的开放经济政策；大多数在开始时收入较平均、在机会上很少等级和种族壁垒；没有一个实行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其中三个政府在投资和指导私人经济部分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 80 年代起步时，拥有同朝鲜、台湾一样强的人力资源基础。收入不平均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后大大减少；城市的不平均也由于大多数富人或是逃离大陆或是丧失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减少。1977 年以来，中国实行开放经济的政策，强调加工品的出口。1979 年以来的政治领导层是稳定的，为了取得迅速增长的经济政策具有求实的精神特征。中国和它的东亚邻居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规模和大部分工业仍然是按照苏联式的中央计划运行的。关于中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从集中计划转变为间接指导依然属于社会主义的工业，以及政治领导能否继续支持这种转变。这些问题是第二篇论文的课题。这里的主要之点是同它的东亚邻居具有许多重要的相同特征。如果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能有效运转，如果国际体系能容纳中国扩大出口，那么就极有理由相信，中国能达到东亚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率。谨慎地防止误解是重要的，但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之大，足以使我们值得探讨一下经济迅速增长的某些含义。

结构变动：都市化

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中国 80 年代中期相当于南朝鲜和台湾 50 年代的水平。进行这样的比较，要以一定年份的价格水平为基准，把人均 GNP 折算成美元。这样的换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使得结果不怎么精确。粗略地说，

以 1981 年价格水平计算的 1952 年台湾人均 GNP 约合 400 美元；用可比价格计算南朝鲜 1963 年人均 GNP 折合为 500 美元左右。如果用 1982 或 1983 年的官方汇率计算，中国 80 年代初期的人均 GNP 大概为 300 美元左右。但是如果用更系统的办法来计算的话，以官方汇率来计算的中国 GNP 被压低了。^① 准确的数据是 350 美元还是 450 美元，对这里的分析影响不大。

随着经济发展，在结构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两个变化。第一，每一个持续增长的国家，其国民产出中农业部分的份额不断下降，工业份额持续上升。第二，随着工业份额的增加，人口大规模地从乡村转入城市地区。

每一个国家的类型总有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但是一般而言，人均 GNP 增长率越快，从农业和乡村地区转移到工业和城市的结构变动就越迅速。在这一方面东亚的经历可用表 1 和表 2 说明。这里并没有包括新加坡和香港，原因在于它们在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乡村或农业部分，它们的乡村内地在国家边境的另一边。台湾和南朝鲜在它们持续迅速增长的开始阶段，国民产出中农业的份额 2 倍至 3 倍于工业的份额。30 年后台湾的工业份额 5 倍于农业份额；20 年后朝鲜工业份额是农业的 2.5 倍，用一代人的时间，农业社会就转变成了工业社会。当然日本的转变进行得更早，花的时间也 longer，原因在于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实现了部分转移，那时的增长率要慢于战后时期。表 2 中关于就业方面的数据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形。

那么，中国人口也将经历从农业和乡村转移进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吗？在 70 年代，中国的工业在 GNP 中份额已同农业

^①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用汇率换算计算出来的 GNP，作为国际间比较的基础是不可靠的。然而中国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中国的汇率同市场影响的关系是十分模糊不清的。

表1: 国民产出中的工业份额

南 朝 鲜	1962	1970	1975	1980
人均GNP (1980年美元)	475	810	1140	1490
GNP中农业份额 (%)	43.3	30.4	24.9	15.9
GNP中工业份额 (%)	16.0	30.8	40.6	52.4
台 湾	1952	1960	1970	1980
人均国民收入(1980年美元)	430	570	1120	2100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 业份额 (%)	35.9	32.8	17.9	9.3
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 份额 (%)	21.9	29.0	40.6	51.6
日 本	1910	1930	1953	1965
人均GNP (1980年美元)	1100	1600	1400	4000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 业份额 (%)	26.8	19.8	17.5	7.7
国内生产总值中工 业份额 (%)	22.5	40.3	42.5	54.0

资料来源方法: 农业和工业份额数据来自经济计划局 (EPB), 朝鲜经济主要统计1982 (汉城: EPB, 1982), 朝鲜份额数据以1975年不变价格计算。台湾的份额资料来自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 台湾统计资料1983 (台北, 1983), 第25页。日本数据来自Kazushi Ohkawa和Henry Rosovsky: 《日本经济增长》(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3), 第284—285页。台湾农业和工业资料以现行价格计, 日本则以不变价格计。这里工业包括除服务、农业、渔业、林业以外的所有部门。

人均收入数据同工业和农业份额数据不同, 是以1980年美元计算的, 从世界银行人均GNP数字起始推算, 用上述资料转回计算成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台湾数据是从上述来源得到其他数字, 这里并不是人均GNP, 而是人均国民收入。

表2: 总就业中的农业份额

南 朝 鲜		台 湾		日 本	
年份	份额 (%)	年份	份额 (%)	年份	份额 (%)
1963	63.1	1952	56.1	1910	62.5
1970	50.4	1960	50.2	1930	49.6
1975	45.5	1970	36.7	1953	42.4
1980	34.0	1980	19.5	1965	25.5

资料来源: 同表一。

份额相当,然而就业人口仍然高度集中在农业, 1983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的70%。因此,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同台湾、朝鲜处于人均收入600—800美元(以1980年美国价格计算)时的结构相比。但从另一个指标来看,中国的就业份额只能同世界上那些更贫穷的、人均收入200美元略多的国家相比。为什么存在着同世界平均水平的不相一致,中国的类型能否很快地、戏剧般地发生变化,这将是第二篇论文的课题。

东亚增长经历中某些结果是值得注意的,并且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以后20年中这些问题也会发生在中国吗?即使是偶尔访问东亚的人,也会注意到这个地区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社会。家庭收入中不断增长的比例用于电视机、电冰箱以及其他在世界上风靡的东西。随着冰箱的普及,人们就没有必要每天都去购买新鲜蔬菜。电视的影响更深远。在80年代初期的台湾和南朝鲜,几乎没有一个农户或城市公寓上面没有电视天线。反映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的图像进入了家庭,这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政府经常试图限制或控制这种影响。例如,朝鲜政府在1985年因为青年对先进国家的文化没有抵御能力和依赖于这种文化,要求美国限制“军事力量朝鲜网”(AFKN)对美国基地的电

波,并缩短播送时间。^① AFKN的情形具有特殊之处,然而即使政府施行普遍的检查制度,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老百姓从电视上所看到的東西。

汽车也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朝鲜、台湾和两个城市国家已经进入了汽车消费的阶段。在80年代初期,朝鲜私人汽车拥有量只有50万辆,但从人均拥有量来看,已经超过了60年代初期日本的水平。台湾只有朝鲜人口的一半,私人拥有的摩托车为60万辆。汽车需要可行驶的道路、销售汽油的服务站和沿路提供食品的饭馆。汽车仅仅是整个广义交通革命的一个部分,这个革命使得日本和东亚四小的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几乎都游览过大城市或在那里逗留过。朝鲜人很少有居住在离大城市需一小时汽车以外的地方,大多数人居住地离汉城也不会超过4小时的汽车。几十年以前的许多东亚人,从生到死就一直在那个村庄里,极其难得能到当地集镇以外的世界去看看。现在大多数人居住在主要城市里,即使自己不在,也有极易来往的亲戚住在那里。

东亚卫生方面的显著变化,大部分也要归之于经济的迅速增长。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台湾人口的预期寿命提高了10年,1982年男性为70岁,女性为75岁。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危害生命的传染病同西欧和北美一样,不再是个大的问题了。

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动,也是意义深远的。东亚的这些地区也大体上完成了人口学意义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以死亡率下降和人口的加速增长为开端,以出生率大大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为结束标志的。80年代初期台湾的人口增长率已降到每年1.9%,朝鲜为1.6%。台湾所有妇女的总生育率从50年代的6个以上下降到80年代初的2.5以下。随着总生育率的下降,妇女的地

^①《朝鲜通报》,1985年11月10日,第1页。

位和作用有了改变。在1953年,台湾中学注册的女生比例虽达总数的28%,但在台湾的大学中,只占15%,女大学生人数不足2000人。在1982年,女性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48%和42%。

很明显,东亚的经济发展使东亚社会发生根本改变有了可能。在日本,这一过程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在其他四个迅速发展者那里,二次大战前只有某些进步,大多数变化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到80年代初期,这些地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更加类似于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居民,而不像他们的祖先。一些朝鲜人和华人十分富有;相当一部分人较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主导文化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在日本,90%的人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中产阶级人数没有这么大,但发展的趋势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动;在政治领域缺乏相应的变化,是令人惊奇的。日本固然属于真正的民主制度: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诚实地选举,反对派也尽其所能有权自由批评。但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40年中,日本一直是由一党领导,没有一个反对党能有可靠的机会组成政府。像欧洲和美国的那种民主形式,忠诚的反对派能周期地替代执政党,这在东亚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在其他四个东亚政府中,新加坡虽有选举制,但是反对派组织和竞选是严格禁止的。南朝鲜也有选举制和积极活动的政治反对派,然而自从脱离日本、获得独立后,除开只延续了一年的一次例外,政府总是通过军事政变和其他非民主的手段组成的。在台湾,反对派人士可竞选地方官员,但是国民党仍然控制着各级政权机构的重要权力,总统也是终身制。香港由英国政府任命总督,无须选举制。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些延续过去几个年代的政府为投资

和迅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然而，这些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将来会继续下去吗？延续几个年代的一党制政府是否是东亚文化、特别是孔夫子的等级制和崇尚权力的传统的正常反映？或者说，东亚 50 年代至 80 年代政府只是封建殖民和农民为基础的传统政策向某种新的、甚至从未尝试过的民主或其他形式的转变时期的时代产物？如果发生这样的转变，它将是平稳的，或者它将伴随着长期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停滞吗？

这里的讨论之所以引入政治学，是强调除日本外，东亚进入现代社会并未完成。政治学同现代化过程如何发生甚至能否继续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个论断对中国的东亚近邻国家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中国本身而言，这个论断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在下篇论文中，主要论题将是：最先是日本、最近是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发生了剧烈的转变，80 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在相同发展过程的初期阶段。中国在事实上是否将这一过程彻底转变到一个现代的都市和工业社会，那么同资本积累、先进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要依政治状况如何而定。

中国是否沿着东亚的类型发展？

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拉丁美洲或非洲、甚至同南亚的发展类型都很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毛泽东逝世为止，即 1949—1976 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条同东亚邻国不同的道路。

同东亚邻国相类似，中国在 1949 年时具有孔夫子的传统，强调教育，许多人具有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精英人物虽说人数不多然而很有意义。现代前都市和商业的发展使亿万中国居民具有了有关的经验。对这个比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共产党增添了在以往政权下所没有的成份。

自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第一次,共产党取得了统一和结束了内乱。然而不像19世纪后期的帝国政府,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动员为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在19世纪税收只占GNP的2%,在1949年后提高到GNP的30%以上。这些税收的极大部分形成资本。为了增强人力资源基础和方便主要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现代技术,教育也急剧扩展。扩展的大学部分,从人文和社会科学转向工程和自然科学。数千名中国人派往苏联接受研究生培训,学习工科和理科。上万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实现工业化。由财产所有权极大差别带来的不平等现象,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和政府没收大多数城市财产而消除。

在这些方面,中国在50年代的经历很像东亚邻国,只有一个区别即中国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当时也比50年代的台湾和南朝鲜更穷,主要是由于中国在1910—1949年期间经历了战争和内战,而南朝鲜和台湾在殖民统治下经历了稳定和某种增长。

然而,中国和它的邻国之间最重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人均GNP的差距。正如上篇论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引入了同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中国的选择,在许多重要方面,是因袭了苏联30年代的东西。像那时的苏联一样,50年代的中国认为自己被敌对力量包围着,因此重视机械和钢铁工业,而不是消费品,以此为手段来更快地发展和加强国防力量。中国在50年代确实进口了大量的投资品,但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一有可能,就尽可能地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其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虽然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和一些矿产品,限于必须范围,它只是为了支付进口,并无其他目的。

同闭关锁国的经济相伴随,1955年和1956年关于重工业战略所作出的决定,是彻底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除开小型的零售商和

工业企业,其余都由国家经营。农业方面彻底实行集体化,1956年是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在农村的消费品分配方面和零星的农副产品方面,容许市场力量继续发挥作用。但在工业方面,集中计划代替了市场,像苏联模式那样,用行政力量分配关键的投入品。

部分地由于这些变化,部分地尽管有这些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加速,从30年代和40年代微不足道地增长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增长率高达7%或8%。尽管有这些初期的经济成功,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并不满足。毛对中国的救世主观念,虽然大部分同经济学无关,但在1958年和1959年,这个观念包含着中国能够发现新的和更快的道路取得经济发展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信念并不是源自苏联,也不是源于东亚的其他地区,而是源于毛自身的经历。毛通过自身的经历认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达到任何似乎达不到的目标。当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时,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激励任何人。当时日本的经济成功,也仅仅只有几年的历史,东亚其他地区甚至还没有起步。很少有日本人能预见到他们的繁荣会不间断地持续20年之久。

1960年大跃进失败,结束了通过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极端形式。以后16年的中国经济政策,是在两派力量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的:一派试图回到苏联模式,强调集中计划和重工业,另一派仍然试图采用群众运动方式,虽然是在较小的范围,主要是在乡村地区。那些强调群众运动方式的,在刺激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方面,也倾向于减少物质方面的激励。工资差别同乡村地区和公社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被保留下来,然而这些差别的激励特性并不存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不管表现如何,几乎没有人能晋升一级工资。农村的工分值,对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很不注意,且不常变动。

在对外贸易和技术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争论。但是,争论的

任何一方都没有表现出对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有什么兴趣。同毛泽东联合的那些人批判了外国技术的几乎所有方面，提出中国人、甚至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能做得更好。另一派只是简单地声称，浪费资源去重新发明新东西是不明智的，在某些部门，特别是石油化学方面，从外国进口设备更有效。

关于物质刺激和外国技术作用的争论时断时续，部分地要依反对力量的相对力量而定，引进设备也时多时少。但在贸易界以外，甚至某种程度上在贸易界内部，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惊人的一致。在理论上是把农业作为基础，但在1962—1976年整个时期，大多数投资投向了重工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1966—1969)，撤消了中央部委，包括计划委员会在内，这对官僚体系是沉重一击。但是集中计划和行政分配大多数工业投入品仍然得以保留。一个变化是把计划分散到省级，对小型工业企业，甚至下放到县级管理。在农村，试行了生产大队(包含几百户家庭的单位)级的管理，当然大多数农业生产仍由生产队(包含20—30户家庭较小的单位)控制。保留占可耕地7%左右的自留地的做法，以及为销售自留地产品而保留的乡村市场，遭到了批判，然而这两者依然存在，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限制。

这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政策和争论的结果，远不是灾难性的。只有在1967和1968年，文化大革命政治活动达到高潮时，工业生产、也许还包括GNP在内下降。农业影响较少，只是在1972年减产，也主要因为气候因素。即使包括大跃进及其后果，依据计算价格水平的年份不同，中国1957—1976年期间GN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或5%。^①

但是经济愈发没有效率，特别是能源使用方面浪费惊人。根

^①关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更系统的计算，参阅D·H·Perkins的《中国文革时期的经济政策、状况及其后果》，《发展讨论报告》，第161期，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1984)。

据一种估计,1美元国民产出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2.5倍^①,而印度自认为利用资源效率不高。由于发现了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尽管能源方面的浪费,仍然使中国的GNP能继续以较高的水平增长。

人均GNP每年增长2.5%左右,但是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增长得没有这么快。GNP中用于资本形成的份额稳定上升,产出中用于军事方面的比例也有某些提高。城市中2人就业和3人就业的家庭增加,意味着尽管工资冻结,家庭收入也在增加。乡村收入增长较慢,这是因为农业产出仅仅同年增2%的人口增长相同步。乡村收入有所增长,原因在于政府收购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价格在提高。

这样的经济体制,能在将来继续不断地存在下去吗?并没有明显的危机使得经济停止运行或被迫改变。70年代中期石油产出的快速增长,在1980年似乎已经结束,这样就必须更加注意节约能源的措施和暂时把以重工业为重心转移开去。中央计划体制一般会陷入这类瓶颈状态而被迫改变。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集中计划不会遇到类似的挑战。事实上,在1980—1981年,基本上是苏联式的工业体系确实遇到了挑战。

收入和消费的缓慢增长也造成了困难,特别是工业劳动纪律松弛,造成了工业的低效率,还有罢工发生。在并没有辞退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竟然可以一个月不上班以至于更长。虽然劳动纪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在以后改革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但中国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并不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问题。这是因为存在着几亿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一有机会,是极愿和城市工厂职工交换岗位的。如果劳动纪律无法控制,确实可以实行这种替代。甚至仅仅是类似的威胁,也足以使城市劳动力回到工作岗位。

^①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1)附录E,第13页。

由此可以相信中国式的苏联经济体制将有足够的余地，一直延续运转到 21 世纪。人均 GNP 仍可继续以每年 2% 或 3% 的速度增长，时高时低，具体得依是否能发现油田、政治动乱的程度以及中国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确定。如果这个体制继续下去，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中国作为东亚增长类型一部分的问题，中国社会也会发生转变，但这需要经历许多年代，2000 年的中国，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能有所提高，但同今天差不太多，同现在已经城市化的南朝鲜或台湾相比，则差距很大。

改变体制：1977—1985

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领导层并没有简单地保留以前实行了 20 年的体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随着体制的变动，从 1977 年开始至 1985 年这 9 年间，经济增长加速，年均速度为 8%。结果是在这样短的时间跨度内，中国的 GNP 增长了一倍，人均国民产出每年平均超过 6%，总的提高了 75%。消费增长得更快，因为 GNP 中的资本形成份额实际有所下降。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正如在上篇论文中所指出的，日本、东亚四小和中国增长方面的差别并不在于生产投入的增长率，而在于前者的生产率增长率高，中国缺乏生产率方面的改善，导致了这些差别。1976 年以后中国加速增长，是生产率大提高的结果。中国投入的增长率，如果不能说根本没变的话，也只能说是变动甚少。实际上，中国的 GNP 中用于资本形成的份额，在 1976 年后还略有下降，当然资本品的增长率高于 1976 年前的水平。1976 年后劳动力仍然同以前 20 年那样，以年均 2.5% 速度增长着。应用计算日本和南朝鲜生产率增长同样的方法，1976 年后中国 GNP 每年增长 8% 中其中有一半要归之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①

^①关于估计生产率变动简短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附在本书的附录内。
——这里附录从略—— 注译

由此可以相信中国式的苏联经济体制将有足够的余地，一直延续运转到 21 世纪。人均 GNP 仍可继续以每年 2% 或 3% 的速度增长，时高时低，具体得依是否能发现油田、政治动乱的程度以及中国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确定。如果这个体制继续下去，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中国作为东亚增长类型一部分的问题，中国社会也会发生转变，但这需要经历许多年代，2000 年的中国，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能有所提高，但同今天差不太多，同现在已经城市化的南朝鲜或台湾相比，则差距很大。

改变体制：1977—1985

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领导层并没有简单地保留以前实行了 20 年的体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随着体制的变动，从 1977 年开始至 1985 年这 9 年间，经济增长加速，年均速度为 8%。结果是在这样短的时间跨度内，中国的 GNP 增长了一倍，人均国民产出每年平均超过 6%，总的提高了 75%。消费增长得更快，因为 GNP 中的资本形成份额实际有所下降。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正如在上篇论文中所指出的，日本、东亚四小和中国增长方面的差别并不在于生产投入的增长率，而在于前者的生产率增长率高，中国缺乏生产率方面的改善，导致了这些差别。1976 年以后中国加速增长，是生产率大提高的结果。中国投入的增长率，如果不能说根本没变的话，也只能说是变动甚少。实际上，中国的 GNP 中用于资本形成的份额，在 1976 年后还略有下降，当然资本品的增长率高于 1976 年前的水平。1976 年后劳动力仍然同以前 20 年那样，以年均 2.5% 速度增长着。应用计算日本和南朝鲜生产率增长同样的方法，1976 年后中国 GNP 每年增长 8% 中其中有一半要归之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①

^①关于估计生产率变动简短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附在本书的附录内。
——这里附录从略—— 注译

题，但对经济的其他部分也有影响。中国在1978年较大幅度地增加城市职工的工资，这是15年来第一次。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重新恢复了工资体系中的许多激励机制，包括晋级、计件和奖励优异工作者。然而增加工资，只有在能够购买到职工所需要的东西时，才是有意义的。他们最需要的是较好的住房，在这10年里或更长的时间里，很少新建住房，并且住房分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其他消费品也处于短缺状态，这是因为强调机械和钢铁生产。在1978年初重新发布的10年计划中，又重新强调了重工业。

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并不是处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自给自足和重工业中的不协调问题，而是在推进改革方面向前跨了一大步。整个1979年，政策变动公开了，并具有了势头。由于能源短缺加剧以及为强调物质激励提供支持，重点由生产资料生产转到消费品生产。十年规划中号召开发相当于10个新的大庆油田，实际上这样规模的油田一个都不存在。1962年至1978年间，石油产出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但1979年只增长2%，1980年实际产出下降。

面临能源短缺加剧，直接的解决方案是把重点转到使用能源较少的部门，特别是消费品生产。长期的方案则是发现更多的油田和更快地开发中国已知的大型煤矿资源。为了后一目的，中国政府邀请外国石油公司联合开发近海石油。这同1962年以来强调自主开发、不要外国任何形式的贷款和少用外国技术的政策，有着极大的偏离，在以前从未考虑过外国资金所有权。

外国石油公司介入中国经济，仅仅是更多地利用外汇这个大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合资企业条例于1978年颁布，以期鼓励外商在许多领域直接投资。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从上述组织以及日本、西欧的进出口银行借款。建立了以自由贸易或出口加工为宗旨的经济特区，鼓励出口和进口先

进技术。原先只让少数外国人作为特殊贵宾入境的限制性签证政策,让位于积极鼓励外国旅游者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积极鼓励全国的所有企业为出口而生产。经理们开始注意市场,而市场这个概念,在以需求过度和束缚市场为特征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是一个不需要、不相关的异己力量。中国初期在西方销售的努力,具有滑稽的一面,如用“白象”作为电池的牌子。^①通常是在香港商人的帮助下,企业学习得很快。到1982年为止的4年中,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年增长22%,如果以名义货币计算,则增加了一倍多。

农业改革甚至比外贸方面更快。类似于外贸,在过去的几年里,农业改革积累了势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鼓励农民在扩大的自由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和征购剩余的那部分产品。在70年代初期,虽有称之为乡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存在,通常人数不多,交易也有限。在1979年人们穿越中国郊区的早晨集市,就会发现那里聚集着上千人,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买卖交换。到1985年,政府甚至对主要农产品取消或缩减了征购定额,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取得国家所需要的产出。

同市场方面的改革相比,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开始进程较慢。初始的问题是如何在生产队的工分体系中为繁重的劳动更多地引入物质刺激,以及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减少较高层次行政方面的过多控制。根据实际表现评定工分的制度障碍,并不像左派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困难,会使生产队成员坐下来好长时间争论各自的劳动努力。它实际上是节省了时间,避免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因为每人每天不管其努力、技术和完成任务的能力如何,基本上评定差不多的工分。解决这种趋势的一个办法,是根据完成的任务来支付工分。

^①白象 (white elephant) 在英文中含有大而无用的意思,因此说出口“白象”牌电池,是很滑稽的。——译注

从根本上说,责任制就是在这—方面改革的努力,试图用这种方法确定任务,并把它分给小组和个人完成。开始时这种改革保持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体制。但在分派指定的作业和完成任务给予报酬时,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把任务落实到个人或个体家庭。这样农民们明白,他(她)们的努力最终变成自己家庭的报酬,而不是为集体组织的其他成员,这些成员也许做了他们的工作,也许根本就没有做。^①

到1982年,75%左右的农业任务分配到农户;到1983年夏季,达到95%。给单个农户指定具体的任务,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可以⁶得到单独的土地,种植根据生产合同所规定的庄稼。分到农户的土地为期15年,以后年限又有所延长,以此鼓励对土地更多的投资。由此实际上结束了集体种植。中国回到了小家庭农业的制度,这同东亚其他地方实行的相类似,只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

从现有的证据看,这个改革并不是由中央当局单独推动的。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干部可能从来没有预料到改革会走得如此之远;许多基层干部竭力阻止把种植粮食和其他主要作物的责任下放到农户。这种责任下放不仅意味着地方干部丧失权力,而且相对减弱了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起初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责任制只容许在最穷的省份,如安徽实行。尽管干部阻挠,责任制在农民中的传播使得它迅速扩展。也许可以这样说,较弱的干部或集体制度较少支持的地方首先改变,然后对邻近的干部们造成压力,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上述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首先是由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允许并鼓励这个进程,然后对

^①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初期斗争的详细讨论,参阅 William L. Parish 编的论文集:《中国乡村发展:巨大的转变》(Armonk, M. E. Sharpe 1985)。

形成的局面正式予以批准。^①

农业方面改革对 1976 年后中国经济实绩的重要性是显著的。1978年后 6 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 9.4%,而在以前 20 多年的时间里,年增仅为 2.9%。如果农业(包括乡村工业)继续以 2.9% 而不是较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到 1984 年中国的 GNP 年增长率不超过 6%,而不是现在的 8%,生产率的增长就不及现在已达到的一半。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综合起来,可以算作生产率增长的剩余部分。

1985年前进行的工业改革以及农业改革,除开那些同外贸和投资有关系的部分,工业方面进行的改革更难评价。概略地说,1985年前的工业改革,相对于上级经济管理者而言,给企业经理以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为此目的,强调以增加利润,而不是以总产值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投资决策越来越多地由较低层次(包括企业)作出,而不是由北京方面。代替以往的把大多数利润上交中央的做法,改革原则上要求企业只须根据固定税率上交,其余利润留给企业自身,当然这在 1984 年并没有实际执行。改革要求在一定的地区内,努力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水平。以前一个城市中(如重庆)许多企业的产品在本市范围内、甚至在一个省或整个西南地区,有一个垄断市场。改革容许远方城市如上海的厂商在同一市场销售,只要企业有这个能力。由于一般说来上海的质量、技术要超过重庆,那么重庆的企业就不得不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或以其他努力,在相应的领域进行竞争。

尽管有上述变化,集中计划的苏联模式其基本特征在 1984 年仍然存在。虽然市场分配产品的比例在增加,但是关键性的投入品主要由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分配。新建项目的投资决

^①如参阅 David Zweig:《中国乡村中的反对变革:责任制和人民公社》,《亚洲调查》,23卷第 7 期,1983 年 7 月。

策不是由北京,就是由省级计划者作出。企业继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计划指标,而不能实行利润最大化或者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由企业自行决定所追求的目标。除开少数合资企业和郊区的许多小企业,所有制仍由国家掌握。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一个彻底的、然而措辞模糊的文件,要求进一步进行工业改革。这个改革呼吁是否实行以及如何实行,将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改革会继续下去吗?

作为本文的目的,其核心问题是,起始于70年代后期的改革能否保持必须的力量,以保证中国过去8、9年的迅速增长继续下去。这个问题隐含的前提是,要继续使生产率增长就必须改革;如果退回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体制,就意味着回到那时较低的GNP增长率,甚至更糟。另一个假定是,在中国的情况下,改革意味着接近(至少在某些关键方面)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强调对外贸易扩展的作用;家庭为基础、对市场作出反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在工业方面,不断增强在国家指导下的、而不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市场的的作用。达不到或不能保持这样水平的改革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停止或者极大减慢。在没有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也可能继续有大幅度地增长;即使进行进一步改革,增长也可能减速。例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大大超过了现在的中国,然而没有人会期望这两个国家能在下个10年或20年达到6%—8%的年均GNP增长率。但是,本文以下篇幅则假定继续改革将有助于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GNP增长率。

中国未来经济的前景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层次是在没有政治变动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经济力量,能改变目前看来似乎十分光明的前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政治环境能否继续

支持高增长的政策？第二个层次不仅仅简单的是个邓小平以后由谁继承的问题，它还包括这样的内容，比如改革本身是否为以后进一步的改革积蓄力量或者将会破坏现已取得的改革成果。

二次大战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其他地区表明，GNP年增长8%，甚至更高，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以人均收入、人力资源禀赋、资本形成水平和收入不均程度等方面加以衡量，中国具有同她的东亚近邻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相类似的特征。那么，中国不同于朝鲜或日本的其他方面的特征会使她的增长前景较悲观些吗？

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差别，在于她的规模。中国巨大的规模会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前景？中国规模大的一个优势是自然资源丰富，东亚邻国则不然。当然这里并没有把以后的能源短缺考虑在内。80年代初期，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全国和地区的实际问题。例如70年代中期，当武汉钢铁厂扩展时，计划者竟没有考虑到新的轧钢厂所需的巨大的电力消耗。要按生产能力开动轧钢厂，那么全武汉所有企业都会因缺乏电力而关闭。在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案是直截了当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发电厂，要开发更多的油井和煤矿。80年代初期中国改变优先序列时，正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内能源供给1980、1981年停滞，1982年增长5%以上，1983年增长接近7%，1984、1985年达到或超过8%。中国的东亚邻国决不会采用增加国内能源生产这一方案的，对它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可进口多少或通过能源转化努力，节约多少。80年代初期，南朝鲜和台湾仅仅是石油进口就占总进口额的20%至25%。中国的石油业则是取得外汇的一个来源，数额虽少，但意义较大。

规模大的另一方面含意可能对中国并不有利。大国同小国相比，其出口率要低得多，也就是说中国较少依赖外贸。由此可见，中国从外贸方面的得益要少于那些外贸占GNP比例高的国家。那些国家较容易地专门生产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产品，其余产品则

可通过进口解决。为出口而生产也给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输入了国际竞争的意识。中国的出口企业也会得到有益的刺激，但是相对于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企业来说，出口企业太少了些。当然不管这一论断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不能把结论推得过远。中国在80年代的贸易比率同日本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油价前的1973年差不多相同。日本经济的大多数为本国国内市场生产产品和劳务，当时日本依然设法从生产率方面得到较大的收益。

对中国来说，国际贸易方面的主要危险是世界市场也许没有50年代和60年代增长迅速，也没有那时开放。盛行的保护主义对加工品出口者是十分现实的威胁，然而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注定会失败吗？中国在80年代初期的出口额只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强，这就为中国成为“另一个日本”前的出口扩展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虽然南朝鲜、台湾和香港的工资现在远远高于中国，在美国和欧洲的新市场上，中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同上述地区相比，还没有多大的竞争力。再说，日本和美国的进口限制确实会影响中国产品，但从政治和战略的原因考虑，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微弱的。总之，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外部经济环境会限制中国的出口努力和增长。内部力量是否会阻止出口增长将在以后讨论。

最后是中国的农业问题。中国农业在1979—1984年间的快速增长和国内粮食出现过多剩余，导致了国内外的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分析家们短暂的欢乐情绪。1985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农业的长期前景。类似于东亚其他地区，中国必须以十分有限的土地养活大量的人口。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都采用进一步依赖进口食物，特别是进口粮食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能更大地依赖于粮食进口吗？如果中国人均进口粮食达到1981年南朝鲜那么大，中国就必须进口1亿8千万吨粮食。世界粮价必然急剧上涨，即使中

国外汇收入在以后10年或20年继续迅速增长，外汇储备也会减少。

由此看来，中国的规模和较低的出口率表明中国必须在农业方面有足够的投资，使国内农业生产保持一定高的水平，防止从国外进口的食物过大。是否“过大”，要依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速度、粮食剩余国的粮食增长率以及农业投资的生产率和农业研究等因素而定。总之，中国必须控制进口粮食，进口份额要低于东亚邻国，可能使中国在综合生产率方面更难取得像邻国那样的增长率。尽管有80年代初期的经验，中国以后10年或20年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类似于东亚其他地区，不太可能像工业那么高。

政治学、改革和未来增长

这两篇论文的一个中心议题是，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依赖于支持性的政治环境。这是中国的东亚近邻在过去所证明，也是中国1976年后自身的加速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任何预测，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国家在以后10年、20年内的政治环境是否仍然对经济增长和鼓励增长的政策持支持态度。

这一问题通常是以邓小平放权以后会怎样的形式提出的。谁将是邓的继承者，能继续他的政策吗？

损害改革的力量

是什么将会使一个今天的积极改革者，认为改革是失败的，必须倒退回去？最明显的实例可能是改革没有能保持经济的加速增长。80年代中期改革的势头部分地是由于有目共睹的成功，特别明显的是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可能有权力使农业改革退回去，恢复到集体农业，然而有哪个中国领导真的会去试一下呢？作出这样的尝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会导致农业生产率和乡村生活水平增长率的下降，甚至是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难道出于

对原先公社体制的意识形态偏好、对农村政治控制进一步加强的愿望以及集体化等因素，就值得在乡村生活水平和国家食物供应方面冒险吗？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许答案是肯定的；但在现在的中国领导层中没有人会对中国的未来持毛同样的观念。

最大可能的是现行的领导层会建立这样的共识，即改革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增加了腐败程度和加剧了不平等。1985年通货膨胀压力已在中国城市居民引起了大的不满。经历了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和30年来价格基本不变以后，中国人对价格上涨缺乏忍耐性，即使是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也不行。因为农民在涨价中得益更多，受害较少，因此问题似乎集中在城市里。某些涨价是暂时性的。例如北京明显地是试图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因此规定除开居住在北京市的农民以外，禁止蔬菜进城。结果是蔬菜价格猛涨，最后只好迅速决策，允许让更远乡村地区的蔬菜进城。但是也有一些通货膨胀的压力是长期性的，这是由改革导致并公开化的。在价格冻结时，通常把个人剩余的钱存入银行，那时要得到短缺物品，唯一的办法是排长队和走“后门”。某些物品仍然供不应求，但越来越多的物品，特别是食品类，可以自由购买了。

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也意味着增加奖金和其他工资，超过了消费供应。由此造成价格上涨的压力。最终所有这些压力可以通过更有效的管理宏观经济变量予以控制，但是有效的控制并不是马上就能达到的。在这同时，城市消费者将继续批评高价格和埋怨改革。某些人也许情愿回到以前短缺和排长队的时期，但更多的人只是简单地批评通货膨胀，享受着更多更好的物品，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腐败和不公平问题以某种方式联系着，对未来改革造成更大的内在的危险。差不多30年来，中国领导人要求为公众利益无私工作，特别要求党员以此为准则。但在实际上，高级官员包括党的干部，比普通工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和享受其他特权。普通的城市

职工也享受着比郊区大多数人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但是上层人物的特权大部分是隐蔽在警卫森严的大门以内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奢侈性消费常使政治人物声名狼藉。那些没有政治权力的人，一般说来也缺乏致富的手段。在中国经济权力充分社会化了，城市社会和集体乡村社会掌握在具有政治权力的人手中。

相反，到80年代中期，政策鼓励个人致富，新生的个体和集体部分有办法致富。党的干部们依然远离这些活动，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坐着观望；那些原先没有什么影响和权力的人，则新建住房，购买彩电。某些，也许为数不少的干部，经不起诱惑，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

在中国这样高度集中控制的社会里，腐败问题是很难定义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一般需要企业间进行互惠交易。计划充满着错误，这些错误可由一企业用它剩余的产品去交换计划和分配中短缺的其他投入品。由于这些投入品在市场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过程是建立在个人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从原则来说，这个过程是非法的，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整个体制就会无法运转。那些精通此道的企业就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企业领导就能得到晋升或其他形式的奖励。

什么时候这些互惠的活动就成为腐败行为？这是很难回答的。肯定地说，某些极端的案例，是简单明了的。如一个负责许可证发放的官员，如果只有在暗中得到金钱以后才肯签发，那么这在任何制度下都是腐化行为。但在中国批评那些致富的官员，并不仅仅限于接受贿赂。在某些党员眼里，几乎任何其他党员得到较多的物质利益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使这些利益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的也不行。某些批评只是简单地出于嫉妒，如城市居民谈到乡村居民变得比他们更富裕时就是这样。但在党员中，也有一些具有这样的信念，认为党员至少在个人生活上要节俭，要作出个人牺牲，这是同通过任何手段想方设法致富的观念不相容的。

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干部利用这个体制为他们的小单位谋利，而不是为他们本身。如海南当局在黑市上购买外汇，进口低税或免税汽车和彩电，然后再转销给全国各地就是一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可得到某些奖励，但巨额收益主要是为单位赚取的。他们违法行为的主要之点是，由于他们的投机，使国家损失了10亿美元的外汇。如果损失是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的话，这些官员可能不会遭到批评，最多只是温和的批评。在黑市上购买外汇明显是违法的，他们能够购买如此之大的数额，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违法买卖外汇的行为是多么普遍。

在控制较少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可以用他们的机智增加财富。无论交易收益归属于谁，只要在合法市场上的任何交易都是正当的。这些市场要有合法的规则和制约，任何违反规则和制约的行为明显是违法的。经济上的成功，并不需要个人或企业破坏这些规则。社会很容易认定什么是非法的，谁是违反者。当违反者是行政官员时，就称之为腐败，虽然这个名词有时也可用于某些民间方面的活动。

正如刚才已经指出的，在中国个人和企业必须想法通过复杂的、经常是自相矛盾的规则和条例的布雷区。要取得成功，并不是严格地遵循这些规则，而是要仔细选择遵循哪些规则，忽略哪些规则。这种状况由于中国法制传统薄弱而加剧，但问题还是源于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和广泛依赖政府直接控制经济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腐败就成了一个高度主观性的概念了。它的含义要随在中国掌权的人的观念而定。

城市改革的复杂性

恐怕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不是通货膨胀或者腐败，倒是这一过程的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意味着改革在实施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错误将会导致经济退步，就会影响政治对深入

改革的支持。

改革过程为什么如此复杂？其原因在于从集中计划和行政分配投入品的体制转变到极大地利用市场力量的体制，必须经过若干必须的、相互影响的步骤。这些步骤中有一步实行不好，就会影响其他步骤的有效性。

什么是最关键的步骤，使得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有效运转？从根本上说，需要五个方面的变动或改革，其中三个方面是绝对必须的，两个方面则是十分需要的。

1. 产品必须在市场上买卖，这也包括占有相当比例的国营企业的中间投入品。如果投入品不能自由买卖，企业经理们就会继续消耗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去试图影响中央计划和那些控制着基本原材料的行政分配官员。其结果企业经理仍将是执行官僚等级体系中上级官员命令的基层官僚，企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主决策。

2. 如果只是简单地让产品在市场上买卖，那些产品的价格并不反映在经济中相对稀缺程度，那么就会导致投入的错误配置。中国工业投入品的价格被冻结了 20 年甚至更长。产品价格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稀缺程度，也只是反映了 50 年代初期的状况。当时的工业经济从规模上说只有 80 年代中期的 1/20 左右。对价格进行重大改革是必须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是由中央当局确定买卖的任一产品的边际成本呢，或者就让产品自由成交，价格自由浮动，直到达到均衡价格？如果没有下面第三个步骤，这后一种办法将会导致一片混乱。

3. 第三个步骤是企业经理和其他人员在产品买卖中要遵循市场规则。从根本上说，他们必须使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追求类似利润最大化的合理目标。如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们就会设法少用价格高的投入品，更多地使用价格低的投入品。相似的，它们的产品组合就会偏向于价格上升的产品，而不去生产跌价的产品。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经理继续试图追求总产值最大化,忽视利润和投入品的成本费用,市场就无法运转。1977—1978年和1984—1985年的外汇运行机制阐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从国外进口投入品的权力下放给基层以后,它们立即大大扩大了对外购买,使外汇储备下降,很快就又恢复了集中控制。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促进了购买风潮,但是如果没有管理企业行为方面规则的根本改变,货币贬值就将更为严重。

在乡村地区实行改革要容易得多,这是由于在农村较易满足上述三个步骤。当决策权下放给单个农户时,第三个步骤就实现了。农户天然地是利润或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由于农户的物质福利要依实现这一目标如何而定。甚至生产队领导也比企业经理更倾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由于农业不像工业,在生产队的福利和收入最大化程度间存在着更明确的依存关系。由于农产品相当大的比例已在市场销售,1985年前就容许价格波动,因此在乡村中价格和市场也更易自由开放。

即使在乡村地区,引入市场力量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地在于实行下列两个步骤存在着困难,而要真正有效地改革,就必须实行这两步。

4. 必须妥善实行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如果放松控制,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又伴随工资的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就会螺旋式地展开。随着原先被控制价格所抑制的需求扩张,改革初始阶段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以后会怎样?由于政府不懂得如何阻止它,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通过抑制城市工人的工资阻止它,通货膨胀会继续下去吗?

5. 第五个步骤要求在产品买卖中消除垄断。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市场才会具有效率方面的高收益。中国在80年代以前,倾向于在一定的区域内给企业以垄断地位。甚至县级企业在本县市场也有垄断,这也阻止了它们在其他县的市场销售产品。

到1985年中期,中国在上述五个步骤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①企业间引入了竞争,特别是在商业方面,以及某些消费品和工业投入品的生产方面。通过把利润同工人奖金联系起来,把小型投资项目同工厂经理的利益联系起来的手段,利润指标得到了加强。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产品比例大大增加。设立了计划内外分配产品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价格变动较小,计划外产品经常以高得多的价格买卖,接近社会的生产价值。政府也承认需要在宏观管理领域做更好的工作,然而抑止通货膨胀的努力并不十分有效。

总之,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实际和持久的努力来改革经济体制。1985年存在的体制,仍然是一个并不理想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成分混和的模式。这种体制运行的复杂性会导致错误;如果错误十分严重将损害改革。另一方面,到80年代中期,我们不能认为改革已经失去了势头。根据我的观点,不能认为改革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会丧失势头。如果这种信念是可接受的,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高速增长将会继续下去。这里所谓的高速增长是指在以后15年或更长时期内,GNP年均增长6%—8%。

如果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8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于从乡村农民社会作出重大转变的边缘。在以后10年如何处理好这种转变,将会决定中国社会和未来经济进入21世纪的框架。中国面临的某些重大选择,是本文以下要讨论的主题。

^①当前在工业改革方面的最好成果,是由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完成的。例如,参阅William Byrd、Gene Tidrick、Chen Jiyuan、Xulu、Tang Zongkun和Chen Lantong,《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世界银行成员工作报告》,第652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4年)。

高增长率及其结果

如果中国人口增长率保持现在 1.5% 的水平, 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 6%—8%, 折算成人均年增长率就是 4.5%—6.5%。中国领导层希望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但是到 1985 年已经愈来愈感到“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过于严厉而难于坚持。正如人口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 彻底实行“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 在 21 世纪将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少数处于工作年龄的人, 即以前的独生子女, 将扶养比例十分高的退休者, 即他们年迈的双亲。到那时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是大部分处于工作年龄的人(他们是 50 年代、60 年代人口爆炸时的产物), 正在扶养一小部分退休者。而且由于东亚严重偏好男性后代, 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会导致性别比的较大失调。例如, 南朝鲜汉城的医院在 1985 年报告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为 1.17 : 1.0。由此政府规定禁止使用超声波和其他医学手段来鉴别怀孕的胎儿性别^①, 而朝鲜的计划生育还是完全自愿的。由于这些和另外一些原因, 中国可能在独生子女的政策方面有所放松, 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②

如果人均收入年增长 4.5%—6.5% 能持续的话, 中国将从 80 年代中期的人均 300 美元至 500 美元左右提高到 600 美元至超过 1200 美元左右。我们这里的讨论, 采用 800 美元至 1000 美元(以 1985 年价格计算) 这个差距较小、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假如果真如此, 中国就基本上重复了南朝鲜在 60 年代的增长经历。中国将用 15 年时间完成南朝鲜和台湾比这略短一点时间内做到的事情。用历史的标准看, 这三个国家或地区转变到中等

^①参阅《朝鲜通报》, 1985 年 12 月 27 日, 第 8 页。

^②请读者留意, D·H·Perkins 这里的讨论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译注

收入社会已经是(或将是)特别迅速的。

在上篇论文中,已经讨论了南朝鲜和台湾人均收入提高的意义。中国的经历将是同样的呢,还是有理由相信存在极大的差别?

城市化和离农就业 (off-farm employment)

历史地看,人均收入从 400 美元增加到 800—1000 美元时,伴随着农业就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平均说来在农业(包括采矿业)的就业比重将从 60% 以上下降到不足 50%。^① 例如前面已指出的南朝鲜和台湾农业就业份额变化,就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类型相似。随着就业比例的变动,就居民整体而言的人口份额变动甚至更快。从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来看,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居民比例从 20% 略多一点变成略少于 40%。^② 南朝鲜和台湾在高速增长时期开始时 4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到 70 年代相应的比例已超过 60%。

中国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快速城市化和离农就业增长的类型? 首先,中国甚至在 1984 年仍有 72% 左右的劳动力在农村。根据任何一种标准衡量,中国依然是乡村社会。问题在于这种乡村化倾向,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自然结果呢,还是精心设计的意在限制城市发展、限制离农就业的政策产物?

毫无疑问,中国作了极大努力来限制城市化。事实上,外国观察家也经常称赞这些努力,认为这避免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常见的、如此之多的贫民窟和棚户区的急剧扩大。为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采取的是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使乡村迁移到城市几乎

^①这个数据源于 Hollis Chenery 和 Moshe Syrquin,《发展的类型, 1950—1970》(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5), 第 50 页。

^②参见注^①第 55 页。

是不可能的。人们离开乡村社区要得到允许，在城市里即使居住几天也要得到批准。如果没有批准在城市居住，这些个人就无资格得到粮食配给计划。企业招工不能自行直接进行，必须通过劳动局；而这些劳动部门只能满足那些已在城市居住的人的需求。其结果是，在国营、城市集体和个体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52年的2500万增加到1983年的11700万，增长了近4倍；相应地城市人口从1952年的7200万增加到1983年的24100万，只增长了2倍多。^①

当然这个差别部分原因是统计假象。1984年中国改变了城镇划分标准，城市人口上升到33000万，占总人口的31.9%。^②如果这个数据是可靠的话，那么，除开在若干中心城市，如上海以外，中国限制城市化的努力将不像一般所假定的那样有那么大的影响。在官方认可的城市区域十分靠近的那些郊区，居住着众多人口，接近9000万人，其中大多数除身份不同外，同城市居民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这9000万中的一部分仍然种植蔬菜，完成其他农业任务。

我所关心的是将来如何。为此目的，中国是否在1952年至1984年间城市人口从12.5%增长到31.9%或者要少一些，是无关系要的。这个比例在将来是否继续提高，并以何种速度变动，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中国城市人口继续像过去30年那样，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会增长一倍，达到6.6亿，或者说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以后15年中，城市新增居民3.3亿，是很庞大的；但从人口份额的变动来看，这同南朝鲜、台湾以及不发达世界的许多地方人均收入从300美元或500美元增长1.5倍时所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同。

^①参阅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香港：中国信息公司1984）第81页。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1985年统计调查》（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5）第19页。

这样的增长真的会发生吗？世界银行1985年的报告中假定，人均GNP的年增长率为4.3%至5.5%，这同这里使用的预测数字差不多。但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只会提高5至10个百分点。在他们其中的一个方案中，甚至没有什么提高。^①在他们提供的城市发展最快的一种预测方案中，城市人口也只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大大低于这里使用的每年5%（用中国官方在1984年对城市人口重新划定前的数据，每年增长4%）的速度。由此可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假定，中国政府将采取限制措施控制城市增长。他们预测的增长率甚至低于过去实行十分严厉的限制政策所达到的水平。

在迅速城市化的情况下，严格控制乡村迁移到城市也许是可能的，是否有理由认为这种限制也是必须的呢？过去的限制政策扩大了乡村—城市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导致了资本在工业方面的集中，当然这两者间的因果联系是很难证明的。事实是中国的政策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系极大。这样的二元结构表现为现代资本集中的城市人口单独在一个地方生活，贫穷得多的乡村人口仍然使用铁锹、箩筐和脊背移石填土。在乡村地区出生的，特别是那些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大概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同一村落。

国家实行限制政策的好处是节约了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住宅方面的投资同城市人口增长不同步。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已降到3.6平方米。^②从精神和政治的层次上说，城市居民也生活得不愉快，居住在卫生条件差和不太安全的狭小空间。外国和中国观察家都认为，防止类似的都市问题实际上倒是为了城市穷人的利益。然而世界各地的调查显示，城市贫民很少同意这种观点。这些贫民认为，自己即使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也比回

^①世界银行：《中国，长期问题和选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5），第19页。

^②参阅《中国日报》，1985年11月13日。

到乡村要好得多。如果他们不这样看，他们早就返回到乡村了。

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节省，值得继续努力进一步限制城市增长吗？现行的城市设施方面的投资对补偿以往10多年的疏忽是必须的。未来城市的生长，特别是3亿左右的人口在以后15年内进入城市，需要在住宅、卫生、交通诸方面大量投资。这用中国的术语说是“非生产性”投资，并不需要多少进口投入品，因此具有弹性。例如城市住宅每年平均要投资180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20%，这同80年代初期在住宅建设方面的费用大致相当。^①

另一种选择是试图把大多数人仍然留在乡村地区。如果把他们留在乡村，也就意味着继续让他们在农业就业，就等于宣布这部分人的收入低而不变。正如前面所指出的，1979—1984年间农业生产的突进是同克服集体农业低效率相关的暂时现象，人均粮食产出将会继续增长，但不可能使人均农业收入年增长同全国人均GNP的增长率一样高，达到4.5%至6.5%，而农业人口本身增长就达1%。

再说，在每一农村劳力平均只有0.3公顷耕地、每年增长500万农业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无论以何种速度增长，也吸纳不了3亿5千万乡村劳动力。^②中国在机械制造方面能力较强，许多农业作业机械化的费用不大，因此将会使更大份额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台湾每公顷可耕地就业在1963年和1964年降到人均0.49公顷，以后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开始下降。南朝鲜每一农业劳动力也只有0.4公顷强。中国已经低于它们的水平，

^①这个数据是这样得来的：城市居民住宅每平方米为151元，乘上每人5.5平方米，再乘33000万人口。居民住宅每平方米费用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31页。

^②由于50、60年代人口增长率高于现在，现在以至将来某个时期内劳动力增长将会高于现在的人口增长率。

并在继续下降。毫无疑问,新增的农业劳动力能够找到某种形式的生产就业,但是这种就业不会带来人均收入和消费持续、快速的增长。显然中国现时必须作巨大努力,把大量的劳动力从种植庄稼和其他有关职业方面转移出去。

中国很少有人对上述论断的逻辑产生怀疑。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农民转移出农业后,不一定允许他们迁移进城市。体现这一政策的口号叫做“离土不离乡”^①,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乡村工业化。

在1979—1984年6年间,副业生产,其中极大部分是乡村工业,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1984年在乡村集体工业中就业的人数只有1030万。十分明显,乡村工业必须以现在的高速度继续发展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吸纳刚才方案中所预测的新增乡村劳动力,即使把一些建立在城市以外的国营工厂所容纳的就业人数考虑进去也是如此。

而且,从历史上看,工业企业建在一起,从而形成城市,是有道理的。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经常的电力来源,需要发达的交通体系运输产品,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设施集中在一起,而不是四处分散在乡村各地,一般说来是最有效率的。

最近中国的乡村工业化,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国家城市工业体系的延伸。把城市和乡村都包括进去,占集体工业就业总人数50%的企业,集中在5个省份和3个直辖市;其余则分布在占总人口75%的21个省份。如果拥有分类更细的地区性资料,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是在沿海工业较发达的省份中,集体工业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

^①这个术语似乎包括进入集镇和类似的地方,但不是进入10万人以上的城市。例如参阅《农村的集镇化和建设》,《经济地理》,1985年第2期第146—149页。

例如江苏省的乡村工业基本上集中在从上海、苏州、无锡到南京的苏南一线。位于大城市的工厂越来越多地把任务转包给邻近的乡村地区，以解决生产扩张后劳动力和土地方面的矛盾。这更多地具有城市工业延伸的特征，而不是乡村工业化，这个过程无疑会继续下去。在农村的大多数人也不认为这就是乡村工业化。

在以后的15年或更长时期内，在中国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能实际地替代城市化，就必然面临着如何实现城市化的选择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政策对城市发展过程的影响很小。中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但是过去政府积极控制城市增长的努力，使人们意识到，潜在地存在代替无计划城市化的选择。

选择的原则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可以容许多少人，以及在7亿仍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中选择谁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如果在中国城市居民中进行民意测验，极有可能极大多数人赞成对新迁入城市进行严格限制。他们认为这样在住宅方面的投资，就可用来缓解已有的居住拥挤问题，而不至于使拥挤现象进一步扩大到更多人。这种观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不现实的。从经济上说，迅速的工业化伴随着辅助性服务业的发展，而这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节约劳动的技术能减少所需要的人数，但这会使工业投资超过必需的水平。从政治上说，限制政策将会加剧中国发展过程的二元性质，这等于宣布数亿农村青年本人及其他们的子女前程渺茫，而其中许多人是有天赋又有雄心的。深深植根于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难道能容许这样吗？

因此，更有兴趣的问题并不是能否让大量的人口移到城市，而是容许谁改变他们的居民身份。现行的政策结果是大多数新工人从最靠近城市的郊区中招收。但是这样的政策已经导致靠近大城市的郊区缺乏成年男劳力务农，留下妇女和儿童从事农业生产。以后将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迁移。这样生活在较远的农村，在城市工作，并在两地间往返，是很不方便的。即使现行的实践能保持

到下一个10年或更长远些,仍然有着相当的副作用,它使已经富裕的郊区农户更加富裕,而更边远的地区变化不大。限制乡村移入城市,是最近几年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大因素,继续这种限制会使问题更为严重。

关于现行政策的另一种做法,是只允许工人本身从更远的地区迁移,让他们住在宿舍里。但是这样的政策意味着几千万中国工人事实上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客座工人”(guest workers),很有点类似于在德国工业中的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这样的政策能节省在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但当人数增大后政治上可行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家庭允许迁移进城,那么如何选择,谁能迁移,又能让他们进哪个城市?现行政策强调发展那些小而分散的城镇,而不是现存的大城市。但是这只有在必须的设施所需成本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才是可行合理的。否则,所有城市的都市企业就会在附近郊区招收工人,并为他们及其家庭建造住房。

另一种政策是中央政府优先迁移那些来自最贫穷地区如甘肃和贵州省的农民。确实中国政府试图把那些较穷的农民迁移到较富裕的农业地区,但是国家除了已在耕种的土地外,很少有可开垦的土地来安置这么多的穷苦人民。^①

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中国在下个10年或20年的最优政策。关键在于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转移出多达3亿的人口。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将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改革的结果。在一个方面,2000年的中国将是这样的社会:城乡间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70%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当然他们不一定在农业就业。在另一个方面,中国城市人口将占50%;由于有选择地从最贫穷地区迁移,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

^①《中国日报》1985年11月20日第1版。

耐用消费品的影响

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增长 2.5 倍、达到 1000 美元时,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部分。在消费类型方面,也会发生急剧变动。这些变动包括,在食物结构方面增加肉的份量,更时髦的衣着,在乡村以及城市地区建筑得更宽敞、质量更好的住房。

消费类型方面的某些变化,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某些耐用消费品就更是如此,如电视机和汽车。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以前不可能发生作为个人交通工具的汽车革命,因此,这里不作讨论。但是,电视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占城市总住户 30% 左右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在工作单位、邻居及附近单位能收看到电视的人口比重就更大了。在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房顶上的电视天线四处矗立。晚上八、九点钟漫步在中国的街道上,可以发现一家又一家聚集在电视机旁。

从小就能看到电视,并很容易接触多种信息的美国人极易低估这种现象的影响。仅在 10 年前,中国的报纸电台可以告诉中国老百姓,他们的东亚近邻生活在大多数人受穷、少数人发财致富的社会里。然而,当邓小平和以后其他的领导人访问日本的时候,中国人民通过电视画面了解了日本究竟如何。日本的高技术震动了许多电视收看者。

电视同剧院不同。电视不能老是重复地播放同一画面而让任何人不断收看。这 10 年来中国人除开看由江青批准的几个“革命京剧”以外,很少有东西可看。在电视时代,相类似的限制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太可行。文化方面的检查仍然控制着中国公众允许收着的内容,然而在每夜都要播放有益的娱乐和富有教育意义节目的压力下,完全的控制是不可能的。

其他新的、无法控制的信息源也流入了中国,其中包括在国外

留学归来的几万中国学生；几百万在东南、北京和上海有亲友的海外华人；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工商界人士、学者和学生。

总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重要的是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城市和中国的沿海地区这种影响要大大超过中国内地的乡村地区。在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沿海—内地，城市—乡村的二元化是个老问题。过去当这二元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是乡村内地的价值观念占了上风。如果以后 15 年的持续增长导致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传统的农民价值观念最终会永远处于守势。

结 论

这里的两篇论文，是从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部分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开始的。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丰富的人力资源禀赋同政治环境的支持以及外向型的经济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力量的汇合所产生的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了东亚社会的转变。在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得以保留，并在全新的环境中得到实现的同时，人们不断受到东亚外部世界物质产品、观念和价值准则的巨大冲击，这方面城市甚于乡村。那种与世隔绝的、传统的农民社会在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已不复存在。

第二篇论文试图探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同东亚其他地区类似的人力资源禀赋，然而 1949 年的人均收入基础水平较低，并实行一系列很不相同的经济政策的国家，是如何起步的。到 1977 年或 1979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可同 50 年代的南朝鲜或台湾可比的水平；经济政策方面的大变动使中国愈益接近东亚邻国，但在某些方面仍有显著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中国保留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和集中计划的特征。尽管保留了国家所有制和比东亚其他地方实行更多的计划，中国的增长率达到了东

亚式的年增8%的水平。1977年至1985年间GNP增长了一倍。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以后能否保持史无前例的增长率，部分地取决于国际经济体系这个外部力量，但更重要的是东亚自身的政治环境能否继续支持迄今为止在这一地区取得实绩的政策。对南朝鲜而言，主要问题是在政府更迭时能否保持稳定和合乎宪法。对香港以及最终对台湾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到某种形式的协调。但是，下个10年重大的问题则是中国本身将怎样变动，在下一个年代里这个大国将开始向新领导层过渡。我在文中已指出了平稳过渡道路上的若干隐藏的危险，同时也指出走向改革的势头是很难扭转的。

如果政治环境仍然是支持性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经历同东亚其他地区在许多特征方面相似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转变，那么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世界后半期从闭关锁国的、贫穷的、乡村的农民社会过渡到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口的主导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部分；这个民族充分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在本世纪的后半期，很少有什么事件能同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相比拟，这无论对东亚人，还是对我们其他人都是如此。

2000年的中国经济

美国 阿伯特·基特尔

译者按：1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中国提出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要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后，中国经济前景问题更引起了世界瞩目。

这里译出的美国阿伯特·基特尔的论文，对2000年的中国经济前景进行了预测和讨论。基特尔比较了世界银行、斯坦福大学和石湾研究公司的三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模型，认为翻两番的目标可望提前到1995年实现，并对中国各部门的增长率，不同项目的外贸出口增长率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无论是在摆脱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还是在农业改革、城市改革、引进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改革的现状是很不均衡的，必须继续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到21世纪，中国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巨人，对世界经济提出新的挑战。

基特尔的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在本文最后，还附上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讨论和评论，他们主要对基特尔的乐观观点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阿伯特·基特尔博士是美国石湾研究公司总裁。他的文章发表于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88年出版的《中国的全球形象》一书中。^①基特尔先生曾对中国进行过学术访问。

一个潜在的经济巨人

虽然一些观察家,包括中国国内的和国外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生命力存有疑虑,我在这里认为中国过去10年的改革经历表明,到本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将卷入东亚“奇迹般增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已为日本、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所有力证明。当这一事件发生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经济规模之大将会超过大多数模型的预测。而且,目前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将达到惊人的复杂程度,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太平洋经济带来愈益重大的利益。

许多迹象表明,整个改革由于它的复杂性,正处于非均衡阶段。如果改革的前进势头被扼制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许多部门、许多方面的局部改革(它们正处于不同的阶段)也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或者是重新实行更强的集中控制和官僚行政控制,包括对乡村经济的政治管理;或者是继续进行改革。

最有可能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继续下去,直到实现更平衡、更稳定的一种改革组合。这中间也许有着暂时的迟缓、加速或者一段时期的政治动乱……经济改革的浪潮是如此深广,以致于不存在、

^①David M. Lampton and Catherine H. Keyser eds., *China's Global Presence*,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8.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领导联盟能重建旧的秩序。

很少有什么事件使得改革失败。除开那些无法预料后果的事件发生,比如,台湾独立运动成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的波动:公众对城市通货膨胀的反应以及政府和共产党官僚机构中中间层次的反对。但是这些事件必须对社会秩序和党的权力机构造成损害时,才会促使全新的领导层同意退回到中央计划、产出数量指标、粮食强制征购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放弃迅速取得的外国技术和经济发展这个长期的目标。从现在来看,产生这样的新领导层的可能性是极小极小的。如果不是完全的向后转,改革就必然继续下去。

中国加强国内市场机制、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结果,将使中国在下一世纪成为难以对付的经济大国,并对谋求整个世界增长和经济稳定的金融、贸易管理政策提出挑战。面临着这样一个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2000年的前景

到2000年中国经济将很容易地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官方指标。在世界贸易方面,中国将不仅在服装方面、玩具方面、而且在消费电器方面、甚至在更复杂的重工业产品如汽车部件等市场方面成为重要角色。

原先试图对未来中国经济进行预测的模型,如世界银行作的,同中国官方的口号和目标相联系,但是现在这些指示线已经过时。更符合实际的预测表明,翻两番的目标能提早到1995年实现。

保守的官方指标 到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经济实绩的数据表明,从1980至200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是极易完成的。1986年是所谓巩固的一年,其增长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表1—1比较了不同的指标和最近的实绩,指出只需相对低的增长

速度即可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表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1952—2000
(百分数)

时 期	内 容	平均增长
1952—1976a	实际增长	7.8
1980—2000	官方指标	7.2
1980—1985	实际增长	11.3
1986—2000	需要增长 ^b	5.8
1986	实际增长	9.3
1986—1990	计划增长	6.7
1991—2000	需要增长 ^b	5.4

a. 1952—1976的增长率是以5年平均计算的，中心年为1954和1974，这是为了避免起止年份的偏离。

b. “需要”指在2000年达到翻两番所需要的年平均增长率。

来源：源自“2000年目标似乎是保守的”，载《中国经济通讯》，1986年6月30日；1952—1976、1980—1985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SSB)，1986年统计年鉴；计划数据来自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摘要”，见《北京周报》1986年4月28日共28页的专版；1986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86年计划执行公报，见《经济日报》(中文)1987年2月22日。

低的经济预测 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模型，最著名的有世界银行和斯坦福大学的，以官方的翻两番目标作为依据。^① 结果，

^①世界银行，《中国：长期问题和选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5)特别是附录D，《模型和预测》，Lawrence Lau，斯坦福大学：“关于中国的计量经济模型，最终报告，第二部份”(为美国国务院准备的报告，1985)。

他们预测的很多其他经济变量也是保守的。表 1—2 总结了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并同最近的石湾 (Rock Greek) 研究公司的 11 个部门模型的预测结果作了比较。

表1—2: 中国1980—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
(年均 %)

	世界银行	斯坦福大学	石湾研究公司
农业	4.9	3.4	5.5
工业	7.1	7.8	9.9
其他	7.6	6.6	9.8
国内生产总值	6.6	6.6	8.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5	5.5	6.8

注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计算是以198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而石湾研究所是以1980年不变的美元价格以影子汇率折合成的。

来源:世界银行和斯坦福大学的测算源自石湾研究公司:《技术转移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作用》(为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准备的报告,合同号 No. 633—2730. 0), 1986年5月。世界银行的原始数据,《中国,长期问题和选择》,以及 Lau《关于中国的计量经济模型》。石湾研究公司的测算源自石湾研究公司:《中国经济的趋势,1986年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6年6月)。

由于斯坦福大学和世界银行的预测都以官方翻两番的指标为依据,因此它们预测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十分相似,为6.6%。同斯坦福的模型相比,世界银行预测的总产出结构是较低的工业增长率,略高些的农业和其他部门(主要是服务业)的增长率。

由于预测的结果要同翻两番目标相符合,因此世界银行和斯坦福模型都预测得过低。修订的模型预测20年间的总的增长率比较高。石湾研究公司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增长类型。较高的农业增长率反映了8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而较高的工业和服

务业增长率指明了以后增长的源泉。在 1—2 表中,石湾研究所估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同对总产值的估计相吻合,而总产值在 20 年间超过翻两番。

沿海经济奇迹 即使是表 2 中石湾模型对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而言,也是保守的。沿海地区,或像中国官方所称的那样“沿海一带”,已在工业增长方面大大领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方面也处领先地位。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中指出,沿海一带要在接受投资和外国技术方面得到优惠。要求内地省份必须等待地区性的“渗透”,沿海地区允许先走一步。

关于动态发展的沿海省份,预测在 200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1000 美元,明显地估计不足。考虑到沿海省份占中国人口总数已近一半(1984 年为 4 亿 2 千 5 百万,并不包括东北三省),模型对整个经济增长的预测,大大地低估了中国未来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

中国不断升级的世界贸易 预测中国实际的贸易水平是很困难的。然而,最近的经验强调,中国的贸易和其他外部经济联系要比一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这是随着中国加快出口线方面的产品生命周期革新,使得很多出口能同东亚经济其他部分竞争而产生的。

大多数外国商人特别热衷于中国潜在的进口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对外汇的严格控制,并且这种控制还会实行一段时间,因此对中国进口能力的兴趣几乎立即转变成对中国出口潜力的估计。中国无疑地将继续实行对外适度借债的计划,但是中国进口的主要限制仍然是通过出口取得外汇的能力。

甚不确定的外贸增长前景 中国关于 2000 年的对外贸易规模,并没有什么官方口号。但是对外贸易可能的结构,特别是出口,取决于中国对国内粮食消费的控制程度,煤炭出口能否成功,能否发现大量的近海石油以及中国能否迅速地为大规模生产高质量的加

工品出口取得技术等等因素。由于这些和其它因素，包括世界贸易市场的一般状况，因此预测未来的贸易，要比预测国内经济更不确定（见表1—3）。

表 1—3
中国1980—2000年出口贸易增长预测
(年均 %)

	世界银行	斯坦福大学	石湾研究公司
食 品	5.7	3.0	2.8
初级产品	7.5	3.1	7.2
燃 料	-7.0	-0.3	4.0
其 他	9.7	3.3	7.6
总出口总额	9.0	2.8	6.2

注意：出口增长率以目前美元计算。

来源：见表2。

世界银行和斯坦福反映了预测贸易增长幅度的两个极端。世界银行预测的平均增长率是斯坦福的3倍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在于世界银行预期农产品出口增长很快，而且对机械类出口的增长率作了极高的预测（表1—3并没有显示出来，把它归之于其他一项）。世界银行之所以预测高的机械出口增长率，是由于模型假定在机械制造能力方面的高投资，会使产出过剩，以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

斯坦福大学的模型预测贸易增长率低，是由于它部分地采用了过去毛泽东时代关于贸易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经济的回归分析。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斯坦福模型，都预测以后燃料出口要下降，明显是考虑国内生产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但是，最近的趋势显示，中国不仅愿意缩减国内对石油的消费以保存外汇，而且正在实

行一个出口煤炭的宏大计划。像许多产品的出口一样，煤的质量如何是能否成功出口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对煤进行精洗处理的投资得到了优先考虑。关于能源供求的模型预测中国在 21 世纪将成为精制石油品的大进口者，但是煤的出口增长更快，因此中国从长期看是能源净出口国。^①

爬行的产品生命周期 中国出口的未来前景，并不依赖于初级产品，而是依赖于加工制品的出口。由于 21 世纪世界市场的许多不确定性，最有用的对中国贸易估计，是调查中国产品复杂程度的可能途径，例如从历史悠久的出口纺织品到汽车部件和消费电器等新产品。有很多指数说明，这个成熟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在未来的 15 年中，三个项目的出口反映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它们是服装、消费电器和汽车。中国已经是巨大的服装出口者；消费电器出口在 90 年代初期或中期也会相当可观；2000 年以后不久，中国将成为有信誉的汽车出口者，在这之前，汽车部件的出口也变得十分重要。^②

中国能够在未来如此迅速地增加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领导层致力于引进技术和扩大贸易；劳动力的文化和技能；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积极进口资本物品；以及在所有主要工业部门已有的可观基础。中国的挑战是要把通常由实验室或小规模生产的产品转移到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并且质量要达到标准。

中国在 1986 年出口的成功，是改变贸易战略，从依靠原油出口到重视加工制品出口的明显实例。尽管石油出口所得外汇大大

^①这些能源方面的预测是由石湾研究公司作出的，参阅该所的中国能源模型和报告，见《中国能源报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7）。

^②关于中国这三个项目出口前景更系统、完整的讨论，参阅石湾研究公司：“技术转移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作用”。

下降，1986年总的出口收入仍然增长了10%以上。^①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质量提高以及增加了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量。

2000年的经济制度：市场和中央指导 国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外贸易复杂程度的提高，这在中国以后15年内几乎是肯定的。这表明一个新的东亚商业巨人正在迅速出现。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将是由市场和集中协调力量混合控制的，这就更加显示出中国的增长类型是同她的东亚近邻的成功共同的。

在消费品交易方面和住宅市场的有关部分将容许较多的自由交换。劳动力的流动性将会大大增加；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权力将缺乏有效的工会保护；在劳动纠纷中，中央政府将起主要作用，维护企业利益。在许多方面将存在金融市场，外汇交易将大大分散化，但在货币市场方面，仍将存在强有力的集中控制。

2000年中央对经济的指导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投资、生产率方面以及保护共产党员和城市官僚精英某种程度的特权和社会安定方面。政府预算的直接支持对关键性的发展项目仍然是重要的，银行信贷的分配不仅仅根据盈利状况，还要根据国家发展经济的偏好。

自由市场的股票和私人银行的贷款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和利润，将受到限制。即使考虑到实际需要，货币的可兑换性日益具有吸引力，仍将继续对外汇实行严格控制，以便把外国资金投入中央经济当局所迫切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仍将实行补贴，使城市生活水平高于城市生产率所能支持的水平，乡村迁入城市，仍由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换言之，中国将发展到中央计划和分散的私人激励机制以及

^①参阅《出口更加兴旺》，载《中国经济通讯》，1986年12月1日；《第四季度进口缩减，对购买的新限制》，载《中国经济通讯》，1987年2月9日。

市场信号相结合的某种新的均衡。我们很难说中央计划究竟如何。但是即使是钢铁、石油产业也不可能仅仅根据计划规定的纯粹实物产出指标来进行生产。在另一方面，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将在劳务和消费品生产领域涌现。这样，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中央控制之间的平衡是难于预测的，然而取得某种平衡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前景 中国 2000 年的希望前景，主要是从 1976 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经历中推导出来的。10 多年来，中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从未低于 4.9%，除一年以来，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保持在 6% 以上。1978 年以来，主要是由于经济改革，经济年增长率都在 8% 以上。毛泽东以后，经济不但加速增长，结构也在变动，更有利于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增长不仅是上升和加速，还更有利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①

经济改革同上述经济增长记录有关。当然，其意义除了记录本身反映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明白为什么 2000 年的中国更可能的是市场力量和中央指导更均衡的一种结合。1978 年以后的经济改革走得是如此之远，涉及面是如此之广，使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处于非均衡状态。如果它停滞不前，保持原状，这一体制将不可能持续很久。除非某些极有权威的新领导层重新实行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集中计划机制，改革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市场和计划取得新的均衡。

^①关于毛泽东去世时和毛泽东以后以最近官方发布的不变价格时间序列计算的主要国民收入项目年增长的记录，其详细内容参阅《国民收入记录》，载《中国经济通讯》，1987年2月23日。

经济改革的关键阶段

为了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到1986年底为止变动有多大、1987年将继续变动有多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经济改革分成四个主要方面：

瓦解苏联体制；计划、金融和劳务部门 以实物指标为主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是中国50年代起从苏联引进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经济中，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体系所达到的程度生动地表明，在目前的转化状态下停滞不前是何等困难。

不仅仅是计划本身在减弱，而且在大多数集中计划经济中垄断性的银行体系现在也经历十分广泛和迅速的变革。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对经济产出和增长的统计，也从强调物质产品的苏联体系转到考虑劳务产出是国民福利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体系。

在中国乡村经济中，毛泽东时代计划的两大主要内容：公社和粮食强制征购已经废除。这一变化带来了乡村经济加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在强制性征购取消的1985年，粮食产出下降。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公社管理体制先是削弱后是取消，对水利投资和水土保持造成很大损失。然而，农村改革并没有倒退，乡村经济的多样化加速发展。

在城市经济中，在1984、1985年大多数工业产品并没有下达实物计划，利润代替了实物产出作为衡量企业表现的主要标准。在原先下达强制性实物计划的地方，计划当局制定了指导性计划，这个指导性计划不像法国所创立的那样，它容许地方当局采用迂回的技术，说服国家、集体和乡镇企业，使它们的投资符合国家发展的意愿。

对中国目前经济动态机制而言，不利于经济刺激责任制的，是

扭曲限制了效率。1987年继续进行的金融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投资的自主权，中央对投资的控制进一步削弱。对年度投资重要部分的失控，是中央计划进一步削弱的明显标志。

新的乡村自主、土地、非农增长和城市联系 乡村中产阶级为货币收入耕种自己的土地，代替了公社管理和强制性的种植计划，已经触发了乡村经济中非农增长的浪潮。某些中国人说，现在只有一半，但最终会包围、占领城市，就像当年毛泽东的游击战略那样。乡村自由市场和小企业的利益，要求城市经济相应地提高生产率，因为消费品制造业的农业原材料增加了，这种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增加不是通过国营商业的补助而是通过市场的现金交易才得以实现的。如果城市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仍然是低效率和高补贴，那只能增加城乡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1985年，中国乡村企业劳动力增长165%，占全国工业劳动力的33%。乡村建筑劳动力增长了近40%，占全国建筑劳动力的50%以上。同时，从事农业的乡村劳动力，其绝对数下降了4%，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①

现在广泛承认需要新的革命，去解决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人们很少意识到，乡村经济改革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发展阶段上。粮食征购价格需要继续调整，化肥分配体系迫切需要重新组织，自发产生的乡镇工作和产出实际上不可能压制，因为到目前为止并不掌握在国家经济领导者手中。紧缩乡村信用，会冒损害整个经济增长的政治风险，这个结果无论是谁都不希望的。

简言之，乡村经济改革不能停滞，倒退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些中国人预期，在2000年中国乡村工业的劳动力占中国工业劳

^①中国官方统计只是最近才报告这些和其他一些关于非农乡村经济的详细情况，对这些趋势更详细的讨论，参阅《乡村劳动对国营部分的挑战》，载《中国经济通讯》，1987年1月26日。

动力的一半左右。^① 这样迫使城市经济在产出和市场方面作出反应，也是不容回避的。

城市企业改革：投资、价格和管理 1987年最敏感的经济改革是在城市工业管理方面，这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的核心。中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曾特别反对削弱党的干部控制工厂经营活动和同企业管理有关的利润分配。1984年以来，党的控制逐渐让位于企业经理的管理。

这个朝向“经理控制”的趋势，十分清楚地说明，目前改革的非均衡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在这里，就是走向更强有力的“经理控制”。1984—1985年的财政改革，把企业全部利润上交给国家作为财政收入这个传统的毛泽东体系转变为对企业征收所得税。结果，从1985年起，过去在预算中只有正的企业收入线现在变成了两条线：一条是正的税收线，另一条是负的企业补贴线。原先隐蔽的补贴，现在对改革的赞成者还是怀疑者来说，都是可见的了。

中国在财政上是保守的，正在讨论减少并最终消灭现存的如此明显的赤字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要么向后退，放弃企业税，把这两条预算线再合在一起；要么继续实行“责任制”方面的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和利润。

首先在一些试点单位实行的所谓“企业管理责任制”，于1986年9月推广到全国范围，11月的修改条例把企业合法代表的权力从党委书记手里完全转到了企业经理手中。在经理负责的体制下，党的书记和职工代表大会仍有重要作用和权力，但是条例明确宣布法人代表是企业经理。^②

^①参阅《乡村产值中工业高于农业》，载《中国日报》，1986年11月14日。

^②具体请参阅《国营工业企业的三个条例》，载《经济日报》（中文），1987年1月12日。

经理负责制最重要的结果是在管理决策中，强化了利润率的作用。经理负责制明确了谁该对成本和收益负责。没有经理负责制，价格改革——也许是城市工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就会收效甚微，因为较大的亏损必须补助，较多的利润要上交财政。某些产品价格的局部改革是1986年企业大亏损的重要原因。

重要的还在于，随着实物计划的大大削弱，经理负责制使价格改革、银行、企业财务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刻不容缓。经理总想买得便宜，卖得贵些，如果国营市场不能满足这点的话，他们就在自由市场和黑市上这样做。随着留用利润增加和市场的进一步分散，增强了投资的自主性，这也增加了继续进行价格改革的压力，不然的话，资金就会被利润率信号错误地投向并不怎么重要的部门。^①

正像农村经济一样，城市工业改革走得如此之远和如此之快，停滞不前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极端保守的力量根本扭转目前的政策，重建已被废除的官僚计划机制和组织，或者是继续改革，直到在大大减少中央控制的环境下进入新的均衡。没有迹象表明在中国有关领导层中存在着这样的保守力量。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滞和几乎不可能倒退的第四个方面是引进外国技术 引进外国技术和提高生产率是邓小平改革方案所要优先考虑的方面。无论是谁都同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现代化，引进外国技术则是必要的。

结果是，扩大外贸、举借外债和外汇流通等，一一得到批准。生产机械的进口逐渐构成了中国进口的主要项目，消费品的进口刺激了消费者的欲望，并迫使工业企业不断取得外国生产能力。情形似乎是这样，中国购买得越多，学习外国技术和外国产品越多，那么对它们的需求就越大。

^①关于不同的国营工业部门差别很大的资本收益率的实际预测，参阅《中国混乱的利润率：强调价格问题的尖锐差别》，载《中国经济通讯》，1987年2月23日。

重要的趋势并不在于取得外国技术本身，而在于由外国技术刺激起来的欲望。因此，外贸和引进技术方面的停滞不前是极其困难的，即使决策者想这样做也不行。

对于引进技术的态度，可以从中国对待 1984—1985 年的外债危机和 1980—1981 年相似的外汇危机的不同反应得到说明。对待 1980—1981 年的外汇危机，中国急剧紧缩进口以保持贸易平衡和积累外汇储备。但在 1984—1985 年，中国认为急剧紧缩是破坏性的，依然从优惠的和商业贷款取得外汇，以保持进口水平。

1987 年一季度的贸易统计清楚地表明，当出口处于恢复阶段时，当局也减少进口。^① 限制政策明显地具有补偿性，继续大规模地取得外国技术的前景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同经济改革的其他三方面相似，其政策和行为的一般模式是导向进一步改革，而不是导向停滞和倒退。改革在所有方面继续下去是极其可能的，其结果是更大规模的经济，更复杂的外贸和国内机制。这些要超过大多数人的想像。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中国经济巨人的出现，其反响必将越过国界。在较短的时间里，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劳力的中国实现工业化，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必须考虑这样的中心问题：如何为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准备足够的世界工业品市场。

由于中国的规模，她将抱怨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利的贸易条件。同时，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将加速把经济重心转到服务业上。总之，只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充分弹性，并对他们的国内经济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展，世界经济也会随

^①参阅“第四季度减少进口”和“第一季度贸易恢复：几乎消灭赤字”，载《中国经济通讯》，1987年5月4日。

之发展。

× × × × × × × × × × × ×

评论和讨论^①

亚当·M·皮尔斯基：^②

我想对基特尔先生关于中国已经取得的高增长率，将会导致在1994年实现翻两番的观点表示自己的一点想法。基特尔把数字同以前毛泽东时代的平均7.8%增长率相比较，但是从历史上看，1968年的水平就低于1960年。中国的高增长率经常导致以后的停滞之年或者相当高的负增长率，到目前为止中国增长率较高并不能证明以后也能这样发展。

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规模太大，就不可能像新加坡、台湾、南朝鲜那样。如在60年代南朝鲜能乘人不备悄悄进入世界市场，然后突然成长。但现在的南朝鲜规模太大了，就不可能重复这一过程。相同的，没有人会允许中国像60年代南朝鲜那样。

而且，考虑到外债问题，我所预期的世界贸易增长率远比人们以前期望的为低，这就会使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相信改革将会继续下去的唯一理由是现在较高的生活水平。一些人在改革中有损失，但许多人会得益，而且得益很多。我们不是讨论理论上的争论，成百万人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高收入，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那样，没有免费的午餐。西方经济体制

^①下面有关内容是海外学者对阿伯特·基特尔《2000年的中国经济》一文的评论和讨论，这里选译其中的一部分。

^②亚当·M·皮尔斯基(Adam·M·Pilariski)为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经理。——译注

为生产提供自由,同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能没有权力。如果那样,它就不能进行。

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家原先靠左边行驶,现在突然决定要靠右边行驶。于是请一些学术顾问讨论要作出哪些改变、如何改变的问题。顾问们决定作一个试验,20%的人改为右边,其余仍靠左边。我对中国的体制也有点类似的感觉:要么人人靠右边,要么人人靠左边。

罗杰·W·萨利文(Roger W·Sullivan);

很少有分析家具有如此大的勇气对待数字,并从数字中得出结论,而基特尔先生就是这样做了。

正如基特尔先生提到的,中国的《红旗》杂志最近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了评论。但是,《红旗》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我认为这一观点不仅为中国所承认,而且也是一致同意的。

牢牢记住对待中国的数据,如指标和其他类似的,不能看得过于认真。

这很有点类似于人们希望10000岁,而不是8462岁。我认为分析家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中国人的数据。

在世界贸易中,中国正愈益变得复杂,这是肯定的;我们已在过去几年看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中国出口的50%以上是加工制品,中国的出口显示出惊人的复杂性,并且也有能力在美国市场上外理销售中的问题。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把向世界出口作为他们的发展目标。他们取得外汇是想进口。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自力更生从国外进口高技术产品。他们并不实行把出口作为增长发动机的政策。

中国具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对出口有着成见。我认为这些成见仍将继续存在。事实上,不管发展水平如何,无论是不发达的大

国，还是发达的大国，世界各地都有这样有趣的关联现象：大国对出口有类似的观念。出口占他们的GNP的比重较小。

我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十分成功地使许多产品达到国际标准，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设计方面，这是因为它们极大部分产品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他们将继续采取保护政策，不仅仅防止外国竞争，而且不明智地反对外国样品的刺激效应……

我们确实一贯低估中国通过出口取得外汇的能力。但是，中国不可能像南朝鲜、台湾和日本那样成为世界消费品市场的主要角色。

丹尼斯·F·西蒙：^①

我要在这里讨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增长的数量方面，另一个是增长的质量。在增长的质量方面，即增长的组成和性质，中国的增长确实不像其数字表现出来的那样纯粹和简单。

我们显然不能过分地看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以中国1978年的统计数字外推，我们是不是确实从一个十分低的基数和劳动生产率出发，以便使得这一时期的增长幅度显得如此之大？……

当然我承认，我们谈论的1978年之前和之后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1978—1986年之间中国增长率处于跳跃时期，但我们能不能推论，中国经济能否这样一直跳跃下去直到2000年？

^①丹尼斯·F·西蒙 (Denis F. Simon) 为美国塔夫斯大学的国际贸易副教授。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底为多少？

新加坡 黄朝翰

译者按：本文重点讨论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问题。

中国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认为是 350 美元，同印度差不多。这一结果是根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传统方法得到的。任一国家计算国民生产总值都用该国自己的货币来衡量，其统计方法是简单的。首先统计实际产出，然后以现行的市场价格加以计量。为了进行国际比较，本国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要以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成美元。

这种国际比较的方法是有许多严重缺陷的。除开发展中国家数据资料不准确外，要把别国货币折合成美元只有在任何国家的所有产品和劳务价格都同当年的美元价格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这种情况是很难满足的。

几位西方学者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差别，试图用新的方法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最著名的有欧文·克拉文斯、萨默斯、麦迪逊。他们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价格数据，利用计算机数据库处理，就可应用新方法加以计算。1991 年 5 月发表的最新测

算，中国 1988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472 美元。

本文译自 1991 年 10 月 18 日出版的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物第 18 期。^① 作者黄朝翰为该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传统指标引起的误解

1.1 由于缺乏更好的衡量尺度，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一直使用一国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国民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数）来判断该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当用这一尺度来衡量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大国时，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在 80 年代无论是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在过去的 10 年中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甚少。显然，在这种场合传统指标没有能反映中国在过去 10 年中所取得的物质方面的实际进步和水平。

1.2 1978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第 1 期《世界发展报告》，在该报告中中国 1976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410 美元（同年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50 美元，新加坡为 2700 美元）。在世界银行以后几年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78 年跌至 230 美元，然后围绕着 300 美元左右波动，直至 1989 年达到 350 美元（1989 年印度为 340 美元，新加坡为 10450 美元），具体数据见图 7-A 所示。外行人肯定对中国 80 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停滞不前、而其他发展并不很快的亚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幅度提高（正如图 7 所示的那样），感到迷惑不解。

^① John Wong, What is China's Per-Capita GNP? IEAP Background Brief No. 18, 18 October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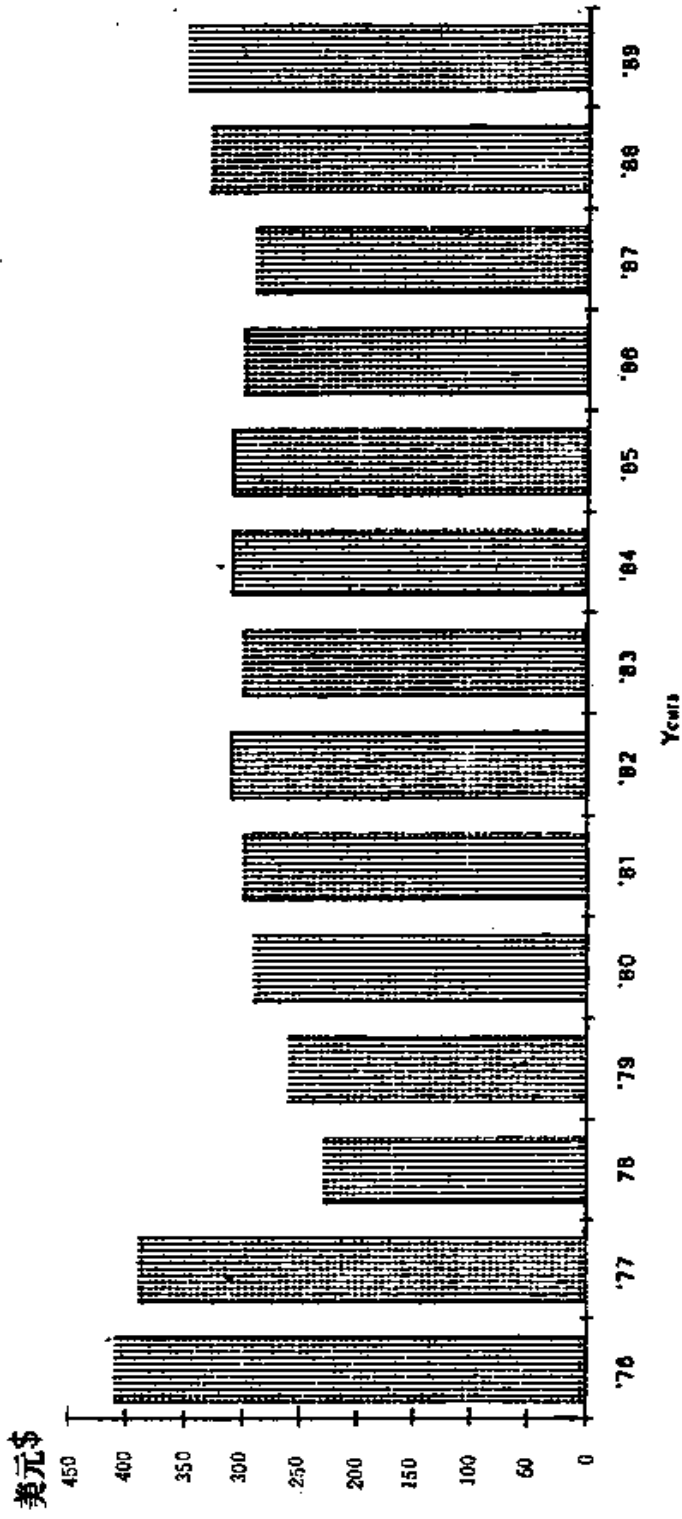


图7-A 中国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6—1989（以美元计量）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8—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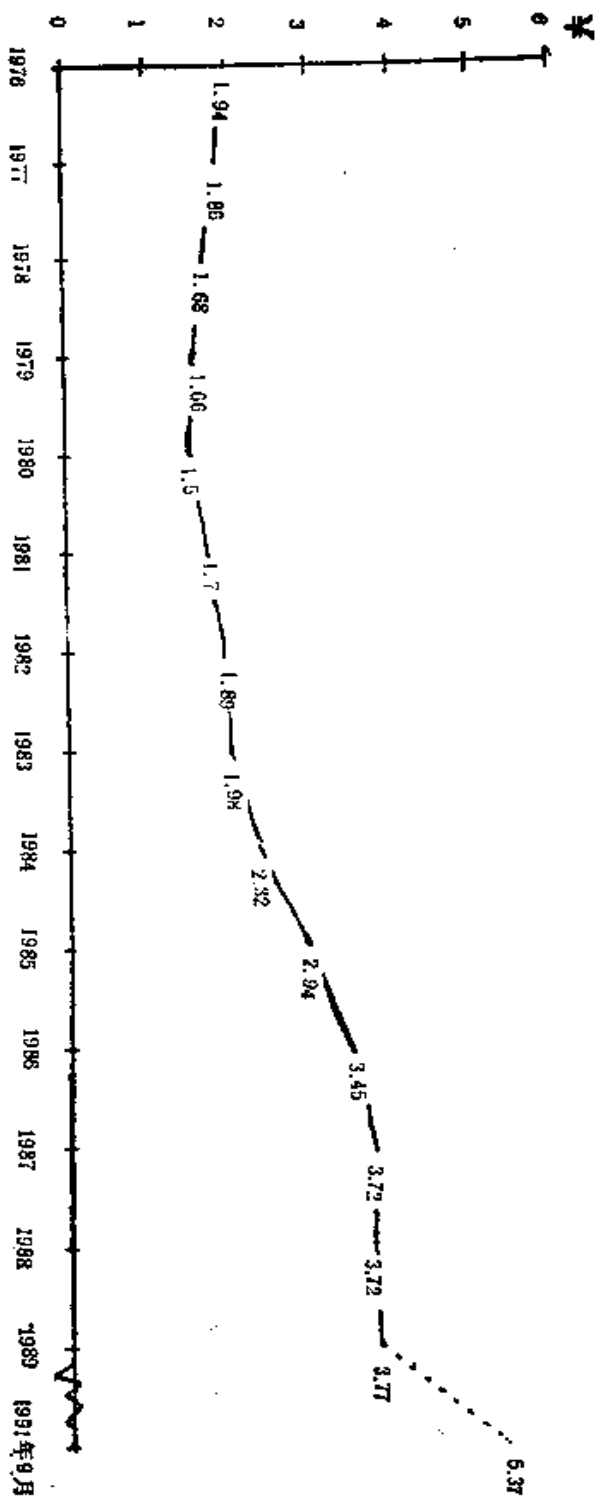


图7-B 中国汇率的波动：1976—1991（人民币对美元）

来源：经济与发展资源中心、亚洲开发银行，“亚太国家主要发展指数”（1989—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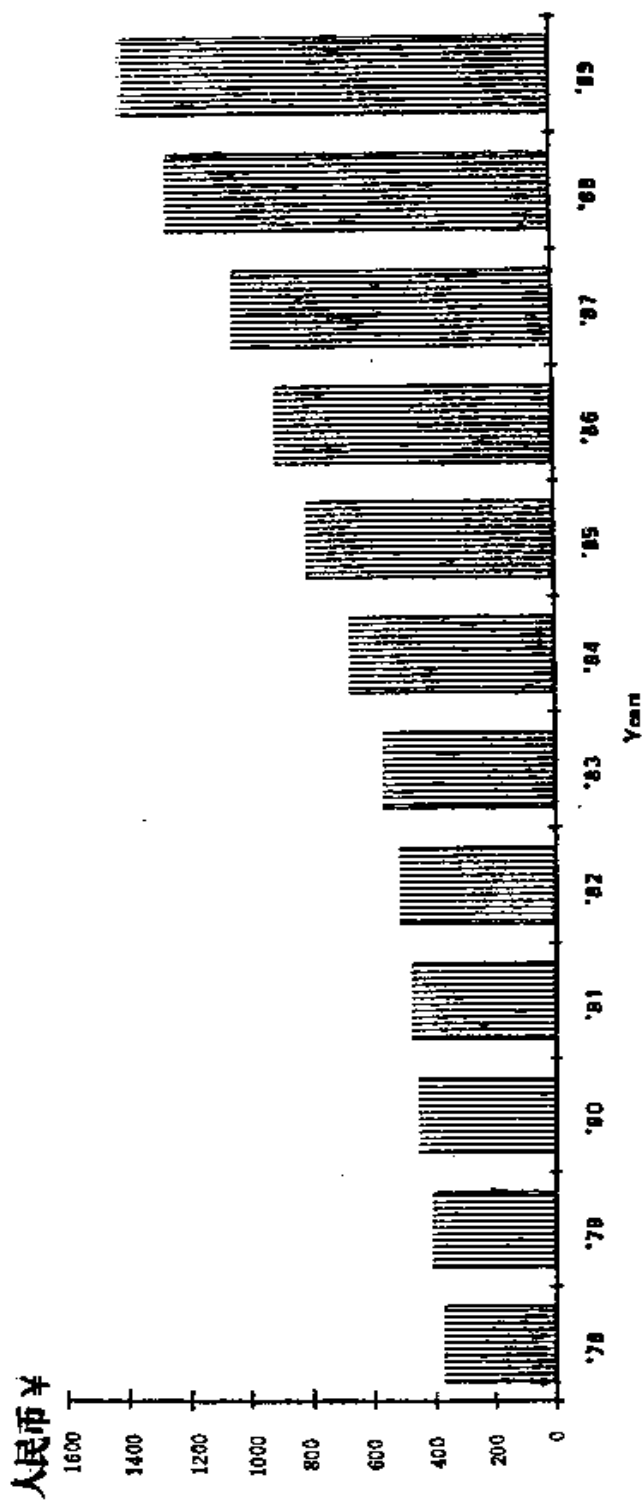


图7-C 中国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8—1989（以人民币计量）

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分散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宏观稳定和工业增长，1990》，《中国统计年鉴1990》。

1.3 经济学家会用下面的理论解释刚才提出的迷惑不解的问题：中国当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帐户体系，因此世界银行高估了中国70年代后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整个80年代中国用美元表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由于人民币的几次贬值而下降了。人民币对外汇的汇率变动可参见图7-B。因此用人民币表示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明显地呈现上升趋势。不管怎么说，这个结果显示现行的以美元计量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重要的经济指标是有重大缺陷的。

1.4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许多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用美元计算的话，不可避免地人们就要以此为标准来比较某个国家的富裕或者贫困程度，比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例如新加坡就可能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判断：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30倍；从经济上说或者从物质生活方面看，平均说来新加坡人要比中国人好30倍。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普通的新加坡工人拿回家的货币收入可以数倍（也许是10倍）于中国普通工人的货币收入，但肯定地说不到30倍。而且新加坡工人用其收入购买到的物品和劳务数量是绝对不会有中国工人购买的物品和劳务数量的30倍——我们都知道大多数日用必需品和基本劳务的价格同新加坡相比，中国要便宜得多。

1.5 为了纠正国际比较中的这些偏差，经济学家指出要区分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概念。作为传统的衡量尺度，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被许多政府和国际传播媒介广泛使用。得到这一指标极其简单，即把以该国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就复杂得多，它要考虑到不同国家货币的购买力，为国家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合适的尺度，这就要把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统统以同样的“国际价格”或共同的“国际美元”加以衡量。这就需要解决同样牌子的一瓶啤酒在新加坡值4.20新元（即

新加坡元),而在中国只值 1.20 元人民币(合 0.40 新元)的问题。

1.6 最近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用 1980 年“国际”价格计算了中国 1987 年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结论为 1748 美元,而世界银行用传统方法计算的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290 美元,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 6 倍。^① 罗伯特·萨默斯和阿伦·赫丝顿教授做了另一个独立研究,以现行的“国际价格”计算中国 1988 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472 美元,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该年名义水平为 330 美元,即前者是后者的 7 倍多。^② 这个新的数据把中国排在世界的低中等收入(lower-middle-income)国家,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是低于泰国。而且,新加坡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中国的 4.2 倍,而不是像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指出的是中国的 30 倍。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中国并不是很贫穷的。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2.1 国民收入(NI)、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之间差别很小,因此经常交换使用。一般而言,这三个概念都是衡量某个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的总的货币价值。^③ 除开那些有着大规模

^①Angus Maddison:《20 世纪的世界经济》(巴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展中心,1989)。

^②Robert Summers,Alan Heston,“宾夕法尼亚世界表之五:扩展的国际比较,1950—1988”,《经济学季刊》(1991 年 5 月)。Summers 和 Heston 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国际比较项目这一领域是 50 年代末期由 Irving B Kravis 开创的。

^③“国民收入”更像一个普通概念。“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在一国国境范围内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国民生产总值”计量的是本国居民生产的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总价值。因此,这个概念应包括国内的总产出加上本国居民从国外取得的要素收入。

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家,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接近的。对中国来说,用人民币计量的这两个概念几乎完全相等。

2.2 对所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而言,由联合国标准化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帐户,称作为国民帐户体系(SNA)。^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准确地计量SNA,其面临的难于克服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即可利用的数据资料方面的限制和定义方面的问题。这是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和服务业方面的生产活动占很大比重,这就带来了计量方面的极大困难。而且,更有可能低估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许多经济活动并不通过市场体系,因此也就未能进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

2.3 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关于服务是“非生产性”的理论,一般应用更狭隘的物质净产值(NMP)概念。净产值大体上是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扣除若干,但并不是全部劳务的价值。^②中国原先习惯于计算净产值,在80年代初期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①一般而言,国民收入可用三种方法加以计量。(1)收入法:把工资、租金、利息、利润(股息、红利和未分配利润)全部加总再加上企业间接税形成以市场价格计量的国民净收入。(2)价值加总法:把全部厂商的所有最终产出加总或把生产各阶段的价值增值加总(即销售额扣除中间产品的成本,避免重复计算),就得到了以要素价格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3)支出法:把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存货库存变动额全部加总,再考虑进口和出口额的变动,就可得到以要素价格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后用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加以调整,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了国民生产总值。

②社会主义国家计算国民收入,关键的步骤是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因此所有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活动和劳务是“物质生产”,其他包括服务于个人的劳务和公共服务是“非物质生产”,并不包含在净产值中。这样区分会导致某些相当荒唐的结论,比如运输货物的火车是生产性劳务,运输乘客的则是非生产性劳务。

基金组织后,开始采用国民帐户体系(SNA)。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简单地加上非物质生产性的劳务,就可把物质净产值转化成国民帐户体系。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民帐户体系扩展到那些没有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计算上的偏差,即众所周知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服务的价格是偏低的。

2.4 尽管存在着许多概念方面和实际方面的困难,国民帐户体系仍然应用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基于同样的理由,国民净产值仍然应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以此分别计量经济增长。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舍此没有更好的替换尺度。用相同的国内价格体系来比较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严重的问题。^①但是,国家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直接就会引起传统国民帐户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或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国家而言,问题就更为突出。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把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根据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计算,这实际上是所有国际组织的做法。这样计算出来的仅仅是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或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2.5 现在相当明显,特别是由于汇率的急剧波动采取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使得一国的汇率不可能真正地反映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外汇控制,高估了它们的汇率,许多工业化国家也发现它们的汇率由于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结果被人为地高估或低估了。^②即使一国的汇率处在自由市场均衡价格的

^①某一阶段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比较,从技术上说称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时点比较”。但是长时期的比较会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动引起严重的问题。

^②我们这里的讨论就涉及到“名义汇率”和“有效汇率”的概念。简单说来,名义利率是指由于资本或利率的运动引起货币方面的变动,所产生的现行市场汇率;有效汇率是由一国同该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决定的汇率。因此,多年来香港的港元由于实行钉住美元的政策,用“有效汇率”的概念来衡量就低估了港元的币值。

汇率水平时,即两种货币兑换率是由购买力平衡(Purchasing Power Parity)决定的,这时的汇率也只是反映了那些进入国际贸易的产品和劳务的相对购买力。这些产品称作为可贸易产品。许多产品(如当地新鲜水果)和大多数的劳务活动(从建筑到公务员、教师和理发师等)是非贸易性的,它们从不进入国际贸易领域,或者由于贸易限制、贸易保护的原因,不能进行世界性贸易。由于现行的汇率并没有包含这些活动,因此在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国家间的比较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低估低收入国家(含有许多非贸易性产品和劳务)的偏向。^①

2.6 毫不奇怪,把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根据汇率折算成以美元为单位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概念,并没有为国际间的比较提供可靠的基础。如果以名义量计算,日本198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是中国的68倍,但是100日元在日本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如果折算成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东西要比日本多得多。国际间比较的主要目的是要不受价格扭曲的因素影响,比较产品和劳务的实际量。价格扭曲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两种货币交换价格即汇率的扭曲;二是由非贸易活动引起的价格扭曲。这就提出了著名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2.7 欧文·克拉文斯教授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比较研究

^①这一问题的含义可以简单地举例说明:起初日本成功地出口了许多加工品如小汽车、照相机等,这就导致日元升值和日本工人的高工资。后来由于内部要素的流动,日本旅馆业的工人(非贸易性的)也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即使他们的劳务没有进入国际贸易领域。最终结果是以美元计量的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由于日元升值而提高。与此相反,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加工品出口方面没有成功,具有更多的非贸易性产品,因此这些国家货币的对外价格(即汇率)较低。当然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贸易性的和非贸易性的工人工资都较低,最终结果是它们的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折算成美元(即它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也较低。

领域的先驱者。他和他的同事们不辞辛苦地搜集了 150 个国家的资料,并把它们精心计算成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目的是为了无偏差地多边比较。^① 基本的方法论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搜集有关国家上百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并把国民支出分类,计算出每一种产品或劳务的加权平均“国际价格”,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克服同类产品价格的极大差异。然后以平均国际价格为基础,计算出购买力平衡的汇率,并得到“国际美元”。“国际美元”可以平衡所有参与国货币的购买力。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本准则,是要使所有国家的全部产品和劳务以单一的价格水准来计值。^②

^①克拉文斯在 50 年代末期首先开始从事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后来又同罗伯特·萨默斯和阿伦·赫丝顿合作,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主要的发现在 1978 年出版。见 Irving B Kravis, Alan W. Heston, Robert Summers, 《实际产出和购买力的国际比较》(巴尔的摩,世界银行出版,1978)。以后他们继续从事宾夕法尼亚世界表的研究,1980 年发表第一部分,1982 年发表第二部分,1983 年发表第三部分,1988 年发表第四部分,1991 年发表第五部分。

^②购买力平衡是基本的价格指数,它不仅应用于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价格的比较,而且可以表示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货币的比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购买力平衡也是平衡两国价格水平的交换率。例如,假定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元之间的现行汇率为 1 新元 = 1.50 马来西亚元,反映了这两种货币间真实的购买力平衡,这就意味着一个持有 100 新元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超级市场购买到的东西同一个持有 150 马来西亚元的马来西亚人在吉隆坡的超级市场购买到的东西一样多。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1 新元 = 1.50 马来西亚元的汇率也就是购买力平衡交换率,这两个国家的国内价格可以看成是两国的“国际价格”。而且,所谓的 1 个“国际美元”对它们来说,一是相当于 1 个新元,另一个相当于 1.5 个马来西亚元。

当然,现实的世界并不像上例描述的这种简单均衡情形。实际上,要为如此众多的国家计算购买力平衡是相当复杂的,也存在着加总方面的技术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见《购买力平衡和实际支出》(巴黎,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经济和统计部,1985)。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3.1 根据麦迪逊的计算(如图8),中国1987年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48美元,或者说6倍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水平。由克拉文斯的同事罗伯特·萨默斯和赫丝顿以1985年价格计算的中国1988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08美元,以现行价格计算则为2472美元,即比世界银行公布的名义水平的7倍还多。这就是说,以世界平均价格来计算,中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传统的名义量的6倍或7倍多。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1987—1988年国内平均价格水平只是世界平均价格水平的1/6或者1/7。^①这样似乎印证了许多常在中国访问的旅行者的普遍印象(图8把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

3.2 表3也支持了普遍的理论观点:国家越是贫穷,根据购买力平衡标准所计量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就压得越低。因此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世界价格水平相比少算了2—3倍,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相当接近它们的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对新加坡和台湾而言。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台湾1988年的价格水平相当接近平均的世界价格水平。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偏离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如此之大,或者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什么压得如此之低,要比印度低得多?

3.3 部分地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价格体制一直处于扭曲状态。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特别是有关个人和

^①从1988年中期开始,中国的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在1988年12月达到29%。虽然在199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1987年以来中国的价格水平确实上涨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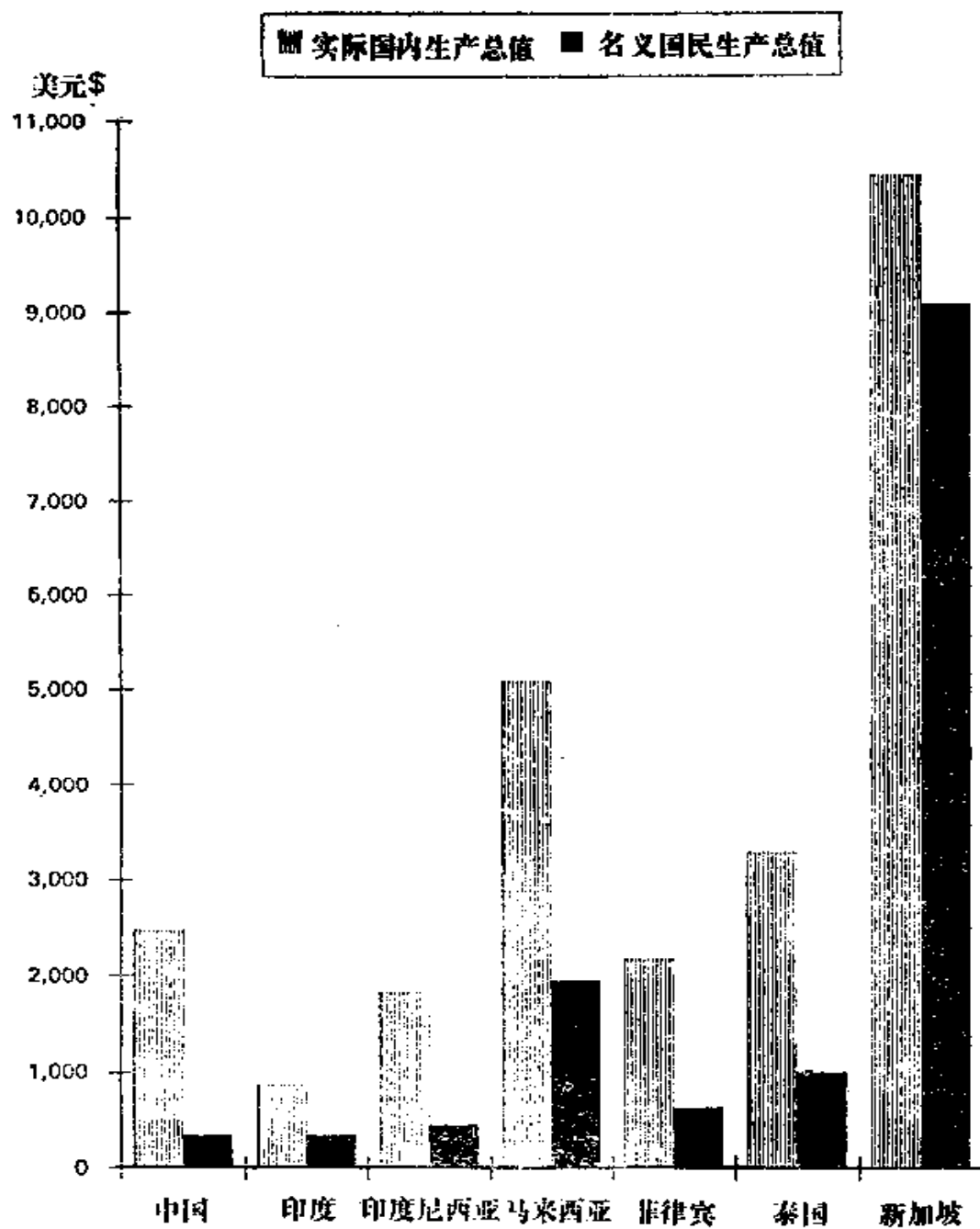


图 8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1988)

来源：表 3、B 列、C 列。

表1：从亚太地区范围看中国的名义人均

年 代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中 国	410	390	230	260	290	300	310	300
日 本	4910	5670	7280	8810	9890	10080	10080	10120
东盟								
印 尼	240	300	360	370	430	530	580	560
马来西亚	860	930	1090	1370	1620	1840	1860	1860
菲 律 宾	410	300	510	600	690	790	820	760
泰 国	380	514	490	590	670	770	790	820
四小龙								
香 港	2110	2590	3040	3760	4240	5100	5340	6000
新 加 坡	2700	2880	3290	3830	4430	5240	5910	6620
南 朝 鲜	670	820	1160	1480	1520	1700	1910	2010
台 湾	1041	1193	1443	1758	2155	2443	2419	2573
加以比较								
印 度	150	150	180	190	240	260	260	260
美 国	7890	8520	9590	10630	11360	12820	13160	1411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8—1991），台湾数据源于

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计量)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年均增长率	
						人均GNP	国内生产总值
310	310	300	290	330	350	5.70	9.70
10630	11300	12840	15760	21020	23810	4.30	4.00
540	530	490	450	440	500	4.40	5.30
1980	2000	1830	1810	1940	2160	4.00	4.90
660	580	560	590	630	710	1.80	0.70
860	800	810	850	1000	1220	4.20	7.00
6330	6230	6910	8070	9220	10350	6.30	7.10
7260	7420	7410	7940	9070	10450	7.00	6.10
2110	2150	2370	2690	3600	4400	7.00	9.70
2890	2992	3646	4825	5798	6889	7.90
260	270	290	300	340	340	1.80	5.30
15390	16690	17480	18530	19840	20910	1.60	3.30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90》(台北, 1991)。

公共服务部分,在原先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帐户中严重偏低,因此在相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要作较大的调整。例如,中国的集体医疗、教育服务和公共交通部分其价格水平只有世界平均价格的几分之一。^①

3.4 中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此大幅度地向上修正对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总量没有变动,变动的仅仅是它们的对外价值。中国和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一样,并不热衷于向上修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许是担心丧失一些贸易优惠。^②对中国而言,变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标价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动。肯定地说,对北京街头的行人而言,中国198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30美元还是应该为2472美元,对他的物质生活没有任何差别。所有外行人能说的也许是:中国从经济上看比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表明的要好得多。^③

^①另一方面,中国无论是个人服务还是公共服务是十分差的。但在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无论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都并不考虑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质量影响到价格水平。基于这一理由,人们也可以认为,根据世界的平均标准,中国许多官僚的服务价格又被人为地抬高了!

^②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中国是“一穷二白”。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意味着从贫穷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除开丧失贸易方面可能的优惠外,一个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将不再具有从世界银行取得软贷款的资格。而且,它必须向有关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机构等交纳更高的费用。

^③在世界银行统计分组中,中国较低的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使它处于“低收入组”中。中国的社会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入学率、平均寿命和营养水平等,使中国处于“中等收入组”中。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指标同经济指标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估计中国有较高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表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1987)

	A 以“国际美元”计量的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1980年价格) 单位: 美元	B 以美元计量的名义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世界银行使用) 单位: 美元	C “实际”与“名义” 的比率, A/B	D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	
				1950—1973	1973—1987
中 国	1748	290	6.02	5.80	7.50
印 度	662	300	2.20	3.70	4.10
印 尼	1200	450	2.66	4.50	5.40
菲 律 宾	1519	590	2.57	5.00	3.20
泰 国	2294	850	2.70	6.40	6.20
台 湾	4744	4825	1.02	9.30	7.80
南 朝 鲜	4143	2690	1.54	7.50	7.90
日 本	9756	15760	-1.62	9.30	3.70
美 国	13550	18530	-1.37	3.70	2.50

注释: A反映了1980年价格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衡。

B为本国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以现行汇率折算成美元的传统计量方法。

来源: A来源于Angus Maddison,《20世纪的世界经济》(巴黎, 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发展中心, 1989),

第19页。

B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台湾数据源于《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台北, 1990),

表3: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1988)

	(A)		(B)		(C)		(D)
	1985年国际价格计量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美元	100*	现行国际价格计量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美元	100*	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8) 单位: 美元	“实际”对“名义”的比率B/C 单位: 美元	
中国	2308	100*	2472	100*	330	100*	7.50
印度	786	34	870	35	340	103	2.60
东盟							
印尼	1714	74	1822	74	440	133	4.10
马来西亚	4727	205	5070	205	1940	588	.60
菲律宾	1947	84	2168		630	191	3.40
泰国	2879	125	3282	133	1000	303	3.30
四小龙							
朝鲜	5156	223	5682	230	3600	1090	1.60
台湾	4708	247	6528	264	5798	1757	1.10
香港	13281	575	14014	567	9220	2794	1.50
新加坡	10417	451	10417	421	9070	2748	1.10
日本	12209	529	13645	552	21020	6369	-1.50
美国	18339	795	19851	803	19840	6012	1.01

*指数以中国为基数

注释: A, B是以国际价格统一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反映购买力平衡。

C是把国内生产总值以现行汇率折合美元的传统方法。

来源: Robert Summers, Alan Heston, “莫夕法尼亚世界表之五: 扩展的国际比较, 1950—1988”

《经济季刊》(1991年5月)。